日本近现代史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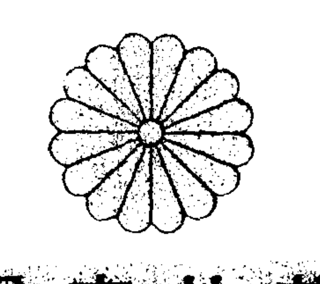
〔日〕今井清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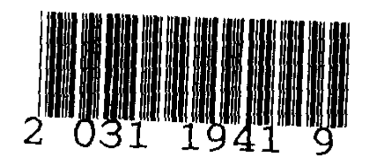


日 本 丛 书 • 日 本 丛 书

日 本 丛 书 • 日 本 丛 书

商 务 印 书 馆





日本丛书

日本近现代史

第二卷



〔日〕今井清一 著
杨孝臣 郎唯成 杨树人 译
邹有恒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日本近代史 II
今井清一 著
据岩波书店 1977 年 12 月版译出

日本丛书

日本近现代史

第二卷

〔日〕今井清一 著
杨孝臣、郎唯成、杨树人 译
邹有恒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98-8/K·248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 000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6 千字
印张 7 3/4

定价：3.85 元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尚希垂察。

编　者

1991年4月

目　录

序　言

本书作为《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叙述了从日俄战争起到九·一八事变前夜四分之一世纪有余的历史，上承远山茂树著的《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下接藤原彰著的《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

在此时期，日本迅速完成了帝国主义的发展，在国民生活方面虽还落后，但已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日本利用二十世纪初期国际间的对立，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逐步蚕食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就乘此良机向东亚扩张势力。日本成了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使它在亚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中陷于孤立，并竟然同它为敌了。另外，这一时期又是处于广义的大正民主政治时代，以反对专制政治、确立人权和获得政治自由为目标，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群众运动。但这个运动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出现了种种偏差。

1917 年俄国革命和第二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东亚，也以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为开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由于米骚动的冲击，日本也建立起正式的政党内阁，但由于面临根本上摇撼帝国主义的这种动向，便加强了走向反动的倾向。民主政治运动，一方面对这种解放运动表示共鸣，有时进行协助，但真正面临这种情况时，帝国主义体制下的人民群众如何应付它，却是个严重的考验。

本卷以政治、外交领域为重点，力求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的叙述。这时总想弄清楚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构，尤其是它的具体组

织。对个别事件往往叙述过细，其目的就在于此。在考虑当前的日本问题时，联想到的事也的确不少。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以前有些先驱的成果，但整个来看，在战后相当时间里处于空白阶段。直到最近，才把研究中心放在民主运动和人民群众的动向上，盛行起来，成果也多了起来。在这种研究进展的鼓舞下，才写出了这本书。但未能总结之处还不少，由于这个时期的研究涉及到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社会运动等各个领域，尽量把所有重要的研究和史料注释出来。

本卷没能如期写完，第一卷出版后拖了这么久，真对不起各位读者。在这期间，岩波书店诸位给予多方面帮助，谨表谢意。

今井清一

1977年11月

序论　日俄战争的意义

1904到1905(明治37到38)年的日俄战争，对于世界不久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欲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都是一个划时代阶段。

日本和俄国围绕着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统治权进行了战争,包括这个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当时曾是国际政治的焦点。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急剧活跃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掠夺殖民地的竞争,甲午战争以后在东亚激化了。因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时，俄、法、德三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归还给中国，还向在中国拥有强大势力的英国进行挑战，展开了提供借款、攫取铁路权益和租借地的竞争。美国也在美西战争中夺取了菲律宾,要求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事件一发生，日本便借口英国要求进行出兵，使列强承认了“远东宪兵”的作用。这个事件以后,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日本便和害怕俄国南下的英国结成日英同盟,接着因要求俄国撤兵,发生了日俄战争。在日本的背后,站着英国和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美国;在俄国方面,有结成俄法同盟的法国和期待俄国东进的德国。

欧洲最大的陆军国和亚洲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日俄战争，是普法战争以来的一次正规战争。两国把总计二百万人的大军派到“满洲”,用精锐的武器,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战争达十九个月,演成了消耗战。两国都加强了战争动员,由于所付牺牲和负担过重,使两国的政治、社会受到很大冲击。两国在军需和资金方

面分别得到了列强的支援，战争的进行和结束受到这些列强的约束。战争高潮一过，早就警惕日本强大的美国，希望由俄国来牵制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州，掀起了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

这次东亚的战争，既是掠夺殖民地战争的一个回合的终结，又是准备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用掠夺东亚殖民地来摆脱其内政外交僵局的阶段已告结束。于是以英国和急剧抬头的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的对立为核心，列强正在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决战而赶紧结成战线。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立的焦点便转移到欧洲及其周围。

1905年初，俄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革命形势扩大，使它决心走向媾和。这次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工人、农民为了打倒专制和拥护劳动人民的权利而发动的群众斗争，创造了帝国主义阶段革命的新型式。这次革命以边境巴库石油工人总罢工为先导，并和被压迫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

不过，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左右着世界大局，制造民族分裂。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侵略过程中，爆发了反对这种侵略的民族运动。但是这种民族运动，不是被歪曲到借助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谋求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方向上，就是个自陷于孤立。① 遭受不平等条约折磨的日本，选择了自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来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道路。正象在日俄战争中的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国际大会上，代表交战国的片山潜和普列汉诺夫在讲坛上握手受到欢呼那样，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认识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战运动的重要性。但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不彻底方面，尤其殖民地问题是它的弱点。

日俄战争当时的内阁，是以山县系官僚为中心的第一届桂太郎内阁。以萨长出身的元老为首的藩阀官僚，在徒有其表的立宪制度下掌握政权机构，长期垄断着政权。桂是陆军大将，又是陆军

长州阀的直系，他的内阁是元老的下一代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元老不仅承担推荐继任内阁首相、参与御前会议等重要会议的策划，而当日俄一开战，还公开出面活动。参谋总长大山岩出任满洲军总司令官后，由山县有朋继任。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当上天皇的顾问，还以大使身分出使朝鲜。松方正义和井上馨奉旨协助战时财政。

在日俄战争前，继伊藤博文之后，西园寺公望任第二代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和以大隈重信为总理的宪政本党联合对抗桂内阁。日俄战争爆发后，需要政党合作，桂内阁便召开官民恳谈会，政党便借此参与战时和战后的经营，加强了在统治体制中的发言权。②在提出第二次增税案的第二十一届议会上，桂首相表示战后愿把政权让给西园寺，要求政友会合作，和政友会的实力派原敬定下了合作密约。③于是政友会和宪政本党联合对抗桂内阁的对立关系为之一变，产生了桂内阁和政友会以轮流执政为设想而进行合作的桂、园时代的模式。

日俄战争中，日军动员的兵力，仅陆军就约有一百零九万人，九十四万余人开赴战场。其中阵亡和病死者超过八万人，伤者达十三万人。④日本的战费达十七亿一千余万日元，超过战前1903年岁入总额的六倍半。

为了获得战费，曾两次新设包括扩充专卖事业在内的非常特别税，其增收额在1904到1905两个年度就达到了二亿一千万日元。而1903年的租税和专卖收入为一亿六千一百万日元，增税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了。税额增加最多的是地税，其次就是专卖收入、砂糖消费税等间接税。而且作为增收地税的报偿，新设了有利于地主的粮食进口税。增税的负担，都落到了农民、小市民和工人等群众的肩上了。

公债是筹措战费的主要来源，其发行总额达十四亿七千余万

日元。其中八亿日元是外债，在伦敦和纽约发行，第二次以后也在柏林发行了。战争之后不久还另外募集了二亿四千余万日元的外债，为支付公债本利的公债费，从1903年的三千余万日元激增到1906年的一亿五千余万日元，都成为了国民的负担。

日本是怀着和大国俄国面临战争的危机感而起来对抗的。报纸杂志都起而煽动国民的危机感，鼓吹斗志。通过在辽阳和旅顺的苦战而取得的胜利，激发了群众的民族主义。政府通过地方行政组织加紧国民动员，推动了纳税、募集公债、支援军人以及改良农业等措施，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为此服务的地方组织。

在日俄战争以前，普选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反对足尾矿毒运动等以人权和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在彼此呼应中，开始扩大到人民群众之间。但是，在战争前后的民族主义高涨中，这些运动被割裂了。这些运动的领导人新闻记者和律师等年青议员，大都走向了开战论。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平民社系的社会主义者公然打起了反战论的旗帜，但在严酷的镇压下不得不陷于孤立境地。然而，转向开战论的这些政治家们也没有停止对桂内阁的专制政治和压制言论的批判。战争的牺牲和负担完全落在人民群众身上，他们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却采取了一种曲折的形式，即从对外强硬立场被动员起来攻击政府。

对俄国大国的胜利，在军人以及广泛的国民中间，产生了作为亚洲强国的自负和骄傲，但在另一方面，也把国民从长期的国家危机感中解放了出来。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竞争，急于建立扩充军备、开发殖民地、充实产业基础等帝国主义体制。这就是所谓战后经营。然而这些事业已超越了日本的国力，致使它一方面对亚洲各国进行压迫和掠夺，同时，又不得不依靠欧美列强。同和国家结合起来的大资本的发展相反，由于重税和物价高涨造成的生活困难，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起来。深感危机的统治阶层，力图加强

由天皇制和家族制度所代表的强权的高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而另方面，不顾国家而注视个人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动向，却在以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为中心开始扩展起来。

① 江口朴郎《帝国主义的时代》，1969年，94——96页。

② 那须宏《帝国主义形成期的天皇制》，1974年，449页。

③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1950—51年，明治38年12月8日项下。

④ 大江志乃夫《日俄战争之军事史的研究》，1977年，129—130、171页。据沼田多稼藏《日俄陆战新史》（1940年）载，"我方损失，死约八万四千四百人，伤约十四万三千人"（225页）。

第一章　桂、园时代和战后经营

第一节　朴茨茅斯条约和日本

日比谷骚动事件

1905年春，日本虽然继奉天会战之后又获得了日本海海战的胜利，但无论在兵力或财政方面，都不能把战争再继续下去了。而沙皇俄国也因为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动荡，被迫想早日媾和。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从中调停，8月间，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召开了媾和会议。当会议陷入僵局之后，日本撤回了提出的赔款要求，在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

（二）俄国在旅顺口、大连一带的租借权以及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间的铁路及其所属权益在清政府承认的条件下，让与日本；

（三）日俄两国军队除上述租借地以外，从满洲同时撤兵；

（四）俄国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让与日本，准许日本国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沿岸享有捕鱼权。

不过，这个条约的内容，与日本国民所期待的过高要求相差很远，特别是没有获得赔款，而巨额的战费全由本国负担，这就激起了国民的失望和愤怒。

在签订条约的9月5日发生了日比谷骚动事件，骚动扩展到东京全市。当天政府下令禁止预定在日比谷公园召开的反对媾和条约的国民大会，封锁了公园，而聚集的民众则以东京市参事会员

为先锋，排除警察的阻挠开起大会。由于警察的镇压而被激怒的民众，会后袭击了内务大臣的官邸、政府系的国民新闻社，政府立即出动军队，于是民众就焚烧和捣毁了各处的警察署和派出所。第二天骚动仍然继续，民众焚烧了电车和教堂。

警察进行了极端狂暴的镇压，当内务大臣官邸受到攻击时，警察拔出刀来扑向群众，当场死伤了好多人。① 桂内阁于 6 日夜间对东京市及东京府内五郡发布戒严令，企图用军事力量进行镇压。既不是战争又不是内乱，却实行戒严，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② 政府还进而颁布了准许内务大臣得以停止报纸发行的紧急敕令来压制言论。但是，由于桂内阁违反宪法施行镇压，反对媾和运动便和抗议政府活动结合起来，扩展到了全国。

这次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排外主义、扩张主义的性质。但同时也是由于民众因战争被迫遭受重大牺牲和艰苦生活的强烈不满而爆发的，所以也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反政府运动的性质。暴动的主要力量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分化过程的手艺人，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被迫过着极其不稳定生活的日工、人力车夫等城市各种职业阶层，是这个时期流入和呆在城市的贫苦无产者阶层③。他们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独揽政权、极端横暴、压制民众的言论、集会自由的藩阀专制统治。

继日比谷骚动事件之后，反对媾和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反对媾和条约的县民、市民、郡民、町民大会几乎遍及全国。报社和新闻记者集团以及政党有志之士、律师、中小工商业者是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运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对藩阀专制的批判，因此，黑龙会等不批判藩阀专制的对外强硬派便脱离了运动。④

如果把东京日比谷骚动事件和扩展到全国的反对媾和运动结合起来看，这里已经明确地出现了后来城市群众运动的雏形。这些领导人大都继承了日俄战争前的社会运动的传统，他们重视过去

政党没有掌握的一般国民、尤其城市群众的力量。他们主张确立立宪政治，开展“国民”的政治活动，以便用其力量来推进帝国主义的发展。他们也被称为“国民主义的对外强硬派”，但却继续激烈地攻击藩阀官僚以及与其勾结的政党和政商的偏重军备、重税和公共费用涨价等压制民力的政策。⑤ 关于这些运动特别是对其后来发展的评价，虽然看法有所不同，但这些运动的高涨，确使藩阀专制不得不后退，并造成了桂内阁的辞职。

桂首相已和原敬约定，“不论缔结什么样的条约，政友会都率先表示赞成”，交换条件是，媾和后召集通常议会之前，由政友会来接任内阁。桂的条件是：“不标榜政党内阁”和“内阁虽然变更，但不改变国家的基本方针”（《原敬日记》明治 38 年 8 月 14 日及 22 日）。其目的是企图在不动摇藩阀统治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根本条件下，利用政友会来避开反对运动，借以转变局面。

在政友会方面，西园寺总裁于 9 月 2 日以“应为人道与文明而祝贺”表明了赞成条约的方针。党内虽然也有反对条约的呼声，但终于不了了之。宪政本党也策划挤进政权，企图和政友会共同反对，但没有成功，只是发表了反对屈辱媾和的声明。朴茨茅斯条约在枢密院通过，10 月 14 日批准。

但是对桂内阁的攻击日益高涨。东京市议会向内务大臣请愿，要求解除戒严令，国民新闻以外的各报社组成新闻大同盟，主张撤消新闻限制令。要求废除警视厅的舆论也高涨起来。东京府议会否决了修建被烧毁的警察派出所的预算（但东京府知事却利用职权执行了原案），东京市议会和府议会向贵族和众议两院议长提出了废除警视厅的请愿书，向内务大臣提出了意见书。桂内阁不得不退却。为追究日比谷骚动事件的责任撤换了警视总监足立纲之和内务大臣芳川显正。在召开第二十二届议会之前的 11 月 29 日，撤消了戒严令和新闻限制令。

变韩国为保护国

在这种形势下，桂内阁企图完成从战时就已进行的把韩国变为保护国和确保在"满洲"的权益。

日本在日俄战争开始后，立即将日韩议定书强加给继续由旧官员统治的软弱的韩国，使之同意为防备第三国的侵犯和内乱，保证"大韩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而征用军事上必要的地点。1904年8月，缔结了日韩协约，向韩国派遣财务顾问、外交顾问，掌握其实权，日本的统治权不断扩大。在奉天会战以后，日本政府决定在韩国确立保护权的方针，在媾和会议以前取得了英、美的同意。

1905年7月，美国的塔夫脱陆军部长来日与桂首相举行会谈，交换了所谓桂·塔夫脱协议的公文。当时美国正为镇压菲律宾独立斗争而苦恼，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权，以此为交换条件，美国承认了日本具有不经日本同意其他各国不得与韩国缔结外交协定的宗主权。随后在8月缔结了第二次日英同盟。这一面将印度置于新的同盟范围之内，加强了攻守同盟，同时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在德英加紧对立的情况下，上一年缔结了英法协约，两国都希望俄国在欧洲对抗德国。英国企图根据这个同盟防止俄国向印度、波斯扩张，而使它转向德国。以使日本军事力量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对立激化和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起作用为交换条件，使其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统治的扩大。

10月15日，朴茨茅斯条约生效，日本以国际承认为背景立即着手确立对韩国的保护权。11月，伊藤博文被特派到韩国，要求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谈判是在日军在汉城出动布岗极其高压的情况下进行的。伊藤从15日起与韩国的皇帝及大臣逐一促膝谈判，罢免了坚持反对的韩圭卨参政（总理）大臣，于17日夜半签了字。⑥

根据第二次协约，韩国的外交被置于日本外务省的“监理指挥”之下，韩国没有日本居间不能和其他国家缔结条约和协定。在韩国皇帝之下设置代表日本政府的统监，负责监理外交。统监通过对以前担任韩国政府“顾问”而握有实权的日本人官吏进行监督，也拥有对内政的监督权。

1906（明治 39）年 2 月，设置了统监府和理事厅，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统监。韩国的外务省及其驻外使馆已经撤消，驻在韩国的各国公使也都撤退了。为了维持治安，统监还拥有命令日本驻韩国守备军司令官使用兵力的权限。⑦ 这种不断扩大“顾问政治”而使之成为保护国的方法，被认为是日本独特的殖民地化的模式，也引起了中国的警惕。

根据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保护条约）而被保护国化，对此在韩国国内，反日运动高涨起来。接受协约的五大臣被当作“乙巳五贼”而受到强烈的攻击。特别是转到积极赞成方面的学部大臣李完用的住宅遭到了焚烧和捣毁。前官吏有的为反对协约而上诉或表示抗议而自杀。1906 年在忠清南道、全罗北道等地掀起了反日暴动。

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

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在清国承认的条件下取得俄国让给的“南满洲”的权益，有各国的利害关系纠缠着。承认韩国为日本的保护国的英美两国，对于“满洲”则强烈要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在朴茨茅斯开会期间，美国的铁道大王和支援日本发行外债的昆洛布（Kuhn Loeb）公司也有密切关系的哈里曼来到日本，提议日美共同经营日本获得的“南满洲”铁路，作为直达欧洲的环绕世界一周路线的一环。10月，经元老井上馨的斡旋，桂首相和哈里曼之间达成了预备协定。但是，在哈里曼离开日本前后脚归国

的小村寿太郎外相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使之流产了。小村希望将"南满洲"确立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清政府强烈反对朴茨茅斯条约的补充条款规定日俄两国撤兵期限长达十八个月之久，和连俄清间协定都没有规定的保留派驻铁道守备队的权利。

小村外相作为全权代表前往北京和清国进行谈判。日本政府以使清国承认其继承俄国的权利为绝对条件，并要求为保持"南满洲"为其势力范围所必需的权益。其中包括"满洲"的不割让以及改善"满洲"施政等项目，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企图把"满洲"作为其势力范围的险恶用心。包括掌握清政府实权的袁世凯在内的全权代表也顽强地坚持不肯让步。正式会议反复开了二十二次之多，到12月22日，才终于签订了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

这个条约的正文只承认继承由俄国转让的权利，但在附属协定中规定派驻铁道守备队，限期经营安东和奉天间的铁道，鸭绿江沿岸的森林采伐权和开放主要城市等。此外在秘密附属文件中还规定了有关经营奉天至新民屯间铁道和修筑吉林到长春间的铁道的事项，以及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先例的禁止修建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最难以解决的是关于铁道守备队问题，清政府认为外国驻兵是造成混乱的根源而坚决反对，并且要求缩短撤兵期限。日本方面则以俄国要求驻扎更多的兵力而加以反驳，最后清政府以加上俄国承认撤退铁道守备队时，日本也以同样"照办"的但书为交换条件，达成了承认驻兵的协议。

日本以驻军的武力为背景，从清政府手里强行攫取了新的权益，但由于清政府的抵抗，日本的要求有的是加上种种条件，以暧昧的表现形式妥协的，也有不少留待以后协议的。"谈判的会议记录由日中两国严格保守秘密，但它具有这样的重要性，即以后关于'满洲'问题的日中交涉都是以这项会议记录所载的协定为基础的，甚至说这个会议记录是'满洲'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为过。"⑧

日本战胜了欧洲的大陆军强国俄国，这就摇撼了欧洲优越的神话，鼓舞了亚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国以及亚洲各地派遣的留日学生不断增加，推进了独立运动。1905年，孙文等人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但是，同时由于日本进而统治朝鲜，加深了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警惕。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公布了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企图加强取缔革命运动。对此，中国留学生立即发起了反抗运动，中国革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以革命小册子《警世钟》等的作者闻名的陈天华，呼吁同志们团结起来拯救祖国，而后在大森海岸自杀，以示抗议。他在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同时，还提出警告说，列强以保留满清朝廷为其代理人来统治中国，进而实现列强统治的所谓“洋人的朝廷”的危险。

① 工藤武重《帝国议会史第三篇》(1906年)中写道："五日日暮以来，手持白光闪闪利刃的数百名警察列队横行于街道，逢人便喝问姓名进行盘问，或加以拘捕，或者甚至立即以白刃相加。此种情况市内到处可见。""惨遭警察毒刃的人民，约达六百人，警察负伤者亦有五百人。但理应调查此种事件的警察，当时已成为人民的仇敌，因而难以确知双方伤亡者的数目。"(第479页)。这本书的作者也是遭过警官砍伤者之一。

② 戒严令是当"战时或事变"时才设想实施的。所谓事变即指内乱。这时得以首先根据紧急敕令，在东京府内一定地区，适用戒严令中必要的规定；而根据另外的敕令，适用戒严令第九条和第十四条，给予戒严司令官可以无视人民权利的权限。戒严令后来曾经在1923(大正12)年关东大地震和1936(昭和11)年的二·二六事件时实行过，二者都沿用了这种方式。

③ 关于参加暴动者的阶级分析，参考中村正则、江村荣一、宫地正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人民——围绕九·五民众暴动》(《历史学研究》第327页，1967年8月)。警方也说电车所以受到袭击是被电车剥夺了职业的人力车夫的怨恨的表现。(高桥雄豺《明治警察史研究》第2卷，1961年，第130页。)

④ 松尾尊允《大正民主政治》，1974年，第20—33页。

⑤ 宫地正人《日俄战后政治史的研究》，1973年，第250—253页。

⑥ 这种情况在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下卷，1940年，第683—699页有详细叙述。

⑦ 陆军主张统监武官制，从决定伊藤博文就任统监起，就强烈反对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文官统监。由井正臣《日本帝国主义成立期的军部》，载于中村正则编《大系日本国家史(5)近代II》，1976年，第138—140页。

⑧ 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下卷,1953年,第249页。此会议记录收在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8卷Ⅰ,1958年,第164—406页。此卷数与明治年度一致。

第二节 西园寺内阁和军部

西园寺内阁的组成

1906(明治39)年1月7日,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组织内阁。当政权交替时,没有召开元老会议,而是由桂首相和西园寺分别访问元老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据说山县是把西园寺作为"华胄之众望"推荐的,以沿袭一切前内阁的遗策为条件的,① 桂也对原敬叮嘱,"不得忽视贵族院","不以政友会内阁为标榜"。(《原敬日记》明治38年12月17日)。

政友会方面也只由原敬占据了副首相级的内相职位,松田正久当上了法相。外相是第四届伊藤内阁外相的加藤高明,这是考虑了同宪政本党关系的人选。因为加藤高明接近宪政本党总理大隈重信。藏相是经元老井上馨推荐,由阪谷芳郎大藏次官升任。属于前内阁系统的寺内正毅陆相留任,由于代表山县系官僚的平田东助谢绝入阁,山县的养子内务次官山县伊三郎担任了递相。贵族院议员松冈康毅担任农商务相。海相由长期在山本权兵卫手下担任海军次官的、准萨派的斋藤实升任,随后萨派的牧野伸显回国,由澳大利亚公使转任文相。西园寺内阁是官僚势力和政友会拼凑的集团,前者之中混有固守"长州陆军"和"萨州海军"老根的藩阀官僚和帝国大学出身的职业官僚。从另一角度来看,西园寺的弟弟是住友家的养子身为该家族的户主,原敬曾是矿山大王古河家副经理级人物,加藤是三菱的岩崎弥太郎的女婿,阪谷是财界的顾问涉泽荣一的女婿,和财界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藩阀官僚势力的总头目桂和在众议院拥有势力的政友会

总裁西园寺的合作，使元老的势力架空了。桂和西园寺一原敬之间，一面互相利用，同时都在策划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两者交替掌握政权的所谓桂、园时代开始了，直到大正政变为止，大致继续了七年之久。

由桂内阁改为西园寺内阁，这对于由日比谷骚动事件而高涨的对政府的攻击起到转移的作用。当时正在召开的第二十二届议会中，众议院各政党的势力对比是，立宪政友会为第一大党，有一百四十九名，改进党和进步党系统的宪政本党共有九十八名，山县和桂系的官僚党派的大同俱乐部有七十六名，以自主独立的议员为中心、有强烈反藩阀和反政友会色彩的政交俱乐部有三十六名，无党派有二十名，政友会和大同俱乐部合在一起超过半数。由桂内阁继承下来的各种法案很容易在贵众两院通过。

首先1906年度预算案，在扩充陆海军军备外，增加了战争时期停止了的改良港湾设施、铺设铁路、扩建炼铁厂等的支出，达到了接近战前1903年度预算二倍的四亿九千余万日元。其中支付公债本利以及恩俸、养老金等的支出为一亿七千余万日元，为此继续征收了以媾和次年末为限期的非常特别税，以其一亿六千万日元的收入供这项开支之用。还提出了包括论功行赏的一亿五千万日元在内、共达四亿五千万日元的临时军事费追加预算案。接近十亿日元的这些预算案，只略加修改就通过了，但非常特别税继续法案，在政府声明二年内进行税制整理之后，才得到承认。

将干线铁路收归国有以便向亚洲大陆发展的铁路国有法案和收买京釜铁路法案，也不顾加藤外相反对，提交议会得到通过了。但由于铁路公司的反对和抬高价格，迟迟不得进展，贵族院将收买私人铁路由三十二线减为十七线，于是全国铁路百分之九十一归于国有。收买价格是四亿七千万日元，几乎超过实缴资本金的二倍。

由前内阁接过来的战后经营政策，西园寺内阁完全予以实现。原敬在其日记中夸耀说："第二十二届议会确实是将重大的议案完全讨论完毕，取得了以前任何一届内阁没能取得的成绩"（《原敬日记》明治39年3月27日）。

这样看来，西园寺内阁似乎只不过代行了桂前内阁的遗策，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原内相向山县派阀的老巢内务省打进了一个楔子。原敬在就任内相以后，立即调换了内务省的干部，使之面貌一新。第二十二届议会提出了废除郡制案，众议院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了，而贵族院则以审议未完了事。郡制是山县模仿普鲁士制定的制度，郡长构成官僚统治的基层。② 原敬似乎企图废除自治体的郡，通过町村合并和町村组合，扩充町村机能，扩大町村长的权限，使之与政党相结合起来。③

原敬内相反对宪政本党提出的废止警视厅方案，使议会否决了它，议会一结束，就改革了警视厅官制。以前的警视总监在高等警察（政治警察）方面要受首相和内相双重领导，而这次改为专由内相领导，并广泛调动了部长、署长，清除了厅内根深蒂固的萨摩出身的大浦兼武派系的势力，还训令警察要为民众谋方便。这是为了回答警视厅被指责滥用权力的措施。原敬还在调动地方官中积极贯彻"罢除老朽，采用新进"的方针，谋求改善待遇，收拢部内人心。警察月薪，原为九日元到十五日元者，提高为十二日元到二十日元。④

关东都督府和满铁的设立

1906年3月，英国和美国指责在日本军占领"满洲"的情况下，日本人独占经济活动，无视了门户开放的公约，以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警告。日本在媾和之后立即在辽阳设置关东总督府，使之负责占领地的军政。⑤ 关于"满洲"门户开放问题，在国内也存在着要在

继续施行军政期间扩大并加强权益的陆军和重视国际协调的外务省互相对立，这竟成了加藤外相辞职的原因之一。

西园寺内阁在第二十二届议会刚刚结束，内阁会议立即决定开放大连的问题，继而西园寺首相兼外相以“若槻(礼次郎)大藏次官一行”为掩护非正式地视察了“满洲”。5月22日，根据伊藤韩国统监的要求，召开了由元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儿玉源太郎参谋总长以及桂和山本权兵卫两大将等出席的“满洲”问题协议会。会上伊藤痛击继续执行军政乃是召致同期待门户开放的美英之间的隔阂，引起中国政府反抗的自杀的政策，主张赶快撤销军政。寺内陆相、儿玉参谋总长也同意按平时精神处理，结果同意将关东总督改为平时组织，逐步废止军政署。

9月1日设立关东都督府以代替关东总督府，负责管辖关东州租借地、保护南满铁道线路，监督附属地的行政和满铁的业务，以及同当地的中国官宪进行交涉。都督限由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统率在“满洲”的军队。关东总督大岛义昌陆军大将被任命为都督，陆军掌握了实权。关东都督除军事关系事项外，被置于外务大臣监督之下。而关东都督以及陆军，为扩大都督的外交权，想把驻南“满洲”的领事置于都督指挥监督之下，和外务省形成对立。⑥

在撤销军政统治的同时，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所谓的满铁。满铁除了经营朴茨茅斯条约所规定的长春、旅顺口间的铁路及其支线以及抚顺、烟台的煤矿连同在日清“满洲”条约中清国承认的安东、奉天间轻便铁路外，还负责经营管理大连等港湾和铁路附属地。还有，附属地的警察权由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掌管，关东都督指挥下的铁路守备队负责铁路警备。满铁是根据敕令由政府任命的筹备委员按外务、大藏、递信三大臣的命令书，在同年11月建成。正如筹备委员长儿玉参谋总长所论述那样：“战后经营‘满

洲’唯一的秘诀，在于阳则伪装建设铁路，阴则实行百般设施”，⑦这是日本经营满洲的关键所在。满铁股份公司拥有二亿日元资本，是当时在日本无与伦比的大股份公司，而政府以实物出资取得了股票的一半。总裁、理事也是政府任命制，后藤新平被任命为第一任总裁。后藤是儿玉任台湾总督时代的民政长官，以继承骤亡的儿玉遗志的形式而就任的。

在设立以前的9月募集了十万股民股(每股二百日元)。实缴是股票票面的十分之一，对民间股东给以十五年内保证每年红利六厘的保护，认购股数竟然达到一千零七十七倍。这就使得满铁股票广泛分散，同时还产生了排除中国股东的效果。⑧虽然说是掀起了股票热潮，但其实缴额总计二百万日元，无论如何也不够满铁的经营资金。

满铁企图委托日本兴业银行发行八百万镑外币的公司债，但迟迟不得进展。满铁向美国定购了机车等二千万日元的订货，但在美国的谈判也由于美国对日本经营“满洲”心怀不满而未得实现，1907年7月，在英国好不容易发行了四百万镑(三千九百零五万日元)的公司债，到1908年末才完成了预定额的发行。到了1911年，又重新在英国发行了四百万镑。日本依靠引进外国资金，才得以经营殖民地，即进行资本输出。

在扩大“满洲”经济势力方面，利用了横滨正金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接受了阪谷藏相的命令要按“‘满洲’贸易以大连为中枢，作为汇兑关系的干线，结成大连和神户间的链环”的方针进行活动。按照政府的内部命令，为了奖励向“满洲”输出，对向该地输出品实行了低利的付息押汇。⑨

日本沿袭俄国的方针，仍以大连港为自由港，谋求贸易的方便，1907年4月，满铁从军方接管之后继续对该港进行了整备扩充。7月开始实行海港特定运费制度，铁岭以北和营口以及大连

之间发出和到达的货物，营口和大连运费相同。通过采取对距离遥远的大连显然有利的运费体系，以谋求大连的繁荣。靠辽河水系作为中国传统的商港而发展起来的营口，由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种急躁的大连中心主义，立即引起了中国民族资本反抗的对策。[10]

帝国国防方针和军令

1906年2月，大山岩参谋总长制定《明治三十年度日本帝国陆军作战计划》，上奏之后得到批准。这是最早的以年度为单位的作战计划。由于在亚洲大陆获得了殖民地，其内容也从守势转为攻势，因此需要积极扩充军备。

这年的10月，山县有朋将《帝国国防方针私案》上奏天皇，这是以俄国为主敌，而首先向中国扩张国家利权的。天皇向元帅府谘询之后，对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下达了制定国防方针的命令。在两统帅部内，以包括在山县私案基础上提出意见书的参谋田中义一中校在内的中坚幕僚为中心，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所需兵力以及用兵纲领，1907年2月，向天皇复奏。在对政府关系上，天皇只向西园寺首相下达了秘阅国防方针的审议和所需兵力的命令，就由天皇“嘉纳”了。

这个国防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和扩张“在‘满洲’和韩国所扶植的利权和正向亚洲南方及太平洋彼岸扩展的民力发展”为目标，假想敌国第一是俄国，其次是美国，以“对抗俄、美兵力，在东亚能取得攻势”为军备的标准。所需兵力陆军是战时五十个师团，平时二十五个师团，海军则以建造最新式战舰八艘，装甲巡洋舰八艘为基干的八八舰队为目标。这里也包括了海军的要求。

西园寺首相回答天皇，虽然赞成国防方针，却极力主张根据外交的“同盟国的友谊”和防止“与帝国利害不同的国际间的联合”的

必要性，关于所需兵力认为从财政上“也不允许立即全部完成”，希望“结合国力，斟酌缓急”。⑪

国防方针当然也左右着外交、财政以及内政，军部实际上是想只由军部来决定，然后借天皇的权威强加给政府。命令首相审议国防方针，也是为了事先压制对扩军的反对。

陆海军的扩充军备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陆军在日俄战争开始时是十三个师团，而在战争末期增设了四个师团，将此编入平时编制，成为十七个师团。陆军进而再要求增加六个师团，但遭到了桂内阁的否决。当编制1907年度预算案时，陆军还要求增加三个师团，西园寺未予同意，经桂的斡旋，结果增加了二个师团。还有，步兵三年服役缩短为二年，因而现役服役者增加了五成。这是为了增加战时能够动员的预备兵力。另一方面，海军也开始了包括由1906年度预算建造两只无畏战舰级（弩级）战舰在内的建舰计划。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以大舰巨炮为目标的建舰竞争激烈，弩级舰时代很快就转移到超弩级舰时代。不久海军就赶紧改变既定计划的舰形和建造新型舰。分别以俄国和美国为假想敌国的陆军和海军的扩军狂热，使得“长州陆军”和“萨摩海军”争夺预算的竞争白热化，加剧了两者的对立。

1907年2月制定了“公式令”。这是对诏书和法令的发布形式进行整理的手续法，但却具有加强首相权限和内阁控制力的意义。1889（明治22）年制定的内阁官制，关于属于各省专任的行政军务敕令，由主管的各省大臣副署就可以了，而公式令却将其改为必须有内阁总理大臣以及主任大臣的副署。⑫这样就增强了首相对各省和军部的控制力。关于内阁官制中特别认可的军机军令的帷幄上奏，作为敕令公布时，也要由首相副署，因而必须取得他的同意。

这件事由于天皇指出而成了问题。⑬于是军部决定采取军令

的形式，由天皇谘询伊藤和山县，山县以无视伊藤的形式，于9月以军令第一号公布了“关于军令一案”。其中规定：以“关于陆海军的统帅，经过钦定的规程”为军令，在公布军令时，只要有陆海军大臣副署就可以了。以前命令都是要通过敕令或其委任予以公布，现在无视这个规定，突然采取了强硬手法，根据军令来制定所谓的军令的新命令形式。作为军令公布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关于军队的编制、教育等的规定。虽然有“关于陆海军的统帅”的限制，但不经首相的同意，也不经过枢密院、法制局的审查，单凭帷幄上奏和陆海军大臣副署就能发出军令。这可以说是军部看穿了内阁中政党势力必然扩大，军方的发言力将受到限制，从而加强统帅权独立的堡垒，以此来巩固作为政府之外的政府的地位。

1908年12月，根据军令修改了参谋本部条例。在这个修改中删去了关于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的关系的规定，把它转到不公布的陆军省参谋本部关系业务担任规定中去了。⑭ 它本身虽然没有缩小陆军省的权限，但是这意味着一旦有事，只以军内部的决定就能将陆军省的业务转移到政府管不着的参谋本部。大致与此同时，在陆军大学专门受到参谋教育的幕僚，不仅在参谋本部，在陆军省也占据了重要职位。这样就确定了陆军对政府的独立性，同时树立了“由幕僚阶层构成的一元化的军事官僚机构”。⑮ 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军部建成了一个独自的政治势力地位。

积极政策和废税减税运动

日俄战争后由于无赔偿媾和，景气一时处于呆滞状态，但到了1906年，由于铁路收归国有和引进外资，民间资本大为发展，企业热高涨，以9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募集股票为开端，突然出现了狂热般的景气。

1907年初的第二十三届议会，临时军费没有了，却提出了比

上一年还多的六亿一千余万日元的积极预算案。其中除上述的陆军增设二个师团的巨额军事费外，还加上了上年以来的改善铁路建设、扩充炼铁厂、扩充电话、改善河川港湾、奖励产业以及扩充教育等事业费。

政交俱乐部的化身、反藩阀的犹兴会，认为这是偏重军备并列入了巨额跨年度费的不健全的预算案而加以反对，但是多年以来反对积极政策的宪政本党竟然改弦更张，转为赞成，预算案得以通过。在该党中，为了接近政权，企图和藩阀实力者结合，以谋求整顿党势的所谓革新派抬头了。在1月的党大会上，将宣言案修改为支持扩军，企图迫使对此持批判态度的大限重信总裁辞职，排斥犬养毅。改弦更张乃是接近藩阀的信号。

原内相在这届议会中又提出了废除郡制案。秉承山县意旨的官僚派拼命加以反对。上届议会众议院顺利通过了，而这届议会由于大浦兼武的活动，大同俱乐部和宪政本党联合起来表示反对。原敬把“政友会与政府自卫上应采取相当措施”(《原敬日记》明治40年2月24日)的意思告诉给桂，表示对抗。该案在众议院以二十四票之差获得通过，而在贵族院，委员会通过了，但在全体会议上却以四十一票之差遭到否决。在这以前，势力的划分是，政友会在众议院而官僚派在贵族院占优势，但从此以后，官僚派以大同俱乐部为据点，在众议院进行多数派工作，政友会也开始在贵族院进行活动。

在此期间，政友会的党势扩大了。议席数第二十二届议会是一百四十九名，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届议会分别增至一百七十一名、一百八十名，在高知、长崎、大分、函馆、青森以及群马的各支部进行了恢复或新建。原敬内相以提拔新进为理由，更换了大批知事，在曾经是山县系统占统治势力的内务官僚中，安排了政友系统知事。和政府标榜开发地方产业、推行积极政策相呼应，他们利用强

大的知事势力，帮助政友会扩张党势。在1907年秋府县议会议员选举中，政友与非政友的对立开始显著，选举结果，政友会大体获得了胜利。[16]原内相安插政友系知事，不久就促进了桂内阁任命非政友系知事。这种方式促使府县党派向政友和非政友系列化方面发展，并依赖知事——县厅来发展政党的势力。[17]

西园寺内阁的积极政策不久陷于僵局。1907年春开始的战后经济危机，因秋季的美国经济危机而更加深刻化。害怕政友会扩大党势的官僚派的策动也活跃起来。

在继续实行非常特别税时建立的税法审查委员会，在这年夏制定了税制整理案。以商业会议所联合会为中心强烈要求废除盐专卖、通行税及纺织品消费税即所谓三恶税，但制定这个整理案时一开始就以不影响岁入总额增减为条件，将现行税目一律保留下来。而且元老以谋求加强财政基础为理由，要求缓办事业和增加税收，在元老和桂前首相出席阁议的情况下，决定了增收酒税、砂糖消费税和新设石油消费税的增税案。在第二十四届议会上提出的1908年度预算案是六亿一千余万日元，这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最高额的预算。

经济危机下的增税方针，引起了反对恶税运动的高涨。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向政府和议会提出了反对增税和废除三恶税的建议，公然批判偏重军备的财政方针。东京、京都及各地工业公会对此也予以支持，作出了不再选增税派议员的决议。[18]在议会中主张绝对反对增税的犹兴会，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内阁不信任案，不但宪政本党，连大同俱乐部也转而表示赞成。政府为了预防意外，事先准备了解散议会的诏书，但终以九票的微差勉强否决了这个提案。此后大同俱乐部又大都回到支持政府的立场，通过了预算案和增税案，否决了三税废除案。

大同俱乐部对内阁不信任案的支持，加深了政友会和官僚派

的裂痕。西园寺内阁在会议的末期，从贵族院把研究会的堀田正养和木曜会的千家尊福拉入阁内。向官僚派当作堡垒的贵族院打进一个楔子。官僚派遭此暗算非常愤慨。

5月15日，因任期届满而进行了第十次大选。缴纳十日元以上国税的财产条件虽没有变，但是由于战争以来的增税，有选举权的选民超过了上次七十六万余人的二倍，约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万人。也由于组成了西园寺内阁，"政党观念渐趋旺盛"，公认政党具有重要意义，登记候选人的数目减少了。言论战兴起，政友会遭受了"增税党"或"多数党的蛮横"的攻击（《立宪政友会史》II，第549—552页）。选举结果，在总议席三百七十九席中，政友会占一百八十七名，将近半数，取得了胜利；宪政本党七十名，大同俱乐部二十九名，议席都减少了。[19] 但是政友会城市议员减少了，特别是在东京市遭到了惨败，犹兴会和商业会议所有关系的议员增多了。表现了时代的一个侧面。

西园寺内阁由于政友会的扩展，基础似乎更加巩固了，但在大选后未满二个月的7月4日，突然决定总辞职。总辞职的理由之一虽然也有财政计划陷于窘境，但和取缔社会主义牵连的官僚派的阴谋乃是主要原因。

足尾暴动与赤旗事件

日俄战争一结束，先前以"反战"为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分化。在因日比谷骚动事件的戒严令下，继《平民新闻》之后的报纸《直言》遭到了停止发行处分，被迫停刊，平民社也解散了。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等创刊了基督教社会主义机关杂志《新纪元》，堺利彦、西川光二郎等出版了唯物论的社会主义报纸《光》，幸德秋水则到美国去了。

1906（明治39）年1月，西园寺内阁组成，改变取缔社会主义

的方针，社会主义者便企图建立迄今被禁止的社会主义政党。首先西川等提出了建立以"实现普选"为目标的日本平民党的申请，这个要求一得到通过，堺等则建成了标榜"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这样党章的日本社会党。这也得到受理后，在二月，二者合并建成日本社会党。其党员总共不到二百人，但报纸报导的全国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是二万五千人。[20]日本社会党也还没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起来，倒是在市民阶层中有些影响。前一年12月建成的普选联合会，是由社会主义者首倡的，但是它"包括了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甚至于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是一种威力。"[21]

由于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以及民众的不满情绪高涨。日本社会党建成之后的3月，东京市内的三家电车公司想把电车票价由三分提高到五分。该党与山路爱山的国家社会党联合召开反对提高票价的市民大会，但在第二次大会上群众掀起骚动，西川等以啸聚凶徒闹事罪而被起诉。政府虽驳回了提价的要求，但6月三家公司一合并，就准许涨到四分。日本社会党号召起来抵制，但提高票价还是实施了。

6月幸德回国，在神田的锦辉馆，作了以《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为题的演说。他在美国对前一年的俄国革命深受感动，批判了修正主义化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政策的软弱无力，认为作为革命手段的总罢工正在形成革命运动的主流，主张直接行动论。这个演说给予社会主义者以重大影响。

正好赶上各产业部门发生了劳资纠纷。特别是几乎所有的兵工厂、大造船厂，从这一年到第二年，争议相继扩大。矿山暴动也相继而起。1907年2月，在永冈鹤藏、南助松等创立了大日本劳动至诚会支部的足尾铜山，在要求改善待遇过程中发生暴动，终于出动了军队。接着各地矿山要求提高工资的骚乱不断扩大，6月

别子矿山发生了骚动。

这一时期争议的特色，是日俄战争以来大规模化和在引进新技术的大企业中连续发生。其原因之一是，战时的加班补贴没有了，同时由于物价上涨，工人生活困难，工人周围的条件也变化了。职工社会距离贫民社会还不那么远，而重工业工人开始有了与此不同的生活结构。[22]小学校毕业程度的职工占了一多半，劳动进一步分工，劳动管理也变了。“工厂主对职工”的直接关系代替了工头包工指挥的“业主对工头的职工对职工”的关系。[23]同时无视车间的惯例以及不公正的管理等，使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而暴发出来。矿山也由于采矿技术的发展，矿山包工头的包工已被废除，为此柜头的中间剥削引起了矿山工人的反感。足尾暴动是在矿山工人运动高涨过程中发生的，柜头老板极尽挑拨之能事。[24]永冈和南虽以啸聚凶徒闹事罪被起诉，但结果无罪。

但是不论如何，这种工厂、矿山频频发生的大斗争，对社会主义者和对政府以及资本家都给予了冲击。

日本社会党在1907年2月的第二次大会之前，于1月发刊日刊《平民新闻》，整顿了阵容。幸德在大会之前在该报上发表了《我的思想转变》，主张普选和议会政策不能完成社会革命，实现社会革命只有依靠团结起来的工人的直接行动。对此片山潜的合作者田添铁二反驳说，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有了觉悟才能实现社会革命，而议会政策或直接行动都是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认为社会革命在一场大撕打下就能实现的说法，是每每易于陷入的谬论。

2月17日的第二次大会把党章第一条改为“本党以实行社会主义为目的”。继而进入决议案的审议。评议员会原案的第一项是“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致力于团结的训练”，并把普选运动看成是个人自由参加的运动。对此，田添和幸德提出了修正案。表决结果，田添案二票，幸德案二十二票，评议员会案二十八票，通过了原

案。幸德以足尾暴动为例，主张“必须承认，三天的运动比议会的二十年的呼喊更为有效”，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镇压立即来临。登载此次大会消息的《平民新闻》，被禁止出售并被起诉，2月22日，日本社会党被命令解散。《平民新闻》也在继续停止出售后，4月13日受到停止发行的判决，第二天以第七十五号停刊。

第二次大会以后，幸德、山川均等直接行动派和片山、田添等议会政策派的对立加深了。片山等拘泥在合法主义的框框内。6月，建成日本社会平民党，立即被禁止，年末建成的平民协会标榜在宪法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实现普选、加强工会的组织和国家产业基础，遭到直接行动派的严厉批判。但这也被禁止了，接着田添病死。直接行动派更为急进了。

11月3日的天长节，在美国各地张贴、散发了以给明治天皇公开信形式的，名为《暗杀主义》第一卷第一号的传单。结束语写道：“可怜的睦仁君足下，足下之命危在旦夕，炸弹就在足下周围，正将爆炸，再见了，足下”。署名是无政府党暗杀主义者，但实际执笔者是前一年幸德在美国策划建成的社会革命党的党员。㉕山县一得到这个情报，就立即向天皇上奏，说取缔社会党有漏洞，攻击了西园寺内阁。天皇通过侍从长询问原内相关于取缔社会党问题，并传达了天皇“希望进行特别严厉的取缔的意旨”（《原敬日记》明治41年6月23日）。

正在此时，直接行动派在1908年6月22日掀起了赤旗事件。在欢迎因《平民新闻》的《踢父母！》而遭到笔祸的山口孤剑出狱的会上，大杉荣、荒畑寒村等直接行动派的青年们高唱革命歌曲，手举“无政府共产”红旗和警察发生冲突，包括企图抑制青年的堺和山川等也都被逮捕了。而且发现了有人在锦町警察署拘留中，在板墙上刻下了“一刀两断天王头，落日光寒巴黎城”的吟咏法国革

命的汉诗，于是事件扩大了。

西园寺在山县上奏后，立即流露了辞意，7月4日，提出了内阁辞职。自组成以来二年有半。关于继任内阁，在谘询了在韩国的伊藤以及各元老之后，令桂再度组阁。

① 德富猪一郎《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1933年，第725页。

② 郡长当初多半是选任郡内有势力者，而在1887（明治20）年采取考试制度以后，主要任命“老郡吏和退职警部”（大岛美津子《地方制度》《讲座日本近代法发达史8》1959年，第13页）在这以后第二届桂内阁时起用了帝国大学出身的青年学士担任郡长。

③ 参阅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1967年，第87—101页。

④ 服部之总《明治的政治家们——和原敬有联系的人们》下卷，1954年，第169页。

⑤ 大山梓《日俄战争的军政史录》，1973年，第231—236页。

⑥ 当时林董外相在1907年10月给伊藤统监的信中批判如下：“据我推测，都督的提案，基本是不承认“满洲”纯粹是中国的领土，包藏着将其作为在我势力下的一种特殊地域，彻底地加以处置的思想”。栗原健《关东都督府问题提要》，栗原健编著《对满政策史之一面》，1966年，第46页。

⑦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传》第2卷，1937年，第651页。

⑧ 安藤彦太郎编《满铁》，1965年，第48—55页。

⑨ 此利率为年利四厘五，一年押汇五百日元以上者，在一年之末可以得到其中五厘的回扣。《横滨正金银行史》附录甲二，1920年，第771—775页。

⑩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1964年，第191页。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计划修建能够对抗大连的不冻港葫芦岛港，早在1910年就着手修建京奉线葫芦岛支线了。

⑪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1975年，第108—122页。《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1967年，第132—151页。以下只记载丛书名。

⑫ 担任起草公式令的是帝室制度调查局总裁伊藤博文，这次修改被认为是从强烈反映山县意图的“内阁官制”路线，回到建立内阁制度当初的“内阁职权”路线，但还被认为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统一政策的需要和建成准政党内阁的西园寺内阁所促成的。

⑬ 由井正臣《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时期的军部》《日本国家史5近代II》，第147—150页。

⑭ 陆军省编《明治军事史》下，1966年，第1649—1651页。

⑮ 大江志乃夫《日俄战争军事史的研究》，第41页。

⑯ “宪政本党及大同俱乐部由于在中央继续携手合作时，各地方反对派大部在‘非政友’的名义下联合起来，以政友会为目标，竞争之激烈是上次无法比拟的。”当选者一五六三名中，政友七三八名、准政友一〇九名、中立二三二名（小林雄吾《立宪政友会史》第二卷，1924年，第408—411页）。

⑰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四卷，1968年，第40页载有：“政党即便不扩充府县支部的组织，靠县知事——县厅也能扩充党势。这不是扩充政党支部组织，我党内阁的成立成了扩充党势的首要条件”。

⑱ 松尾尊兊《大正民主政治》，1974年，第63页。

⑲ 众议院、参议院编《议会制度七十年史·政党会派篇》，1961年，第374页。以下的众议院各党派的议席数，主要以此为根据。

⑳ 中村胜范《明治社会主义研究》1965年，第235页。田中惣五郎《资料日本社会运动史》第2卷，1949年，第31页。

㉑ 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政治史》I，1954年，第95页。

㉒ 津田真澂《日本城市的下层社会》，1972年，第142——144页。

㉓ 横山源之助《东京的工厂地区及工厂生活的全景图》《新公论》，1910年9月（《日本工人运动史料》第3卷，1968年，第12页）。

㉔ 二村一夫《工人阶级状况及工人运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8近代5》，1975年，第98页。

㉕ 《在美国的日本革明（命）党的状况》《明治文化全集第六卷社会篇》1955年，第574—578页。

第三节　“满洲”问题和吞并韩国

日法协约和日俄协约

1907（明治40）年6月、7月、8月，日法协约、日俄协约、以及英俄协约等，相继缔结了一系列条约。英法两国想联合大陆军事强国俄国一起对抗开始大力推行建设舰队的德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为此希望日俄两国在亚洲能够保持协调。这一系列的条约在世界政治方面，和原来的俄法同盟、日英同盟、英法协约相呼应，确立了英法俄日四国包围德国的体制。①

同时，这些条约，在亚洲方面也是这些国家为了互相保障各自的领土和势力范围等帝国主义权益，维持和加强他们的地位和势

力，压制正在兴起的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运动的。日本和俄国都是凭着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和独占侵掠中国及其他各民族的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弥补了财力上的不足。而日俄两国凭着进入了这种合作关系，在金融上得到了英法两国的支援。

这表现在缔结日法协约这一事实上。俄国的同盟国法国曾经害怕日本攻击其殖民地印度支那，但现在却在日本想要在英法金融市场上把日俄战争中以六厘高利借到的外债改为五厘外债时，接近日本，签订了协约。协约规定维护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机会均等和日法两国的地位、维持领土现状，同时互相承认在接近两国领土、保护领的中国各地方的特殊利益。日俄战争后，越南的民族主义分子留学日本，搞独立运动，1907年达到二百名之多。但是，日法协约一签订，根据法国的要求他们就被逐出日本，对日本所怀的期望破灭了。

日俄协约公布的也只是两条，即主张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机会均等和互相尊重日俄两国的领土和权利，但是附属的秘密协约则互相承认各自在“满洲”、朝鲜和蒙古的特殊权益。即关于“满洲”，规定了哈尔滨和长春之间的松花江上游一线作为两国利权的分界线；关于韩国，俄国不妨碍日本的保护关系的发展；关于外蒙古，日本承认俄国的特殊利益。

在缔结日俄协约前后，日本在朝鲜和“满洲”的势力面临着强烈的抵抗。日本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也有必要和俄国缔结协定。当谈判日俄协约的时候，伊藤统监致书林外相，关于韩国条款写道：“交换公文，应明确表明‘将来之发展’（保护关系之将来发展——引用者，以下同）一词也包含‘合并’的意思，最为得策。……韩国的形势象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合并’将逐年增加困难”，为此“关于蒙古问题尽量同意俄国的要求，至为重要”。[2]

第三次日韩协约和义兵斗争

1905年11月的第二次日韩协约将韩国变为保护国以后，在韩国内部反日运动高涨。以开明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爱国启蒙运动扩大了，宪政研究会(后来的大韩自强会)等文化团体在各地相继建立。对签署第二次协约的朴齐纯内阁的"攻击到处皆是，声势浩大，几乎是处于四面楚歌的情况"，而且，"表面上标榜攻击政府，其实意味着排日"。在日俄战争中，在日本陆军支援下所建立的为运输和建设铁路提供劳动力的亲日团体一进会，已处于"似乎无法挽回从前的势力"③ 的状况。

在这种形势面前，陆军对伊藤统监考虑国际形势和财政问题采取慎重政策，心怀不满，便利用一进会，想赶紧把韩国变为殖民地。伊藤统监也企图利用亲日分子加强韩国政府，来对抗反日运动的扩大。1907年5月，强迫皇帝令朴内阁中最协助日本的李完用组阁。一进会的宋秉畯也入阁了。

结果，6月发生了海牙密使事件。第二次世界和平会议在荷兰的海牙召开时，会上出现了持有韩国皇帝全权委任状的特使，想要呼吁各国否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但是，由帝国主义各国构成的世界和平会议，以韩国没有外交权为理由，拒绝其参加，在参与计划的美国人牧师哈尔巴德的斡旋下，仅仅举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

这个事件一发生，伊藤统监就认为是"采取改变局面行动的好机会"，以违反协约为理由，"让总理大臣宣告日本有对韩国宣战之权利"。④ 西园寺内阁同元老协商，决定不失时机地掌握韩国内政的全权。

日本政府派林外相赴韩国，在伊藤的压力下被任命为大臣的李完用、宋秉畯等逼迫皇帝李熙(高宗)让位，在日本军队盘据于皇宫的情况下，7月19日晨，终于让位给皇太子李拓。反对让位的群

众在汉城市内举行了反对让位的游行示威，还烧了李大臣的邸宅。韩国大臣都处于日本保护之下，皇帝也屈服于日本，要求伊藤统监进行镇压，于是驻朝鲜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占领了皇宫。

伊藤统监和林外相要求派遣一个旅团，7月24日开始和韩国政府进行交涉，使之签署了第三次协约。据此将韩国内政置于统监指导之下，制定法律和任免高级官员必须得到他的认可。并在绝密的备忘录中规定除守卫皇宫的一个大队外，解散军队，任命日本人为各部次官、内务警务局长等。这样就开辟了日本全面掌握韩国内政实权的途径。

8月1日，在汉城突然举行了韩国军队解散式。首先只召集军官向他们宣读解散军队的诏敕，继而集合徒手的士兵举行解散式，并向士兵发放了破格的恩赐金，以防动摇。但是，近卫联队的两个大队掀起叛乱、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接着地方的韩国军队也都被解散了，但是原州镇营队叛乱，袭击了警察署和日本侨民，江华岛也发生了叛乱。

韩国军队的叛乱，成了各地零星战斗的义兵斗争扩大到全国的导火线。叛乱的士兵和解散的军人都参加了义兵斗争，其战斗力一下子大大增强了。8月以后，义兵斗争扩展到全国各地，义兵相互间的联系也不断加强。义兵主要在朝鲜南部活动时期，以儒生为核心，但当运动扩大到北部，人民出身的领导者就出现了。⑤1908年义兵斗争达到最高潮。

日本出动军队加以镇压，但是义兵得到农民的积极支援，继续进行顽强的游击斗争。日本军在1908年“从无职业的韩人中”采用了数千名宪兵补，给以优厚的待遇，从第二年1909年的秋天起，采用了“将讨伐队细行划分，使之在特定区域内进行搅拌式的搜索”的破坏根据地的方法，才镇压下去。⑥

围绕“满洲”权益的斗争

1907（明治40）年4月，日俄两国除租借地、铁道附属地外，终于从“满洲”撤兵完毕，以前由日俄两国管辖的地区也恢复了中国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从新设置东三省总督，6月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任命耶鲁大学出身的唐绍仪为奉天巡抚，两人均是袁世凯系统的实力人物，这个人事安排具有对抗日本统治“南满洲”的意味。

他们一到任，哈里曼的好友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就提议，为了对抗日本对“南满洲”的统治，引进美国资本建设京奉线上的从新民屯到法库门的铁路。还准备进一步延长到齐齐哈尔、爱珲，形成环绕世界一周的交通路线的一环。还计划建立开发东三省的银行。这个铁路建设计划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改由英国资本来代替，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了承包合同。日本政府认为这违背了日清“满洲”条约中禁止修筑与满铁平行线路的条款而强烈抗议，中国政府认为从距离上看并不是平行线而加以反驳。但是，英国考虑到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希望本国的资本家和日本保持协调，因而这个计划终于流产了。英国为了对抗德国，重视同日俄两国保持协调，因此美国在“满洲”问题上就处于孤立了。

对“满洲”引进英美资本的计划，第二年1908年又重新提起。中国为表示感谢美国减少义和团事件的赔款，而派唐绍仪赴美，使之进行“满洲”借款的谈判工作，司戴德对此也给予支援。其背后还有德国想为了对抗日英法的联合、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实现美德中三国联合的活动。

但是，在此期间日美关系急转直下。日俄战后由于日本独占“满洲”而恶化了日美关系，由于第二年1906年加利福尼亚州排斥日本工人运动的高涨，更加紧张，一时甚至传出日美战争的流言。但是1907年关于移民问题进行交涉，1908年初，缔结了日本主动地

限制发行护照的所谓君子协定。这一年美国舰队进行世界巡航，其目的主要是对日本示威，但是日本却主动地邀请他们到横滨港予以欢迎，使日美关系有了好转。这一年7月，第二届桂内阁组成，11月高平小五郎驻美大使和卢特国务卿交换了维持太平洋现状和支持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公文。

而且在这之前不久，中国受软禁的光绪皇帝和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相继逝世，三岁的溥仪接替即位，称为宣统皇帝。袁世凯失掉了后台，不久就下台了。唐的借款交涉也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届桂内阁为了对付中国收回利权的运动，想缓和对美关系，同时一揽子解决“满洲”的各种悬案，以明确权益。交涉从1908年末开始，但毫无进展。1909年8月，日本单方面通知断然改建正在交涉中的安奉线，以威胁中国政府。赶走了袁世凯，掌握了政权的“满洲”贵族一派，发生动摇，趋向妥协。中国承认改建安奉线，继而按照日本的要求缔结了关于间岛以及“满洲”五案件的两个协定。关于间岛问题，日本承认中国关于国境的主张，但以允许朝鲜人杂居、取得修筑吉会铁路的约定为交换条件。关于“满洲”案件，日本取得了抚顺、烟台两煤矿的采掘权，并使中国政府承认大石桥营口间铁道为满铁支线，还使中国答应在修筑新民屯、法库门间的铁道时，要预先和日本协商。其交换条件是承认中国将京奉线延长到奉天城根。

日本压迫软弱的中国政府，扩大了“满洲”的权益，对此，中国人民以抵制日货进行报复。中国抵制外货开始于1905年对抗美国排斥中国移民运动的抵制美货。1908年初发生了秘密运输武器而被扣压的第二辰丸事件，日本蛮不讲理反要中国道歉，中国政府表示屈服，对此以广东为中心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擅自决定改建安奉线的通告一发表，在日中国留学生呼吁抵制日货。抵制日货主要是在“满洲”和华北，对日本出口给予了打击。直隶

宪政研究会还发起了废除日清新协约运动。

日本利用中国政府软弱扩大权益，但遭到了正在开始抬头的民众舆论的严厉抵抗，成为不容忽视的事情了。⑦

1909（明治42）年3月，共和党的塔夫脱就任美国总统，随即展开了所谓积极援助美国资本输出海外的美元外交。此时正是中国修筑铁道高涨。这年6月，中国和英德法三国借款团缔结了修筑粤汉（汉口、广东间）、川汉（汉口、四川间）两铁道的借款草约，美国也要求参加，1910年5月，四国借款团和各国缔结了借款预备合同。四国借款团的结成，是依靠资本的力量来对抗日俄两国军事的政治的扩张，同时也是对抗要求收回利权和铁道自营的中国人民的。

美国还想向"满洲"扩张。同月，美英资本和中国缔结了投资修筑锦州、爱珲铁道的草约，11月，向各国提出"满洲"铁道中立化方案，即向中国提供借款，使之将"满洲"各铁道收买回来，再把这些铁道交给国际管理。对此日俄两国反对，英国和法国考虑到和日俄两国的关系，没有赞成，结果没有成功。关于锦爱铁道，日本以参加借款为条件，表示同意，但俄国完全反对。

美国的美元外交，造成了日俄两国同盟的加强。1910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加强日俄协约的方针，企图通过日俄互相承认南北"满洲"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首先使英法两国、接着使其他各国、进而使中国予以承认。很快在7月，第二次日俄协约就签订了。在公开的协约中，只不过是约定了关于"满洲"铁道事业的相互合作和维持"满洲"现状，但在秘密的协约中互相承认以上述分界线为界，将南北"满洲"分别划为日俄各自的特殊利益地区，并且还约定为了维护特殊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

但是，日本和俄国相互勾结加强对"满洲"的统治，不但加深了同美国的对立，也加深了同英国的对立。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国

的自治领也发生了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但在同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对立的激化中、英国为了推行包围德国的政策，又不得不继续日英同盟。1910 年英美开始了缔结仲裁裁判条约的谈判，于是修改日英同盟便成了问题，到 1911 年 7 月，签订了第三次日英同盟。其中有一条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同第三国缔结总括的仲裁裁判条约时，对该国不适用此同盟条约，事实上美国被列为同盟对象之外了。日英同盟是英国专门为了包围德国的需要而继续存在的。

吞并韩国

吞并韩国也是在看准了这种国际形势之后才付诸实行的。伊藤博文辞去统监、转任枢密院议长之后不久，1909 年 7 月，日本政府阁议决定了在适当时期吞并韩国的方针。恰在此时，强制缔结日清新条约刺激了俄国，日俄关系出现了紧张，伊藤博文为了会见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访问哈尔滨，在哈尔滨车站被韩国独立军志士安重根暗杀了。这是“为故国受此公(伊藤)之毒害而报仇”之举。就在这动乱形势之中，与日本陆军勾结的一进会号称代表“会员一百万人”提出日韩合并的请愿，这造成了“招致国民大演说会的激烈的反抗，大大耸动了上下民心，社会极端混乱，汉城政界也处于紊乱状态”。⑧

1910 年 5 月，日俄协约交涉刚一结束，立即进行了吞并工作。同月，寺内陆相代替曾祢荒助统监而兼任统监。6 月，让韩国政府签署警察事务委托备忘录，并将此事委诸宪兵之手。明石元二郎宪兵队司令官兼任警务总长。各道的宪兵队长兼任道警务部长。军部曾经要求的宪兵警察体制于是实现了。继而将日本军集中在龙山，8 月22日，寺内统监和李完用首相之间在极端秘密中签署了关于吞并韩国的日韩条约，29日公布出来。在吞并的同时，解散了韩国包括一进会在内的所有政治结社，报纸除了统监府的御用报

纸外也一律停刊。不将朝鲜化为殖民地，完全剥夺朝鲜人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日本就不能确立对朝鲜的统治。

日本吞并韩国后，在那里设置朝鲜总督。寺内统监在继续兼任陆相的同时被任命为朝鲜总督。朝鲜总督直接隶属于天皇，从陆海军大将中任命，具有使用朝鲜内陆海军之权，并允许其向“满洲”、华北以及俄国沿海省派遣军人和军属的权利，还拥有统辖一切政务，和发布代替法律的命令的权限。在总督之下设置政务总监，但这和台湾的情况不同，是和以警务总长为首的宪兵警察系统并列，而后者握有实权。

韩国和其他各国缔结的条约，由于吞并失效了，但朝鲜的进出口税，包括日本商品在内，十年内维持同一税率。这是为了通过尊重各国的经济利益，使吞并得以顺利进行。

① 此节参阅波多野善大《日俄战后国际关系变动的原因》，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明治时代》(《国际政治》特集) 1957 年。

② 1907 年 4 月 13 日，伊藤统监致函林外相，《日本外交文书》第 40 卷 I，1960 年，第 124 页。

③ 1907 年 6 月 4 日，伊藤统监致函林外相《关于韩国内阁更迭问题通报》，同上，第 556 页。

④ 1907 年 7 月 7 日，伊藤统监拍给西园寺首相的电报。同上，第 454 页。

⑤ 宫田节子《朝鲜的殖民地化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23 近代 10》1969 年，第 25 页。又关于义兵斗争，可参阅马肯基(渡部学译)《朝鲜的悲剧》1972 年。

⑥ 小森德治《明石元二郎》上卷，1928 年，第 421—426 页。朝鲜总督府《朝鲜的保护及合并》1918 年，第 195 页(金正柱编《朝鲜统治史料》第 3 卷，1970 年，第270页)。

⑦ 看到这一点的是伊藤韩国统监。1908年12月 6 日寄给桂首相的信说，中国民权论发展，有乘光绪帝、西太后逝世、政府权力衰弱之机，煽动群众逼迫政府的趋势，“如近来各地的收回利权论，并非出自北京的命令，无疑系地方官宪与人民共同活动所产生。……纵令同北京政府签订协定，地方官与人民是否遵守履行，亦不无怀疑”。角田顺《“满洲”问题和国防方针》1967 年，第 443 页。

⑧ 朝鲜总督府，上引书第 317 页，(金编前引书第 445 页)。又，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1966 年，第 232—234 页。

第四节　第二届桂内阁和大逆事件

政府、政党、财界

第二届桂内阁是以平田东助任内相、大浦兼武任农相、后藤新平任邮递相等山县系或桂直系官僚为中心，于1908（明治41）年7月组成的。这时正处在财政困难和减税废税运动中，藏相破例由桂首相兼任。桂内阁采纳了全国票据交换所联合会长丰川良平（三菱银行部长）的建议，① 制定了整理财政计划，决定延缓既定计划，停止募集新公债，增加公债偿还数额，新设铁道特别会计案。被称为笑面虎的桂，取得了希望公债涨价的银行家的欢心。但是，商业会议所和实业公会所希望的废税减税却没有被采纳。

桂内阁整理财政的另一个侧面是，加强了和紧缩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对策。组阁之后不久就特别得到敕裁而发表的政纲，提出了在“机械工业的发展和竞争的激化所造成的贫富差别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对逐渐兴起的社会主义，在其蔓延起来之前，“要制定所谓社会政策，以预防祸根，同时抑制关于社会主义的出版、集会等”的方针。② 9月，推迟预定在1912年开幕的大博览会，10月，停止出售赛马券，发布了戊申诏书。这是为使日本与各国并驾齐驱，在共享“文明恩泽”时，必需“发展国运”，为此依仗天皇的权威告诫“臣民”，在庶政更张和醇风美俗的基础上，上下一心，“勤俭治产”，“去华就实”，“自强不息”。③ 桂内阁的施政方针就是由这两个方面所组成的。

在1909年初的第二十五届议会上，政友会内的反对桂内阁的呼声也很高涨，但是桂首相和西园寺政友会总裁会见之后，取得了妥协。预算案为五亿一千余万日元，与从上年度预算扣去新的特别会计的铁道预算的部分相比，岁出约减少四千万日元，稍加修

政就获得通过，可是，宪政本党、又新会、戊申俱乐部的三税废止案被否决了。又新会是犹兴会的后身，戊申俱乐部是由新当选的中野武营等商业会议所有关者们和仙石贡等三菱系统实业家所组成。

议会中发生了非政友的联合问题。在上次大选中失败的宪政本党，和有势力的门阀相勾结企图恢复党势的所谓改革派的活动活跃起来。其首领大石正巳和吏党的大同俱乐部的臼井哲夫等密谋计划组织非政友大联合，与反对和大同俱乐部联合的犬养毅等非改革派形成对立。和桂勾结的丰川良平是背后的导演者，以前被改革派从党的首领地位赶走的大隈，这次站在改革派一边。丰川被称为三菱的伯乐，和大石、犬养等都是近年来的知心朋友。改革派在1月的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过半的领导职位，在常务代表会上开除了犬养。但报纸一致声援犬养，在党内以批判内讧的新议员为中心的反对改革派蛮干的气氛也高涨起来。议员会作出开除不当的决议，犬养留任院内总理。④此后以又新会为中心推行了新党运动，但由于是否包括大同俱乐部发生纠纷，终于自消自灭了。

在这届议会里，以修改报纸条例运动为背景，由村松恒一郎等提出了修改报纸条例的报纸法案。其主要目的在于废除禁止发行、禁止有关预审消息报导以及肉刑的规定。在委员会中，由五名特别委员和政府进行交涉，结果这些废除要求均未实现，而且和1897（明治30）年的修改相比更加反动了。⑤已经在1907年公布了修改刑法（新刑法），从1908年开始施行，但这也扩大了法官的量刑的范围，从而增强了侵犯人权的危险。⑥

这届议会修改了贵族院令。伯、子、男爵议员的规定名额，改变了以前总数一百四十三人按各爵位数目予以分配的办法，伯爵定为十七人以内，子爵七十人以内，男爵在六十三人以内。这意味着由于日俄战争男爵数目增多而增加男爵议员的名额，并使伯爵、子爵议员名额能够稳定。这个提案是政府容纳了以子爵为核

心的有力团体研究会的希望而提出的，因此加强了桂和官僚派在贵族院内的势力。另一方面，参加了西园寺内阁的蝠田正养等遭到压迫而陷于孤立。

议会之后发觉了日糖贿案。这是大日本精糖会社为了延长输入砂糖原料退税法的期限而收买议员的贪污事件，政友会、宪政本党和大同俱乐部的议员二十余名遭到检举并定为有罪。政友会的贪污议员大部分属于同桂有关系的二十日会，宪政本党的贪污议员全是改革派，大同俱乐部的臼井哲夫贪污最多，达二万日元。⑦这个事件打击了非政友联合运动。

这么多的议员遭到检举并确定有罪，还是第一次。这个事件表明了政界的腐败和同财界勾结之深。⑧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也表明了对于日俄战争后有选举权的人数急剧增加，以地方名流为基础的政党，不能从组织上来应付，寻求筹措膨胀了的选举运动费的资金来源就更加困难了。⑨以当时司法省民刑局长平沼骐一郎为代表的检察官僚，利用这种政党的弱点压服政界，创造了发展自己势力的机会。

桂内阁在制定1910年预算时，还是采取紧缩方针，以应付1910年初的第二十六届议会。政府提出了整理一千万日元限度的税制以及给文武官吏、下士官提薪三成的提案。偏巧这时战后经济危机深化，大米等农产品价格暴跌，打击了农村。政友会为适应减轻地税的舆论，要求减轻水旱田地税一分。交涉结果达成了增俸二分五厘，地税减八厘（把地价五分五厘改为四分七厘）的妥协。去年以来的三税废除案有的撤回，有的被否决。

政府在这届议会上提出了关税定率法的修正案。这是为适应翌年1911年协定税率期满确立关税自主权的需要。这个修正案采取了保护国内工业产品、降低原料品税率的方针。关于稻米进口税，在去年的全国商业会议所联合会上已决议予以废除，政府试想

无税或减税。但是政友会要求提高粮米进口税而不让步，并使之通过。在降低地税方面和提高粮米关税方面，政友会忠实地代表了其选举地盘的地主、富农阶层利益。只是在这之后米价上涨，从殖民地进口大米变成无税，米价被抑止住了。因此资产阶级的低米价、低工资的要求和地主的高米价要求得到调整。与此同时，在殖民地的日本人进行了土地集中。

第二十六届议会是完全以政府和政友会的妥协而进行的，在这期间，在野党和小会派间再度燃起联合论。但这同上一年和桂内阁相呼应的那种联合论的情况有所不同，3月实现了两个联合。首先大同俱乐部和戊申俱乐部的一半合并组成中央俱乐部。这纯粹是官僚派的政党，大浦农相是其背地的首领。对此宪政本党和又新会的大部分以及戊申俱乐部的一部分合并组成立宪国民党，成为拥有九十二个议席的第二党。国民党政纲首先倡导"明确内阁责任，使大政经常在国民的广泛基础上行使"，强烈地提出了民党主义。这样，政友会在众议院中扩张了势力，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依然是改革派在等待时机，尽管如此，反藩阀的色彩却浓厚了。桂内阁的支持派只剩了五十个议席的中央俱乐部。

日俄战争后，不顾财政困难，以战后经营的名义强行确立以扩充军备、整备交通通信机关、经营殖民地为主的帝国主义体制。当时日本的贸易结构是，向美国出口生丝，向中国、朝鲜出口棉纱和棉布，从印度和美国进口原棉，从英国、德国、美国进口钢铁和机械。日俄战争后向中国、朝鲜出口的棉纱和棉布急剧增加，同时也增加了肥料用豆饼的进口，但是对这两国的出超额增加了。另一方面，为了战后经营和建设重工业，从欧美各国进口钢铁和机械等也急剧增加，总的说来入超增加了。这靠以上述国际形势为背景从英国、法国引进外资来补充。日本作为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对欧美各先进国结成了后进国的贸易关系，同时开始把中国、朝

鲜当作了本国的帝国主义市场。

靠廉价的茧、低工资、长劳动时间支持的缫丝业，这时由于片仓、郡是等大规模机器缫丝提高了优质丝的生产，日本的生丝控制了美国市场。

棉纺业，在日俄战争前已经形成机器生产的大工业而发展起来，但每次经济危机都由于纺纱联合会的缩短作业时间和合并企业，日俄战后很快确立了六大纺纱业（钟渊、富士瓦斯、大阪、三重（1914年两社合并建成东洋纺纱）、尼崎、大阪合同、摄津）的统治。但在进口原料和出口制成品方面则要依靠财阀系统贸易公司。大纺纱厂兼营织布，与英美的棉布竞争，扩大了对朝鲜和"满洲"的出口。⑩

日俄战前刚刚开始建设的重工业也得到了急剧发展。在其基干的钢铁业和重机械制造业中，国营八幡制铁所和陆海军工厂占有压倒优势。八幡制铁所通过 1906 到 1909 年的第一期扩建工程，钢材年产量总算达到十八万吨，1910 年开始摆脱了赤字决算。工人的工资是英、德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六分之一，⑪ 劳动事故极多。随着生产的扩大，从中国和朝鲜进口铁矿石增加了。日俄战前缔结了借款合同的中国大冶铁矿，1908 年和萍乡煤矿、汉阳铁厂合并，设立了汉冶萍煤铁矿厂公司。横滨正金、日本兴业两银行向它提供了数次的追加借款，作为其条件日本则以廉价购买铁矿石和生铁。韩国国有的殷栗、载宁两铁山也因日本吞并归日本政府所有，供给由低工资劳力生产的廉价矿石。殖民地上的炼铁业也开创起来。1911 年在军部的支援下，大仓组在"满洲"建立本溪湖煤铁公司，三菱在朝鲜建立了兼二浦制铁所。

演成消耗战的日俄战争的经验，使政府痛感到有扶植和利用民间重工业的必要。继住友铸钢厂之后，相继建立了神户炼钢厂、日本炼钢厂⑫、日本钢管和财阀系炼钢厂。几乎全都是依靠陆海

军和铁道院的需求及其优厚的保护和根据 1911 年修改关税得到的关税保护，得以巩固了基础。但是，直到 1913（大正 2）年，生铁的自给率也只有五成弱，钢材自给率只有三成。

在民间的机械制造工业中，造船业由于造船奖励法的保护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日俄战争之后开始建造军舰，第一艘超弩级军舰（金刚号）的建造，除了从英国的维加斯公司订购必要的技术、机器和原料外，几乎全是国产的。三菱长崎、川崎神户等的民间大造船厂也参加军舰的建造，⑬ 商船的建造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随着铁道的发展，机车也逐步国产化，这对降低较高的铁道运费起到了作用。

这个时期还是电力革命的时代。东京电灯于 1908 年在山梨县驹桥建成桂川水力发电厂，实现远距离高压送电以来，水力发电事业迅速发展。日俄战争后机械进口占首位的是纺织机械，但从 1911 年开始变为电器机械了。电灯和电力铁路事业也发达了，但这些事业大都是地方资本家同监督官厅和地方政界相勾结谋求地区性的垄断，由于收费太贵直接压迫民众生活，所以降低电灯费、电车票价以及电业公营，每每成了民众运动的目标。

在输入品占压倒优势的各种工业部门中，也建立了财阀系的大企业，开始了同进口商品的竞争。但是由于这是由垄断流通部门和矿山业而积蓄了巨大利润的财阀资本的投资建成的，其内容是脆弱的。⑭

随着这样企业的大规模化，公司债的发行也急剧增加，银行对企业的控制也加强了。1910 年第二届桂内阁，想乘因财政整理和引进外资而利率降低和公债涨价的好机会，为借新还旧，发行五厘利的公债五亿二千万日元，但这时东京、大阪的有实力的银行十五家结成认购公债的辛迪加，承担了四厘利的公债二亿日元，但不同意承担更多的转期公债，政府在伦敦和巴黎发行了四厘利外债二

亿八千余万日元，才得以完成了借新还旧，减轻了政府的利息负担。这是我国最初结成的认购公债的辛迪加，被认为是金融资本"确立了对政治优势的一个标志"。⑮

和这些发展相关联，三井、三菱等财阀的组织也整备起来。

1909年，三井同族会把以前以合股公司经营的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以及三井矿山分别独立出来，作为持有资本金二千万日元的股份公司，并新设控股公司一三井合股公司加以统辖。三井财阀由此具备了康采恩的形态，各企业得以自由展开活动。三菱合资公司也在这前一年实行机构改革，对矿业部、造船部进行了独立核算，但是属下的各公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独立的。财阀和官僚主导的战后经营相勾结取得发展，形成桂、园时代的主要背景，金权和政权的勾结每每成了新闻界暴露的对象。

在这个时期确立了重工业的基础，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比重很大，工厂工业虽然也有了发展，但零星的小企业和家庭手工业构成了它的基础。按各种职业的人口来看，1910年的农林业人口是一千四百三十一万人，占就业人口近六成，工矿业人口才四百六十一万人，不足二成。而且雇用十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不过八十一万人。在民营工厂六十九万人中，纺织部门为四十四万二千人，其中女工占三十八万一千人，远远超过机械器具部门的五万五千人。但是，炼钢厂和军工厂等的国营工厂工人是十一万七千人，说明重工业中国家资本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矿工是二十四万人，其中女工超过五万人。此外，运输通信工人是三十六万六千人。⑯

农村和地方改良运动

在日俄战争中动员国民的时候，政府注意到了地方的作用，所以当战后经营时，地方问题也受到重视。政府的目的在于，一方面

建设能够承担帝国主义国家负担的町村，另一方面对抗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变化，维持以国家主义和家族道德为中心的地方秩序。

正在这时，大城市特别是东京发展很快，具备了现代城市的规模。以帝国大学为顶点的学校体系已经完备，到城市上学也极为盛行，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考试的竞争、就职困难更为严重，出现了“高等游民”问题。

另一方面，农村在日俄战争和战后经营的重担中挣扎。政府采取了以种植水稻和养蚕为中心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政策。但是旱田畜耕、增投化肥、改良品种等水稻生产的改革，是在零散耕地的范围内投入大量家庭劳动、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的形式下进行的，结果却维持和加强了小农制。种植桑树和养蚕也从长野、群马、山梨等向全国扩展，这也是以利用家庭劳动的小农副业为主要形式发展起来的。

以大米和蚕茧为中心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致使农民的家庭经济也由于购买肥料和日用品以及捐税的增加等而被卷入商品经济当中去，受到它的威胁。特别是交纳高比率的实物地租的自耕兼佃耕农和佃农贫困化了。他们靠养蚕副业和兼作其他劳动，以及把子女送到缫丝和纺纱工厂从事劳动来补充家庭开销。中等以下家庭的成员也向外流，在大城市内堆积着过剩劳动力。这就造成了高额地租和低工资相结合的局面。

在农业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大地主推行土地集中，自耕兼佃耕农和佃农的数目增加，地租亦随之提高了。豪农和地主阶层的自营方式解体，日益化为寄生地主。自耕农还不到农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了。地租收入向农业以外的投资增加了。非常特别税采取土地重课、股票公债轻课的方针，更加速了这种情况的演变。子弟到城市就学也需要投下很多资财。在寄生地主化进展的另一方面，官

僚提出了改良农业和保护中农的政策。由于1909年修改了耕地整理法,以改良水力为中心大力推行耕地整理事业,大藏省存款部通过劝业银行发放贷款。国立农业试验场的活动也走上轨道。为了统一蚕种公布了蚕丝业法,设立了原蚕种制造厂(后来的蚕业试验场)。还为了防止商品经济的渗透所造成的中农没落,普及了产业组合。这是以小地主和自耕地主上层为中心的组织,其目的是使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以维持地主制秩序中的农民阶层。

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和铁道的普及,米谷市场扩大了,米商要求各地改善粮米的质量,实施米谷检查。这就增加了佃农的负担,成了租佃纠纷的直接原因。

义务教育从1907年开始由四年延长为六年。由于义务教育和国政委任事务不断增加,使町村的岁出也急剧增加,町村财政枯竭了。而且由于优先保证征收国税而限制地税付加率,大众课税的门户捐加重了,下层人民为这种负担叫苦。不仅城市,农村也蓄积了不满情绪,出现了石川啄木所说的"时代闭塞的现状"。

这种形势所产生的危机感,形成了颁发上述的戊申诏书。第二届桂内阁的平田内相在1909年召集地方官员和町村长等举办了地方改良事业讲习会,从此开始动员内务省的机构,利用地方的笃实农业家、僧侣、教员等,推进了所谓地方改良运动。其直接目的是重建由于战后经营增加负担而濒于破产的町村财政,把它建成能够自力更生的町村。为此企图通过改革农业、奖励纳税以及统一村落所有林野(町村财产化)来改善町村财政。但是统一村落所有的林野增加的町村岁收成了地主阶层的利益,而另一面限制了村落居民的共同使用权,打击了中下层农民的生活,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抗,结果减弱了村落共同体的约束力量。于是提出了统一国民思想的施政方针,即通过贯彻义务教育和由青年团等进行社会教育,以行政上的町村为单位谋求村落共同体的约束。村落共同体的象征

神社也统一了，以国家统一规定的节日作为町村的节日，代替传统的节日等，强制推行以国家的生活秩序来代替传统的生活秩序。

因此，青年会、在乡军人会、报德会以及产业组合等各种团体都是按行政上的町村单位建立的。其中地方改良运动所重视的是遵从二宫尊德教导的报德会，提倡以勤勉、节约、律己、谦让来实现农村的自力更生，对产业组合运动可能唤起的权利主张起到中和作用。青年会则是本来具有自主性质的村落青年会改成了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町村青年会，变成了由町村长、小学校长、有名望的乡绅领导的国家修养团体。⑰

1908年，文部省成立教科书用图书调查委员会，由保守的宪法学者穗积八束任委员长，对国定教科书进行了修订。1904年采用的第一期国定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主义勃兴期的现代教科书的性质，也重视了市民社会道德的教育，但是，它的第二期教科书却强调国体观念、忠君爱国、家族道德等，对甲午和日俄战争也作了过分宣扬。这在普及率上升的情况下，成为最初的全国教科书，其影响是很大的。⑱

日俄战争后急剧增加了兵力的军部，也把目光转向地方。如上所述，1907年，在增建两个师团的同时，步兵的服役年限从三年缩短为二年，服役者的增加造成了训练质量的下降和军纪的松弛。1908年，在东京和大阪的联队中发生了士兵结伙逃走事件，陆军首脑部对社会主义者的言行动起了神经。逃避征兵的现象也扩散开来。从这一年起，相继修改了“军队内务书”、“步兵操典”等，其中强调了攻击精神、白刃战主义以及军纪风纪等精神主义，并灌输“家族主义”，企图加强团结。为了掌握退役后的兵役者，1910年建立了帝国在乡军人会，不但让它承担起对在乡军人的教育训练，并且期待它作为“国民骨干”成为国家主义的支柱。陆军还希望青年会能成为入伍前的训练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5年，

青年团员的年龄限制到二十岁，使它和在乡军人会相衔接。

“大逆事件”

第二届桂内阁攻击西园寺内阁对社会主义取缔不彻底，刚一取而代之，便象上述政纲中所看到的那样，严厉取缔社会主义。1908年8月对赤旗事件的判决，量刑之重超出了预想。带头的大杉监禁二年半、堺和山川各二年、荒畑为一年半。在第一审宣判无罪的参与反对提高电车票价骚动的西川等也在最高法院被判处重监禁。直接行动派几乎全被抓进监狱，《东京社会新闻》、《熊本评论》也被迫停刊。

回到土佐中村家中休养的幸德，赤旗事件一发生就立即进京，在自己家门前挂出了平民社的牌子。警察在他家门前搭起帐篷，监视一切出入人员。

严峻的镇压引起了报复行动。当年的11月，受到幸德的同志内山愚童秘密印刷的《无政府共产》的影响的工人宫下太吉，为了破除人民的迷信，决心暗杀天皇。宫下访问了平民社，把新村忠雄、管野须贺等拉了过来。幸德和荒畑的姘头管野同居，遭到同志们的责难而陷于孤立，从宫下处得知该计划后，内心虽动摇了，却未明确表示参加。

1910年5月下旬，企图制造炸弹的宫下、新村等被检举，6月1日，幸德也被逮捕。报纸报出加上幸德共七人的制造炸弹的阴谋，但检举却扩大了。幸德进京途中曾经走访过的新宫町的大石诚之助等，访问过幸德的熊本的松尾卯一太等，大石访问过的大阪的武田九平等社会主义者们相继被捕。宫下等的空想计划不仅连累了幸德，和他们仅仅有一点关系的社会主义者们，也都作为同谋者，想要一网打尽。这刚好是在吞并韩国的前夜。

12月10日最高法院进行了“公审”。大逆罪包括未遂在内是

死刑、采取了最高法院的一审制。公审是在禁止旁听、只准许若干律师旁听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搜查时，司法省平沼民刑局长兼最高法院副检察官，临阵指挥，每天早晨向桂首相报告事件的情况，由桂上奏天皇。翌年1911年1月18日，宣布二十四名死刑的判决，第二天又以"天皇圣虑"的名义，十二名减刑为无期徒刑。而且很快就在判决的六天后的24日，对幸德等十一人、第二天的25日对管野执行了死刑。

从宫下被捕八个月，从公审开始仅仅一个半月，幸德等十二名社会主义者就遭到杀害，这给与国内外很大冲击。报纸称他们为"叛逆"，但在石川啄木、永井荷风、森鸥外等不少文学家的作品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2月1日，德富芦花在第一高等学校进行了以"造反论"为题的演说，称幸德等是"为人类献身的志士"，以此责难除杀害以外束手无策的阁臣和检察当局，指出"不能惧怕造反。新的事物常常是造反"，强烈地感动了听众。在议会里也责难政府，指出桂内阁的镇压政策把他们赶上绝望途径，因而造成了这个事件。

在海外，9月，这个事件一报导，在美国、英国、法国等立即掀起了抗议运动，攻击镇压思想和秘密审判。12月20日在伦敦召开了抗议集会，有一万五千人参加。日本政府也动摇了，一面强调审判手续如何合法，宣传被告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一面赶紧处理事件。

"大逆事件"的严峻处刑，赤裸裸地暴露了天皇制政权的面目。1911年8月，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科，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严冬时代"。但是，群众生活仍然饥寒交迫，不满情绪高涨。为了表示天皇"仁慈"，谋求"改善思想"，提出了慈惠的社会政策。2月，天皇作为对贫民百姓施药救疗之资，支出内帑一百五十万日元，并向富豪和官员募捐，建立了"恩赐财团济生会"。"内务省开始了细

民调查事业。文部省建立了文艺委员会和通俗教育调查会。……市营贫民住房和市营职业介绍所突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⑲ 大企业在足尾暴动的冲击下，1907 年建立起铁道厅现职人员共济组合以及以经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共济组合，这类组合在大逆事件后急剧增加了。

① 鹈崎熊吉《丰川良平》1922 年，第 211—214 页。

② 德富猪一郎《公爵桂太郎传》坤卷，1917 年，第 349 页。

③ 据说当颁发戊申诏书时，小村外相和斋藤海相在阁议上发表了没有必要的意见，但平田东助内相“几乎要哭出来似地申诉”说，“世态极为恶化，使人感到除至尊威光外，别无一可靠者”而获得通过，《子爵斋藤实传》第 2 卷，1941 年，第 87 页。

④ 鹈崎鹭城(熊吉)《犬养毅传》1932 年，第 202、208 页。

⑤ 朝日新闻社编《明治大正史 1 言论篇》1930 年，第 231—241 页。

⑥ 又，当审议刑法案时，众议院花中卓藏等展开废除死刑的论辩，委员会通过了从内乱罪中删去死刑，但贵族院表示反对。在两院协议会上，富井政章(东大教授)和花井展开了大辩论，结果众议院让步了。佐伯千仞、小林好信《刑法学史》载《讲座日本近代法发达史》II，1967 年，第 250—252 页。

⑦ 前田莲山《历代内阁故事》1961 年，第 245 页。

⑧ “关于由第二十三届议会砂糖退税至第二十四、二十五届议会的砂糖国营等问题，日糖会社力图收买议员这是事实，如第二十四届议会，我正在任上，对公司董事以及有丑行的议员(包括我党党员)都使便衣警察跟踪，以预防犯罪，故收贿议员可能很多，本来，议员在山县内阁当时与自由党合作而得赠与金二、三十万日元(现在的桂当时任陆相，居中斡旋)，议员年俸增加到二千日元，修改任用令，以为禁止猎官的手段，官僚派自信对议会政策是合适的，但议员之腐败因此加剧，后来又波及地方，地方议员中贪污者剧增，这次的检举或将成为以儆将来的良药也未可知。”(《原敬日记》明治 42 年 4 月 15 日)

⑨ 雨宫昭一《日糖事件》载《日本政治裁判史录》1969 年，第 493—494 页。

⑩ 1906 年成立对朝鲜的三荣棉布输出组合、对“满洲”的日本棉布输出组合，二者都是以三井物产为总代理店，推行共同推销。两组合的中心都是大阪、三重两社，以在朝鲜的垄断利润为基础，用倾销手段打进“满洲”市场。减轻朝鲜和“满洲”间铁路货运的关税和对出口“满洲”的棉纱布运费打折扣等办法，对此起了助长的作用。(高村直助《日本纺纱业史序说》1971 年，第 184—190 页、第 226—227 页。)

⑪ 小岛精一《日本钢铁史(明治篇)》，1945 年，第 524 页。

⑫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钢铁厂。这是北海道煤炭轮船株式会社以因铁道国有而获得纯利一千余万日元为基础，在海军援助下，与英国阿姆斯特朗、威卡斯两公司合办，1907 年设在室兰的，资本金为一千五百万日元，比其他私营钢铁企业大得多，拥

有最先进设备。该社聘请吴海军工厂长官山内万寿治中将以现职兼任顾问，接受海军工厂的订货，生产大炮炮身等。（大江志乃夫《国民教育与军队》，1974年，第286—287页。1912年北炭并入三井伞下。）

⑬ 1911至1922年，与金刚号同型的超弩级巡洋战舰三艘分别由横须贺海军工厂、神户川崎造船、长崎三菱造船各着手建造一艘，此外，超弩级战舰一艘在吴海军工厂开始建造。这些就是比叡号、榛名号、雾岛号、扶桑号，是和金刚号一起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最老的军舰。

⑭ 柴垣和夫《日本金融资本分析》，1965年，第212—224页。

⑮ 大内兵卫《日本财政论·公债篇》，1932年（《大内兵卫著作集》第2卷，1974年，第115—118页。）。又，此十五家银行是东京方面的横滨正金、第一、日本兴业、三井、三菱、十五、第百、第三以及安田等各银行；大阪方面是三十四、鸿池、住友、北滨、浪速、山口等各银行。

⑯ 大石嘉一郎《资本主义的确立》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7近代4》1976年，第121—122页。本章的数字主要据此。

⑰ 有泉真夫《明治国家和民众统一》，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7近代4》，第234—39页。

⑱ 唐泽富太郎《教科书的历史》，1956年，第270—271页。

⑲ 石桥湛山《问题的社会化》，载《东洋时论》，1912年4月，《石桥湛山全集》第1卷，1971年，第62页。

第二章　大正政变前后

第一节　从明治到大正

“情投意合”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

第二届桂内阁组成后的第四年，1911(明治44)年初复会的第二十七届议会，预想到会发生纠纷。国民党也加强了攻击政府的态度，政友会内部对桂内阁的不满也日益高涨。

桂首相为寻求妥协向政友会进行工作。政友会的原敬也立即响应，选择了议会后迫使让出政权的道路。原使桂作出约定，将“为获取宪政的美果，只有和政友会共同料理国政一事”，公开“向全国发表，使人心为之一新”，以便加强政友会的立场(《原敬日记》明治44年1月26日)。1月29日，桂首相举行午餐会，招待政友会的议员和干部，发表演说，恳切希望和“以稳健政见贡献于国家”的政友会“情投意合，协同一致，以期收获宪政之美果”(《立宪政友会史III》1925年，第354页)。这件事和桂为自己打算升进公爵一起引起了藩阀内部的反感。

桂内阁以同政友会的情投意合，渡过了第二十七届议会，只有铁道宽轨化方案被推迟，有关吞并韩国的紧急敕令，除把承认朝鲜总督拥有发布代替法律的制令权的敕令作为法律案重新提出，得到通过之外，所有一切都得到事后的承认。国民党提出的大逆事件以及关于南北朝正闰论的责问内阁大臣的决议案遭到了否决。刚好这时，国定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到南北两朝的正闰问题一事，遭到国体论者的攻击。政府用修改教科书，免去教科书编辑委员喜田贞

吉的职务，结束了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届议会上，普选同盟会的松本君平、日向辉武等提出的普选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各政党对此都进行了自由投票，没有受党内决定的拘束，反映了自由主义舆论的高涨。当时最热心提倡普选论的《东洋经济新报》，在要求普选乃是国民权利的同时，指出在现在有限制的选举情况下，占有选举权者大半的地方小地主容易受到官僚的威胁和收买，为他们所左右，形成元老政治制度的支柱，因而主张只有通过普选政党才能代表国民舆论，同元老政治进行斗争。① 因此，这个法案，在贵族院遭到激烈责难而被否决。② 不仅如此，桂内阁在议会后对普选同盟会进行镇压，竟迫使它解散了。据说各政党都进而以党内决议，禁止党员提出普选法案。③ 普选法案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止，没有提到议会上。

另外，也由于大逆事件的冲击，长期以来作为悬案的工厂法案得到通过。日俄战争后劳资纠纷和矿山暴动不断发生，社会政策学会在 1907 年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工厂法和劳动问题”，政府在 1910 年的第二十六届议会上提出了工厂法案。这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的渗透、维持壮丁的体质才要求保护工人的。但是，由于纺织业者反对禁止少年、妇女夜班作业等而不得不撤销。在第二十七届议会上，将适用此规定的犹豫期间从十年推迟到十五年等，按照资本家方面的要求加以修改才勉强得以通过。但是此项法律并未规定施行日期，在第一次大战的战争景气的有利形势下，于 1916（大正 5）年才付诸实施。

第二十七届议会过后，桂首相拖延向西园寺转让政权，在此期间大力扶植自派势力。原敬竟愤恨地在日记中写道：“最近有的人简直也太岂有此理了，贵族院由官僚党把持，正金银行、日本银行也随心所欲地塞进他的人，诸如拓殖局、铁道院似乎也都要留下自己

的人；而修改条约也结束了，预算也编制好了，这种作法是为了什么呀！”(《原敬日记》明治44年6月29日)。7月10日实行了每七年进行一次的贵族院伯、子、男爵议员的改选，但由于官僚派的压制，政友会的支持派被排斥在外。原于8月3日访问桂，突然改变了态度，指出秋天府县议会议员的选举，“如果在现任内阁下进行，我党将改变对此次选举的方针和主张，以今日之方针难以参加这次选举，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原敬日记》明治44年8月3日)。桂内阁于8月25日辞职。④后任首相按以前的约定，举荐了西园寺，8月30日组成了第二届西园寺内阁。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在组阁时，认为“需要阁内一致抵抗外部压力”(《原敬日记》明治44年6月8日)，除陆海军大臣以外，“尽可能不同彼(桂)商量”(《原敬日记》明治44年8月26日)，由西园寺、原、松田决定人选。政友会只有原内相、松田法相再加上长谷部纯孝文相入阁，党外入阁者也避免用官僚系的人，选择了与西园寺和原相好的人物。藏相山本达雄(日本劝业银行总裁)是第一次从财界起用的。外相的人选，拒绝了桂极力推荐的小村留任，而任命了内田康哉。农商务相和递信相又重新任用了第一届内阁的阁僚牧野伸显和林董。铁道院总裁也拒绝了桂推荐的后藤新平留任，由原内相兼任。寺内前陆相专任朝鲜总督，石本新六次官升任陆相，斋藤留任海相。在内阁组成那天，桂向山县写信表示不满说：“以上述的人选，内阁是组成了，情况会怎样呢！尤其大藏大臣的人选很不可靠，令人担心。”(《公爵桂太郎传》坤卷，第554页)。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和第一届相比，一上台就颇有政党内阁的姿态，摆出了执行符合舆论要求的政策的架势。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组成后不久，1911年10月10日，中国武

昌起义成功，开始了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日俄战争以后，立宪运动在中国各地急剧发展，革命运动扩展到新军中去了。这年的5月，清廷开始设立内阁制度，大臣的位置几乎全由满洲的皇族和贵族所占据，对清廷的不信任感极度高涨。与此同时，清朝公布铁道国有化，和四国借款团缔结了修筑川汉、粤汉两铁道的借款合同，并开始接收已经开始修建的民营铁道。这就激起了国民对此卖国行为的义愤。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各省，在所谓地主、官僚势力开明派的立宪派领导下，展开了护路运动。在四川省，革命派也参加了这一护路运动，暴动开始了。在这种形势下，武昌新军的革命士兵起义，将武汉三镇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推举曾任旅长的黎元洪为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湖北军政府决定建立中华民国和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的同时，通知领事团，尊重同各国缔结的现行条约，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一如既往地承担赔款和外债，但如果援助清政府则以敌人看待。不过，力图避免帝国主义转向敌人方面。革命洪流迅速遍及全国，大部分省相继宣布独立。但是，政权几乎全为立宪派和保守势力所掌握。12月末，孙文由美国回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布中华民国成立。⑥

革命刚一发生，清廷立即要求日本提供武器。西园寺内阁以尊重日本在东三省的权益为条件，答应了清政府的要求。10月末，日本政府确定了“满洲”问题根本解决有待时机到来，当前则和各国协调，把清廷拉到自己这边来，在中国本土扶植自己势力的方针。陆军对向革命派提供武器也采取了积极态度，革命后立即向中国各地派遣了很多军事间谍，向汉口派出了中清派遣队。

清廷还接受朱尔典英国公使的劝告，要求下野后仍在北洋军官中拥有潜在势力的袁世凯出马，而袁则要求取得政治和军事的全权，轻易不肯出马。英美等列强希望实力者的袁世凯组成施行

若干立宪改革的强有力的政府，担负起镇压革命派、维持秩序的反革命的任务。袁世凯在他的嫡系冯国璋、段祺瑞分别担任第一军、第二军的司令官，进攻武汉之后，11 月，出任内阁总理；攻下汉口、汉阳，然后和革命军进行讲和谈判。以英国为首的各国，没收中国的关税收入等，对革命政府施加财政的压力，使之不得不和袁妥协。

日本政府为使清政府作为立宪君主制存在下去，于 11 月下旬提出了和英国共同进行干涉的方针。在这背后有山县和桂的压力。特别是山县害怕中国如果建成共和制，在思想上将会影响日本，并且收回利权的运动也将激化，为了防止这些问题，希望软弱的清廷存在下去。

但是，英国已经对腐朽的清廷完全失望，正在以废除清廷和使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前提，斡旋和平谈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中国的形势是在英国的主导下发展的。日本国内舆论同情革命派，《大阪朝日》记者中野正刚认为邻邦的革命是“打破政界现状的革新运动”，和打倒藩阀、改造腐败政党有一脉相通之处，因此，反对官僚政治家的干涉政策。⑥ 和革命派关系很深的国民党的犬养毅及玄洋社的头山满也为了援助革命派前往中国，但是，大陆浪人在支持革命派的背后，是想在革命成功后，将“满蒙”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1912 年 2 月，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了。继而孙文辞掉中华民国总统，南京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担任总统。孙文等企图以临时政府设在南京、遵守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来防止袁世凯的专制。但是这个设想由于袁世凯的策划而以失败告终，袁世凯于 3 月正式就任总统，将临时政府迁到北京。

在此期间，1912 年初，日本策划打开政策碰壁的局面。在北方，首先煽动清廷中最保守的宗社党，逼袁辞职而告失败。其次，山县向政府提议，和俄国协调，向“满洲”出兵一至二个师团。但由于英、

美、德出面牵制，西园寺内阁停止这一举动，引起了山县的不满。陆军便利用以前担任北京警务学堂监督的川岛浪速，拥护清廷皇族肃亲王，策划“满洲”独立，这个策划遭到挫折之后，又策划蒙古军造反，但是也以失败而告终。

还策划利用南方革命政府的财政困难，提供武器贷款以获得利权。通过三井物产公司进行的日中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借款以及大仓组进行的江苏铁路公司借款都签了字，借款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三井物产以及大仓组提供的购买武器的价款。⑦日本邮船和中国航运业中心招商局之间的借款谈判也在进行。但是对于革命政府以矿山、铁路、航运等利权为担保向日本要求借款遭到强烈的谴责。于是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计划撤回，招商局借款也终于没有成功。

袁世凯刚一掌握政权，英、法、德、美四国借款团就企图给以借款，以解救财政危机，并立即交付了预借款。四国借款团的活动，是压迫日本和俄国的。以结成包围德国圈为目标的英法两国，不能置日俄两国不满而不顾。这年的6月，决定四国借款团再加上日俄两国的银行，组成六国借款团。日俄两国发表保留“满蒙”特殊权益的声明之后，加入了六国借款团。但是，日俄两国无力提供借款，只靠英法两国提供。六国借款团一成立，对中国的借款条件便苛刻起来了。

与此同时，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协约秘密签订，在第二次协约所规定的南北“满洲”之外，又加上了东西内蒙古分别成为日俄的特殊利益范围。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即1911年11月末，外蒙古宣布独立，因接近俄国，日本也希望划定蒙古的势力范围，所以才签订了这个协约。俄国于1912年11月缔结俄蒙协约，明确表示为了维持外蒙自治和保有军队的权力，给予援助。

袁世凯政权的确立，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障碍。在软弱

的清廷统治下，日本以其军事的政治的压力，得以比较容易地建立了独占的势力范围。但是革命后的袁世凯政权，虽然说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军阀，却拥有自己的武力，而且利用外资进行合理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上软弱的日本便处于落后的命运。⑧ 从此日本就不断地试探推行帝国主义的冒险政策和高压政策。

改元前后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成立的时候，整顿行政财政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日俄战争和战后经营，外债累累，到 1911 年已超过十六亿日元，支付本利，1912 年度就达七千三百万日元，再加上海军省的海外经费估计为二千万日元。而且贸易一直继续入超，政府、日本银行保有的公债，加上纸币发行准备金的二亿二千万日元也不过三亿七千万日元，甚至流传着将要发生停止兑换的危机。反对扩充军备、要求紧缩财政和减税的呼声高涨起来。

当编制 1912 年度预算时，包括海军强烈要求的建造军舰费用在内，扩充军备费的新要求全被取消。但是，原内相兼铁道院总裁却强烈主张在内政方面实行积极政策。特别是围绕着铁道预算，山本藏相以及支持他的西园寺首相和原的关系一时呈现了紧张状态，但在这一点上山本让步了，铁道扩建费打上了六千万日元。内阁在 12 月设立以首相为总裁的临时制度整理局，开始对行政、财政、税制进行正式整顿。

明治最后的一年1912（明治 45—大正元）年，东京市电车公司发生了罢工，在市电工人中间，以片山潜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者曾进行了宣传。罢工是有组织进行的，工人取得了增加津贴的结果。但是罢工之后的镇压是残酷的，六十三名工人被判为有罪，片山潜也遭到五个月的监禁。⑨ 由于在经济危机中物价高涨，民众生活极度贫困。⑩ 1906到1907年高涨后处于低潮的劳资纠纷，这一年又高涨

起来，此后一直处于继续不断高涨的状态。

在这种形势面前，在1912年初的第二十八届议会上，原内相提出了改为小选举区制的选举法修正案。原曾经对山县说，小选举区是“防止危险思想传播的唯一方法”。[11]这虽然在众议院压服了在野党的反对而通过了，但在贵族院遭到否决。大概是害怕因此会使多数党的地位更加强化。

议会闭会以后的5月，由于任期届满而举行的第十一次众议院议员大选，是在冲绳县首次参加之下举行的。政友会从前一年以来，为了扩大党势在全国各地大力进行宣传，[12]在这年秋天的府县议会议员选举中，势力也得到扩张。这次大选，上次已经占有过半数议席的政友会又有所增加，达到了二百一十一席，把国民党九十五席、中央俱乐部三十一席、无党派四十四席远远抛在后边。但是，引人注目的是政友会在大城市遭到了失败。在1910年7月的神户市补选中，政友会支持的实业家松方幸次郎（松方正义的三子、川崎造船厂社长）大败于国民党的野添宗三，第二年1911年11月的东京市补选中，反对金权派、主张理想选举、并和反对煤气合并运动结合起来的万朝报记者古岛一雄取得了胜利。在这次大选中，东京市的十一名定额中，国民党五名、反政友系的无党派四名，政友会只一名，中央俱乐部只一名。[13]

7月30日，明治天皇（睦仁）逝世，皇太子嘉仁继承皇位，改元大正。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所谓明治时代，同时也是近代国家日本的成立和发展的时期，明治天皇是建设帝国的象征。正因为这样，他的逝世给予国民的冲击是巨大的。而且这个时期的日本正面临巨大的转变。勉强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起来，扩大了种种矛盾，而且势在必须解决。因此，明治天皇之死，作为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给与人们以深刻的印象，随后又加上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夫妇的殉死，其意义掀起广泛的议论。

正当这时，东京帝大法科教授上杉慎吉和美浓部达吉之间展开了所谓天皇机关说的争论。美浓部把前一年文部省召开的中等教师讲习会上的讲义，以《宪法讲话》为题出版了，他在序中说："甚至连专门学者论述宪法的人们，还在假借国体一味鼓吹专制思想，压制民权而要求绝对服从，在立宪政治的假面具下企图实行专制政治，这种主张听到不少了"，对此，上杉在杂志《太阳》上（明治45年6月1日），认为这是"关系到国体的异论"加以责难，由此争论扩大了。⑭ 上杉的主要论点是把臣民对于天皇统治权的绝对服从，看作国家结合的重要条件，以此作为国民道德的根据。对此，美浓部则强调应把具有共同目的的多数人团体这个国家作为基本，其机能的统治权要服从法律限制。后者的背景中有市民社会的设想。⑮ 支持上杉的仅仅有他的老师穗积八束等少数人，穗积慨叹舆论和人心的动向说："现在所谓以民意为基础的议院政党全权论是一种时髦的东西，因此，自然就要否定大权独立。更有甚者……竟产生了对皇位主权本身也妄加议论的事态。"（《国体的异说和人心的动向》，《太阳》大正元年10月1日）

市民文化和市民意识也在成长。在大逆事件那一年创刊了《白桦》杂志，白桦派和自然主义文学家们不同，后者是以被动姿态对社会压迫进行反抗，而白桦派则大胆地肯定自我，要使人性的自然本质在社会中得到充分伸张。在朝日新闻继续发表连载作品的夏目漱石，也以这一时期为界限，评论说，从外部的"超越性的明治批判"，"由于深入到社会内部批判，反而达到了对近代社会基础的批判"。⑯

在政治社会思想的领域中，这一年创刊的《东洋时论》（《东洋经济新报》的姊妹杂志）针对象古岛一雄那样的所谓国民主义对外强硬派所主张的、用观念的"国民"概念打倒专制的观点，从问题在于个人的自由在社会中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出发，开始对政治、

社会进行批判。这不久就发展成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明治天皇逝世两天后，在靠近大工厂的东京的三田成立了友爱会。这是在统一基督教弘道会(原为唯一神教徒协会)负责社会事业的铃木文治，为了提高具有一定职业和技术而人格却遭到藐视的工人的地位，以理解工人运动的学者、名士为顾问而建立的修养、共济团体，大工厂的工人踊跃入会，得到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把时代闭塞的原因归结为贫富悬殊、拜金思想、功利主义等物质文明的结果，并对此加以非难的反近代主义也开始抬头。不久，着手撰写“大菩萨峠”小说的中里介山也在大逆事件所造成的绝望中加强了近代批判的倾向，它具有为社会底层民众的怨恨而控诉的性质。⑰

明治天皇之死，对于一直利用其权威扩张权势的元老以下的藩阀势力，是一大打击。他们耽心西园寺内阁是否会乘机更加伸张议会和政党的势力。

正当这时，前首相桂太郎和其亲信后藤新平前递信相、若槻礼次郎前大藏次官等一起正在欧洲旅行，在俄国首都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接到了天皇病危的报告。桂出访目的之一，是和俄、英等各国首脑会谈，以便为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取得有利的进展，据传说另外一个目的则是观察、研究欧洲的政局，准备成立新党。为了对抗政友会，和以结成反政友会的联合为目的的国民党改革派进行谈判，已经是公开的秘密。⑱

桂于8月回国，回国后立即被任命为内大臣兼侍从长，进入宫中辅佐大正天皇，不得不退出政界。一般认为这是由于山县不希望桂扩张势力，将桂塞进宫中，但同时这也是山县阀把手伸到宫中，以确保对新皇的影响力。

① 松尾尊兊《急进的自由主义的成立过程》，井上清和渡部彻编《大正时期的急

进的自由主义》1972年，第55页。

② 在贵族院大会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宪法学者穗积八束，起来反对说："说起来，此案今天由众议院的大门钻进本会，非常遗憾。所以，在否决的同时，我认为挂上一个不仅今天、就是将来这种普选案也不得进入贵族院大门的牌子，然后希望全会一致加以否决。"(《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8卷，第137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见松尾尊兊《大正民主的研究》1966年，第101页。

④ 当桂内阁辞职时，授与三井八郎次郎、藤田传三郎、鸿池善右卫门、住友吉左卫门、近藤廉平等人男爵。这是继甲午战争后1896(明治29)年授与岩崎弥太郎、岩崎久弥和三井八郎右卫门男爵之后的授爵，可以视为授与富豪爵位的正式化。

⑤ 关于中国辛亥革命，参阅菊池贵晴《现代中国革命的起源》，1970年、野泽丰《辛亥革命》1972年。

⑥ 野泽丰《辛亥革命和大正政变》，《东洋史学论集第六》1960年(由井正臣编《大正民主》1977年，第55页)。

⑦ 关于这些借款和提供武器，见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1972年，第12—16页。

⑧ 江口朴郎《帝国主义和民族》1954年，第109页。

⑨⑩ 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I，第153—158页、第165—171页。

⑪ 《原敬日记》明治44年12月16日。原还曾以"在大选举区制之下，或以金钱腐蚀选举界，或以过激言论煽动中等阶级以下之人，此两者虽均为选举竞争的要诀，但以金钱腐蚀之事犹属可忍，而以过激言论谋求当选实属危险。而近来类似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与日俱增"这样的话吓唬山县。

⑫ 1911年的"演说会次数竟达三百九十余处之多，旁听人数不下二十六、七万人。致力于宣传如今年之盛者，乃前所未有"。小林雄吾《立宪政友会史》第3卷，第450页。

⑬ 宫地正人《日俄战后政治史的研究》第278—282页。

⑭ 参阅星岛二郎编《上杉慎吉对美浓部达吉最近宪法论》1913年。引用据此。

⑮ 松本三之介《天皇制国家和政治思想》1969年，第298—306页。

⑯ 飞鸟井雅道《初期社会主义》《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7 近代4》第173—175页。

⑰ 参阅尾崎秀树《修罗明治之秋》1973年，鹿野政直《大正民主的底流》1973年。

⑱ 迭兹奥·那吉塔(安田志郎译)《原敬——政治技术的巨匠》1974年，第143页。

第二节 大正政变和护宪运动

增师问题和陆军的倒阁

1912(大正元)年秋，陆军强烈要求第二年度预算案编入增设

两个师团的费用，开始对西园寺内阁进行攻击。其理由是由于西伯利亚铁道的扩建，俄国充实了远东兵力；由于朝鲜的反日民族斗争，驻朝鲜部队被迫分散部署，降低了战斗力；以及中国辛亥革命的结果，失去了利用中国军队对俄国作战的希望。① 当时陆相是这一年4月新任的萨阀上原勇作中将，这个问题是田中义一军务局长、宇垣一成军事科长等中坚阶层提出来的。特别是田中军务局长为了实现增师对元老、财界、政党等各方面进行了活动。

西园寺内阁正在进行上述的行政、财政、税制的整顿，令各省节约支出由九厘到一成五，估计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整顿总额为三千七百余万日元，预定将此项财源在1913年度分配到减税、振兴产业、扩充海军等方面。但是陆军主张实现增设师团是整顿的前提，因此坚决主张将陆军的整顿额作为这个财源一部分。

陆军采取强硬态度原因之一，是海军的扩充。如上所述，当时陆军是以俄国，海军是以美国作为各自的假想敌国，而竞相扩充军备的。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由于日俄协商，改善了同俄国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同美国的关系由于围绕中国问题上的对立，再加上排斥日本移民问题而加剧了紧张。海军扩充是和以国家资本为主导、财阀系垄断资本为补充的军需重工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当时的舆论，在扩充军备这一点上有支持海主陆从方针的倾向。同时以陆军为中心的长州阀，以元老的首领山县有朋为靠山，在官界、贵族院、枢密院、宫中等权力机构占有势力，而以海军为中心的萨摩阀趋于衰落，因而出现了宁肯与政党相呼应、互相利用的动向。

海军要求从1911年起，以建造战舰七艘为中心的造舰费三亿五千万日元，1913年度的预算案里，准备编入三艘战舰建造费第一年度份一千零五十万日元。陆军认为这是西园寺内阁利用海军压陆军，以显示政党内阁威信的策略，从而决心在增师问题上同西

园寺内阁进行决战。②

上原陆相于12月22日向内阁提出增师案。西园寺首相与原、松田两相协议，决定"如上原陆相提出从大正3年度实行亦可的申请，则另当别论，否则即使得不到后任陆相以至于倒阁，此时也不提出增师案的方针"(《原敬日记》大正元年11月26日)。

12月1日，首相将前一天在内阁会议上否决增师案一事，告诉上原陆相，陆相于第二天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上奏说不能同意增师案的拖延，这是滥用帷幄上奏的特权来弹劾内阁。

西园寺首相3日访问山县，山县婉然拒绝推荐后任陆相。西园寺内阁5日总辞职，政友会在发表其始末的同时，向各支部发出如下的电文"现在内阁整顿方针和增师无法协调，陆相辞职，由于无后任者，乃行总辞职"(《立宪政友会史》III第569—572页)。西园寺内阁——政友会和陆军发生了正面冲突。

但是，还剩下天皇发布敕语命令西园寺留任的一条道路，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不伤体面的范围内予以妥协"(《原敬日记》大正元年12月6日)。但是没有颁发敕语。桂内大臣并不想在内阁和陆军之间进行斡旋，这表明桂内心有在万一情况下自己出来组阁的想法。

护宪运动

西园寺内阁的总辞职，被评为"大正政治维新的开始"(《东京日日新闻》大正元年12月5日)，"予天下人心以深刻感动，盖为我国所罕见"(《东洋经济新报》大正1年12月15日)。③"在政治危机未消除而继续发展中，舆论逐渐支持多数党的政友会，政友会的政治地位，达到了以往在妥协政治范围内不能想象的那样高度"。④

西园寺内阁的辞职，引起了舆论如此高涨，给予元老、藩阀势力很大的冲击。12月6日，为推荐后任首相，召开了元老会议。这

是日俄战争后第一次。但是在自己招致的政治危机面前，元老们莫衷一是。[5]元老会议首先要求西园寺留任，但是只要陆军不撤回增师案，就没有接受的道理。对于陆军推举的寺内因为只能刺激舆论而未考虑。其次是推举了萨派元老松方正义，松方也推辞，继而考虑到"萨派海军"的巨头山本权兵卫、山县系官僚的平田东助，也都拒绝了。又重新提出了寺内出任的主张，也没有实现。这样意见纷纭的结果，山县说除了自己和桂以外，无人能担当起如此困难的局面，桂不忍心烦劳高龄的山县，便接受了组阁。于是，在17日召开的第十次元老会议上，正式推举桂为后继首相。在这种纠纷的背后，有萨长、海陆的对立，此外还有长阀系的桂、寺内、平田各自代表的势力之间的对立，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在以后不久随着政局的演变就表面化了。

桂接受了天皇的敕语，以受天皇命令，不得不走出宫中的形式进行组阁。首先任命警察官僚而能够制服政党的大浦兼武为内相，和财界关系很深的殖民地官僚后藤新平为递信相兼铁道院总裁、随后以若槻礼次郎藏相为首的桂直系官僚势力充实了内阁。外相预定是三菱的女婿驻英国大使加藤高明。桂采取了海军扩充案也和增师案同样要召开国防会议来解决的方针，但是海军反对，斋藤海相拒绝留任。海军中坚层的态度也很强硬。桂决定战舰建造的第一年度预算为六百万日元，同时请求发出要求斋藤留任的敕语[6]。这样，第三届桂内阁终于在12月21日组成。桂坚定了同政友会对抗的姿态。

西园寺内阁刚一总辞职，在反对增师的基础上，以打倒滥用陆军特权导致西园寺内阁跨台的阀族、实现责任内阁为目标的护宪运动扩展起来。总辞职的报导一传开，形势就成了下述状态："到12月14日为止，全国政友会支部宛如鼎沸似地愤起，作出了反对增师、剿灭阀族的决议，激励党本部而来者已无一支部例外，……象

这样唤起舆论，完全是空前罕见之事”。⑦政友会支部和商业会议所以及新闻记者团等，在各地召开了反对增师、拥护宪政的大会。12月13日，东京的新闻记者和少壮律师组成宪政振兴会，作出了排除元老干涉国政、由政友和国民两党健全份子建立纯粹民党以及反对增师的决议。在这种形势下，交询社的同志站起来，推出国民党的犬养毅、政友会的尾崎行雄，以运动的兵战部自任。交询社是由福泽谕吉创建的组织，当时网罗了庆应义塾出身的主要是三井系的新进实业家以及新闻记者、议员等。12 月 14 日，这个组织召开了时局对策恳谈会，决定正式会名为宪政拥护会，19 日，在东京歌舞伎座召开第一次宪政拥护大会，发表了“阀族的横暴跋扈已达极点，宪政危机迫在眉睫。我们断然排除妥协，根除阀族政治，以期拥护宪政”的宣言。

12月 27 日召开第三十届议会，一直到翌年 1913 年 1 月 20 日止为休会期间，宪政拥护派的议员分赴各地进行宣传。地方排阀热也高涨起来，全国各地连续召开拥护宪政的市民大会、县民大会、记者大会等，并发表宣言，准备桂内阁解散议会，以期重选同志议员。在桂内阁方面，大浦内相在年末大批调动地方官，进行干涉选举的准备，还开始了暗中离间议员的活动。

1 月 19 日，国民党召开大会。改革派提出了重点放在攻击政友会的宣言案，犬养派则立即以主张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民党宣言案来对抗，后者以微小的多数获得了胜利。犬养派乘机以公选常务议员，掌握了执行部。20 日改革派的大石正巳、河野广中、岛田三郎、武富时敏、箕浦胜人退党。同一天，桂首相宣布组织新政党。

桂所想建的新政党，根据德富猪一郎的看法是“对内奉行皇室中心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国民的大政党”(《公爵桂太郎传》坤卷，第700页)。这不仅是政党，还包括贵族院、官僚，毋宁是以后

者为中心的组织的设想，其目的是一方面排斥以众议院为中心的政党内阁，另一方面抑制元老以及军部的干涉，由政府自己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桂向田健治郎说明新党必要性时，“阐述了陆海两相应由文官担任的革新措施”，得到田的赞同（《田健治郎日记》大正 2 年 1 月 18 日）。在陆军方面，田中军务局长给寺内朝鲜总督的信中也说：“这次桂公的政党，甚至主张修改关于陆海军大臣的官制，令人担心”。⑧

国民党的过半数和大浦领导的中央俱乐部全体加入了桂计划的这个新党。桂估计政友会也会分裂而有相当多的议员加入，但只有两名被开除的而没有退党的。众议院的新党议员只有九十三名。贵族院山县系议员的主流派平田、田等也认为贵族院应当采取超然立场，决定不加入新党。桂的计划大部落空。

而且桂一建立新党，完全失去了和政友会妥协的可能性。1 月 24 日，在新富座召开的第二次拥护宪政大会极为盛大，一直采取慎重态度的政友会干部也派松田正久出席了大会。

2 月 5 日，议会复会，政友、国民两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署名的议员超过半数。尾崎行雄攻击阀族，指责桂“想以玉座为胸墙，以诏书代替子弹，来打倒政府”。但桂并不想解散，而下令休会五日。停会不言而谕是进行妥协工作的前提。8 日，桂要求会见西园寺总裁，要求撤回不信任案。西园寺予以拒绝，于是 9 日，天皇召见西园寺，向他下达了协助解决众议院纠纷的敕语。这意味着叫他撤回不信任案。

敕语一下达，政友会的干部开始动摇。只有尾崎和特意由国民党参加协议的犬养认为虽说是敕命，但不能改变党的决议，而多数议员对桂的阴谋表示愤慨，反对服从敕语。10 日早晨，劝告桂辞职的山本权兵卫访问政友会本部，这也助长了这种气势。这一天的议员全体大会决定坚持不信任案前进。桂被自己的方案击败敬

了。

这一天，议会为民众所包围。桂内阁决定政友会如不撤回不信任案，就解散议会。但是，气馁的桂不想在解散后继续进行战斗，便决定内阁总辞职。原在这一天日记上记载："如果仍然不辞职的话，将会引起革命的骚动"。

包围议会的民众，当了解到议会不开了，便掀起骚动，对政府发泄愤怒。政府系统的报社和派出所都遭到了袭击。

东京的骚动，立即波及到关西各城市，情况更加严重。11日，在大阪，明治宪法发布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局政谈演说会，因警察命令中止，以此为契机酿成骚动，政府系统的报社和加入桂新党的议员住宅遭到袭击。13日，神户发生骚动，继续了三天，姬路联队出动了兵力。16日广岛、17日京都也都发生了骚动。这表明了民众日积月累的深刻不满。

桂内阁已经败下阵来。而在奋起的人民的不满中，并没有能提出确切目标的领导者，骚动不久就平息了。

桂内阁2月11日总辞职，元老会议根据以元老身份初次出席会议的西园寺的意见，推荐山本权兵卫为后任首相。山本以政友会推荐阁僚给与支援为条件接受了组阁任务。但政友会认为这不过是以萨阀代替长阀，因而反对的呼声高涨。原敬则说服党员，如果对此加以拒绝，就将倒退到官僚内阁去；另一方面要山本承认以政友会的主张为内阁的施政方针，阁僚除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四相以外，余者由政友会选任或加入政友会，这样才使政友会决定支持山本内阁。原敬还想让犬养入阁，但遭到山本拒绝。政友会由原内相、松田法相、元田肇递信相入阁，高桥是清藏相、山本达雄农商相、奥田义人文相加入政友会，木越安纲陆相和斋藤海相留任。

国民党声明对山本内阁采取严正中立的态度，和政友会断决关系。在政友会内部，推行护宪运动的尾崎和冈崎邦辅等交询社

一派的二十六名议员，因反对同山本内阁妥协而退党，组织了政友俱乐部。这样一来护宪动运发生了分裂，后来的护宪运动就由国民党和政友俱乐部来推进了。

日比谷骚动事件以后，城市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政党势力也在上升。但是，在众议院占过半数的政友会和国民党的犬养派联合起来，以城市群众运动为背景起而攻击政府，这还是第一次。而在这种群众运动高潮中打倒了内阁，可以说在明治宪法下是空前绝后的。护宪运动虽然由于政友会的妥协，不久就分裂了，但总算得以组成了准政党内阁，形成了推行下述改革的压力。群众运动很快就平息了，但在广大群众中提高了政治关心，其影响后来在各地以种种形式留存下来。在各地方城市中对护宪运动表示共鸣的青壮年，以青年团等名义组成自发的团体，参加改革市政以及降低电车费和电灯费的运动，参加废除营业税运动，就是例子。在这个时期建立的鸟取联合青年会和高崧雄辩会等组织，不久就明确了它的市民的政治结社性质，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展开了活泼的运动。⑨

关于这个护宪运动的评价，大致可有三种立场或论点。

第一，强调以种种形式反对藩阀专制的城市中间阶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由大城市向各地扩展，推动一直和藩阀政治妥协的政友会，参加护宪运动，打倒了桂内阁。这是一般说法，应该说这是站在护宪运动前头的犬养和尾崎等所谓强硬派的立场。

第二，对在众议院占有过半数、并具有和藩阀势力进行讨价还价力量的政友会的现实政治能力的肯定评价。护宪运动是"靠全国性的政友会的组织"，而其"党组织又为原、松田以及地方八团体的各领导——政友会干部所掌握"；同时，地方支部的领导者重视地方的经济利益，为了使积极政策继续下去，特别关心政友会要掌握政权的问题。⑩ 并重视在桂拒绝情投意合之后，为了和它对抗，原

把党的整个组织投入了护宪运动。致使运动以激烈的形式展开，但这是中央震源性的运动，而且也是重视中央政界动向的向往中央的运动。⑪这是肯定政友会的党组织及其干部尤其原敬的作用的。

第三，肯定犹兴会、又新会以及国民党的急进派和继续不断反藩阀、反政友会的急进的政治家集团的立场。这个集团站在反对苛税、反对提高电车费等的市民运动的前头，一直重视人权、普选以及自治权等问题。但是，由于政友会成为护宪运动的一翼，所以只把政权问题提到前面，而没有提出减税、人权以及扩大选举权的问题，由于桂内阁向山本内阁的政权更替，护宪运动迅速衰落下去。同时，他们的护宪理论是以主张除掉隔离皇室和人民联系的阀族这种一君万民论为基础的，指出这是它的弱点。⑫另外，当进行护宪运动时，要求普选的只有《东洋经济新报》，此外，力主应与群众生活问题结合起来的是 1913 年 10 月创刊的茅原华山、石田友治的《第三帝国》。⑬

根据重视上述哪些问题，对护宪运动的分析和估价也会有所不同，但对这些论点加以综合考察，还是必要的。

山本内阁的各种改革

山本内阁组成后不久，就面临第三十届议会复会。而且由于执政党政友会的分裂，差一点不够过半数。

政友俱乐部的林毅陆提出关于内阁政纲的质问，即对于政党内阁的必要性、陆海军大臣现役制的改革、修改文官任用令、增师问题以及减税等五项有关政府的方针进行质问。3 月 11 日，山本首相对林的要求除增师问题要看周围情况外，作了承认某种程度的答辩。特别就陆海军大臣现役制问题，把上届桂首相说的在宪政运用上“没有阻碍”，改为“难保没有阻碍”，答应要改革。在这以前，原内相对山本进行工作，指出为了应付议会和缓和舆论，这种改革也

有必要，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估计预算案等能够通过。和山本商谈过的木越陆相表示“从大局看，乃属不得已而答应了”(《原敬日记》大正2年3月6—8日)。1913年度预算案，众议院仅以五票之差通过了。

与此同时，废除了在制度上曾是瓦解西园寺内阁原因的陆海军大臣的现役制，改为退役的大将、中将也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但是，后来也没有任命现役以外的大、中将为陆海军大臣的例子。参谋本部对此改革强烈反对，⑭不久木越陆相被迫辞职，后任陆相一事，山本首相未取得山县的谅解，就任命了阀外的楠濑幸彦中将。⑮

关于这个改革，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实施这个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用来缓和舆论，使扩充军备易于进行。这对于要求巨额造舰费的海军特别合适。木越陆相也说，如果由于这个问题导致政变的话，将来增师将会困难，所以不得已同意了。⑯

其二，陆军的对策是，从陆军省的业务中把关于编制、动员移交给了参谋本部。这种策划是为了即使由预备役或后备役甚至由文官出任大臣，因有统帅权这个堡垒也难以发挥作用。⑰这样一来，统帅权的独立范围就更加扩大了，但从军部的立场看来，在战争指导上也是背上了一个大包袱。

8月修改了文官任用令，扩大了可以特别任用没有官员资历的政党党员等的范围。原内相想扩大到各省的局长级，但因其他阁僚表示踌躇，决定除陆海军省以外，只扩大到各省次官、法制局长官、内务省警保局长、警视总监以及各省敕任参事官等。这个修改由于以山县为议长的枢密院的反对，迟迟不得进展。但山本内阁采取强硬态度，表示不惜修改第二届山县内阁当时扩大枢密院谘询事项的明治天皇的指示书才得以通过。⑱

山本内阁这样排除陆军和枢密院的强烈反对，总算废除了陆

海军大臣现役制和修改了文官任用令，撤消了内阁拓殖局，而由内务大臣“统理”殖民地行政。山本内阁似乎还想准备废除殖民地长官武官专任制等的改革。《东京朝日新闻》（大正3年1月14日）报导说，政府没有同山县、寺内等协议就起草了朝鲜、台湾两总督和关东都督都可以任用文官或武官的改革方案；寺内朝鲜总督决心辞职。扩大政党内阁的人事权范围，是政友会特别是原敬经常关心的事。

第三十届议会后不久，与尾崎行雄并列的领袖冈崎邦辅退出政友俱乐部，重新加入政友会，追随者相继出现。冈崎退出政友会，是迫于当时形势，暗中已和原约定，伺机与同志一起复党。到年末时，政友会已经恢复了超过半数。政友俱乐部和其他小会派合并成立了中正会，和国民党一起留在宪政拥护会中。

另一方面，桂的新党一发表立宪同志会的组织和宣言，便立即下野，但不久就和大石、河野、岛田等国民党系统的政治家和官僚派特别是后藤新平之间围绕政党应有的姿态问题发生了对立。随后在10月，桂党首突然死去，这种对立表面化，后藤等退了党。12月，立宪同志会正式举行建党仪式，加藤高明前外相就任总理，大浦、大石、河野担任总务。但是，在护宪运动之后，党势不振，极其不得人心。

① 上原陆相的意见书。其趣旨见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上卷，1958年，第491—493页。另外，这个草稿还有宇垣军事科长起草、田中军务局长加以增删的付记。

② 在寺内家文书中的陆军用纸的意见书，有如下的判断："政府谋求取得整理的实效，实行公约，抬高政友会内阁的声价，以保全政党内阁的基础，为此，暂时利用海军，首先对陆军施加强大压力，拒绝其要求，以期显示政友会的威信"，并且号召"当前的形势不单是增设师团问题，政府在此时机有奠定政党内阁基础的内心想法，因此，增师问题不过是其牺牲而已，实在是关系到我国国是的重大时机，即日本帝国是成为民主国家或是君主国家的关键时刻。"一般推测这是田中军务局长之流的意见书，此后，陆军关于增师的要求始终不让步，这说明如果因此西园寺内阁总辞职的话，按顺序就该让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来组阁。在寺内家文书中，和此意见书一起还有题为"关

于时局的来电”，即1912年12月4日以后田中少将发来的电报簿，是从企图实现寺内内阁的角度表示了连日来时局的动向。

③ 山本四郎《大正政变的基础研究》1970年，第218、228页的引文。

④ 迭兹奥·那吉塔《原敬——政治技术的巨匠》第152页。

⑤ 当时元老会议的情况，当时作接待工作的小川金男在1951年《宫廷》中有所回顾。参看今井清一等编《日本百年六暴发户的天下》第41—42页。

⑥ 官僚派的田健治郎也在日记中责难说，如果使用以敕语使之留任的手段，西园寺内阁也许不至倒台，桂累及帝室，竟毫不忌惮。《田健治郎日记》大正元年12月21日。原文为汉文，引用时改为日文。

⑦ 上田外男《大正政变》1913年，第39页。

⑧ 大正2年2月2日田中给寺内的信。井上清《大正时期的政治和军部》，井上清编《大正时期的政治和社会》1969年，在第368—370页中引用了全文。

⑨ 松尾尊兊《大正民主》第100—103、第112—117页。

⑩ 迭兹奥·那吉塔前引书，第172—174页。

⑪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3卷，第118页以下。

⑫ 宫地正人《日俄战争后政治史研究》第303—305页。这是宫地所说的国民主义的对外强硬派。松尾尊兊《大正民主》，从不同的观点出发，重视这个组织，但并没有直接涉及大正政变。

⑬ 松尾前引书，第85—86、第122—123页。

⑭ 陆军省军事科长宇垣一成也曾经散发过反对它的怪文件《关于陆海军大臣问题》，收在《宇垣一成日记I》1968年，第88—95页。

⑮ 德富猪一郎《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第876页写道：尤其在木越陆相辞职之后，山本内阁的特色“是除长派中（山县）公系统或代表其势力的国务大臣外，纯以萨派和政友会组成的内阁”，是别无他例的。

⑯ 山本四郎《第一届山本内阁的研究》，载《史林》1967年9月（由井正臣编《大正民主》第100—101页），藤原彰《第一次大战前的日本军部（I）》，载《历史学研究》383号（1972年4月）第61页。

⑰ 《战史丛书》，载《陆军军需动员（I）》1967年，第132—134页。井上前引论文，载井上编前引书第368—371页。

⑱ 关于天皇的指示书，参阅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I》第226页。其全文收入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1953年，第473—474页。

第三节　护宪运动的瓦解

政界的变动和中国二次革命

经过大正政变和护宪运动，桂、园时代的政权布置大为改变。

桂、园时代，代表山县系势力的桂和左右众议院的政友会干部西园寺、原敬等，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一直由桂和西园寺交替执政，因而阻碍了桂以外的山县系势力登上政治舞台，政友会以外的政党也没有接近政权的希望。但是，政友会利用桂、园合作扩展了势力，从而激起了山县阀的危机感，致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桂考虑把非政友会的各政党和贵族院的山县系势力合在一起组成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执政党，陆军方面则设想拥立寺内正毅组成陆军内阁。由于陆军掀起的大正政变，一方面使群众运动登上了政治舞台，另一方面使桂走向组织新党，从而断绝了桂、园恢复合作的可能性。政友会结合“萨摩的海军”，获得了政权，确立了势力。桂虽组成了同志会，但没有能够纠合山县系势力。陆军却死守统帅权的堡垒，贵族院的山县系势力也不愿意被同志会吸收去。于是，同志会就向集结众议院的非政友势力和与此相勾结的官僚势力方面前进了。其转机是不久以后出现的大隈内阁的组成。

1913年7月，中国发生了二次革命。这年年初进行的参议院、众议院的选举，以中国革命同盟会为中心组成的国民党，在两院中都占了接近半数，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因而同大总统袁世凯形成对立。3月，国民党的促进者宋教仁被袁的刺客暗杀，使国民党极为愤慨。而且4月，袁大总统未经国会承认，便和五国借款团缔结了二千五百万镑的改革借款。这项借款在交涉时，以盐税为担保，并由外国顾问对此进行监督等苛刻条件成了问题，美国认为这将威胁中国行政独立，因而退出了六国借款团。由此巩固了财政基础的袁世凯，便对国民党积极施加压力。6月，罢免了国民党系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7月，李在江西宣布独立，起来讨袁，从此开始了二次革命。革命派的孙文、黄兴等曾要求日本给与援助，但日本政府顾虑同各国的关系，没有答应，军部暗中进行了援助。

二次革命立即遭到了占压倒优势的袁的政府军的镇压。扬子江上的日本军舰，不顾外务省的制止，收容在南京举兵的黄兴，使之逃往上海。而孙文，黄兴等革命派领袖，在外务省的反对声中，一个接一个地逃到日本。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军和日本军人、日侨相继发生了冲突。8月在山东省和汉口发生了中国军监禁日本军官的事件，9月1日，中国政府军占领南京的时候，日本人有三人被杀。

陆军认为关系到日本军的名誉，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攻击外务省。对二次革命失败感到焦急的大陆浪人们，也攻击山本内阁的“软弱外交”，主张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9月5日，发生了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被右翼青年暗杀的事件。阿部政务局长过去一直强调统一外交，极力排斥军部干涉外交，以致引起军部的不满。① 继而7日，对华同志联合会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劝告政府向中国出兵的决议，要求会见牧野外相而拥至外务省。这是大陆浪人和陆军相呼应而煽动的，但也表明国民中间积有无从发泄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极容易受对外强硬的煽动。为此所压服的山本内阁，加强了对中国的要求，迫使它答应了。

美国已经在5月承认了以袁为总统的中华民国，10月日本也和英国、法国等一起予以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政策继续陷于僵局。

西门子事件

直到1914年初第三十一届议会为止，山本内阁在废除军部大臣现役制，修改文官任用令的同时，还裁减了约七千名官员，整顿行政财政，节省了七千万日元。整顿行政财政和减轻国民负担，是舆论的强烈要求。但是，山本内阁却将这笔节约款项不是用在减轻国民负担上，而是用在扩充海军上了。连同上年度预算开始提出的共计战舰四艘、驱逐舰十六艘和潜艇六艘的建造费一亿五千四

百万日元，列入到1919年度为止的跨年度费。用于减税的只不过以营业税为中心的六百万日元。

对此，宪政拥护会刚好在这经济危机中提出减税问题，诉诸舆论。主张全部废除营业税、纺织品消费税以及通行税等三种苛税。以前的第三十届议会也曾经提出许多废税减税案，但都以审议未完不了了之。东京市会议员们因而组成营业税全废同盟会来对付，于是废除苛税运动扩展到全国各地。特别是集聚在实业组合联合会等的中等营业者，积极展开了废除全部营业税运动，各地商业会议所的资本家阶层也被卷了进来。但是，商业会议所的联合会干部，却极力主张应当只减轻营业税，这表明上层资产阶级步伐的混乱。②

以废税减税运动高涨为背景，在野各党派竞向议会提出了各种废税减税法案。国民党的提案是，全部废除营业税、纺织品消费税、通行税、石油消费税以及完全废除食盐专卖和地税减七厘；中正会提出了全部废除营业税和通行税以及纺织品消费税减半的提案。在同志会方面，加藤总裁等干部对减税是消极的，但是由于下层的推动，决心主张全部废除营业税、通行税和纺织品消费税减三成。三个在野党都一致主张全部废除营业税和通行税。因此所需财源三千余万日元。

正当这时，突然发生了西门子事件。1月23日的报纸报导柏林地方法院判决西门子·秀克尔德电气公司原东京分公司职员盗出关于向日本海军高级官员行贿的文件，对西门子公司进行恐吓一事为有罪的事件。同志会的领袖岛田三郎立即提出这一问题，对山本首相和斋藤海相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海军成立了检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不仅弄清了围绕千叶县的船桥海军无线电信所的建设接受了西门子公司的贿赂，还发现了围绕巡洋战舰金刚号的订货，通过三井物产公司接受了英国维加

斯公司的贿赂。被认为将任下一届海相的吴镇守府司令长官松本和中将也被投入监狱。这表明了大战前夜、煽动扩充军备竞赛的"死的商人"军需产业资本家的国际活动的一斑。③

山本首相是"萨摩海军"的大后台，并在议会中提出了扩充海军的计划。群众强烈号召打倒萨阀和肃清海军的主张。护宪运动推倒桂内阁整好一年后的2月10日，同志、国民、中正三党向众议院提出了弹劾山本内阁的决议案，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揭发批判内阁的国民大会。弹劾决议案被政友会否决后，群众包围议会，演成了骚动。政府虽请求出兵，而陆军却迟迟不出。原内相严厉镇压群众骚动，并禁止报纸刊载，遭到了蹂躏人权的指责。

西门子事件是，追究军阀腐败，制止扩充军备，将其财源用于废除税收上，并把提高人民生活的要求和打倒阀族、反对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结合起来的最好的问题。但是，运动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

宪政拥护会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立即停下了废税问题，专事攻击海军的腐败，企图以此打倒山本内阁。这就同对参加护宪运动、打倒桂内阁的政友会抱有强烈反感的同志会和贵族院的官僚派议员的要求符合起来。另一方面，商业会议所、实业组合联合会等组织，则把废税运动的目标限于废除营业税，以避免将它和海军问题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反政府运动。并一心致力于分化政友会的议员，使之赞成废税的主张。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是向着扩大民众权利、迫使政府改变帝国主义政策的方向前进，而是谋求在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原封不动之下，实行轮流执政，抑或采取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团体的姿态。

山本内阁和政友会在舆论高涨面前也只好让步。政友会在众议院削减造舰费中战舰一艘三千万日元，在减税方面也增加为削减营业税三成、地税减二厘等一千五百万日元。④ 这时站在山本

内阁面前拦路的是贵族院的官僚派。他们激烈攻击偏重海军和海军的腐败，从众议院的修正案中，又削减了驱逐舰和潜艇的建造费四千万日元。只剩下了战舰三艘的费用。

面对这种形势，原内相向山本首相提议，在最近时期，或是将政权让给政友会，或是原退出内阁。他认为这样，可在政友会的立场不至受重大损害之下，通过预算，并能使内阁继续下去(《原敬日记》大正 3 年 3 月14日)。但是山本首相拒绝了这个提议。在两院协议会上，众议院否决了贵族院的修改，结果 1914 年度预算案终于没有获得通过。因众议院解散而预算案没有通过的事是有的，但预算案遭到如此否决则是从来没有过的(《田健治郎日记》大正 3 年 3 月 23 日)。山本内阁陷于窘境，不得不在 3 月 24 日总辞职。

大隈内阁的组成

掌握政局关键的仍是元老。山本内阁的倒台，固然与宪政拥护会和支持它的报纸、民众的活动有关，但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贵族院的官僚派。因此，对于后任首相的人选，考虑到政党和舆论的动向，推举了阀族色彩不太明显的官僚系统人物。元老会议首先推荐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德川推辞不就，便命令枢密院顾问官清浦奎吾组阁。清浦虽然是山县系，但是司法官僚出身，远离政界。对于清浦的组阁，包括同志会在内，所有政党都表示反对。还有，海相候补者加藤友三郎中将坚持入阁条件，即要求支出因预算没有通过而不能支出的战舰的年度建造费，不肯让步，因此清浦打消了组阁的念头。从表面上看，尽管废除了军部大臣现役制，似乎还是因为得不到海军大臣的人选而使组阁流产了。但并不一定只是这一个理由。清浦的传记也写道："此时是否反倒应该选任反山本的海军大臣，断然排除海军一部分的反抗。……但是，断然出此，还不具备确实的舆论后援"。⑤ 清浦内阁的流产，再一次表明随

着藩阀势力内部的萨长海陆对立的深刻化，要想摆脱这个矛盾，必须依靠政党和舆论的力量。

元老会议提到第三人时，转而改为推举改进党以来的政党政治家的元老大隈重信为首相。推举大隈的是他青年时代的亲密朋友元老井上馨，目的是想利用大隈击败政友会。

大隈的出马，赢得民众的热烈欢迎。大隈的计划是，组成以同志会为中心加上国民党、中正会的反政友三派的内阁。企图把反政友提到前面，用来冲淡拥护宪政、打倒藩阀的争论点。由同志会的加藤高明任副总理级的外相，若槻礼次郎任藏相，官僚派占据要职。成为问题的是内相的人选，由官僚派的大浦兼武、还是由党人派的大石正巳，抑或是由中正会的尾崎行雄来任内相，争论不休，结果由大隈兼任。大浦以农商务相负责同山县联系。中正会的尾崎以法相入阁，但国民党的犬养拒绝入阁，由于同大隈的多年关系，只表示友好的中立。各省次官任命了滨口雄幸、下冈忠治等接近同志会的新进官僚。

大隈内阁在政纲中提出了刷新弊政、充实国防和减轻国民负担。为了符合长阀元老的期待，把击败政友会和增加两个师团作为目标，同时也表明了与此相矛盾的废税减税的姿态，以便博得民众的欢心。

首先看一下充实国防。由阀外起用的八代六郎海相，一上任立即使山本、斋藤两大将待命，随后又编入预备役，打击了“萨摩海军”。多亏这次“廓清海军”，建造中的战舰的年度建造费，轻易就通过了6月的第三十三届临时会议。在这届议会中，为了审议“陆海军备的设施”，设置了防务会议。⑥当护宪运动时，犬养毅等曾经主张为把国防计划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设置国防会议，这和防务会议是似是而非的。防务会议规则在其审议内容中，没有提到国防的根本方针，也没有提到军备和财政的协调。其机构也以军

人为中心，不过是保持陆、海军的平衡，使扩充军备合理化，欺骗舆论的机关而已。在防务会议上，强调财政困难、限制扩充军备的若槻藏相的主张，遭到长谷川参谋总长的反击，⑦连陆海军的协调也发生了困难。

另一方面，以贯彻先前第三十届议会上没有完全通过的废税减税为目标，大日本工商协会等很快就从6月前后展开了运动。⑧

大隈内阁几乎处在元老们期待的扩充军备和民众要求的废税减税两者夹击之中。从这种困境中把它拯救出来的是这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 表明阿部政务局长意见的有大正2年稿《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纲领》。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卷，1955年，第369—376页。在初版中为元年，但以后的版本中订正了。

② 关于减税运动，参阅江口圭一《1914年的废税运动》，载于井上编《大正时期的政治和社会》。

③ 对这一点进行分析和追究的有巴克的《私人的军事工厂》(Philip Noel-Baker, The Private Manufacture of Armaments)1936年，西门子＝威卡斯事件，参阅第150页以下。

④ 这些减税法案，经贵族院的若干修改之后通过。关于营业税从1915年实施，其纳税人员从六十一万人锐减为三十七万人，但税额只不过从二千八百五十九万日元，减为二千一百四十六万日元。江口前引论文，井上编前引书第107页。

⑤ 德富猪一郎监修、井上正明、坂口二郎《伯爵清浦奎吾传》下，1935年，第187页。

⑥ 关于防务会议，参阅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论备忘录》《法学》1964年3月10日(由井正臣编《大正民主》第160—161页)。藤原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军部(2)》，载《历史学研究》第395号。

⑦ 若槻礼次郎《古风庵回顾录》1950年，第212页。

⑧ 江口前引论文，井上编前引书，第113页。

第四节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大隈内阁组成三个月左右，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弗朗茨·裴迪南大公夫妇，在合并不久的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被试图联合塞尔维亚统一南斯拉夫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所暗杀。起初谁也没有想到，由于这个事件会引起空前的大战。但是，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背后，有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所代表的列强之间帝国主义的对立，从巴尔干半岛到土耳其这一地区，是其焦点之一。苦于国内民族问题的奥地利，企图给塞尔维亚以打击，以便镇压民族运动，而想要向土耳其扩张的德国对它给与支援。苦于国内革命运动的俄国，也想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确保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好战的态度，支援塞尔维亚。①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认为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便于7月28日宣战。对此俄国开始动员，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遭到拒绝，乃于8月1日宣战。当时德国参谋本部作战计划，所谓施里芬计划是，预想东西两面作战，首先在六周内使法国屈服，然后转向俄国。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4日破坏比利时中立开始进攻。英国与此对抗，对德宣战。这样，按时间表规定扩大了战争，这说明帝国主义列强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

开战伊始，列强为使国民支持战争，积极动员舆论，煽动国家主义。② 这时的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建立了第二国际组织。这些运动虽然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同时还依靠国家来推行社会政策。唯其如此，在民众的战争热高潮

中，他们虽然几乎都感到苦脑，但同时又都认为战争对本国是防御战争，转而采取了支持战争的态度。

但是，在大战爆发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成了继续四年半之久的长期战争，并且又是总力战，给国民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一般认为不久就会在陆上和海上进行决战，根据胜利者的要求实现媾和。谁知事与愿违，战争演成使用现代武器的长期战和总力战，并造成了重大牺牲，于是反战活动便在民众中扩展开来。

日本的参战和占领胶州湾

欧洲列强投入大战，这也影响了东亚。大战以前，列强乘中国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以铁道、矿山、各种税收为担保给予借款，扩张势力，而财力薄弱的日本竟落后了。当年山本内阁的牧野外相对加藤外相说，要想在将来瓜分中国时获得构成干涉容喙开端的各种利权，有必要讲求非常手段③。由于大战爆发，列强不得不从亚洲撤手，这是日本向中国扩张势力的绝好机会。正如元老井上馨在给大隈首相的意见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是“对于发展日本国运的大正新时代的天佑”。④

加藤外相具有任英国公使、大使的长期经历，大战一开始，立即寻找根据日英同盟参战的机会。8月7日，英国以只限于击毁德国武装商船为条件，要求日本参战。因为德国东洋舰队，正在以中国山东省胶州湾租借地的青岛为基地，到南洋德领各岛进行活动。一接到英国的要求，加藤外相立即经过内阁会议，上奏天皇、元老大臣会议，准备参战手续。并向英国提出反对限定参战的目的，为了彻底肃清德国在东亚的势力，日本希望根据日英同盟通过英国的要求参战。

英国对日本的回答感到踌躇，便撤消了参战的要求。英国害怕日本一旦全面参战，将向中国以及南洋群岛扩张势力，进而给予英

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以冲击，同时又将恶化美国的舆论。中国也害怕日本以占领胶州湾为起点，扩张其侵略势力。中国在宣布局外中立的同时，向美国进行工作，希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的战斗行动。德国也开始了暂时把胶州湾租借地交还给中国的谈判，想把东亚从欧洲大战的影响下隔离开来。但这是不可能的。

加藤外相要求英国重新考虑撤消要求日本参战的作法，英国方面则要求把日军作战区域限于北中国海。在这种交涉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8 月 15 日，日本便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艇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面撤出，并把胶州湾租界地无代价无条件地转交给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未予答复，8 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

这一参战的决定，完全是在加藤外相主导下进行的。加藤外相一向讨厌元老干涉外交，连重要外交文件转给元老传阅的惯例也取消了。山县、井上等元老对于把他们置于局外表示强烈不满，责难加藤的外交谈判拙劣。

法国和俄国在大战爆发之后，就提议和日本缔结同盟，继而又提议两国加入日英同盟，形成四国同盟。这是为了防止日本威胁两国背后。井上也在前引的意见书中谈到："日本必须和英法俄结成诚实的联合团结，以此为基础对统一中国者进行怀柔"，这是包括山县在内的元老的基本方针。但是加藤外相想以日英同盟为中心，对两国的提议表示冷淡，⑤ 于是加深了元老和加藤外相之间的鸿沟。

向德国宣战后，日本军队立即开始了作战行动。9 月 2 日，陆军在远离胶州湾租借地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在这以前，日本要求处在中立状态的中国，承认黄河以南为交战区域，这虽然未得到同意，但是，在 9 月 3 日，使中国承认了以山东半岛根上的潍县以东为交战区域。日本军内心是想控制山东省。登陆的日本军

不是指向青岛南下，而是首先沿着山东铁道西进。9月25日，占领了潍县火车站，到10月6日，将到济南的山东铁道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这是不顾日置益驻华公使的强烈反对，按照参谋本部主张进行的。⑥日本军占领青岛要塞是11月7日。

日本军这种高压态度，激起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山东铁道沿线不断发生日本军和中国人的冲突事件。

同时，海军除封锁胶州湾外，其南遣支队攻占赤道以北的德领各岛，10月中旬完成了占领。此外，还和英国海军合作，担任搜索攻击太平洋上的德国的巡洋舰队，护卫商船。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主要的报纸和杂志都热烈主张日本参战。从前站在反对增建师团和打倒阀族前列的《大阪朝日新闻》，也对政府的对德最后通牒要求交出胶州湾是为了“归还中国”，采取批判态度，暗示应将青岛归日本领有（1914年8月19日社论）。《东洋经济新报》反对参战和反对领有青岛，贯彻内政的民主改革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几乎是唯一的例外。⑦一年前中国二次革命时，攻击政府“软弱外交”的对外强硬派政治家和浪人们，以现在正是向中国扩张势力的绝好机会来督促政府。

1915（大正4）年初，中国声明废除交战区域，要求日本等各国军队撤出。日本对此加以拒绝，并于1月18日，将已经准备好的要求，由日置公使直接递交袁大总统。

日本政府从参战后，就着手草拟这个要求的草案。其中心人物是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他和陆军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在外务省的要求事项中，还加上陆海军、关东都督府等各方面的要求，共为五部分二十一条的庞大要求。⑧下面举出其主要要求，加以简要说明。

第一部分，关于山东德国权益的处理，中国承认日本和德国协定的一切事项。承认日本连结芝罘、龙口和胶济铁路的铁路敷设权。这是以向山东省进行经济扩张为目的的，但还意味着把战略要冲的山东省，作为日本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准备。

第二部分，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和满铁、安奉线的租借期限都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人在"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有土地租借权以及所有权、自由居住往来权、从事业务活动权，和另行协定的矿山采掘权。在上述地方需要政治经济军事顾问、教官时，首先和日本协商。将吉长铁路的经营管理委任给日本，为期九十九年。以旅顺、大连以及满铁、安奉线的延长为中心的这个第二号，是加藤外相等所最重视的。

第三部分，改汉冶萍煤铁矿厂公司为日中两国合办，由该公司保有邻近矿山的采掘权。这是想把中国最大的铁矿山和炼铁企业拉过来，为国营八幡制铁所供给原料。

第四部分，不得将中国沿岸的港湾、岛屿割让和租借给其他国家。如与其他国家签订这样协定时是侵犯主权，这就给了日本在一旦发生问题时，进行干涉的理由。

第五部分，中央政府聘用政治、财政、军事的日本人顾问。必要地方的警察或是日中合办，或是雇佣日本人警察。接受日本供给武器，或设立日中合办的兵工厂。承认日本人有传教权。承认从南昌到武昌、杭州、潮州各铁路的敷设权。福建省的铁路、矿山、港湾引进外资时首先和日本协商。第五号是对整个中国的要求，所以日本政府对此加以隐匿，但被中国方面揭露出来，引起了各国的不信任，加藤外相辩解说，这是一种希望条款。

交涉进行非常迟缓，3月，日本增强"满洲"、山东、天津、汉口的驻军和派遣部队进行威吓，但结果只是煽起了排日运动。还有，当美国得知日本仍坚持第五号要求时，态度就强硬起来了。5月

2日，中国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一到达，政府就决定发出最后通牒，但是，在第二天元老大臣会议上，山县、井上等元老反对包括第五号要求。英国也希望不要因为第五号要求而使谈判决裂。因此，政府也决定去掉第五号，发出最后通牒，在御前会议上正式决定下来。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9日，中国对此表示接受，25日，签订了关于山东省的条约、关于“南满洲”以及东部内蒙古条约及其换文。

日本诉诸最后通牒的非常手段，贯彻其要求，这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也明显地削弱了条约的威信。关于第二号的土地商租权，中国方面认为如承认享有治外法权的日本人拥有这种权利，就是侵犯了中国主权，因而强烈反对，结果东部内蒙古除外，只承认了在“南满洲”有此权利。但这后来由于中国人的抵抗，也没有行得通。⑨

一九一五年大选

第一次大战的爆发，对于大限内阁来说，是从扩充军备和废税减税两者夹击中被拯救出来的“天佑”。在上述的意见书中，井上馨主张：“内则终止几年以来甚嚣尘上的废税减税等的党论，巩固财政基础，排除一切党争，使国论跟上世界形势”，资产阶级也似乎对此予以响应，主动停止了废税运动。8月25日，六大城市商业会议所的代表，向大日本商工协会各支部发出呼吁，为“举国一致，断然贯彻军国之实……谋求帝国国运的进展”，停止废除营业税运动，各支部相继决定停止运动。⑩

在这种形势下，大限内阁在这年12月7日破例地召开了第三十五届议会，提出了防务会议上决定的增设两个师团方案和军舰建造案。这是想乘大限内阁的威信和攻占青岛的胜利气氛还没有消失之前，以增师问题来解散议会，击败政友会。

这时，政友会在西门子事件和废税减税问题造成的不得人心的气氛中，失去万年执政党的地位，陷入了显著的窘境。也正是西园寺总裁以所谓违敕问题引退，和原敬一直共同管理党务的松田正久也在3月逝世，原敬在6月就任第三代总裁不久的时期。

原敬着手进行延缓解散议会的活动，通过田中义一少将向山县进行工作，说明以增师问题为争论焦点而解散议会，对国家来说不太合适。但这个工作以失败而告终。增师案以政友、国民两党的反对而遭到否决，大限内阁立即解散众议院，第二年1915年3月举行了第十二次大选。

大限内阁单方面地动员了权力、财力以及舆论的力量。1月，不顾尾崎法相和大石正已的反对，任命了能够制服政界的大浦农商相为内相，负责取缔选举事宜。由于和三井结合的元老井上馨支援了同三菱有深切关系的大限首相和加藤外相，政府在财界有了威信，花了巨额的选举费。政府批给友党候选人竞选活动费的惯例也是从这次大选开始的。⑪

这次选举是护宪运动以来第一次大选。大限内阁巧妙地诉诸高涨中的国民政治热情，运用了受言论界支持的大限的威望。以在地方具有势力的早稻田大学校友为中心，各地组织了大限伯后援会。大限和除去陆海军和内务以外的所有阁僚们一起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宣传。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了大限首相的火车站演说、大限和尾崎法相的录音演说、阁僚联名的候选者推荐书，最后在投票前一天，向有选举权人拍发推荐电报等种种新花样的选举战术。

政友会从西门子事件以来，处在非常不得人心的状态。不仅如此，正如上次大选，政友会在大城市失败所显出的那样，对于政友会的横暴正在民众中间散发着不满情绪，大限内阁对此巧妙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城市执政党取得了压倒的优势。⑫

大选的结果，使原来阵容为之一变，执政党获得大胜。同志会增加了五十八名，以一百五十三席成为第一大党，中正会减少三名，共占有三十三席，加上大限伯后援会等支持政府的无党派团体，执政党超过了二百四十席。政友会减少了七十二名，剩下一百零八席，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国民党也减少了五名，占有二十七席。在护宪运动二年后的大选中，当时曾是攻击目标的同志会，成了第一大党，站在护宪运动前列的国民党和加入此运动的政友会遭到了惨败。

大选后的第三十六届议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增师案和军舰建造案。但同时政府干涉选举也成了问题。特别是在石川县，知事因此辞职，选举无效而进行重选。6月，发现大浦内相在前一年为通过增师案而收买政友会议员的事件，大浦被迫辞退公职。大限内阁也在7月30日总辞职，但是，元老会议劝其留任，结果只有主张共同责任论的加藤外相、若槻藏相、八代海相等退出内阁，大限内阁经改组后维持下来。改组后的大限内阁，声誉一直不佳，但是，这时正好处于大战景气之中，所以政权一直维持到第二年的1916年10月。⑬

① 由于帝国主义把后进地区也纳入自己统治之下，所以在那里的矛盾也包括在帝国主义矛盾之中了。三国协约也好，三国同盟也好，都包括俄国和奥地利这样旧体制的帝国，面对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高涨的两国的迫切危机、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的纠纷，成了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关于这一点，江口朴郎的《帝国主义时代》(第104—106页)提出了问题。

② 关于这一点，参阅冈义武《国际政治史》第195—201页。

③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第41—42页。

④ 井上馨侯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第5卷，1934年，第367页。

⑤ 田村幸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参战》，载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1963年，第11—13页。

⑥ 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上，第609页。

⑦ 井上清《帝国主义批判论》载井上、渡部编《大正时期急进的自由主义》第116—123页。

⑧ 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参阅蝇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序说》1958年，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

⑨ 关于日本的“满洲”、内蒙古权益及其有关问题，在信夫淳平《满蒙特殊权益论》1933年中，有详细叙述。

⑩ 江口圭一《一九一四年的废税运动》，载《大正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第114—115页。

⑪ 前田莲山《原敬传》下卷，1943年，第264页。

⑫ 关于从政友会看的政府干涉选举，见《原敬日记》大正4年3月28日。但是，原敬也承认大败的原因是，政友会的“几年的兴盛，招致反感，报纸多数站在政府立场上，对我党进行诽谤中伤”，加之“由于数年间我党在朝执政，而现政府成员当时在野，他们得以采取攻势，我党处于无论如何只能陷于辩解说明，而难以转为攻势的境地”。

⑬ 关于大隈内阁的性质，尤其大隈首相的行动方式，参阅冈义武《转换期的大正》1969年，第5—10、53—54页。

第三章　第一次大战中的日本

第一节　从大隈内阁到寺内内阁

大战景气和工业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乎当初的预料而长期化了。1915（大正4）年过去了，但还看不到结束的征候，交战各国在战争重压下挣扎着。这对于占领了胶州湾和德属南洋各岛而结束了战斗的日本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扩张势力的好机会。

在开战之初，日本经济由于卷入世界经济危机之中，一时陷于萧条状态。但从1915年中期起，出口急剧增加，大战景气开始了。“大正4年以来，以协约国俄、英、法等国开始向日本定购武器、军需品、食品等为开端，日本货还大量涌进中国、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欧洲货。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生丝以及各种商品的销路旺盛起来，以至出口贸易取得迅速发展。”① 日俄战争后一直是入超的贸易收支，从这年起开创了大幅度的出超记录。日本的出口额，1915年为七亿余日元，1916年为十一亿余日元，1917年为十六亿余日元，1918年为十九亿余日元，呈现直线上升的增长。这四年间的出超额，分别为一点七亿日元，三点七亿日元，五点六亿日元，二点九亿日元，总计竟达十四亿日元。

贸易外的收支也从1915年起转为收入超过支出。资本收支除外，直到1918年的四年间，收入超出支出额达十三亿五千万日元，大体相当于出超额。贸易外的收入中，运费、租船费的收入占

首位，其次就是以出售军火为主的政府海外收入和国民海外事业利益。虽说是海外事业收益，而海外劳工的汇款却占相当比重，纯事业收益仅稍多于此，这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进性。大战一结束，贸易收支立即从1919年又开始转为入超。而贸易外的收支，以海运收入为主，仍继续保持着收入超出支出的状况。

随着大战景气的发展，企业的扩建、新建也兴旺起来。由于开战，从德国进口的染料、药品停止了，于是政府于1915年制定了染料医药品制造奖励法，保证年利八厘的红利，大力扶植化学工业。1916年2月，建立日本染料股份公司时，认购股票竟达公开招股的八百倍，掀起了大办企业的热潮。从大战前就以大企业面目出现的过磷酸工业、氰氨化钙工业，这时由于进口的中断，获得了巨大利益。

大战前，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工业，是以国营炼铁厂和兵工厂为中心，民间重工业也主要是依仗陆海军、铁道院、递信省的订货来维持。由于这种关系，各种重工业部门，都处于财阀企业垄断之下。可是，由于大战期间工业的发展，民办重工业的这些部门也迅速发展，产品也流向民需方面。与此同时，各财阀也争先恐后地创办新企业打入主要部门，加剧了竞争。② 尤其是造船业取得惊人的发展，轮船的出口急剧增加。不过，由于交战各国禁止出口，我国深感钢铁不足，1918年，和美国缔结了船舶钢铁换货协定，美国供应日本钢铁，而日本把制造的船舶交给美国。

为了解决对钢铁急剧增长的需求，国营八幡制铁所从1916年度开始的第三期的六年扩建计划，缩短到1920年完成。1917年公布了钢铁业奖励法，对于民办炼铁厂的新建、扩建，给予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和适用土地征用法等特权。日本资本强行开发中国矿山，以汉冶萍为首，这时期开采的新铁矿砂，都被日本廉价买去用作炼铁业的原料，而对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没起任何作用。③

以铜、煤为中心的矿业也因大战景气而繁荣起来，并且从出口产业向内销产业转变。以铜矿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财阀，在大战期间，开辟了以生产电线为主的铜加工业。由于这种发展，日本在大战后变成了一个铜的输入国。煤炭业在大战期间也繁荣起来，但由于工资的提高和滥肆采掘造成产量下降，价格上涨，出口量锐减。然而，财阀系统的煤炭企业，却趁化学制品进口中断的时机，向煤炭化学工业方面发展起来。

煤炭价格的上涨，促使增加利用电力。正象在大战前夕建设猪苗代湖水力发电所看到的那样，大规模的水利发电和高压长距离送电有了可能，便加剧了电力业的竞争。在大战景气中，电力业急剧发展起来。从 1913 年到 1919 年间，电灯用电量增到二点二倍，全国普及率达百分之五十三。动力用电增到四点三倍，促进了小工厂的电力化。1917年电动机的马力数超过了蒸气机的马力数。

大战前，已经实现了集中生产的纺织业，在大战期间产量猛增，棉纱增长到四倍，棉织品增长到七倍。因为一向依靠英国进口的纺织机械不进口了，原有的大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鉴于日俄战争的经验，为防备战后经济危机，充实了企业内部的保留和帐外资产。缫丝业也由于向美国出口生丝的激增而繁荣起来，生丝产量增至一点七倍，金额增到五点二倍。茧价的上涨也给农村的养蚕业带来了繁荣。

工业如此迅猛的发展，致使农业和工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1914 年农业总产值为十四亿日元，工业总产值为十三点七亿日元，到了 1919 年时，农业为四十一点六亿日元，工业为六十七点三亿日元，工业超过了农业。不过，在工业中，重、化学工业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纺织业的比重仍占压倒优势。从 1914 年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六，增长到 1919 年的百分之四十九点四。④

随着大战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利润急剧增加。在各个

部门中不断地出现了靠投机博得巨富的暴发户。与此同时，在主要产业部门中，一向靠国家保护来维持的幼小的垄断资本已经向生产力得到提高和对外具有竞争能力的正式垄断资本发展转化。“在主要产业部门中，到大战后期，在海运、造船、棉纺、铜、煤、电力、银行七个部门确立了垄断资本。”“除棉纺、电力外，其余五个部门的中心企业都处于财阀控制之下。”⑤

1916年4月，大隈内阁设立了经济调查会。在此前后，日本工业俱乐部已经筹备就绪，并于1917年3月成立。这与缴纳营业税者推选代表组成的商业会议所不同，而是由三井、三菱、涩泽、大仓、安田等大资本系统的代表人物组织的，三井的团琢磨担任理事长。工业俱乐部创立之后，立即提议对钢铁业实行保护奖励，积极对政府施加影响。战争时期，对保护重、化学工业、关税政策提出要求，当媾和时则反对劳动条件法制化，力求维持低工资。⑥

大战中的繁荣，特别是出口的激增和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容后再述。

日俄同盟和排斥袁世凯运动

当开战之初的速战速决方针破产，欧洲战线陷入胶着状态时，交战各国为了增加伙伴展开了秘密外交。1914年10月，受英国和俄国压迫的土耳其参加德国方面，1915年5月，意大利背弃三国同盟参加到协约国方面。德国在1915年初对日本进行单独媾和的活动，同年夏天又开始对俄国进行试探。⑦通往英法的主要联络路线被切断的俄国，这时战局显著恶化，国内不稳也日益严重。俄国、法国自不必说，就是一向消极的英国也要求日本加入不单独媾和和互相商定媾和条件的伦敦宣言。由于大隈内阁改组，石井菊次郎代替加藤高明就任外相，日本便于10月加入了伦敦宣言。

1916年1月，俄国派遣以格奥尔吉大公为皇帝特使前往日

本，提出缔结日俄同盟和增加武器供应，交换条件是将中东铁路支线（哈尔滨—长春）的大约一半即松花江铁桥以南部分卖给日本的建议。社会舆论反对与不断战败的俄国结盟，石井外相也不积极，但是，山县有朋和朝鲜总督寺内、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等却极力推动，并对大限内阁施加压力。于是大限内阁于2月召开阁议决定，以让与中东铁路支线全线为条件，与俄国进行提供大量军需品和建立同盟关系的谈判。

然而，日俄谈判由于让与区间问题而拖延下来，到了7月3日，好不容易才签订了第四次日俄协约（日俄大正五年协约）。协约规定，日俄两国互不参加敌视另一方的协定或政治联合，双方为保护在远东的各自的领土权或特殊利益而互相合作。并且还在附件的秘密条约中规定，为防止中国落入怀有敌意的第三国的政策控制而互相合作，在发生战争时，互相进行军事援助。这实际是军事同盟。两国一向把“满洲”、蒙古分成两部分，看作是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在政治上则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全中国。条约中所指的第三国，表面上似乎是指的德国，其实，站在日本的立场来看，主要是指美国。

由于日俄协约，保证了俄国背后的安全，日本向俄国提供大量军火，并认购了三亿多日元的俄国财政部债券，然而中东铁路支线的转让没能实现。日本为将北满的大豆吸引到满铁方面来，强烈要求最低限度要伸展到松花江北岸。自1908年三井物产公司将“满洲”大豆介绍到欧洲以来，其出口量急剧增加。但俄国坚持日本只能伸展到两国势力范围境界的松花江南岸，毫不退让，结果决定到南岸。⑧ 但因俄国索价太高，谈判拖延，当达成协议时，发生了十月革命，谈判以流产告终。

对中国，自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大限内阁还同军部、浪人勾结积极地继续进行干涉。中国袁世凯总统于1915年夏企图废

除共和重建帝制，掀起复辟运动。10月，日本以重建帝制将招致中国国内动荡为理由，强拉英、法、俄三国共同劝告袁世凯延缓实行帝制。中国政府被迫让步，答应年内不实行帝制。接着，英、法、俄三国立即向日本提议让中国参战，中国政府也认为参战是复辟帝制的好机会。但是，日本政府不愿意中国在媾和会议上有发言权，就以对远东和平不利为理由，加以拒绝。可是，12月，从云南省开始，在中国各地发生了反对帝制的第三次革命，中国政府也就在1916年2月停止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大隈内阁乘着中国由于第三次革命而陷于混乱之际，更加露骨地推进干涉中国的政策。3月，内阁正式决定：袁世凯政权成了日本扩张势力的障碍，想把袁搞下台，默许民间有志之士的排袁运动。实际是，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串通陆军参谋次长田中、海军军务局长秋山真之，由政府和军部当后台加以操纵搞起来的。他们策划在"满洲"利用以复辟清朝为目标的宗社党和巴布扎布蒙古军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在山东省煽动"革命军"蜂起制造动乱。在上海策划夺取军舰来支援革命军。⑨这比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所标榜的树立地方傀儡政权更前进了一步，是想使中国的中央政权屈从于日本。⑩

但是，这个计划很不周密，接连不断地出现混乱。在"满洲"与其搞没有成功把握的兵变，不如让奉天的实力派张作霖发表反袁独立宣言的主张，占了优势。因此，策划宗社党兵变的川岛浪速一派表示反对，5月发生了他们同伙的预备军人企图舍身炸死张作霖的（未遂）事件。

当日本的工作正陷于混乱之际，6月6日袁世凯突然死去。副总统黎元洪升任总统。北洋军阀段琪瑞留任国务总理，段让亲日派曹汝霖代理外交总长，表现出接近日本的姿态。大隈内阁也改变政策，采取利用的方针，命令停止排袁工作。然而，一直被利

用的那些浪人却不肯罢休，在各地制造混乱。巴布扎布得到武器后，在日军监视下向蒙古撤退，但在途中与张作霖军队冲突时战死。排袁工作就这样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

寺内内阁和外交调查会

改组后的大隈内阁失掉了生机。政友会的制服和增师的实现，对于长州阀元老来说，大隈的任务已经完了。大隈首相的威望也在下降。但是，从这年的下半年起，空前的大战景气却来到了日本。11月，大正天皇在京都举行登基大典，日本国中充满着庆祝的气氛。第二年夏天，虽然还处在大战之中，从授予大隈首相侯爵起到大臣、军人、官吏、议员及宫中女官，都得到论功行赏的大肆犒劳。

在1915年末召开的第三十七届议会上，贵族院的官僚派议员就出售武器和"减债基金"的还本问题，大肆攻击大隈内阁。山县担心因此预算不能通过而导致政变，再次激发起群众运动，便亲自出马进行调停。他让贵族院退让，交换条件是大隈内阁在议会结束后总辞职。但是，大隈首相在议会结束后还想把政权让给同志会总裁加藤高明，而山县却以处在战时应该"举国一致"为理由表示反对之后，大隈内阁仍然继续不动。

到了6月，在枢密顾问官三浦梧楼的斡旋下，加藤、原、犬养三党首脑举行会谈，并发表了外交、国防协同一致，不容外界插嘴，对华外交力求增进彼此利益，国防费用定出适当限度的备忘录。这意味着要以政党为主导建立战时"举国一致"的体制。然而，在这个时期，政党的动向不是互相合作来排除元老、军阀对政治的干预，而是想接近他们并利用他们来发展本党的势力。

10月4日，大隈首相向天皇提出辞呈，并推荐加藤高明为后继首相。可是，早就对大隈动向心怀警惕的元老，向天皇推举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元帅，当天，寺内受命组阁。这样一来，陆军从大正

政变当时就策划的军阀内阁，终于乘大战的压力和大限内阁失政之机，得以实现。这一天，侍从长向宪兵司令官传达了天皇的指示："市内难免发生骚乱，要充分警戒！"⑪这段插曲恰好说明了寺内内阁的本质。《大阪朝日新闻》(大正5年10月6日)抨击寺内内阁为"妖怪的出现"，《东洋经济新报》(大正 5 年 10 月 5 日)称之为无视国民意志的"不良内阁"。"非立宪内阁"的绰号，不久传遍全国。由首当其冲吞并朝鲜的寺内组阁，也给中国很大冲击。广大的中国人"早就疑惧可能发生吞并"满洲"的事件，对阁下的对华政策异常不安，正象您早已知道的那样"。这是本野一郎外相给首相意见书中的一句话。⑫但是，政党早已不想再号召民众开展护宪运动了。

寺内内阁不仅是由军人、官僚霸占的超然内阁，而且首相本人就是朝鲜总督，内相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和满铁总裁，稍后继任藏相的胜田主计是朝鲜银行总裁，外相本野是驻俄大使、日俄同盟的主要鼓吹者，内阁的主要职位都被露骨的殖民主义者占据了。在同政党的关系方面，寺内的态度是不同山县推荐的同志会合作，而是利用上届内阁的反对党政友会来牵制同志会。同志会总裁加藤反对曾脱离同志会的后藤入阁，并宣言同新内阁断绝关系，政友会总裁原标榜"是是非非"，采取善意中立态度。大隈内阁的友党同志会、中正会、公正俱乐部合并，组成宪政会，加藤任总裁，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

为了击溃宪政会的多数党的地位，寺内内阁策划尽早解散议会，并且不让组成打倒藩阀的统一战线，孤立宪政会。在 1917 年初的第三十八届议会上，国民党决定提出对寺内内阁的不信任案，并为此向各党进行工作。对此，政友会表示拒绝，但宪政会响应。可是，国民党犬养毅在提出内阁不信任案的演说中，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大隈前内阁而不是对准寺内内阁。众议院一解散，国民党就声明与宪政会断绝关系，把它孤立起来。犬养对于曾经使国民党

分裂的同志会的后身宪政会是怀恨在心的。

没有友党的寺内内阁，试图一方面攻击宪政会是“不自然的多数党”，⑬另方面同政友会合作，并暗中援助国民党，设法打垮宪政会，进而使政府系的中立议员大量当选，用来牵制政党。原一面利用寺内内阁，一面对其组织政府党的活动，严加监视和警告。4月20日大选结果，宪政会减少了七十六名，降为只有一百二十一名议员的第二党，政友会增加五十四名，上升为拥有一百六十五名议员的第一党。国民党略有增加，为三十五名，在无党派六十名中，四十三人组成政府党——维新会。政友会虽然没有达到绝对多数，但还远远超过寺内内阁的预料，成为牵制寺内内阁的力量。

当时大阪府立茨木中学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大宅壮一在日记中写道：“大阪的重要报纸集中力量抨击政府，所以民党在关西大胜。”⑭这次选举，象大阪市的今井嘉幸、长野县的植原悦二郎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选，也引起人们注目。

在6月的特别议会召开之前，寺内内阁为了“将外交、国防置于政争之外，谋求统一国论”⑮，设置了直属天皇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寺内首相任总裁，本野外相、后藤内相、加藤友三郎海相、大岛健一陆相和枢密院的牧野伸显、平田东助、伊东巳代治，以及政党方面的政友会总裁原、国民党总裁犬养任委员。政府要求三党首脑参加，但宪政会总裁加藤认为违反责任内阁的原则，加以拒绝。犬养则被认为丧失气节，遭到非难。这个外交调查会，是以长州派势力为中心吸收萨摩派、政党参加组成的，拉拢后二者特别是政友会参加，以便于在极端秘密中决定政策。这样，寺内内阁就取得政友会和国民党的支持，在大战景气中推行了军国主义政策。

① 日本银行调查局《世界战争结束后本国财界动摇史》，见该局编《日本金融史资料明治大正编第二二卷》，1958年，404页。

② 宇野弘藏主编《讲座帝国主义研究6日本资本主义》，1973年，53—59页

（山崎广明执笔）。

③ 日本派遣的“汉冶萍最高顾问，总会计师，以廉价买进该公司采掘生产的大部分优质矿石、生铁，大有批发商从农民那里收买青苗之嫌”，根岸佶《买办制度研究》1948年，348—349页。“白仁制铁所长官来访，谈及以前按中国方面要求生铁价格每吨竟值五百日元，却说是合同定好，竟以四十五日元（还是提了价）买进。而这次接受中国方面的要求，提高到一百二十日元。这样的事例以前就有过，如此蛮横，受各国的攻击，乃理所当然。”见《原敬日记》（大正7年10月21日）。

④ 守屋典郎《经济史（日本现代史大系）》1961年，194—195页。

⑤ 高村直助《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和中小企业》，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8近代5》，58页。

⑥ 《日本工业俱乐部二十五年史》上卷，1943年，103页。

⑦ 义井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发展》，见《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4现代1》，1970年，40—41页。三宅正树《世界史中的德国和日本》，增订版1971年，122页。

⑧ 吉村道男《日本和俄国》，1968年，292—294、319页。

⑨ 军事资金由与中国有关的政商承担，大仓喜八郎给宗社党肃亲王一百万日元，久原房之助给革命派一百八十万日元。栗原健《第一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和小池外务省政务局长的辞职》，见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145—161页。又据《原敬日记》（大正7年4月18日）载，大仓与大限内阁约定，将鸭绿江木材公司卖给大仓，先交出一百万日元，接着又出资五十万日元，作为浪人善后费用，由于一直没有履行，乃请原帮忙，原谢绝了。后来，大仓还一再请求。

⑩ 由井正臣《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米骚动》，见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讲座日本史7》1971年29页。

⑪ 田崎治久编著《续日本之宪兵》，1929年（三一书房版《日本的宪兵（正、续）》，1971年，516页）。

⑫ 1917年5月25日的本野外相书信，见栗原编《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所附资料）267页。

⑬ 后藤内相在地方长官会议上的训示，见鹤见祐辅编《后藤新平》第3卷，1937年，733页。

⑭ 青地晨编《大宅壮一日记》，1971年，294页。国民党被列为政府反对派。

⑮ 伊东巳代治《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要义》，见小林龙夫编《翠雨庄日记》，1966年，256页。

第二节　西原借款和出兵西伯利亚

大战的扩大

1916年，在欧洲的西部战线，双方集结大量军队展开了激烈

的战斗。德军从2月开始对凡尔登要塞发动总攻击，接着是7月英法军队于索姆河畔展开大反攻，一直持续到11月。双方共消耗了几千万发炮弹，死伤各达百万人左右，但谁也没能突破对方阵地。交战各国都因通货膨胀和物资不足而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统制。由于战争的牺牲急剧增加，负担日益加重，为了加紧对国民的战争动员，需要强有力的战争指导。德国在这年的8月，组成了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为领导的统帅部，掌握全权，强行扩大军需生产。英国于1、2月，由自由党急进派劳合·乔治组成了有工党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加强了对战争的领导。空前未有的消耗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这个时期，明显地表现出了总力战的特点。

到了1917年，俄国因战败和粮食不足而陷入非常深刻的危机。3月8日(俄历2月23日)发生了女工罢工和要面包的示威游行，士兵也掀起叛乱，与之合流，演成二月革命。以国会为据点的资产阶级势力，在得到了由工人、士兵组成的苏维埃有条件的支持下，建立临时政府，皇帝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灭亡了。临时政府得到协约国的援助，决定继续战争。

就在即将发生革命的2月，苦于英国海军封锁的德国，声明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想对英国进行反封锁，扭转战局。同英法有很深经济关系的美国，立即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劝告其他中立国家也这样做。恰在此时，俄国帝制垮台，使美国便于参战了。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标榜“为民主主义而战”，宣布参战。同时，美国为了尽力避免与协约国的瓜分领土的秘密条约发生牵连，强调虽然同英法合作，却不结盟。①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反映了以优越的经济力量为背景，以专心致力于扩大海外市场为目的的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同样在2月，日本答应英国的要求，为护航运输船，派遣舰队前往地中海。日本乘此机会同英国秘密约定：在媾和会议上，日本

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的德领各岛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支持日本对山东省的德国权益和赤道以北的德领各岛的要求。3 月，法国、俄国、意大利也以日本同意中国参战为条件，和它取得了同样的约定。

协约国早就希望中国参战，支援战争。当时，已有十几万的中国劳工运到英国、法国，从事兵站运输等工作。中国政府也早就打算通过参战确保在媾和会议上的发言权，并希望延期支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获得借款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于 1916 年 6 月升任总统，于是南北达成妥协，也重新召开了国会。但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各省督军的武力为后盾，与黎总统、国会对立。中国于1917年 3 月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但黎总统、国会都反对参战。因为对中国来说，大战为发展民族工业提供了良好机会，保持中立比较有利，另外，还担心参战将增强军阀的地位。

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中国参战将导致美国影响力的加强，表示支持，但国务卿蓝辛则认为中国一旦参战就将置于日本的军事指挥之下，因而采取反对态度，压制芮恩施。这是考虑到，自从大战开始以来，美国是唯一具有抑制日本膨胀力量的国家，但因为参战，倾注全力于欧洲战争，给中国的援助将是有限的。②

援段政策

日本已经加强了对段总理的支持，转为赞成中国参战。先前担心的媾和会议问题，由于同各协约国的秘密协定，有了实现要求的把握。便认为现在支持段政权参战的愿望，加强对它的控制，对日本有利。

在寺内内阁组成之前，寺内的心腹西原龟三就前往中国，同总理段祺瑞、代理外交总长曹汝霖举行了会谈。并向朝鲜总督寺内

献策：日本借款给中国，从而靠日本人顾问来改革中国财政，进而推行日中货币混用，发展日本的经济势力。③ 内相后藤也早就设想过东亚经济同盟。

寺内内阁组成后，就密令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承办不同于以前横滨正金银行承办的对华政治借款的经济借款。西原秉承胜田藏相的意旨，会同驻北京武官坂西利八郎大校，与曹汝霖谈判，1917年 1 月，签订了为整顿濒于破产的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的合同。这是一笔无折扣、无手续费的破例贷款。中国参战问题一发生，西原就承认提高关税等参战条件，并约定再给交通银行二千万日元的借款。但日本棉纺资本家发动了反对中国提高关税的运动。

中国于 5 月将参战案提交给国会，这时段总理指使御用团体包围国会，施加压力，但却遭到反击。黎总统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于是各省督军联合起来，纷纷宣布独立，反对黎元洪。 6 月，受黎元洪委托进行调停的安徽督军张勋发动政变，占领北京，复辟了清朝。段祺瑞则依靠其他督军的支持予以镇压，7 月再任总理，副总统冯国璋代替黎元洪为代理总统。 8 月，中国宣布参战。反对参战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总统，开始了南北对立的时代。这期间，参谋次长田中，从 5 月 1 日到 6 月末，到中国作视察旅行，与张勋、冯国璋、孙文等人举行了会谈。

中国南北对立形势一成定局，寺内内阁对段政权的援助便积极起来。7 月 20 日的内阁会议决定，给段政权以财政援助，以友好的态度考虑供应武器军需品，设法解决日中之间的悬案。9 月末，决定给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二千万日元，还决定开设承办日中借款业务的中华汇业银行。在 10 月 3 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以段政权保证不在讨伐南方作战中使用为条件，原也表示赞成，于是

供给武器得到承认。④

但是，日本的武器援助，在中国认为这是复活以前二十一条第五部分中规定的日中武器同盟。在中国，反对段祺瑞讨伐南方的活动扩大了，代理总统冯国璋也参加了反段一方。他们虽都是北洋军阀出身，但段属于安徽派，冯属于直隶派，彼此对立。11 月，段内阁垮台，组成了以直隶派王士珍为总理的两派合作内阁。

寺内内阁露骨的军事外交政策，还表现在加强关东都督府问题上。寺内内阁组成之初，关东都督中村觉就仿效有铁路附属地的"南满洲"的例子，也要使驻"北满洲"、"东蒙古"的领事兼任都督府的事务官，以便把他们置于都督指挥之下。这是都督想要抓住外交权，推行武断外交。但以币原喜重郎次官为首的外务省当局认为，一名地方官吏的都督指挥外国领土"满洲"所有的领事，严重违背国际惯例，将引起中国的不安和各国的疑虑，表示强烈反对。

但是，1917 年 7 月决定，从前在外相监督下的关东都督，除有关外交事项外置于首相监督之下，并兼任满铁总裁。内阁恢复拓殖局，掌管包括关东洲、满铁在内的有关殖民地的事务。还决定宪兵司令官兼任都督府的警务总长，指挥领事馆的警察，⑤ 并任命深得山县信任的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陆军中将为关东都督，兼任满铁总裁。

寺内内阁还提出了朝鲜、"满洲"经营一体化的方针。它体现了重视军事的思想。决定朝鲜铁路委托满铁经营，而以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交给朝鲜总督府。横滨正金银行把在"满洲"发行金券权等业务移交给朝鲜银行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管理。这是想让朝鲜银行券渗入"满蒙"，使之成为西原设想的改革中国币制的一环。

对抗日本扩大独占中国势力的力量是美国。美国为创建太平洋舰队而设想大规模的造舰计划，日本也象后面所讲的那样推行大规模造舰计划。但是两国也都希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调整国

交。日本打算让美国承认大战期间在中国确立的优越地位，而美国在倾注全力于欧洲战争之前，想使日本再次确认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原则。

这年夏天，前外相石井以特使身分派往美国，同国务卿蓝辛举行会谈，11月，发表了通称为石井·蓝辛协定的换文。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特别在与日本领土接壤的地方尤其如此，其交换条件是日本承认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支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⑥这个协定是两国妥协的产物。日美两国尤其是美国，根据这个协定，暂时冻结了围绕中国问题的两国关系，集中精力于欧洲大战。

俄国革命和日中军事协定

与石井·蓝辛协定发表的同时，俄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仍积极地继续进行战争，这反而加深了危机。11月7日（俄历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农兵苏维埃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第二天8日，全俄苏维埃大会宣布接管政权。这次大会还向所有交战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呼吁，立即开始为公正的民主主义的媾和进行外交谈判。还宣布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完全民主化，确立士兵权利，工人管理工厂，保证民族自决权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虽然有不少困难，但却给交战各国的反战革命运动，进而对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影响，具有从根本上摇撼世界帝国主义体制的意义。苏维埃政府于11月21日，向交战国政府提议媾和，第二天宣布废除秘密外交，开始公布秘密条约，日俄协约的秘密条款也公布出来了。12月，和德国缔结停战条约，开始了和平谈判。由于德国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媾和条件，苏维埃代表团不得不暂时撤回。但是，终于在

1918（大正7）年3月接受了这种条件，签订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

协约国面对苏维埃政府的媾和条件，深感有立即明确战争目的、重振国民斗志的必要。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向议会提出咨文形式，宣布了和谈条件十四条。宣布排除秘密外交；海洋通商自由；裁减军备；尊重殖民地居民利益；调整殖民地要求；建立保证各国独立、安全的国际机构，还提出了以民族自决为原则的关于欧洲国际秩序的具体建议。

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时，日本表示欢迎临时政府继续战争。当时社会舆论的主要倾向是，说帝制崩溃是沙皇的专制造成的，日本的皇室和沙皇不一样。⑦但是，十月革命一发生，论调突然大变。当苏维埃政权呼吁立即媾和，进而公布秘密条约时，日本就叫嚷说布尔什维克是过激派，是反国家的，破坏性的，加以激烈攻击。

俄国革命发生后，法国首先策划进行军事干涉。英国因为受到苏维埃政府号召亚洲人民从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冲击，也加入了这个策划，1918年1月，向日本提议联合出兵西伯利亚。日本参谋本部也在俄国革命之后立即制定了以保护侨民为理由的出兵计划，随后又扩大成为武装干涉贝加尔湖以东的计划。但在这里有微妙的矛盾。法国、英国最希望的是重建东部战线，而日本却计划侵占沿海省、西伯利亚。美国早就积极援助俄国临时政府，企图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管理权，所以担心日本的军事控制。

俄国革命在1917年就波及到哈尔滨。哈尔滨于二月革命后成立了工兵苏维埃。苏维埃政府于12月发表通告，承认哈尔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区代表俄国行使权力。哈尔滨苏维埃声明不承认中东铁路局长霍儿瓦特的权力。哈尔滨发生革命时，段祺瑞内阁刚垮台不久。在北京各国公使团之间以及哈尔滨领事团之间，究竟是用国际警察部队，还是用日军、或是用中国军队进行镇压，

争持不下，最后还是请求中国政府出兵，而出动的却不是与日本勾结的张作霖的奉天军队，而是接近直隶派的吉林军。从这里可以看出各种势力的复杂关系。⑧

在日本国内，本野外相、田中参谋次长是积极出兵论者，但在外交调查会中具有强大发言权的原敬，则认为出兵必须有充分的决心和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而一直在反对。田中参谋次长计划，首先与中国缔结军事协定，供给中国军火、军需品，由中国要求出兵北满。为此，既要对张作霖作工作，也要对段祺瑞给以支持。1918年2月，中国陆军部从日本购买一千七百余万日元的武器，在山海关附近的秦皇岛刚一卸货，张作霖就派兵夺取了这批军火，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3月段祺瑞又重新组阁，⑨曹汝霖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接着本野外相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之间交换日中协同防敌公文。随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宇垣一成前往北京负责军事协定的谈判。使寺内首相叹息的是，中国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拖延谈判而感到为难"。(《原敬日记》，大正7年5月2日)。但5月中旬，日中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秘密签字，7月末，缔结了价值二千二百四十二万日元的第二次武器供给合同。日方的当事者是三井物产、大仓组、高田商会组成的泰平公会，价款用北京政府发行的国库券支付，然后由日本大藏省买进这些证券。

这个协定指出，敌国势力在俄国领土内扩张，致使"整个远东的和平和安宁"有遭到侵犯的危险，因此有必要采取共同防范敌人的行动。但是，据外务省记录载，其真正目的是："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有自由向中国领土内必要方面出动帝国军队的方便，并以军事协助之名，我国有切实控制中国军队的组织、训练以及重要武器制造材料的方便条件；在政治上也得以同盟关系为基础，积极干与内政，在各个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⑩在中国很

快地就出现了把中日军事协定看成是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特别是武器同盟的实现而加以反对的呼声。5月初，中国留学生召开反对这个协定的集会，并纷纷回国，以示抗议。⑪

缔结日中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前后，连续向段祺瑞政权提供西原借款。这时前后缔结、提供的借款有：4月的有线电信借款二千万日元，6月的吉会铁路准备借款预付一千万日元，8月的黑龙江吉林两省森林金矿借款三千万日元，寺内内阁倒台的那一天，即9月28日又分别签订了维持参战军费的参战借款二千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准备借款预付二千万日元，山东二铁路准备借款预付二千万日元的协定。⑫这些借款帮助了苦于财政困难的段祺瑞政权解决行政费、军事费问题，使他编练了受日本颐使的军队，和日本取得铁路及其他各种利权。此外，还计划了炼铁厂借款，但由第二天即29日组成的原内阁给停止了。在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西原借款中，得到如数偿还的只有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的五百万日元。此外还秘密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公文，即日军集中到青岛，并撤除由日本设置的民政机构，其交换条件是承认山东铁路中日合办，警察队聘用日本人。对此，段祺瑞政权表示"欣然同意"。

段祺瑞政权接受日本援助，推进了对南方的讨伐。但是如上所述，在北洋军阀内部也遭到了直隶派的批评，吴佩孚就激烈地指责段祺瑞总理用日本的借款，继续内战，屠杀同胞，在前线的直隶军同广东政府军实现了局部停战。段祺瑞内阁也在寺内内阁辞职半个月后的十月十日被迫辞职了。

西伯利亚武装干涉

这期间，想要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活动也在进行。在3月的布列斯特和谈前后，英法两国强烈要求日本出兵。但是美国以出兵将会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将使同革命

俄国的关系恶化而采取反对的态度。日本在西伯利亚进行战争需要美国的援助。外交调查会的原敬、牧野伸显反对在没有取得美国同意下就出兵，山县、寺内首相也犹豫不决。高唱自主出兵的田中参谋次长、本野外相陷于孤立，四月后藤内相转任外相。《大阪朝日》、《东京日日》等开展了反对出兵的论战。批判帝国主义最彻底的《东洋经济新报》(大正7年3月25日)发表了《援助过激派!》的社论。

但是，军部、外务省等待着出兵西伯利亚的机会，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理由，1月将军舰开到海参崴，4月陆战队登陆；陆军则在北满向建立反对布尔什维克军的谢苗诺夫大尉提供武器，4月使其越过国境，向外贝加尔方面进攻。但是，谢苗诺夫军队的残暴招到民众的反抗，不久被迫后撤。恰在此时，即5月，经西伯利亚向西部战线转移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这就为武装干涉提供了绝好的借口。

到了7月，美国根据英法两国的要求，向日本提出了以援助捷克军为目的的限定出兵建议。寺内内阁表面上同意美国提案，实际上则计划全面出兵。但在外交调查会里，原、牧野从对美协调观点出发加以反对。于是，伊东巳代治提出日本出兵一万二千，美国出兵七千的限定出兵议案，但附带条件是："为援助捷克军，可向海参崴以外地方出动，并随形势的发展，预料有增派的必要"，取得外交调查会的同意，并得到了美国的谅解。⑬

8月2、3日，日本、美国分别发表出兵声明，西伯利亚干涉战争开始了。与此同时，日本强烈要求中国履行日中军事协定。8月中旬，第十二师团在海参崴登陆，驻"满洲"的第七师团向北满出动。接着，参谋本部以捷克军要求增援为理由擅自决定增兵。使第三师团向外贝加尔方向出动，对海参崴也增派了兵力。这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既没有和美国协商，并以统帅权的独立为借

口，也没有咨询外交调查会。

到9月中旬，日本占领了从海参崴到伯力、赤塔的铁路沿线。10月末，日本在西伯利亚的部队，包括北满的一万二千在内，实际上达到七万二千人。11月，美国对日本增派兵力和独占中东铁路提出了抗议。

① J·焦鲁（池田清译）《欧洲百年史》1，1975年，278、309页。协约国，在美国参战后就被称为“协约国及联合国”。

② 参照江口朴郎《帝国主义时代的研究》，241—243页。

③ 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82—86页。

④ 原敬是这样想的：“对中国内部，虽劝其表面统一，但实际上不能统一也可，重要的是如果注意使其不产生敌视我国的恶感，那末，他们之间即使稍有争端，对我不但无害，而且可以乘机加以利用得到好处”。（《原敬日记》大正6年9月29日）。

⑤ 参照栗原健《关东都督府问题提要》，见栗原编《对满蒙政策的一个方面》，38页以下。

⑥ 还有，两国不得利用现状，在中国谋求有损其他友好国国民利益的特权这样一句话，为避免误解从声明中删掉，但附有这符合两国政策的不公开发表的议定书。

⑦ 菊池昌典《俄国革命和日本》，1973年，114页。

⑧ 关宽治《现代东亚国境环境的诞生》，1966年，110—161页。

⑨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121—122页。

⑩ 根据关宽治前引书198页的引文。

⑪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上，1969年，329页以下有决议、檄文等。当时二千五百名中国留学生中，据6月12日调查，回国的有一千二百零七人（362页）。

⑫ 铃木武雄主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1972年，141—165页。此外，志立铁次郎兴银总裁因对西原借款和创立中华汇业银行不满，于1918年2月辞职。《日本兴业银行五十年史》，1957年，237页。

⑬ 小林龙夫编《翠雨庄日记》。170—179页。细谷千博《西伯利亚出兵史的研究》，1955年，231—235页。

第三节　民本主义和米骚动

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由于日本参加大战，政党被迫走向军国主义，资产阶级领导的

减税运动也停止了，但是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参战后不久的9月，在名古屋发生了要求电车减低票价的运动，名古屋电铁遭到烧毁。茅原华山和石田友治发行的《第三帝国》仍坚持急进的自由主义的主张，1915年茅原转向支持战争后，以石田为中心进行了对藩阀官僚专制统治的批判，提出了确立人权的主张。① 该杂志重视读者来稿，刊登了以地方小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青年为中心的读者们所面临的问题，从家庭、征兵问题直到殖民地问题。在台湾，在中国辛亥革命影响下，计划发动争取独立的起义，继1913年的苗栗事件之后，1915年又发生了西来庵事件，台湾总督府进行了残酷镇压，八百六十六人被判处死刑。② 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杂志上（大正4年11月）坦率地批评说："竟然作出这等事情的大和民族真可怕"。不久，大正天皇即位。实行大赦，对还未执行的七百三十一人实行减刑，于是又在下月号的《白桦》上补充写道："天恩不应只限于即位大典时出现，希望经常颁赐。"此后，白桦派迎来了全盛时期，他们所主张的"人类"立场，也出自这样一些事情。

1916（大正5）年一月号的《中央公论》，以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所写的题为《论宪政的本义及其贯彻到底之方法》长篇论文装饰卷首，倡导民本主义。吉野将民主的意义分为"国家的主权从法理上看应属于人民"的民主主义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应该为人民"的民本主义。后者即民本主义，也是适用于君主制国家的立宪政治的共同基本精神，它包含着政治目的应该在于全体民众的福利，和政策的决定应该依据全体民众的意向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然而，人民直接参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改善代议政治，使人民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够监督政府，这是必要的。因此主张第一，彻底贯彻选举道德，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第二，实现根据责任内阁主义的政党内阁；第三，抑制妨碍下院和政党内

阁活动的上院或元老。通过这些改革，代表一般民众意见的众议院，应该成为政治中心。

这种民本主义，一面通过避而不谈主权论，巧妙地避开了国体论者和官宪的镇压，一面乘拥护宪政运动以来的民主潮流，公开主张普选和政党内阁，为抨击军阀、官僚的独裁政治和金权势力的蛮横开辟了道路。但同时因而使批判标准的一般民众即人民的地位不够明确，没能充分制止其向国家主义发展。不过，以吉野和首先在早稻田大学、继而又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大显身手的大山郁夫为代表的民本主义者，利用报纸、杂志，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时事评论，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还通过友爱会推进了同工人阶级的结合。吉野本来是承认1915年的二十一条要求的，但从这时起，通过同中国、朝鲜学生的接触，了解到中国和朝鲜的群众思想感情，因而从尊重中国、朝鲜的立场出发，开始了对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③

这一年从9月到12月，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贫穷故事》，提出了“文明国中穷人多”的问题。“国家虽很富、民众却甚穷”，这正是大战景气中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河上的充满人道主义热情的文章，吸引了人们，给以强烈印象。河上把贫困作为社会问题来对待，但却把解决贫困的道路是求之于富有者停止奢侈，栉田民藏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社会上所以存在着奢侈，……是因为存在着造成社会问题的贫困的缘故，……并不是因为有了奢侈才有贫困，……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方法，教授为什么不把希望寄托在工人的阶级觉悟(经济的觉悟)上呢？”④

困守在卖文社和《近代思想》中过着“艰苦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也开始活动了。1915年9月，堺利彦发行了《新社会》来代替文艺杂志《丝瓜之花》，高畠素之、山川均等也参加了。作家马场孤蝶在

1915年 3 月的大选时，标榜民主主义，参加竟选，堺也和夏目漱石、与谢野晶子、平塚雷鸟等一起予以支援。在 1917 年四月的大选中，堺亲自出马，论述普选的必要，在寺内内阁干涉的情况下，演说会竟总是坐无虚席。⑤ 这一年，加藤时次郎等恢复了普通选举促进同盟会，在叶山事件中受到打击的大杉荣也翻译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论》，重新开始了活动。

这一年，俄国革命再度爆发，国内劳资纠纷也急剧增加，这给社会主义者以很大鼓舞。这时，民本主义者的民主运动开始兴起，新闻界也进一步活跃起来。社会主义者也以匿名方式，出现在《新日本》、《中外》杂志上。其中，山川对避而不谈主权论的民主论，进行了接连不断的尖锐批判。⑥ 但他是把民本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民主看成是工商资产阶级一手独占的专卖品，忽视了由此而来的自由和权利的扩大，联系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堺打算在这种情况下与民本主义者合作，积极参加普选运动。对俄国革命有深刻研究的高畠认为，政治运动不能只限于议会政策，工人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运动完全是政治运动，说政治运动就是妥协，就是堕落是不对的，采取了反对工团主义的否定政治运动的立场。

大战景气下的政府和民众

寺内内阁由于 1917 年的大选和设置外交调查会，取得了政友会、国民党的支持，便乘大战景气之机，开始积极推行扩充军备政策。在 6 月的第三十九届特别议会上，通过了为建设八四舰队的二亿六千余万元的七年跨年度费为主的、包括扩充电话、炼铁厂的经费在内的追加预算，还通过了制铁业奖励法。接着，寺内内阁在外务、大藏、递信、农商等各省设立临时调查部，调查研究欧美各交战国的战时体制，以使在重新组织日本帝国主义时发挥作用。

在1918年初的第四十届议会上，通过了包括建设八六舰队的三亿余日元的六年跨年度费和陆军充实装备跨年度费的庞大预算，还通过了以增收所得税、酒税和新设战时所得税为中心的增税法案。这就使得在前一年已经出现的地税收入与所得税收入地位颠倒过来的倾向更加强了。最大众性的消费税——酒税的收入更高了。税制修改原案吸收了国民党的主张，还包括了废除通行税等内容，但是，原敬威胁寺内内阁说，如果无视政友会的意见，就同宪政会采取联合行动，使得政府同意将它推迟到战后。寺内内阁改变态度使友党新政会（维新会的后身）陷入困境，发生了分裂。可是，原敬认为同宪政会合作就会破坏政府同政友会的关系，因而表示反对。（《原敬日记》大正6年10月17日）。

这届议会通过了军需工业动员法。陆军在1915年秋就任命了临时军事调查委员，调查交战各国的陆军状况。结果无论是兵力动员、装备，还是弹量消耗，其规模之庞大，远远超出预料而大为惊讶！于是同海军协商，为了作好战时军需工业动员的准备，决定平时也要进行调查和培养。这个法案由于赋予政府包括管理工厂、企业在内的强大权限，因而在议会内展开了激烈争辩，终于附以设立官民联合的军需评议会的附带决议才得以通过。还通过了对大型运货卡车的制造、购入、保有者给予补助的军用汽车补助法。接着，在内阁中新设置了以首相为总裁、陆海军次官为次官的军需局，由陆海军人和各省厅的官员参加，开始了军需工业动员准备的调查。⑦

政党，尤其是政友会对扩充军备，特别是对装备的现代化非常热心，原敬是空军独立论者。（《原敬日记》大正6年12月10、28日）。日本工业俱乐部也在制定军需工业动员法时提出应在平时增加民间生产武器的机会，设法扩大武器生产能力的意见书。⑧

为适应大战以来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

对帝国国防方针等进行了修改，经过同陆海军大臣的协商和向元帅府的咨询，1918年6月末得到天皇的批准而决定下来，把帝国国防方针和所需兵力，批示给了寺内首相。它是一个以俄国、美国以及中国为假想敌国的，以陆军战时四十一军团、海军第一线战舰——巡洋舰三队的所谓八八八舰队为所需兵力的庞大计划。⑨寺内内阁在其辞职前夕的9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复奏天皇，贯彻这个计划。然而，田健治郎递信相在日记中却这样写道："根据我国的财政现状，这个计划不容易办到。今后数年间，政界主题将要集中到调和国防财政这点上"。(《田健治郎日记》大正7年9月10日)。

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社会趋向流动化，改变了面貌。人口集中城市，大城市的郊区发展起来。由于公私企业的发展，新中间层、工人也急剧增加，对市民生活问题的关心也加深了。尽管有些迟了，政府还是不得不提出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1918年，在内务省成立了城市计划调查会和救济问题调查会。对由于义务教育费的急剧增加而陷于困难的地方财政，解决得虽然还不够，却施行了市镇村立小学教员的薪俸由国库负担一部分的措施。

大战末期，大战景气的矛盾尖锐化了。输出的激增带来了硬币的流入和在外硬币的蓄积。由于交战各国禁止输出和运费上涨，机械、原料等的输入也困难了。再加上劳动力、住宅的不足和运输、通信能力达到极限，再也无法扩大生产。以前以米为主的比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从1917年中期开始暴涨。而政府继续采取奖励产业，促进输出的政策，再加上囤积居奇，使物价益发飞涨。工资增长远不及物价的上涨，薪俸更赶不上，中产以下阶层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农商相仲小路廉于1917年9月，急忙发出了暴利取缔令，开始制止对米谷、铁、煤、布匹、纸张、染料、药品

等的囤积居奇，但已为时过晚，再加上继续实行优先出口的经济政策，因而没有取得什么效果。⑩

因大战的景气，企业的股东红利达三、四成，而工人却不得不靠加班、夜班来抵补生活费用的上涨。而且由于推行机械化的结果，资本家雇用大量不熟练工人，削减了工人的工资，于是温情主义的主从关系迅速瓦解了，工人开始意识到权利的意义，阶级觉悟提高了。

1917 年，劳资纠纷急剧增加。据官方统计，罢工次数，大战开始的 1914 年为五十次，参加人员为七千九百零四人；1915 年为六十四次，七千八百五十二人；但 1916 年就增加到一百零八次，八千四百一十三人；到 1917 年猛增到三百九十八次，五万七千三百零九人。这一年以重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为中心，相继发生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纠纷。

友爱会也开始参与劳资纠纷。1916年 8 月的横滨船坞和1917年 1 月的池贝铁工厂的纠纷，友爱会员起了核心作用；横滨、东京的友爱会支部分别支援工人的要求，表现出阶级意识的成长。1917年 3 月日本制钢所室兰工厂的罢工，就是在友爱会支部的领导下，获得了提高工资二成的胜利。

日本最大的军需工厂日本制钢所的罢工，招致当权者的反击。罢工后，友爱会的核心成员都被解雇，室兰支部解散了。寺内内阁加强了对友爱会的干涉和压迫，老会员中大多数离开了，但代之而纷纷入会的却是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这样一来，原来互助色彩浓厚的友爱会便向工会方向演变了。还由于野坂铁（参三)、久留弘三等大学出身的会员和平泽计七、松冈驹吉等先进工人的努力，铃木会长的独裁体制开始得到纠正。在磐城以及横滨、东京、神户、大阪建立的联合会，为工人会员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⑪1917 年 4 月的友爱会大会提出普选要求，11 月在友爱会本部召开

工人大学生联合大会，加强了工人同先进知识分子、学生的联系。

除友爱会外还建立了其他的工会组织。1916 年，住友铸钢所的熟练工人西尾末广等组成职工工会促进同盟会，向职工亲自组织自己工会方面迈进。同一年，欧文排字工人组织的欧友会恢复活动，组成信友会，目标是推动全体印刷工人的组织化。

统治阶级在当时的动荡不安中，越来越感到危机。山县有朋在 1917 年 6 月担心人心的向背说："社会主义的妄想邪说，尤其自中国和俄国革命以来，往往不无由那些沽名好事之徒向广大下层无知阶级传播的倾向"⑫。遭到《大阪朝日》等舆论的激烈攻击的寺内内阁，大肆禁止刊登新消息和发行新闻杂志，压制言论，随着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的迫近，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在害怕民主主义高涨这一点上，政友会总裁原敬也不例外。这一年的 10 月，原敬曾对三浦梧楼说："将来，民主主义的兴起确实是可怕的，这是我和官僚都担心的事。所不同者，只是官僚想堵住这个潮流，而我则是不让它激烈起来，通过相当的疏通，不让它造成大的危害就是了。"(《原敬日记》大正 6 年 10 月 22 日)。

这一年的 9 月，寺内内阁设立了内阁直属的临时教育会议，任命前内相平田东助为总裁，并任命有力的学者、官僚、军人、政治家、财界人物为委员。⑬ 开会时，寺内就振兴教育的目的说道，可以预料，战后的经营将是困难重重，为了对此有所准备，要造就富于护国精神的忠诚臣民，来发扬国体精华，这就是振兴教育的目标。会议的审议内容涉及整个教育制度，但引人注意的总的说来却是针对大战以来思想意识的变化，要采取贯彻国民道德、增强国体观念的国家主义的方针。会议除答复咨询外，还通过了关于振兴军事体操的建议和关于完善教育效果所需一般设施的建议。后者是为了明确国体本义和维持我国固有的醇风美俗，要求修改与此相抵触的法律。

而另一方面，承认公私立大学，开放高等教育，以及振兴实业教育这样一些对咨询的答复，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要求。正好这时，小学国定教科书修改了，这一年的新生开始使用第一课是“鼻子、鸽子”的普通小学国语课本了。在这本教科书中虽然新加进了“喂！一太郎”这样美化军国主义的课文，但是包括这类文章在内，强烈地反映出重视孩子的自发兴趣的趋向。这本教科书一直到1933（昭和8）年被“开了！ 开了！ 樱花开了！”的国语课本取代之前，使用了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代表大正民主时期的教科书。

米骚动

一进入1918（大正7）年，大米和生活必需品暴涨更加严重，民众在困苦生活中挣扎。特别是米价，1916年粗米一石平均是十三余日元的低价，但到1918年2月，就超过了二十五日元，7月竟达三十日元以上，而且在继续暴涨。

米价暴涨的背景是，大战中资本主义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地主制下的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城市人口和工矿业的工人剧增，在大战景气中沾光的农户也以大米代替麦、粟，因而大米的消费量增加了，造酒用米也增加了。另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劳动力不足，因而小农制下的大米的商品量减少了。进口大米也困难了。再加上地主、米商的粮食投机，就使米价更为昂贵了。

在1918年初的第四十届议会上，废除稻谷进口税、增加粮食进口的呼声高涨，寺内内阁也考虑了这方面的立法，但参加商榷的原敬却转到对此进行压制那方面去了。议会后，政府公布了进口大米管理令、这是由指定商人来负责输入外国米和运进殖民地米所产生的损失由政府补偿的办法。三井物产、铃木商店等被选为指定商人。这是为了防止米价过分下跌的不彻底的对策，无论在抑制粮食投机上，或者在大量购进外来米压低米价上，都没有起到多

大作用。

民众被逼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处在无权状态的民众来说，推动政府采取对策的途径也堵死了，他们痛恨那些哄抬米价、渔肉民众的富豪，尤其痛恨爆发户、米商。

7月下旬，在富山县各地，愤恨米价暴涨的民众，掀起了反对外运稻米的运动。8月3日，西水桥镇的主妇们闯进粮店，强烈要求廉价售米，运动以“骚动”形式出现。当地报纸以“越中妇女暴动”为题加以报导，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⑭恰巧这时出兵西伯利亚，一到8月，米价就扶摇直上。8月10日，名古屋、京都发生米骚动，接着大阪、神户发展为大规模暴动。13日，东京也发生骚动，波及到各地方城市。京都市内最大的受歧视的部落柳原市民起来要求降低米价。参加国民党大阪俱乐部召开的米价调节市民大会的民众，违背主办者的意图，走上街头。神户，三菱造船厂的暴动一开始，就烧毁了与寺内内阁勾结的政商铃木商店。

8月17日以后，骚动转向地方村镇。尤其在山口县和北九洲的煤矿，采取了暴动以至近似暴动的形式。到九月中旬，历时五十天的米骚动才告结束。

寺内内阁当初认为米骚动是因生活困难而起的，采取了慎重态度，但12日夜，神户市发生暴动后，惊慌的政府转而采取了果断的方针。在13日的阁议上，决定奏请天皇下赐三百万日元，政府也拨出一千万日元，强行收购国内稻米，还提出了积极出动军队的方针。14日，打算在一部分地方实施戒严令，后因水野内相反对没有实行(《田健治郎日记》大正7年8月14、16日)，但出动总兵力达到九万二千多人次。⑮

一向批判寺内内阁压制言论的报纸，善意地报导米骚动，抨击了寺内内阁的失政。8月14日，寺内内阁发出了禁止报导有关米骚动的一切消息的命令，新闻界一致加以抵制，实际上使它撤回

了。25日的关西记者大会通过决议，追究寺内内阁责任，要求辞职。这种动向成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强大力量。

米骚动，可以看作是自从日俄战争以来由日比谷骚动事件开始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的最后一次爆发。但它们之间有一些不同之处。以前的群众运动是以群众的不满为背景，起首是由政治家煽动起来，而这次米骚动却是由群众自身的“饿肚子”问题爆发起来的。率领群众的不是号称壮士的中资产阶级的有志之士，而是无产者自己。以前是以当时的政府、官宪和他们的同伙为目标的政治性运动，而这次是因为对群众生活艰苦和暴发户的豪奢而感到社会不公平的群众的经济的社会运动。政党已经不站在运动方面，新闻界、知识分子给以很高的评价，加以声援。这是一次没有合理的目标或组织的自发性运动，也没有同工人运动保有组织上的联系，但这时急剧增加的劳资纠纷形成米骚动的开端的事例，是到处可见的。

京都帝大教授户田海市认为：“这次暴动，起首似乎纯粹是米价暴动，但发展到各地之后，就具有了破坏资本主义运动的浓厚的色彩了。……肯定地说，战争以来不断发生的同盟罢工，大大增强了我下层群众对资本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⑯米骚动之后，工人运动和普选运动呈现出了新的高涨。

米骚动一暴发，统治阶层方面汇集了皇室和政府的出资和富豪巨商的捐款，廉价售米，想用施惠的温情主义来安抚群众的不满，防止扩大。在大城市开始创办公立市场、简易食堂、托儿所、职业介绍所等社会福利事业。但另方面，对参加骚动的人，检察当局则以严惩主义对待。被起诉者，在一道三府三二县中，总数高达七千七百七十六名，并尽快进行审判，课以重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歧视的部落民，站在米骚动的前列，当权者宣传说他们行动残暴课以重刑，妄图以此离间同其他群众的关系。统治者还深深感

到有必要把青年团、在乡军人团、消防组等团体拉到国家体制这方面来加以利用,便积极扶植了这些组织。

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起来,这时正处在贫富两极分化时期,也是日本人以多种形式向海外发展的时期。据 1919 年 6 月末外务省通商局调查,侨居海外各地的日本人,除朝鲜人、台湾人外,总数达五十八万二千人,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八万八千人,其中的百分之四十集中在美国(包括夏威夷在内),但日本移民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受到极端限制,开始向南美发展。在中国(包括关东州在内)也占百分之四十。从他们的职业表来看,在中国,"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店员"固然不少,但在中国、尤其是在"满洲"、西伯利亚、东南亚,则以"艺妓、娼妓、女招待及其他"占多数,合计约达一万人。⑰

原内阁的组成

米骚动给予寺内内阁很大冲击。追究寺内内阁责任,抨击其镇压政策的社会舆论日益高涨,寺内内阁已经没有维持下去的希望。当米骚动发展起来的时候,回到盛冈家中的政友会总裁原敬在探察形势时表示,寺内内阁倘若留任,作为政党,只好弹劾内阁,但最好让它稳稳当当地下台。寺内首相也想以有病为理由辞职,推荐一直与寺内内阁合作的原敬为继任首相。但掌握继任首相的关键人物是山县。因此,原对于能否顺利地实现政友会内阁并不乐观,尽量避免表态,注视事态的发展。⑱

寺内内阁于 9 月 21 日正式提出辞呈,立即授命西园寺公望组阁。西园寺辞而不就,推荐原敬,并说服了山县、松方。27日,原受命组阁,除陆、海、外三大臣外,全体阁僚都由政友会成员担任,组成了日本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内相由原从内务省起用的床次竹二郎担任,并兼任铁道院总裁。外相,因牧野伸显推辞,由原的

老朋友内田康哉担任。藏相由推行积极政策而知名的高桥是清担任，而采取消极财政政策的山本达雄任农商相。高桥、山本不但是政友会成员，而且还是贵族院的敕选议员。文相，预定是元田肇，因表示不满，就由原来预定任递信相的中桥德五郎担任，递信相则由野田卯太郎担任。中桥是原大阪商船公司经理，在大阪财界有相当势力，野田同三井有很深的关系。法相因为检察总长平沼骐一郎和司法次官铃木喜三郎都一再推辞，便由原敬兼任。陆相是山县推荐的田中义一，海相由加藤友三郎留任。内阁书记官长为原敬的亲信高桥光威，法制局长官任命了在任干事长时和野田一起同寺内内阁进行交涉的横田千之助。

由政党总裁任首相，大部分阁僚又都是政党成员，这样的内阁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但是，那些首相，如大隈、伊藤、西园寺等，都是以明治政府的功臣身分做了政党总裁，担任首相的，他们所拥有的爵位就象征了这点。原是以政党人的身分做政党总裁的，又以政党总裁的资格担任首相的。没有爵位的众议院议员当上首相，这还是首次。“平民宰相”的称呼，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原内阁并不是政党通过斗争从官僚手中夺取政权而组成的内阁，而是官僚集团在米骚动的群众压力面前把政权让了出来而组成的内阁。以元老山县为代表的官僚势力，仍然把持着军部、枢密院、贵族院等阵地，原内阁只能在同这些势力保持妥协的情况下推行自己的政策。不仅如此，担任陆相的田中义一，在大正政变当时的活动姑且不论，在大隈、寺内两届内阁时作为参谋次长是侵略中国政策的推动者。被推举为法相的平沼骐一郎，正象在临时教育会议的建议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个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原内阁所处时代潮流的姿态。

在这以前，寺内内阁把《大阪朝日新闻》看作眼中钉[19]进行了反击，抓住报导8月25日关西记者大会消息中的“白虹贯日”这句话，

禁止该报晚报的发行，接着又以冒渎皇室尊严，紊乱国法的罪名进行起诉。9月28日，右翼团体浪人会的打手，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阪中之岛公园，袭击该社社长村山龙平，紧接着又召开拥护国体演说大会，气焰万丈。原内阁成立以后，检察官还曾要求停止发行该报，进行威吓。大阪朝日内部，村山社长辞职，编辑局长乌居素川以下长谷川如是闲、丸山干治、大山郁夫等退社，新任编辑局长西村天囚发表了转变社风的宣言。审判结果，编辑发行人和执笔者被判处监禁两个月，但免于停刊。检察当局因有了转变宣言，打算撤消检察当局的起诉，但兼任法相的原敬认为仅以一纸宣言是不够的，把新社长上野理一找来，让他当面保证贯彻宣言之后，才取消了起诉。(《原敬日记》大正7年12月8日)。

① 松尾尊兊《大政民主》119—143页。

② 你津正志《日本现代史1》，1966年，168—172页。

③ 参照吉野作造(松尾尊兊编)《论中国、朝鲜》，1970年。

④ 栉田民藏《读河上教授的奢侈和贫困》，载《国家学会杂志》31卷5号(大正5年5月)。此外，参照胁村义太郎《贫穷故事前后》，载《胁村义太郎文集》第4卷，1976年。

⑤ 松尾尊兊同上书，159—163页。

⑥ 以《建筑在沙滩上的民主》(《新社会》大正6年3月)批判大山，以无名氏的《民主的烦闷》(《新日本》大正7年4月)批判吉野和早大教授北昤吉，就是代表的事例。

⑦ 《战史丛书》，载《陆军军需动员(1)》，1967年，53—69页。

⑧ 《日本工业俱乐部二十五年史》上卷，68—70页。政友会的野田卯太郎也向寺内首相提出了扩充军工厂，补助民办工厂的扩充军备的建议。(《原敬日记》大正7年1月17日)

⑨ 《战史丛书》，载《大本营陆军部(1)》220页，虽然军团编制说抬头了，但采纳了寺内首相的与其增加师团莫如充实装备更要紧的意见，定为把所需兵力减少十个师团，战时为四十个师团。可是《田健治郎日记》谈到9月10日的阁议时，补充写道："陆军为四十一军团"，"盖军团兵数，和现有师团相比，约增加五成。四十一军团大约为六十余师团，虽说是战时特设，经费却不可避免地成倍增加"。此外在《中央公论》1918年11月号刊载的逸名氏《斥在军团掩盖下的陆军大扩张案》一文中，补记道：本文写的是二五军团，但送到大藏省的军团预算案是二一军团，和现有师团数相同。这大概就是平时计划的军团数吧。

⑩ 桥田民藏《从社会政策上看暴利取缔令》，载《桥田民藏全集》第4卷，1935年，219—221页。桥田说："依政府的看法，认为保护国内产业，向外销售商品，从国外赚取硬币，有利于国家。……一国富强与否，不应依硬币量的高低、贸易额的多少、企业资金的多寡而定。……硬币多……在国内关系上反倒会贫穷的。就是说，国民消费所必需的商品，不顾国内的需求，只顾向外输出，则国民必须用高价购买东西，如此将越来越贫困，国家就会产生出少数的富人和多数的穷人"。

⑪ 松尾尊兊《大政民主的研究》1966年，184—195页。

⑫ 1917年6月25日致德川家达的信，见德富猪一郎编《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1197页。

⑬ 参照海后宗臣编《临时教育会议研究》，1960年。

⑭ 关于米骚动，井上清、渡部徹《米骚动研究》全五卷（1959—1961年），有详细记载。

⑮ 松尾尊兊《民本主义的潮流》，1970年，130页。

⑯ 户田海市《米价暴动的社会意义》，载《经济论丛》，7卷4号（大正7年10月），114—115页。

⑰ 外务省通商局《海外各地日侨职业别表》，1919年6月。

⑱ 原认为："后任内阁一事，根本无需注意。……倘若内阁是官僚派，就应以全力打倒它。这时应和宪政会合作。只有如此，才能扫除官僚派，使政局为之一新，……但是我想这样手段，未必对国家有利，因而希望尽量不用激烈手段而使政局为之一新。"（《原敬日记》大正7年7月20日）。

⑲ "这次骚乱大概和大阪朝日新闻销售区域有关系，该报的社会主义煽动似乎起了作用，而且宪政会成员和社会主义者也有参加煽动的行迹，不可不深加追究。"（《田健治郎日记》大正7年8月13日）

第四节　巴黎和会和亚洲

巴黎和平会议

在原内阁组成前后，意识到失败的德国，为了以威尔逊的十四条为基础进行媾和谈判而请求停战。在停战条件的谈判中，奥地利、匈牙利投降了，德国也发生革命，推翻了帝制。1918（大正7）年11月11日实行停战，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1919年1月，为讨论协约国的媾和条件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了全世界，但主要战场在欧洲。欧洲各参战国的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俄罗斯爆发

了社会主义革命，各协约国正在发动武装干涉。三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不久就成了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的国际组织。德国革命前途无法预料，协约国各国也掀起了工人运动的浪潮。活生生的悲惨战争的记忆，把对敌国的憎恨和对战争的憎恨交织在一起。

和平会议是以大国为中心来进行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五国，各派出二名首脑，组成十人最高会议，后来变成了除去日本的四强会议。其他协约国的代表，只限于参加有关事项的讨论。会议的决定是强迫德国接受的，苏维埃俄国被排除会议之外。

会议讨论的基础是威尔逊的十四条。它承认国际联盟和有限的民族自决等国际关系中的民主主义原则，企图抑制战胜国的帝国主义要求，反映了在经济上占压倒优势的美国的利益。但其他大国与此形成对立，而附属国、殖民地人民又对民族自决原则抱着过分的期待。为战争付出重大牺牲的协约国的工人运动，则强烈要求设立国际劳工组织。

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派遣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首次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是，日本的方针只是侧重于要求承受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权益和割让德属南洋各岛。至于其他问题，则顺应协约国大势，唯独对限制日本国家发展的问题抱着防范的态度。

对于设立国际联盟，日本态度消极，作为对抗手段，日本强烈要求把废除种族区别，即各国对居住其领域内的外国人不设人种和国籍的区别的规定加进去，但因澳大利亚等国强烈反对，没能实现。

协约国迫使德国放弃全部殖民地，但威尔逊不同意作为殖民地由各国来合并的主张，而主张由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经过激烈辩

论之后，达成妥协，承认了委任统治原则，但将其分成A、B、C三种方式，而C方式实质上等于合并。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群岛属于C式，日本是受任统治国。

在日本的要求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山东省的德国权益的归属问题。日本的方针是无条件地承受胶州湾租界地一带的德国的一切权益，以后只把租界地自动地归还中国，而确保山东的铁路、矿山、居留地等权益。日本在二十一条要求中，已经使中国答应承认，而且也同英、法、意约好，在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的要求。就是在中国参战的时候，日本也乐观地认为，即使北京政府的代表出席媾和会议，也能使它接受日本的要求。但是，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广东政府的势力发展起来，段祺瑞在北京政府的地位也发生动摇，1919年2月召开了南北和平会议。因此，中国全权代表团由南北两个政府的代表组成，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席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广东政府的王正廷等为代表。而顾和王都在美国受过教育，是所谓少壮中国的代表，中国代表团的实际领导者。①

当全权代表牧野在十人会议上要求无条件承受山东的德国权益时，顾维均则主张，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德国的租借条约已经失效，因而权益应归还中国。之后，在中国收回国权的呼声高涨起来，在媾和会议中，以美国代表为首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同情的多了。4月21日，日本政府接受外交调查会的决议，向日本代表发出强硬训令：如果不通过对山东的要求，就不在国际联盟章程上签字。英法根据秘密条约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上，威尔逊也为使国际联盟得以建立，在山东问题上让了步。英国询问日本归还山东的具体条件，日本代表在4月30日的首脑会议上，答应把山东半岛的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只保留德国曾据有的经济特权和在正常条件下设置租界地的权利。日本的要求得到了承认。但是，在中国，

掀起了反对这个决定的五四运动。

同德国媾和的同时，于6月28日签订了决定组织国际联盟、设立国际劳动会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但中国因为反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拒绝签字。美国虽然签了字，但因参议院反对没有批准。

朝鲜三·一运动

正当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强烈主张种族平等的3月1日，汉城以及朝鲜各城市，爆发了独立运动。

自1910年韩国被吞并以来，朝鲜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即军人总督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凭宪兵警察实行残酷的武断政治，朝鲜人没有任何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期间，为了保证总督府的财政收入实行了土地调查。在确定土地所有权时，以前贵族、官僚具有收租权的土地，被定为私有地，而另方面，农民则被剥夺了习惯上拥有的耕作权，降为佃户。所有权不明确的土地，则被定为国有地。佃租平均为六成，甚至很多是让佃户负担地税和捐税的。这样确定土地所有权的结果，就使抵押过期的土地，很容易集中到以"资金和权力为背景的日本人"地主手中。② 早在1908年，日本政府让韩国政府以土地作为实物投资而创办的东洋拓殖会社，在1913年末就成了拥有六万五千町步的大地主，以涩泽、三菱、大仓等财阀为首的日本人大地主，兼并了南朝鲜谷仓地带的水田。

而且，总督府发布会社令，从1911年起对开设公司实行许可制，抑制了企业的发展。丧失土地的农民，在朝鲜无法当工人，不得不迁到日本、中国、西伯利亚去，农业政策也极端贫乏，朝鲜经济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

俄国发生了革命，接着吞并了朝鲜的寺内正毅内阁因米骚动而倒台，以及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高唱民族自决的原则，所有这

些，给饱受日本殖民统治压迫的朝鲜人民争取独立，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1919年2月8日，住在东京的朝鲜学生，在朝鲜基督教青年会馆发表了独立宣言和民族自决的决议，有六十多人被逮捕 在朝鲜，由天道教教主孙秉熙以及基督教牧师、佛教僧侣签署的独立宣言准备发表，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也在各学校负责组织工作。恰好在1月，因海牙密使事件而被迫退位的李太王（高宗）突然死去，预料3月3日举行葬礼时，在汉城将有几十万民众参加。

3月1日，在汉城以及其他朝鲜的主要城市，发表了独立宣言书，举行了高呼"大韩独立万岁"口号的示威游行。独立宣言说，基于"人类平等的大义"，顺应因"人类良心的发现"而出现的"改造世界的大好转机"，宣布朝鲜的独立和朝鲜人民为自由的人民。宣言警告说，日本吞并朝鲜不仅加深了两民族的怨仇，而且"使中国人民对日本更加危惧和猜疑，必将招致整个亚洲同归于尽的悲惨命运"。宣言还说，为了亚洲和平，为了世界和平，朝鲜独立是必要的。关于运动方法，宣言主张要合乎情理，并强调遵守秩序。3月1日这天，宣言签名人改变了预定计划，没有出现在群众面前，而集合在饭馆里，打电话给警察，接受逮捕。

独立宣言一发表，引起了渴望独立的朝鲜人民的强烈共鸣，独立示威运动席卷朝鲜全土，各地纷纷发表独立宣言、檄文。商店关门罢市也从平壤扩展到各城市。仅仅不到五万的工人在两个月内就举行了二十四次罢工，学生也起来罢课，走在示威游行的前头。运动开始时，是和平示威，但由于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不久就转为用镰刀、铁锹、棍棒等的武力抵抗，到处展开了烧毁村公所的课税、土地关系等文件的行动，③成了一场以实际行动向殖民统治基层机构进攻的斗争。

日本政府企图对毫不抵抗的民众进行武力镇压。原内阁3月

1日，对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发出训令说："这次事件，对内对外，需要把它说成是轻微问题。然而实际上要严励处置，以防再次发生。但要充分注意，外国人最注意此次事件，不要招致残酷苛刻的批评。"(《原敬日记》大正8年3月11日)。到了4月，政府决定采取"断然处置"，增派兵力六个营和补助宪兵四百名(同上，大正8年4月4、8日)。长谷川总督认为"目前事实上已经是大部分国民的政治运动"，因而决定"动用全部兵力尽力镇压"，并"给予警察机关进行搜察、逮捕的活动自由"，以期迅速镇压下去。④ 15日，发布"关于政治犯罪处罚"法令，用十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的重刑进行威吓。⑤ 镇压是非常残酷的。在京畿道的水原郡，二名日本警察被杀，日军就逮捕八百人，烧毁民房数百户，又，4月15日，将二十五名基督教、天道教教徒关在堤岩里的基督教堂里，放火全部烧死。⑥

这样，到4月末，起义大体上被镇压下去。据说，官方死亡宪兵六人、警察二人，但朝鲜人民的牺牲是死亡七千六百四十五名，重伤四万五千五百六十二名，被捕四万九千八百一十一名，烧毁的房屋七百二十四户、教堂五十九所、学校三所，⑦ 但人们认为实际上不止于此。

三•一运动是在召开巴黎和会期间发生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未得到部分领导者所期待的外国援助，和会也没有接受朝鲜独立的请愿。这次运动在以独立口号动员广大群众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但并没有同朝鲜人民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问题结合起来，也缺乏组织农民、工人的领导力量。因此，被镇压之后，没能继续进行有组织的运动。

中国五·四运动

中国也对巴黎和会寄以期望，希望根据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

决”原则，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代表团要求山东的德国权益要直接归还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条约和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会议根本不理后两项，山东问题又和日本的主张直接冲突，如上所述，4月末基本上通过了日本的要求。于是在中国，反对运动高涨起来。

在中国，皖系军阀段祺瑞由于对日妥协和继续内战遭到舆论的谴责，已于上年10月下野，但其友党安福俱乐部在北京国会占绝对多数，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等亲日派要人就是由它推选出来任政府要职的。因此，反对运动的锋芒既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指向了把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的这些要人。

5月4日，是星期日，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合，会后前往驻有各国公使馆的东交民巷游行示威，因在入口处受阻，便袭击曹汝霖住宅。学生殴打了当时在场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曹宅后撤回。由于有三十二名学生被捕，又掀起了要求释放运动，结果取得了胜利。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那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一千余人前往各国公使馆请愿示威，由于警察的镇压，很多人受伤和被捕。这件事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纷纷组成学生联合会，上海带头组织了抵制日货的市民组织。拒绝签署和约的运动和罢免卖国贼、抵制日货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发展起来。

日本要求北京政府取缔抵制日货和排日言论，段祺瑞也亲自出面主张签署条约，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面对这种形势，北京学联作好了全体成员被捕的思想准备，坚持斗争。接着上海爆发了学校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运动波及到各地城市。6月10日，北京政府屈服，发表了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的声明，钱能训总理也辞职了。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知识分子的对策

标榜“为民主而战”的协约国的胜利，也使日本的民主运动高涨起来。当时，正在攻击《大阪朝日》的浪人会企图乘势用“维护国体”的旗号，压制言论。针对这个挑战，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以面对面的辩论演说会来应战。在11月末的演说会上，他在为“保护吉野”蜂拥而来的学生、工人面前，奋力驳斥了浪人会。之后不久，以吉野和东京高商教授福田德三为中心联合民本主义的学者、思想家，结成黎明会。“扑灭倒行逆施的危险的顽固思想”是其纲领中的一个内容。黎明会从1919年1月开始，每月召开一次讲演会，开展了启蒙运动。

聚集在吉野周围的以赤松克麿、宫崎龙介等为首的东京帝大法科学生，在该年底，以“同人类解放的新趋势相协调”“顺应现代日本的合理改造运动”为目的，结成新人会，以便“作为青年团体，向社会各阶级开放，争取同志”。⑧ 早稻田大学也于1919年2月组成民人同盟会，不久分裂为建设者同盟和晓民会。

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专门针对日本的运动，因而日本大多数舆论不想把它理解为根据民族自觉而发生的运动，却指责是美国传教士煽动起来的。但是，黎明会对这些运动有所理解。三·一运动一发生，黎明会就在三月的例会上，听取金雨英等朝鲜学生的意见，在3月和6月的例行讲演会上提出了朝鲜问题。吉野、福田揭露了水原事件等的日军残暴行为，抨击了军阀统治、民族歧视和同化政策。在基督教会中，日本美以美教会的石坂龟治还去调查镇压三·一运动的实际情况，寄给各派机关杂志登载。⑨

当五·四运动一爆发，吉野作造就把一篇未署名的题为《不要谩骂北京学生们的行动》文章，作为开场白刊载在《中央公论》6月号上，文章说，就争取从官僚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来说，是同我们志向目标一致的，“只有从官僚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

才能建起两国国民巩固的民族亲善。以前的所谓亲善，实际却是建立真正亲善的大障碍”。由于黎明会的努力，两国的知识界和学生有了交流的场所。

参加巴黎和会的政治家、外交官、舆论界人士，清楚看到了日本在政治、外交方面的落后性。中野正刚、永井柳太郎、古岛一雄、马场恒吾等政治家、舆论界人士，回国后就创办改造同盟，倡导打破官僚政治、实施普选。这些都是合理改革国家的主张。参加和会的有田八郎等少壮外交官，回国后以开放门户、培养外交人员、加强扩大机构为目标，创立了外务省革新同志会，对上司施加压力，促其实现设立情报部以及其他制度的改革。⑩

在受民主运动洗礼的日本，也产生了以改造国家为目的的急进的国家主义，他们为摆脱国内外激烈动荡所造成的群众不安，寻求新的国家形象。预言末日来临而重建日本帝国的大本教势力的急剧发展，也是这种思潮的一种表现。

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等国家主义者，1918年秋组织了老壮会，卖文社的高畠素之也和堺利彦等分手，同它接近。满川和大川在第二年春建立犹存社，以“日本革命，比中国更危险，回国吧！”⑪为理由，把视为领导者的北一辉，从中国叫了回来。北一辉在日俄战争后不久写了《国体论和纯正社会主义》，因被禁止发行，便投给中国革命同盟会，当五·四运动席卷上海时，他正卧病在床，一面听着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同志所领导的排日运动的吼声，一面撰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来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部书一面认为中国所以产生排日运动，是日本军阀外交造成的，同时又主张日本应该在拥戴天皇的戒严令下改造国家。建立“革命帝国”，把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从英俄的侵略下解放出来，当亚洲的盟主。

① 小林龙夫《巴黎和平会议和日本外交》，载《神川先生六十寿辰纪念·近代日本

外交史研究》，1956 年，399 页。

② 山边健太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1971 年，35—39 页。

③ 姜德相《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和朝鲜独立运动》，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25，现代 2》，1970 年 328—342 页。

④ 1919 年 4 月 11 日，朝鲜总督拍给陆军大臣的电报，载姜德相编《现代史资料 25·朝鲜 1》，1966 年 201 页。

⑤ 这是处罚"以变革政治为目的，聚众破坏或企图破坏安宁秩序者"，和为此而进行煽动者的，虽然只适用于朝鲜，但也适用于在国外的活动。这是治安维持法的前奏。

⑥ 这件事，外国报纸报导出来，成了问题，当事人陆军中尉有田俊夫虽提交军法会议，但以拘捕时正值失火为口实，而判为无罪，只给禁闭三十天的行政处分。

⑦ 同注③的 474 页及根据姜在前引论文中所引的 H. Chung, The Case of Korea《朝鲜实情》伦敦，1920 年，346 页。

⑧ 《新人会纪事》，载《民主》第 1 卷第 1 号，大正 8 年 3 月 8 日，16页。

⑨ 松尾尊兊《民本主义潮流》，193 页。

⑩ 《外务省的一百年》上，1969 年，739—757 页。

⑪ 《中国革命外史序》，1921 年《北一辉文集》第 2 卷，1959 年，4 页。

第四章　民主运动的开展

第一节　原内阁和普选运动

积极政策和民众运动

内阁组成后不久，原首相出席了1918（大正7）年10月11日东京商业会议所举办的招待会，在会上明确表示在改良教育、整备交通通信机关、充实国防、调整物价方面，采取避免极端手段的积极政策。“政友会的四大政纲”把这最后一项视为奖励产业的。这是和大战时的产业发展相呼应，在扩充经济基础的同时，励行扩充军备，以便提高景气和扩张党的势力。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因军需景气而繁荣起来的日本经济，立即逆转，染料、药品、金属等军需物资首先下降，造船业、海运业也受到打击。但是1919年的3月左右，景气有了好转，接着又出现了超过战时的狂热般的战后景气。因为大战中欧洲各交战国遭到严重打击，为了复兴，需求大增，美国也景气好转，于是输出再次增加。

原内阁的积极政策，对此起了推动作用。日本银行对贸易金融业给以更大的方便，于是那些战时因输入机械困难而推迟了的事业的新建扩建活动急剧活跃起来，从6月前后开始，投机热潮极度高涨，到了秋季竟达到白热化程度。

物价也逐月上升，到6月突破了停战前夕的最高纪录，并且还在继续上涨，其上涨率占世界的首位。① 米价也超过米骚动当时的最高价格，到了新米上市的季节，也不见下降而继续上涨。

在1919年初的第四十一届议会上，原内阁虽然把军备的正式扩充推迟到一年以后，但却提出了包括以大大发展高等教育机构为重点的积极预算案，并使之通过。与此同时提出了选举法修正案。这是想把现行的大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制，把选举资格的纳税条件由直接国税十日元降到三日元的方案。小选举区制是原的一贯主张，由于降低纳税资格而新取得选举权的人，从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免税点的关系来看，当然是以农民为主的交纳地税的人占多数。

恰在此时，报纸、杂志对普选论和有限制的扩大论展开了热烈讨论，到1919年时，普选论占了上风。② 当明治宪法颁发三十周年的2月11日，在东京，由东大新人会、早大普选促进同盟会、各大学辩论会举行了要求普选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这时，关西友爱会的各联合会发动了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工会和废除阻碍它的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的运动，与此相结合，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普选运动高涨起来。3月1日，普通选举促进同盟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了要求普选大会，学生、商人、老板、手艺人、职员等五万群众参加了大会，一万多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③ 可是，在野党除极少数的部分议员外，在普选问题上还没有下定决心，宪政会、国民党分别提出的选举法修正案，只把纳税资格定为二日元，把中等学校毕业生加了进去。议会通过了政府提案，有选举权者从一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二倍多的三百三十万人。

1916年以来一直在飞速增加的劳资纠纷件数，到1919年达到了战前的最高峰，并且集中在6月以后。结合劳资纠纷，工会日益发展，工人的团结大有进展。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讨论了劳动并非商品、承认工会、八小时劳动等的劳动九原则，并且在凡尔赛条约的四百二十七条中成文化了，大大鼓舞了工人运动。在友爱会中发生了反对铃木文治会长们的干部专横制度的改革运动，这和

急进派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出身的老会员之间的对立有联系。友爱会七周年大会从8月30日起开了三天，将会名改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确立了理事会制度。9月，开展了由友爱会带头，信友会、大日本劳动联盟、矿山劳动同盟会参加的一致反对政府官选的出席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劳动代表的运动。

这一年的4月，《改造》杂志创刊，6月，《解放》杂志创刊，出现了好多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等的《我等》、堺利彦、山川均的《社会主义研究》也都出版了。与世界的动荡相关联，"改造"成了时代的口号，"针对吉野博士们的为第三阶级的民主，第四阶级的民主主张明确地提了出来，被认为是这一年的特点"。④

年底，曾是《青鞜》的骨干平冢雷鸟和曾任友爱会的妇女部书记的市川房枝等筹建新妇人协会，1920年3月举行了成立大会。它主张通过妇女的团结实现男女平等和维护母权，并宣称和男人同心协力参加改造社会的实践运动。

在台湾，稳健的民族主义者林献堂和在东京留学的台湾学生合作，开展了取消委以台湾总督立法权的六三法的运动。1920年，在东京成立了新民会，出版《台湾青年》，终于发展成设置台湾议会运动。⑤

原内阁的对策

原首相早就说过：由于大战的原因"有突然发生无秩序的变动之虞"，要"用有秩序的变迁来制止国内的变动"。(《原敬日记》，大正8年4月2日、6月19日)。原内阁多少也改变了寺内前内阁那种露骨的强权政治的作法，但关于体制的改革，却是极其消极的。

改革元老、军部、贵族院、枢密院等的绝对主义的政治机构，无

论对于确立政党内阁的地位，或提高政党的威信和势力都是必要的。原打算一面把这些置于政党指导之下，另方面为了维持帝国主义的权力对抗群众势力，想把它们保存下来加以利用，避免了同这些特权势力发生正面冲突。

原内阁首先着手的，是在山本内阁时就成为话题的殖民地长官武官专任制的改革。1919年4月，改革关东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关东长官由文官充任。满铁社长也独立了。然而关东军司令官不但负责关东州的防御，而且还担当南满铁路线的保护，关于作战和动员计划则受参谋总长的指挥。从这方面看来，这为关东军得以独断地发动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8月，改革朝鲜和台湾两总督府，总督可由文武官任何一方担任，在朝鲜还废除了宪兵警察。但是，这次改革由于长谷川总督的反对和枢密院的拖延审议而遇到困难，迟迟不得进展，⑥在旧官制下，将原海相斋藤实恢复现役之后任命为朝鲜总督，之后修改了官制。当修改官制时，天皇颁发了诏书，表明朝鲜统治制度的改革到此为止。⑦宪兵警察对殖民地统治的效率是很低的，改革后却大量增加了警察。至于朝鲜总督一职，后来也没有任命过文官。

10月，号称山县谋士的田健治郎被任命为台湾总督，这是第一任的文官总督。但到1921年底满期的六三法，事实上继续有效，总督专制仍旧继续着。

原内阁打算修改文官任用令，扩大自由任用和铨衡任用的范围，但也因枢密院的反对不得进展，只好缩小其任用范围求得妥协。

关于劳动问题，由于东大教授高野岩三郎的努力，上述的救济问题调查会提出了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的修正案，在1919年3月的大会上通过，⑧在第四十一届议会上，宪政会的小山松寿等也要求修改。床次内相认为并没有禁止稳健的工会，拒绝修改，但暂时

停止适用。可是，该年8月，陆军炮兵工厂发生罢工，又重新适用了，在11月的釜石矿山纠纷中出动了军队。1920年2月，八幡制铁所的大工潮和东京市电的罢工一扩大，原内阁就用强硬手段实行镇压，竟使山县有朋表示钦佩。⑨

关于工会，床次内相反对横断的组织，而想以工厂为单位组成劳资协调团体，并在各地再成立联合组织。这是想要阉割工会。1919年12月，成立了以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财界的涩泽荣一等为正副会长的协调会，但劳工方面拒不参加。农商务省和内务省也草拟了工会法草案，然而它们的法案特别是前者，倒象是工会取缔法，因此遭到劳工团体的反对而自消自灭了。

从1919年夏开始，物价再度暴涨，各地富豪们担心米骚动重演而出面兴办救济事业。官员们的薪水也提高了。宪政会、贵族院各派以将招致社会动乱为理由要求调节物价，但高桥藏相认为提高利率，将引起不景气，阻碍对外的发展，因而继续推行积极政策。

原首相认为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安完全是受外来思想刺激所引起的，批驳了在野党说其原因在于物价暴涨致使中产阶级以下的生活不安定的主张而急于采取思想对策。床次内相为谋求国内的“协同调和”，培养“健全的国家观念”，于1919年3月发起培养民力运动，要求地方有力者以及户主会、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妇女会等各团体给予合作。⑩ 7月，设置临时法制审议会（总裁穗积陈重、副总裁平沼骐一郎），原首相向其提出修改“民法中与我国古来醇风美俗不相容者”的咨询。⑪

政友会还组织了右翼团体，用以对抗工人运动、民主运动。早在1918年4月，就组织了可以称之为政友会的院外团的大正赤心团，到了1919年，东大为了对抗新人会，以上杉慎吉教授为中心成立兴国同志会，在早大校友之间成立了纵横俱乐部。8月，在床次

内相的斡旋下，关东、关西的右翼头面人物成立了大日本国粹会。

在这种背景下，1920年1月发生了森户事件。在上一年独立的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机关杂志《经济学研究》的创刊号上，登载了森户辰男副教授的论文《克鲁鲍特金的社会思想研究》，对此，兴国同志会大加攻击，发起了排斥森户运动。兴国同志会通过律师竹内贺久治同平沼检察总长取得了联系。⑫ 文部省对东大施加压力，经济学部教授会决定森户停职，随后内阁以其相当于新闻法的"紊乱朝宪"条款，决定对森户和编辑大内兵卫提起公诉，审判结果定为有罪。另一方面，经济、法律两学部学生召开大会，发表"要求学问独立"的宣言，并决议敦促经济学部教授会和山川健次郎总长反省。⑬ 兴国同志会遭到学生的责难而分裂了。

大选和两院纵断

1920年的第四十二届议会，由于群众站了起来，普选运动达到最高潮。首先，在关西，在友爱会领导人贺川丰彦和自由主义的议员今井嘉幸的号召下，于上年底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关西劳动联盟"。1月，在东京集聚了四十多个团体，成立了以宪政会议员大竹贯一为会长的全国普选联合会。友爱会等东京工人团体的主流，在警惕被卷入上述组织之下成立了"普选期成治安警察法废除关东劳动联盟"。⑭

在议会内，在野党的宪政会、国民党终于决定开始普选工作。这是为了对付民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兴起，由政党亲手给以普选来发展自党势力，以防止民众运动激进化，稳定统治体制的。宪政会提出了一揽子制定工会法、整理行政财政、调节物价的政策，国民党则主张删除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修改新闻纸法。但两党的普选计划没有统一起来。第二党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是在"感到与其被迫答应，莫如干脆主动给与"⑮的想法下决定开始普选

的，但加藤还是坚持以独立谋生为条件，尽管国民党和普选实行会作了让步，仍然拒绝妥协。

原首相对逐渐扩大选举权并无异议，但是却对阁僚说："按所谓的消灭阶级这种以试图打击现代社会组织为宗旨"来进行普选，那是非常危险的，并说："倘若根据群众的强制要求而造成破坏现代组织的形势，必将危害国家基础"。(《原敬日记》，大正 9 年 2 月20日)。他还认为，众议院也可以否决普选案，但只是否决了，普选运动在今后一年间还会发展，到下届议会时，在野党解散也不怕了。根据这种判断，才决定乘在野党步伐紊乱之际，先发制人，解散议会。

政友会的积极政策得到了资本家、地主强有力的支持。新兴实业家中，有不少人由政友会提名为候选人，或捐献了大量选举资金。采用小选举区制，对政友会起了极为有利的作用。政府将普选的危险性向有选举权者作了宣传。另一方面，出乎意料地遭到解散的在野党发生了动摇，特别是宪政会，缺乏从正面主张普选、同政府决一胜负的斗志。

政友会在 5 月 10 日的第十四次大选中取得了压倒的胜利。由于修改了选举法，议席增加了八十三席，共为四百六十四席，而政友会当选者增加了一百一十六名，共为二百七十八名，远远超过半数以上。宪政会减少了八名，为一百一十名，国民党减少二名，为二十九名。但是，在大中城市中，普选派却占了压倒的优势。城市的小市民本来是宪政、国民两党的地盘，在这次选举中，这种倾向显得更加明确了。

大选后，原内阁立即将铁道院升格为省，任命元田肇为第一任铁道相，原敬还把其兼任的法相职务让给了贵族院的大木远吉。原早就对贵族院进行了工作。贵族院中有爵议员占过半数，其余的都是内阁推选的敕选议员和多额纳税者的互选议员。在藩阀政治时代，官僚派的敕选议员控制着贵族院，但在有爵议员中也有接近

政友会的动向。原内阁组成后就对伯爵团和以子爵为中心的研究会进行工作。1919 年 8 月，二者联合成立的研究会，成了拥有一百三十九名议员的最大派别，明确表态支持原内阁。研究会干部大木的入阁，象征着原对山县系官僚势力控制着的贵族院进行工作取得了成功。

原对研究会的干部说："今后的政界，贵族和平民分离必将带来大害。贵族和平民共同维护稳健分子的势力，对国家来说是有利的。研究会一支持政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公正会等势力今天就会倒向宪政会"。(《原敬日记》，大正 8 年 11 月 28 日)。原敬并不是要推翻贵族院，而是采取把它保存下来，和其多数派合作的两院纵断政策。研究会和政友系的交友俱乐部明确表示支持原内阁，而男爵团体的公正会，以山县系官僚为中心的茶话会、由宪政会系的敕选、多额纳税议员组成的同成会则采取反对立场。由于后三者将办事处设在幸俱乐部，所以也称为幸三派。

在大选后的第四十三届特别议会上，在两院纵断政策上取得了成功的原内阁，得以逐步推行了积极政策。在扩充军备方面，为了建成海军的八八舰队、陆军的增设特科队和改良武器，增加了多达十几亿日元的跨年度费，军事费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919 年度决算，陆海军合计为六亿五千万日元，占总岁出的百分之四十八，1920 年度为七亿三千万日元，达百分之四十九。为筹措这些费用，对所得税和酒税实行了增税。为扩充产业基础，对于建设和扩充铁路、电讯、道路也需要增加巨额跨年度费，为此发行了公债。政友会将为开发地方的铁路建设作为扩张党势的武器，这种为一党营私的行为，是众所周知的。

原内阁的末期

选举战方酣的 3 月 15 日，白热化的战后景气，一变而为激烈

的战后危机，首先是股票行市猛跌。4月，从生丝、棉花、米开始，商品行情暴跌。5月，横滨的七十四银行歇业，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以铃木商店、久原商事为首的许多有名的商社遭到了严重打击，成了后来破产的原因。

原内阁答应财界的要求，积极救济财界。日本银行为缓和金融，不但对银行发放救济贷款，还对遭到挤兑的银行及其他各行业施行特别贷款。先前被动员来向中国贷款的大藏省存款部的资金，这次也被用来救济财界。救济财界的目的，在于维护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产业，但结果使那些因投机而遭到打击的不健全的企业存在下来，以致延缓了财界的整顿，削弱了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并且带来物价上涨和民众生活困难，遭到了舆论的批评。

到了1921年初的第四十四届议会时，原内阁的积极政策在财政方面出现了破绽。宪政会的财政通滨口雄幸就1921年度预算十五亿八千万日元中的增加部分二亿二千七百万日元，几乎都用在军事费上，指出如将临时军事费等也加上，本年度的公债募集额就达到四亿六千万日元之多，质问政府估计能够整理吗？尾崎行雄还提出了限制军备的决议案，虽然以三十八对二百八十五票被否决，但议会后，尾崎到各地进行宣传，却得到听众的强烈支持。但是，普选法案还是因为在野党步调不一致就轻易被否决了。

在这届议会上通过了对市制、町村制的修改。第一，删掉市町村议员的选举资格中必须缴纳地税或二日元以上的直接国税的条件，只要缴纳市町村税就可以了。因此，有选举权者从约五百万人增加到约七百五十万人。第二，以前是町村二级、市三级的等级选举，这里取消了关于町村规定，只保留市二级制了。因为原担心城市民众的动向，反对全部废除。(《原敬日记》，大正10年1月18日)。原敬早先计划的废除郡制案也通过了。这是作为地方自治

体的郡被废除了，郡只是行政区划了，郡公所仍然保留。

在野党提出满铁案件、关东厅鸦片案件和贪污案件，指责原内阁。陷于窘境的政友会则揭露宪政会总裁加藤，以不给党内普选派为条件，从造船暴发户内田信也那里接受五万日元的赠款，即所谓五个珍品案件，形成相互揭短。议会后，在这些案件之外，又揭露出东京市的贪污案。原多年来的朋友和他所推荐的人因与这些案件有牵连相继被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原首相以傲慢的态度对抗在野党，"最后依仗及党占绝对多数来扼杀在野党的责难作法，结果引起了人们对原敬的许多反感和憎恶"。⑯

在明治宪法之下，政府具有广泛的不经议会承认就可独自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力，议会权限很弱，原内阁对此没有进行丝毫改革。并且由于政友会占绝对多数，在野党的批判软弱无力，结果致使议会政治背离了舆论。

与此同时，宫中发生了某重大事件。先前内定久迩宫良子为皇太子妃，而久迩宫良子出自有遗传色盲的萨摩岛津家，对这件事的可否，宫中和政界的上层在对国民极端保密之下进行了讨论。山县有朋让前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任宫相，强烈主张取消内定的婚约，西园寺、原首相也表示同意，但是，久迩宫家和萨派以"纶言如汗"为由反对取消婚约，头山满等右翼表示支持，并攻击山县，事态变得严重了。结果在2月，由中村宫相个人负责，公开表示内定婚约不能更改，才把这个事件平息下来。中村宫相辞职后由萨派的牧野伸显继任。山县奏请辞掉一切官职和荣典，天皇加以慰留，但其权势减弱了。右翼还对皇太子裕仁出国访问表示反对，但皇太子还是从3月3日起乘军舰香取号前往欧洲，考察英国、法国等，于9月3日回国，11月25日，因大正天皇患脑病，皇太子就任摄政。

原敬从1920年秋就考虑内阁总辞职，并试探山县的意向。当时群众运动正在兴起，山县一直依靠原敬，故表示反对。原敬向山县

表示，他辞职后，不愿意政权落入反对党手里，宪政会总裁加滕一旦组阁，实现普选，将招致混乱。原敬似乎打算宁肯成立以山县系官僚为首相的贵族院内阁，让政友会做后援，然后再由政友会组阁。这说明原并不希望由复数政党轮流组阁的政党内阁制度。

1921 年 9 月，一代之间创立了安田财阀的安田善次郎，被诡称律师的朝日平吾刺死，朝日也当场自尽。朝日曾经是大陆浪人，自称是神州义团团长。他给北一辉等人的遗书中，抨击君侧奸人遮蔽了"日本臣民乃朕之赤子"的君德，勾结奸商富豪，凌虐贫民，致使正义和爱国心消失；主张应该消灭奸商富贾、显官贵族和现有政党，实行普通选举，平均财富；为此提倡一人一杀的警世天诛。这是反手利用天皇权威，攻击统治阶层，把它转到一人一杀的实际行动上来了。⑰

接着，11 月，原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身亡。现任首相被暗杀这还是第一次。犯人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冢车站职员中冈艮一，但没能查清背后关系。⑱ 原敬死后，高桥藏相受命组阁，保留内阁原班人员，成为第四代政友会总裁。

① 日本银行调查局的《世界战争结束后我国财界动摇史》，见《日本金融史资料明治大政编》第 22 卷，444 页。

② 金原左门《大正时期的政党和国民》，第 211—213 页。

③ 普选期成同盟会的干事、当天示威的副指挥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大正 8 年 3 月 15 日）社论中，称之为"日本最早的大示威运动"，并写道："原来我国政府和警察历代的方针是，讨厌群众组织具有政治意味的团体和进行街头行动。因此，政府和警视厅对这次行动也进行了种种干涉。文部大臣训令各校应阻止学生参加普选运动。……幸而这时主办者坚决拒绝了这些条件。……示威游行如主办者预定那样，是完全自由进行的……因此，警察今后对这类运动就丧失了干涉的口实"。（《石桥湛山全集》第 3 卷，1971 年，28—30 页）。

④ 木佐木胜（《中央公论》记者）《木佐木日记》第 1 卷，1965 年，大正 8 年 12 月 25 日项下。

⑤ 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1972 年，180—189 页。

⑥ 原也对枢密院的审议写道："审议四十多天（6 月 26 日提交该院），并没有什么

反对的意见，浪费了这么多时日，实在令人吃惊。”（《原敬日记》，大正8年8月8日。可是新闻记者马场恒吾这样说：“原内阁所以如此受枢密院刁难，是因为原内阁背后没有群众的力量。原内阁应当把群众作为友方，借助群众力量对抗枢密院才行”。原说：“那种议论可不得了，利用群众的势力，来对抗枢密院，那是革命，我不能赞同。”（《原敬论》见《现代人物评论》1930年，120页）。

⑦ 与此同时，总督发出告示，结尾写道：“如有不逞之徒，造谣惑众，扰乱民心，破坏治安者，依法严惩不贷。”（《子爵斋藤实传》第2卷，438页）。

⑧ 大岛清《高野岩三郎传》，1968年，115—123页。

⑨ 山县在评论原首相对罢工怠工的处置时赞扬说：“原实在了不起，电车、钢铁厂都安定下来了，原的作法了不起。” 冈义武·林茂校订《大正民主时期的政治——松本刚吉政治日志》，1959年，大正9年3月1日。

⑩ 金原左门《大正时期的政党和国民》，174页以下。

⑪ 矶野诚一《修改民法》，见《讲座日本近代法发展史》2，1958年，275页。

⑫ 《关于我国最近的国家主义及国家社会运动》（《司法研究》第19辑10），1935年，112—113页。

⑬ 宫地正人《森户辰男事件》，见我妻荣等编《日本政治审判史录·大正》，1969年，239—251页。

⑭ 松尾尊兊《第一次大战后的普选运动》，见井上清编《大正时期的政治和社会》，176—194页。这里注意到期待堺利彦组成工人政党。

⑮ 伊藤正德《加藤高明》下，1929年，338页。

⑯ 冈义武《转变时期的大正》，155页。

⑰ 久野收、鹤见俊辅《现代日本的思想》1956年，119—123页。

⑱ 联系宫中某重大事件，可能与右翼有关，但不确切。可参照雨宫昭一《原敬事件》，收在我妻等编《日本政治审判史录》和长文连《暗杀原首相的真相》，1973年。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和西伯利亚撤兵

大战后的中国和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已将兵力配置到北起西伯利亚、中经“满洲”、山东半岛，南到赤道以北的原属德国领有的南洋各岛的广大地区，扩张了势力。但是，这是强行乘着第一次大战的爆发和扩大、俄国革命和武装干涉以及中国内部的军阀混战这样的国际形势，才作得到的。所以当大战结束，国际形势一发生变化，日本就不得不节节后退。

1919(大正8)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日、英、美、法四国银行家达成协议，组成对中国的新四国借款团。这是一个包括了这样内容的计划，即根据上一年10月美国为了对抗西原借款而提出的建议，将对中国的政治借款、经济借款都作为借款团的共同事业，各国银行团现有的合同或优先权凡是没有着手的事业，也都提供给四国借款团。这样一来，日本根据二十一条要求和西原借款所获得的敷设铁路优先权也纳入到这里来了。

日本面对美国的资本攻势，单独对抗是困难的，于是加入借款团，以便在全中国扩大经济活动。日本想把"满蒙"除外，提供山东的优先权，交换条件是要英国提供长江流域、法国提供南部中国的优先权。日本这种"满蒙"除外的要求，引起了各国的强烈反对，谈判拖延了。1920年5月，日本答应提供山东二铁路、另外还有洮南、热河铁道和从这里某一地点到海港的铁路优先权，新四国借款团才告成立。日本放弃了东部内蒙古的优先权，只得把"南满洲"的权益列为借款团对象之外。

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处于崩溃状态。1919年2月，南北和平会议一召开，各国商定，直到统一政府建立之前，禁止提供政治借款和供给武器、军需品。7月，陷于困境的北京政府要求四国借款团给以财政援助，也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出要求。皖派势力想以日中直接谈判来结束山东问题，以此得到日本的援助。①由于原首相的意图是为对付中国的排日运动，表面上努力同各国保持协调，但"在暗中则采取彻底援助亲日派使不失望的方针"(《原敬日记》大正8年6月19日)，内阁会议决定：如果9月还不能实行借款时日本就答应单独借款。当1920年2月，四国共同提供五百万镑贷款时，日本马上就预先借给九百万日元，以维持北京政府的局面。

同年7月，段祺瑞、徐树铮等的皖派与曹锟、吴佩孚等的直

隶派之间发生了直皖战争。② 北京政府的总理靳云鹏虽为皖系军人，但接近直隶派，先前援段而当上东三省巡阅使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靠近直隶派。③ 以日本武器装备起来、受日本军人训练、并靠日本借款来维持的边防军（由参战军改称）三个师的皖派，想通过战争打开局面。日中两国早就发表过声明，在内战中不使用边防军。但是，这时，日本政府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不反对皖派使用边防军，只是命令担任训练的日本军官不参与内战。事实上是援助了皖派。于是中国追究日本责任的呼声高涨起来。

可是，战争一开始，张作霖与直隶派相呼应，从背后攻击了皖派。皖派大败，边防军溃灭。徐树铮等所谓皖派九祸首亡命日本公使馆。进入北京的直派，一面要求惩办以段为首的皖派要人，一面释放了皖派逮捕的学生。皖派的垮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日本对内战的介入，更助长了排日舆论。

从东三省把势力扩张到中央的张作霖，强烈希望得到日本的援助。原内阁为了领有朝鲜和经营"满洲"，也采取了支持张以便维持和扩大日本势力的方针。

恰在此时，在同朝鲜接壤的间岛地方，朝鲜人的独立运动活跃起来。日本本想进行武力讨伐，但当时的形势，日本一旦出兵显然会演成严重的国际问题。于是日本策划以日本军人为顾问，指挥中国警察队，同中国共同讨伐，但始终没有实现。

1920 年 10 月 2 日，间岛地区的珲春日本领事馆遭到土匪袭击而全部焚毁，日本人和市内的中国人、朝鲜人遭到杀伤。日本政府宣布，这是"不逞鲜人"和"过激派俄国人"勾结土匪制造的事件，立即出兵，并迫使张巡阅使签订日中共同讨伐的协定。说是共同讨伐，实际是由日军单独讨伐到 11 月底，④ 还让从西伯利亚撤回日本途中的第十四师团的一个旅团登陆，在珲春方面采取示威行动。日军以讨伐的需要为理由，烧毁教会、学校、村落，惨杀了很

多朝鲜人、中国人。中国人民掀起了激烈的反日运动，在日本方面也成了问题。日军于1921年4月，从该地撤退。

西伯利亚的战败

1919（大正8）年春夏之际，俄国反革命军在协约国的援助下，频繁发动攻势。在西伯利亚西部，以高尔察克提督为主席的鄂木斯克政权得势。但不久，苏维埃政府的势力再度兴盛起来。年底，鄂木斯克政权垮台，高尔察克在第二年初被捕枪毙。协约国也对苏的武装干涉失掉信心，渐渐开始撤兵。

1920年1月，美国声明从西伯利亚撤兵，英国、法国亦效仿美国。捷克军也在三月底前回国了。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反革命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了，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实权。援助捷克军的出兵目的不存在了。

日本政府企图以新的理由驻兵。3月，以布尔什维克的扩展威胁了朝鲜、“满洲”为理由，采取了将兵力集中在中东铁路沿线、沿海省南部，来“防止过激派的行动”的方针，接着以保护西伯利亚的侨民和确保朝鲜、“满洲”的安全为理由，声明继续驻军。4月1日美军一撤退，日军就向海参崴临时政府提出了取缔反日活动等条件的强硬要求。出乎预料之外，临时政府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日军在签字的前夜即4日的夜间，以遭到射击为理由，突然袭击西伯利亚东部各地的俄军，并解除其武装。

西伯利亚的革命势力，于4月6日发表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远东共和国宣言，将这个共和国作为苏维埃俄国同日本之间的缓冲国，以此避免同日军的冲突。5月15日，苏维埃俄国对此表示承认，接着和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发生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事件。当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反攻蓬勃发展时，占领库页岛对岸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引起

居民反感的日本军队，在这年的 2 月，被地方游击队包围起来。日军根据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第十四师团长的命令，与对方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日军于 3 月 12 日拂晓突然袭击队长托里阿帕金的司令部，激战之后，剩下的日军投降了。5 月末，日军援军一来到，托里阿帕金就杀害了狱中的反革命派和日本人俘虏，烧毁市镇之后撤退了。战死或被杀害的日本军人、侨民达七百多人。

日军为了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残暴，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广泛地利用了这次事件。7 月，日本政府发表了在本事件得到解决之前保障占领北库页岛的声明。另方面，革命派方面追究了这个事件的责任，在审判之后将托里阿帕金等处死，⑤ 同时，也揭发日军残杀游击队军使等的非法行为。

撤退西伯利亚派遣军，由于参谋本部的强烈反对而搁浅了，8 月才开始从外贝加尔州撤退，从 10 月到年底才撤出哈巴罗夫斯克。⑥ 但是继续占领沿海省南部和北库页岛。在1921年初召开的第四十四届议会上，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质问政府，主张从西伯利亚撤兵，而原首相和田中陆相则大谈共产主义的威胁，强调出兵的理由。2 月，远东共和国召开宪法会议，实现了贝加尔湖以东俄国领土的统一。5 月，原内阁召集殖民地长官、驻华公使、关东军司令官，举行东方会议，决定为“巩固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援助张作霖的方针。接着在海参崴发生了日军支持的政变，建立了傀儡政权。但其后不久，美国就指责日本有永久占领的意图，并警告日本政府，根据占领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权利概不承认。

华盛顿会议

1921（大正10）年 7 月，美国政府向日、英、法、意四国政府非正式建议，召开限制军备以及讨论远东、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遭到严重打击。与此相反，日本却得到

迅猛的发展，而美国也爬上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因此，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成了帝国主义对立的焦点。另方面，在侵略中国上曾是日本伙伴的帝俄，被苏维埃政府所代替，其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的卡拉罕，于 1919 年 7 月声明，废除帝俄从中国获得的特权和不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

如上所述，日本和美国之间在扩建海军方面展开了空前的大规模竞争，英国也被卷了进来。1920 年发生战后危机，巨额的建舰费用就成了这些国家的沉重负担。美国想乘此情况裁减海军，并抑制大战以来日本的扩张，以确立各帝国主义国家间新的均势。

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有围绕日本的悬案问题。上面提到过的山东问题、西伯利亚出兵之外，还有到1922年 7 月满期的日英同盟的继续问题。英国认为，由于德国的败北，日英同盟对英国来说已是无用之物了，并和国联章程也有矛盾。日本则希望重新订约，但中国认为该条约成了日本的侵略武器，反对继续留存下去。在 1921 年 6 月召开的英国帝国会议上，加拿大强烈主张废除，提出了用有关各国就太平洋问题进行协商的办法来代替日英同盟。这成了走向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阶段。⑦

日本对讨论远东、太平洋问题怀有戒心，但还是参加了华盛顿会议。由于加藤友三郎海相任全权代表，原首相管理海相事务，是向军部大臣文官制靠近了一步，但原在会议前夕被暗杀，组成了高桥内阁。参加裁减海军会议的国家是英、美、日、法、意五国，参加讨论远东、太平洋问题的国家，除上述五国外，还有中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共九国。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及中国的广东政府没被邀请。苏维埃俄国发表声明，对此提出抗议，并表示对会议的决议保留行动的自由，广东政府也声明不承认会议通过的所有决议。

华盛顿会议于 1921 年 11 月 12 日开会。美国国务卿休斯破

例地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一开始就提出了包括废除建造中的主力舰和腐朽化战舰，十年内停止建造主力舰的爆炸性提案。这个提案以其"大胆而彻底和强有力地诉诸美国舆论，使人们有各国接受这个提案是合情合理的，谁反对它就是反对正义似的感觉。"⑧日本加藤全权代表原则上欣然接受休斯的提案，但关于主力舰的比例问题，主张把休斯提案的10:6改为10:7。美英两国步调一致，不肯让步。结果，在美英承认太平洋的防备，即维持军事设施现状的情况下，日本同意了10:6之比。加藤全权代表从"如果没有真正充实的国力，不管有什么样充实的军备也不能发挥作用"⑨的见地出发，压制了坚持10:7的强硬论者的全权顾问加藤宽治中将，由自己负责，接受了美国提案。

这样签订的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法、意主力舰的比例为10:10:6:3.33:3.33，航空母舰大体上也以同样比例限制各自的保有量，还决定原则上今后十年内不建造战舰。条约的期限是十五年。

同时，还讨论了日英同盟、中国、西伯利亚问题。关于日英同盟，日、英、美、法四国间，缔结了关于太平洋方面各岛屿的属地及领土的四国条约，规定缔约国间互相尊重既得的权利。从该条约自1923年8月17日生效起，历经二十余年的日英同盟结束了。

关于中国问题，中国代表提出了包括公布、审查各国的特权、利益和废除对中国的政治、司法、行政自由的限制等十条要求，但没有被接受。而美国全权代表卢特，起草了四条原则，即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的完整；为中国能够独立维护其强有力的稳固的政府提供最大的机会；维持在中国的机会均等主义；不承认削弱友好国家人民权利的特权，并为此缔结了有具体措施规定的九国公约。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传统主张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但这也没有限制了各国在中国的既得权利。

中国要求增加关税。但是，关于中国关税的条约，也只约定承认提高到从价百分之五和迅速召开关税会议而已。

关于山东问题，因为九国中有六国是凡尔赛条约的签字国，所以中日两国在会外直接进行谈判，英美以观察员的身分列席会议。日本答应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但交换条件是要求日中合办山东铁路。因此交涉不得进展，结果是中国以铁路为担保，用十五年分期偿还的公债买回山东铁路，在未偿清前，任命日本人为运输主任，另外还选用一名日本人为会计主任，矿山则以日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而日本在占领青岛期间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中国还要求日本、英国、法国尽快归还租借地，尤其要求日本研究取消二十一条条约问题。倘若取消了二十一条，关东州的租借期限到第二年即 1923 年就满期了。日本只是作出放弃向“南满洲”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的优先权等若干让步，拒绝了中国的要求。

关于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早就向日本提出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但日本没有答应。可是到了 1921 年，英国和苏维埃缔结了通商协定，其他各国也开始了通商谈判。日本也在华盛顿开会之前，同苏维埃开始了谈判。 8 月，同远东共和国及苏维埃代表在大连举行会议，但因日本要求西伯利亚的权益及限制军备，致使谈判拖延。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代表不得不发表声明，对西伯利亚没有领土野心，谈判一旦成功就撤兵。

西伯利亚撤兵和援助张作霖

日本被迫从中国及西伯利亚后退，便想通过援助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满蒙”为中心扩张势力。当时中国正处在南北两个政府对立时期，北方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互相对抗，在这

种均势上建立了靳云鹏内阁。可是，正当华盛顿会议开会期间，1921年12月，靳内阁在张的压力下倒台，由旧交通系的财政通梁士诒组阁。梁一组成内阁，就取消了逮捕逃亡到日本公使馆的皖派要人的命令，从而遭到指责，在山东铁路的谈判中，又主动接受了日本的主张，因而也遭到抨击。⑩

张、吴的对立激化了。1922年4月，为对抗奉系军阀的入关，吴佩孚军队北上，爆发了第一次奉直战争。张的军事顾问本庄繁大校，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等，强烈请求援助张作霖，但外务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使内阁做出不许担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军人参与有关时局事务的决定。原来日本援助张作霖的政策，只限于巩固张在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这是出于这样的判断，即："日本是张作霖的后台这种感觉，在外国人特别是英美人中间已经成为传统印象"，如果援张扩张到中央，就会使中国的排日运动愈来愈高涨，并将再次同英美形成对抗的形势，这反而对日本不利。⑪

同远东共和国进行谈判的大连会议，1922年4月决裂了。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声明从西伯利亚撤兵的日本，处于不管谈判如何不得不撤兵的立场，6月，日本政府声明，10月末以前从北库页岛以外的地区撤兵。9月，同远东共和国及苏维埃代表在长春举行了会议，但由于日本反对从北库页岛撤兵，月底会议再次决裂。日军于10月末以前除北库页岛外，从西伯利亚撤完了军队。同时，也从北满、山东省、汉口撤退了军队。日军本想把海参崴堆积如山的缴获武器交给反革命政权，但因反革命政权处于崩溃状态，不得不交给远东共和国方面。11月，远东共和国同苏维埃俄国合并，不久苏维埃联邦成立了。

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战争，是日本头一次碰到的人民战争。四年多的战争，由于要求解放的西伯利亚人民的顽强抵抗，以日军惨败而告终。不仅白白耗费了六亿日元战费，而且还因军纪败坏，

丑闻不断出现。⑫不只是国内公开要求撤兵，而且进入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还对前线的日本兵进行了反战宣传。但是，日本统治阶层，尤其参加武装干涉的日本军人，因败退而深感痛心，对俄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更加仇恨了。

长春会议由于发生了捷克军的武器丢失事件而演成了问题。日军在海参崴管理着庞大的缴获武器，其中有捷克军从西伯利亚撤退时寄存的十九车箱武器。可是1922年8月，根据捷克方面的希望进行清点时，发现武器丢失了。负责人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原净一少校被提交军法会议，他承认擅自将这些武器供给反革命军了。当时张作霖曾强烈要求日本供给武器。但北京外交团决议禁止向中国输出武器，日本也受此约束。因此，张向海参崴日军加强活动，要求转让武器，于是这些缴获武器也许流入张作霖之手的疑惑传播开来。

在直奉战争中日本军事顾问继续活动的情况下，发生了这起武器丢失事件，因而引起了军部不经过外务省而另外推行的所谓双重外交的责难。在外务省也以少壮派外交官为中心掀起了粉碎双重外交的运动。7月，内阁会议决定，现役军人应聘任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军事顾问时，要事先取得外务省的同意。⑬吉野作造批评道："使实力强大的军阀，竟对软弱的政府都越来越抬不起头来，可见时势变化之大"。⑭

这年的9月，废除了外交调查会，但与此同时，在特权势力中间开始出现了抨击政府的协调主义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动向。12月，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决议，签订了关闭在华邮局的日中邮政协定，但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邮局暂时维持现状，认为还有可能成为两国间交涉的题目。对此，枢密院表示反对，认为未经咨询就签字是不对的，向摄政弹劾了政府。以此为契机，在1923年初召开的第四十六届议会上，贵族院通过了近卫文麿公爵等提出的要求

确立对外国策的决议案，对加藤友三郎内阁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正好在3月，中国政府发来了废除二十一条条约的通知。当日本政府拒绝这个通知时，在中国掀起了排日运动。

① 小野信尔《五四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5现代2》，1970年，第370页。

② 藤井升三《围绕1920年直皖战争的日中关系研究》，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关系的发展》，1961年，第56—62页。

③ 关于这一期间的张作霖的活动，见林正和《张作霖军阀的形成过程和日本的对策》，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外交和舆论》，1970年，134—135页。

④ 关宽治、藤井升三《日本帝国主义和东亚》，载《岩波讲座世界史25现代2》第533—534页，这个事件还有一说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出兵间岛而施展的策略。姜德相编《现代史资料(28)朝鲜(4)》(1972年)，收集了关于珲春事件的详细史料。

⑤ Morse &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II, 1931. p.490. 关于事件的全貌，见井上清《新版日本军国主义II》，1975年，第278—281页。

⑥ 这时参谋本部以先前的省部业务分担规定为依据反对撤兵，与陆军省对立。原首相劝田中陆相改革参谋本部时说："军阀军人同国民形成毫无关系，将来必将成为我国国防上的严重祸根"。但是"陆军的改革，端赖陆军内部有了改革者方能奏效，由别人来改革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利用社会攻击军阀的呼声，借助其势力时，也不是不可以由别人进行改革，只是这样做时，陆军固然可以改革了。而将来的陆军有变得软弱无力的危险。"(《原敬日记》，大正9年8月10日)。田中豁出丢掉官职只作到了从伯利撤兵。

⑦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179—182页。

⑧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华盛顿会议限制军备问题调查报告》，1976年，1页。

⑨ 小林龙夫《海军裁军条约》，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I》，1963年，28页。

⑩ 太宰松三郎《满铁调查资料第十五编中华民国第十一年史》，1923年，37—57页。

⑪ 《关于对奉直战争的态度》，大正11年4月22日内阁会议决定，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1955年，22—23页。

⑫ 吉野作造《青年军官看到的西伯利亚出征军的实际状况》，《中央公论》大正11年5月，松尾尊允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1976年，331—346页。

⑬ 《聘我现役军人为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顾问事》，大正11年7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1955年，25—26页。

⑭ 吉野作造《二重政府和帷幄上奏》，1922年，《吉野作造民主主义论文集》3，1947年，29页。

第三节　工农运动和政府的对策

神户工潮

战后经济危机一发生，解雇和降低工资等的资本攻势就加紧了，工人运动被迫处于守势。雇用十五人以上的私营工厂的工人数，从1919（大正8）年末的一百四十八万人降为1920年末的一百三十七万人，一年之间就减少了百分之七点三。当时已经是工人运动中心的造船业、金属矿业等，因经济危机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与大战末期最繁荣时比，造船工人五年间减为五分之二，矿工竟减为四分之一。[①]1920年劳资纠纷锐减，要求条件也都是一些反对降低工资、反对解雇等防守性的，但工潮本身深刻化了，纠纷时间有长期化的倾向。

在通货膨胀中急剧增加的粗制滥造的工会组织，在资本攻势下纷纷垮台，坚强的工会组织也遭到打击。正因为这样，才痛感到有把工会集结起来的必要。1920年5月2日（星期日），在东京的上野公园，由友爱会、信友会等十五个团体召开了有四千工人参加的日本第一次五·一劳动节集会。集会通过决议，要求废除准备实施的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防止失业，制定最低工资法，还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实现公费教育等。并趁庆祝五·一劳动节之机，结成了工会的同盟组织。在关东是劳动组合同盟会，在关西则是关西劳动组合联合会。

在实现普选遥遥无期，战后经济危机中资本攻势加强的情况下，工人重视直接行动，主张用总罢工来废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势力有了发展。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官宪的镇压下，同官宪的冲突不断发生，也发生了破坏机器的事件。强调工人自发性和自由联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同重视工会团结的友爱会干部的

对立表面化了。友爱会东京联合会主事棚桥小虎在该会机关刊物《劳动》杂志（1921 年的 1 月号）上，批判了轻率的直接行动，呼吁“回到工会来！”但招致青年活动家的反对。3 月开始的足尾铜矿的罢工，也由于矿工总联合的负责人麻生久担心因公司的挑拨而爆发起来，经奔走交涉，达成妥协。但这招致工团主义的不满，发生了排斥知识分子领导的动向，工会内部的对立激化了。6 月，友爱会脱离劳动组合同盟会，在 7 月的该会东京联合会大会上，棚桥主事被迫辞职。此外，在这年秋天的友爱会大会上，从会名中删去了友爱会字样，改为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

1921 年春夏之交，以关西地方的重工业大企业为中心，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工潮。以 4 月的大阪电灯工潮为开端，连续发生了大阪的藤永田造船厂、住友三厂（电线、铸钢、抽铜）等的工潮，从 6 月下旬到 8 月中旬，神户的川崎、三菱两造船厂也发生了大规模工潮。包括战前最大工潮的川崎、三菱争议在内的这一系列劳资纠纷，是日本工人运动的一个顶峰，也是转折点。

这些工潮受到以贺川丰彦为理论指导者的友爱会的神户、大阪、京都各联合会的领导和支援，工长级的熟练工人在这些联合会中起到核心作用。他们的主要要求是获得团体谈判权，实现以此为基础的产业民主。这些工潮超越了个别企业以经济要求为中心的斗争范围，发展成为把团体谈判权这样的权利问题提到面前的“工人对资本家的一次大决战”。起首，大阪电灯、藤永田造船厂的纠纷，在友爱会的强有力的支援下，公司方面不得不承认团体谈判权或者设置工厂委员会。但是，要求承认以地区工会为背景的团体交涉权的川崎、三菱工潮一发生，政府、资本家都害怕这类斗争席卷全国，便采取强硬态度来对付了。公司关闭工厂，解雇工会活动分子；工人方面则宣布管理工厂，进行对抗。县当局就请求姬路的第十师团出兵，对工潮进行镇压和干涉。假借参拜凑川神社形

式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警察队发生冲突，工人代表团和神户联合会的干部全被逮捕，工人代表团不得已发表失败声明，决定上班干活。②

这次工潮是最先进的大企业的工人，想以团结的力量，获得工人基本权利的一场正面斗争。但是，政府和资本家竟以武力镇压来对待，工潮之后又全部解雇了各工厂的工会活动分子。布施辰治、山崎今朝弥等有志律师，组成自由法曹团，以对抗对人权的蹂躏。

以川崎、三菱工潮失败为分界线，友爱会员被神户的大企业排斥于门外。从全国范围来看，几乎所有大企业中独立的工会组织都消声匿迹了。为适应团体谈判权的要求而建立的工厂委员会，在没有独立工会组织的情况下，只能是个单纯的沟通思想的机关，起不到代替团体谈判的作用。在关西地方，贺川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也下降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活动显著增加。

社会主义者开始展开了新的运动。1920 年夏，律师山崎今朝弥为了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同盟。以堺利彦、山川均等马克思主义者和大杉荣、岩佐作太郎等无政府主义者为首，再加上友爱会、信友会等工人组织，新人会、晓民会、建设者同盟等学生团体，平民大学、文化学会等文化团体的代表，响应山崎今朝弥的倡议，建立了筹备会，于 12 月，抢在预料中的禁止结社之前，建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工团主义占据优势。参加者包括各府县、朝鲜、台湾达一千多人。置身于群众团体之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国性的组织成立了。该同盟在高压之中坚持活动，但第二年的 1921 年 5 月，由于禁止结社而停止了活动。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于 1920 年 10 月(原文如此——译者)在上海召开了由共产国际主持的远东社会主义者大会，堺、山川出于警惕没有出席，大杉参加了。大杉领取了运动经费后回国，

吸收近藤荣藏、高津正道等青年布尔什维克，发行了《劳动组合》。另方面，山川均、菊荣夫妇则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研究和介绍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山川、堺等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于1921年4月建立共产国际日本支部筹备委员会，各个负责人分别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③ 正好这时，俄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无政府主义，大杉等转而攻击苏维埃俄国，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论战激化了。

5月，近藤荣藏去上海，同共产国际联系，通过朝鲜革命家李东辉，领取了运动经费，但在回国途中，由于近藤不慎被发现，共产国际支部成立计划遭到挫折。但是，10月，从法国回来的和共产国际有联系的小牧近江等发行了《播种人》，接着搞起了救济俄国饥馑运动。近藤同高津等的晓民会合作，散发反战传单而被捕，当局宣传为晓民共产党。

日本农民组合和全国水平社

战后经济危机对农业给以深刻影响。米价从1920年3月的每石最高五十五日元，到该年12月下降为二十八日元，正好下降一半。茧价也因生丝的暴跌而猛跌。经济危机开始时，春茧市价一贯为八、九日元，不久又跌到四日元左右，夏秋茧就更低了。在大战景气之中进行小商品生产的农民，受到沉重打击，因此要求地主减轻高率实物地租的租佃纠纷增加了。

租佃纠纷从大战时就已经在接近工业地区的岐阜、爱知、兵库各县为中心有所增加，而战后经济危机扩大的1921年，猛增为一千六百八十件，相当于上一年的四倍，后来直到1926年，纠纷件数、参加人员年年增加。这个时期的纠纷集中发生在以农民的小商品生产发达的近畿各县为代表的西日本一带，在带头进行小商品生产的自耕兼佃耕的中农的领导下，集结了包括佃耕贫农在内的

广大的农民阶层，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

在租佃纠纷激增的情况下，于 1922 年 1 月创刊了日本农民组合机关报《土地与自由》，4 月在神户市的基督教青年会馆召开了日本农民组合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贺川丰彦起草的宣言、纲领和宗旨。宣言主张互助和友爱，反对暴力，呼吁农民团结和解放；纲领主张"我等农民希望培养知识，磨练技术，涵养德性，欢度农民生活，发扬农民文化"，"我等农民以稳健着实、合理合法的方法，期待实现共同的理想"，于是，在各地从事组织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加入进来，他们在"确立租佃立法"和"耕地社会化"中，看到了"农民文化的成就"。

日本农民组合在串连分散的农民团体、活动分子，扩大农民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成立时是十五个组合，到年底已有九十六个组合，1923 年末达三百零四个组合，24 年末增加到六百九十四个组合。日农成立半年之后，以总同盟的赤松克麿、建设者同盟的大西俊夫等为核心，组成了日本农民组合关东同盟，并加入日农，促使其急速进展。日农在各地提出永远减少地租百分之三十的要求领导斗争，并制出每一"段"土地的收支计算表，指出其根据，佃农也要求作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给予公正的评价。由于租佃纠纷如此发展，以西日本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地租开始减低了。

对此，警察当局修改府县令，加强镇压，地主方面也建立组织，起来反击。佃农要求法院在收割之前禁止进入耕地，或扣押青苗的临时处分，以此为对抗。被剥夺了收获的佃农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但法院总是作出对地主有利的判决。

面对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地主的进攻，农民组合要求制定以耕作者为中心的租佃法和扩大农民的政治自由。

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在大战中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对大米的需求也增大了，而地主制下的零

散的个体农民的农业生产力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这就成了米骚动时所看到的米价高涨的原因。此外，地主制的农村也是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女工的来源，但由于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和高度技术化，工人阶级也成长起来，这样一来就引起资本重视增加大米的供给和稳定低廉米价来了。

在政府中也出现了必需保证耕作者一定程度的耕作权以稳定农村秩序的意见。1920 年，农商务省建立租佃制度调查委员会，接着石黑忠笃干事(农政科长)提出了租佃期为十五年以上的保护耕作者的租佃法研究资料。但是因为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搁置起来。④ 取而代之的是准备了租佃调停法，并于 1924 年公布。它不是通过明确地主与佃户之间的权利义务来解决问题，而是仍然将佃户置于无权地位，用租佃官、郡长、村长们的调停来平息纠纷。⑤又，1926 年施行了建立和维持自耕农的补助规则。这是把简易人寿保险公积金以低利息贷给佃户，使其买得土地变为自耕农，以便缓和租佃问题的办法。它也为地主以较高的价格抛卖土地开辟了道路。最大的地主天皇家族，担心纠纷造成坏影响也出售了耕地。⑥

战后经济危机米价暴跌时，根据地主的要求，制定了粮谷法，但这是以调节大米供求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另方面，促进垦荒、治理河川，特别是在朝鲜开始施行大米增产计划，大米的输入增加了。但这是肩负了沉重的土地改良费用的朝鲜农民的勒紧裤带的输出的结果，日本人地主一昧地兼并土地，移居日本的朝鲜劳动者急剧增加。

日本农民组合建立前一个月的 1922 年 3 月 3 日，以被歧视部落民的自主解放为目标的全国水平社，在京都市公会堂举行了成立大会。根据 1871（明治 4）年的解放令，取消了被歧视部落民的“秽多、非人”的称号，应该说在法律上没有身分上的差别了，其

实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非常恶劣，在结婚、就业等各个方面受到露骨的歧视，成为侮辱、迫害的对象。

米骚动时，被歧视部落民在许多地方站在运动的前列，这使统治阶级深感有研究部落对策的必要。1919年2月，在东京筑地的本愿寺分院召开了第一次同情融和大会。这种融和运动的目的在于防止因歧视部落造成阶级对立的激化，是把部落民定为劣者、弱者之后，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教化"，来加以"改善"的，引起了部落民群众的不满。

从俄国革命和米骚动开始的民众运动的高涨，提高了被歧视部落的青年的觉悟，促使他们用部落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解放运动。这时，早大教授佐野学在1921年7月号的《解放》上发表了《特殊部落民解放论》一文，论述了为了部落的解放，首先部落民自己必须团结起来，要求废除不合理的社会地位，但最终目标还是要和经济上的弱者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一道改造整个社会。这是在废除身分差别这类民主主义问题上，社会主义者首次指出的解决办法。

老早就追求部落解放并建立了燕会的奈良县南葛城郡掖上村柏原的青年们，在佐野论文的启发下，向建立全国水平社的方向突进。在其创立宣言开头写道："分散在全国的我特殊部落民团结起来！"规定自己是"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虐待的兄弟们"的"通过尊重人格来进行自我解放的人们的集体行动"，最后以"我们以秽多而自豪的时候到来了。""热爱人世啊！光照人类啊！"结束了宣言。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民第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人权宣言。

接着，在奈良、京都、崎玉、三重、大阪、爱知、兵库各府县建立了地方水平社，一年后三府六县成立了六十个组织，二年后三府二十七县成立了三百个组织。运动初期采取了对歧视行动进行彻底揭露的战术。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忍受歧视的部落民的愤怒的爆发，起到提高觉悟的作用。但是，这也使没有摆脱掉偏见的民众增

加歧视心理和恐惧心，官宪和当权者对此加以煽动，反而用来攻击解放运动。1923 年 3 月，国粹会介入奈良县都村的揭露斗争，涉成武装冲突；1925 年 1 月，在群马县世良田村发生了反对揭露的普通村民捣毁部落、造成流血的事件。在这样的冲突中，部落民方面受到了不公正的过重处罚。

在这样斗争中，人们认识到比个别歧视言行更重要的应该是形成歧视观念基础的社会结构，提出了应加强水平社的组织，同无产阶级一道开展部落解放运动的主张。1923 年末，遵照这样的方针，建立了全国水平社青年同盟。然而，在现实中还有不少的工人、农民怀有歧视观念，这个方针就不一定能够顺利地被接受过来，因此引起了全国水平社内部的对立。另方面，同在日朝鲜人等被歧视的民众的联系加强了。1926 年制定的暴力行为等处罚法，本来是为了镇压揭露斗争的，但揭露斗争的重点转到以军队为主的权力机构的歧视上面去了。⑦

改组统治体制的活动

在 1922 年到 1923 年间的阶级斗争、民主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形势下，在国际上有华盛顿会议和日本从西伯利亚、中国撤兵，在国内则有原敬和山县有朋之死，明显地出现了拉拢小市民阶层谋求改组统治体制的动向。

《东洋经济新报》(大正 10 年 11 月 26 日)，对高桥是清内阁的组成发表评论说：这绝不只是偶然现象，而是“新时代的产物”。在 1922 年初的第四十五届议会上，宪政会取消了以前坚持的“独立生计”条件，和国民党、无党派首次提出了统一普选方案。各政党内部的少壮议员也显露出头角。在地方上市民的政治结社也活跃起来。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左右地方政界的地主、资产阶级名望家阶层，和友党系的官选知事相勾结，扩大势力，企图让地方均沾

利益，但是在劳资纠纷和租佃纠纷等群众运动发展中，单是名望家阶层已经无法处理地区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中小资本家、律师、记者、青年知识分子等组成的市民的政治结社。而在市民的政治结社中，出现了企图与宪政会、国民党结合来对抗操纵地方政界的政友会的动向，和通过支持工农斗争参加工农运动的动向。宪政会很快就对市民政治结社开始了工作。在关西，以今井嘉幸为中心，于2月组成西日本普选大联合，各地的市民政治结社以及一部分工会和日农联合会也参加了。在普选法案向议会提出的那天，数万群众涌向议会，在众议院第一次经过了四天的讨论之后被否决了。

军阀的总后台山县死去的第二天，即2月2日，政友、国民两党向众议院提出裁减陆军的决议案，接着国民党又提出废除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建议案，各党派领袖纷纷发表对提案的赞成演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代表友党政友会的大冈育造的演说，他抨击了帷幄上奏和滥造将官的弊病。前者以"将步兵服役期间缩短为一年零四个月，同时坚决整顿各机关，每年应筹出四千万日元的剩余金"的内容，后者在修改了攻击军阀字句之后以大多数通过。但是，山梨半造陆相认为无论是缩短兵役年限还是节约四千万日元都很困难，表示反对。先前曾主张废除参谋本部的高桥首相也在答辩时说，没有必要修改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和帷幄上奏。

与裁减陆海军相配合，宪政会和国民党又提出了废税减税案，在院外，以大阪、东京的实业组合联合会为中心开展了废除营业税的运动。废税减税案虽然由于政友会的反对而被否决，但废除营业税的运动于同年秋在全国蓬勃地发展起来。⑧政府的咨询机关临时财政经济调查会也在回答咨询时说：过渡性地减轻地税、营业税，随后转让给地方税。从米骚动那时开始，城市问题就表面化，1919年公布了都市计划法、市街地建筑物法，1921年制定了为应付住宅问题、保护租地权等的租地法、租房法、住宅组合法、职业介

绍法等项法令。但是,因为城市计划是以国家为主体,市民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并且财源又得不到保证,所以城市改造也无法进行。还有,由于国家方面委任事务的激增,地方负担增加,造成财政困难,1921年,原内阁企图通过小学二部制的办法节减教育费,遭到舆论的批评。把两税转让给地方的方案,也具有应付这种局面的意义。

承认妇女有权参加政治演说会的治安警察法修改案,也在贵族院的难关通过了。新妇女协会首先所要求的修改治安警察法中禁止妇女加入政党和参加政治演说会的条款中,只有后一项实现了。

议会末期,在野党中发起了非政友合并运动,进步派七人宣布脱离宪政会。以此为契机,出现了以国民党为中心汇合无党派议员改造政界结构的动向。9月,国民党解散,11月,建立了拥有四十五名议员的革新俱乐部。尾崎行雄、犬养毅和正在卧病的岛田三郎都是老先辈,这是一个按照尾崎的主张,通过"打破现有政党"以期争取革新政界的自由的政治俱乐部,打算在将来创建新党的犬养也参加了。京大教授佐佐木惣一等学者以及妇女的参加引人注目。他们在政策方面标榜扩大市町村自治权,公选府县知事,改革特殊银行、会社、同业公会、产业公会,以及通过立法来改革劳动、租佃问题等,主张彻底实现包括社会生活这方面的自由主义。这是想要对还没有被现有政党组织起来的中小产业资本家、农民、小资产阶级阶层进行工作。它的性质被认为是以"根据资产阶级合理主义的产业立国论的帝国主义思想"为基础,但又"强调天皇统治体制下的资产阶级改革,通过加强社会政策和靠立法来解决劳动、租佃问题,以达到预防革命、建立稳定的资产阶级秩序的目的"。⑨

该年的8月,日本经济联盟会开始活动,在华盛顿会议时,财界派遣以团琢磨为团长的实业团访问英美,以此为契机起到了集中垄断资本意志的作用。成立大会决议把通过裁军、整顿行政财政

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减轻国民负担。[10]

1923 年 4 月，在一直推动废除营业税运动的大日本实业组合大会上，成立了实业同志会，钟纺经理武藤山治任会长。武藤讨厌政府和资本家相勾结，拒绝加入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首先提倡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实业同志会主张以小型政府为目标实现经济的自由主义，在中小产业资产阶级中开展了活动。

在政友会中，高桥总裁、横田千之助干事长等的改革派同继承原敬路线的床次竹二郎等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表面化了。在第四十五届议会后的 1922 年 5 月，高桥首相着手改组内阁时，中桥文相、元田铁道相拒绝辞职，阁内的不一致造成了总辞职。政友会干事长横田正在为高桥再次组阁进行筹划时，元老松方正义和西园寺公望决定向摄政推荐加藤友三郎海相为继任首相，如果辞退，就推荐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元老很重视华盛顿会议的善后工作。当政友会得知第二候补是加藤高明时，便说服加藤海相组阁，海相以政友会支援为条件接受了组阁。加藤海相主要是从贵族院的研究会和交友俱乐部中选择阁僚来组织内阁，政友会从阁外给予支援。政友会的心愿是，与其组成反对党的政党内阁，莫如组成一个自己支持的非政党内阁。加藤友三郎内阁一组成，从原内阁时就担任联络研究会的反总裁派的床次担任联系政府的联络员。总辞职后被政友会开除的中桥、元田，不久又恢复党籍，党内纠纷大体上平息下来，但党内还是床次和横田的两头政治，仍然不稳定。

加藤首相亲自兼任海相，负责贯彻华盛顿海军条约。废弃摄津号、安芸号等十五艘战舰或注销其舰籍，正在建造中的六艘战舰、巡洋舰中，加贺号、赤诚号改造为航空母舰，其余四艘停建，还未开工的八艘战舰、巡洋舰的建造计划也停了下来。为了建造这些军舰保留到 1927 年度的预算额达三亿五千余万日元，但实际建造时，由于单位造价的提高，照例还得编制相当数额的追加预算，

所以停止造舰节约下来的款额远远超过上述的数额。因裁军而裁减下来的海军官兵达七千五百名，裁减军工厂职工达一万四千名。

山梨陆相也推行裁减陆军，裁减兵员五万六千名，马一万三千匹，但服役期限只缩短了四十天。而且因为预算转用在整备武器上，所以1923年度的节约额只有二千四百余万日元。至于军部大臣武官制问题，则毫未触动。

华盛顿海军条约是在当年3月末元帅府对天皇的质询回答说："认为对帝国国防没有妨碍"之后，在枢密院通过，于8月5日批准。在此以前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于同年3月进行协议，开始修改帝国国防方针等。海军军令部在山下源太郎部长之下，5月任加藤宽治为军令部次长，担任修改帝国国防方针的军令部第一科长为末次信正，强硬论者垄断了军令部的中枢部门。⑪修改的国防方针，认为东亚大陆将是列强之间经济战的焦点，日美冲突势在必然，因此以美国为主要假想敌国，俄国和中国次之。这说明海军军令部成了和华盛顿体制唱反调的中心。上原参谋总长、山下海军军令部长于1923年2月将上述内容上奏给摄政。而摄政就国防方针质询了元帅府，也垂问了加藤首相，然后决定下来。

认为山梨裁军不够彻底，非难之声高涨。在1923年的第四十六届议会上，宪政、国民两党再次把陆军裁军建议提交给众议院，但政友会以裁军已经结束加以反对，而被否决。国民党提出的废除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的建议案虽然再度通过，但仍未被理睬。而政党也没有下定同以军部为首的特权势力进行认真较量的决心。

过激法案和日本共产党

在此以前的1922年3月，当时的高桥内阁曾向第四十五届议会提出过取缔过激社会运动法案。前首相原敬老早就重视思想问题，想要制定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治安立法，但直到发生近藤荣藏

事件才算有了直接诉诸立法的时机。⑫法律条文规定，凡是“关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扰乱朝宪的事项”和“用暴动、暴力、威胁或其他不法手段变革社会的根本组织的事项”的宣传、劝诱、结社、集会，前者判处十年以下徒刑，后者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监禁。从法律条文含糊不清来看，这是一部想要广泛镇压国民政治自由的法案，与治安警察法比较，处刑是非常重的。

对此，东京、京都两帝大法律系教授们开展了反对的辩论，各报社为维护言论自由也建立了“反对过激法案新闻同盟”。在贵族院，宪政会派的伊泽多喜男、汤浅仓平们起来反对，法案经过再度修改通过。但在众议院，不仅在野党表示反对，就连政友会也是消极论占上风，以审议未了告终。但在这场反对运动中，除《播种人》派之外，社会主义团体、工会都持消极态度。所以如此，其指导思想是，官方镇压一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会反而更加明确。

1922年1—2月间，在共产国际号召下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劳动者大会，亦即远东民族大会。日本、中国、朝鲜、蒙古、爪哇以及俄国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固然是为了对抗帝国主义各国的华盛顿会议的，但包括一向承担日本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在美日本人社会主义团体在内，建立日本共产党也是一个目的。日本代表有来自在美社会主义团体的片山潜、铃木茂三郎等六人，和来自日本国内的水曜会的德田球一、晓民会的高濑清和无政府主义者吉田一等七人参加了大会。会上，苏维埃代表萨法洛夫认为远东劳动大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因而很重视日本工人阶级从内部来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但朝鲜、中国的代表则指出日本劳动大众的排外主义的危险性，强调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⑬

同年春，德田和高濑一回到国内，青年布尔什维克就主张立即建立共产党，以便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取得承认。于是拉来

主张首先在工人运动中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建立共产党的堺、山川，于七月建立了日本共产党。堺、山川、荒畑、高津等被选为执行委员，堺任委员长。这虽然是在水曜会、晓民会、总同盟等现有团体凑合起来的，但对先进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接着，川山在《前卫》1922 年 7 、8 月合刊号上发表了《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一文。该文认为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会运动，少数先进分子在确立社会主义理论上取得了成功，但却脱离了群众。因此必须重视无产大众的当前要求，改善其生活，积极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号召“到群众中去”“进行政治斗争”。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还有不足之处。工会和政党在政治斗争中起什么作用不够明确，让工会担负起政党的作用，有招致工会分裂的危险。还有，从革命形势就要到来的这样看法出发，认为无产阶级进入议会，将给资本主义的统治带来新的安定，因而对普选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但是，德田球一、美国组的铃木茂三郎、猪俣津南雄等，却极力主张推进普选运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⑭

当年夏天的对俄不干涉运动取得了成果，但是，对付资本攻势的工会大联合运动，却在 9 月的成立大会上，因为大杉等的无政府主义派主张工会自由联合，而布尔什维克派则支持总同盟干部的中央集权联合，不肯让步，终于造成分裂。

1922 年 11 月，召开了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承认日本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并通过了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纲领草案强调日本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的半封建性，认为不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就是处于在野党地位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相当部分也被置于国家政权之外，因而主张共产党在过渡口号中提出推翻天皇政府和废除君主制，领导普选运动、农民的反地主斗争，掌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1923 年 3 月，为讨论纲领草案，

召开了石神井会议，但关于废除君主制、政党组织问题没有得出结论，决定等待共产国际给予指示。⑮

① 二村一夫《工人阶级的状态和工人运动》，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8近代5》112—113页。

② 隅谷三喜男《日本工人运动史》1966年，109—117页。大前朔郎、池田信《日本工人运动史论》(1966年)就是这次争论的研究。

③ 其中有堺等的LM会、山川等的水曜会、高津等的晓民会、桥浦时雄等的钟表工人工会、荒畑等的LL会。《德田球一讯问记录》，见山边健太郎编《现代史资料20社会主义运动7》，1968年，69页。

④ 参照竹村民郎《垄断和武器生产》，1971年，《农政上的1920年代》。

⑤ 关于调停问题，参见利谷信义、本间重纪《天皇制国家机构·法体制的再编》见中村编《大系日本国家史5》，241—246页。

⑥ 阪本楠彦《日本农业的经济法则》，1956年，160—166页。

⑦ 渡部彻《部落解放运动》，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8近代5》，参照马原铁男《论水平社的时期划分》，见部落问题研究所《水平运动史的研究》第六卷。

⑧ 江口圭一《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史的研究》，286—303页。

⑨ 木阪顺一郎《革新俱乐部论》，见井上清编《大正时期的政治与社会》，292页。

⑩ 堀越祯三编《经济团体联合会前史》，1962年，121页。

⑪ 《战史丛书》，《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196页。

⑫ 1921年8月，司法省、内务省警保局都起草了严惩主义的紧急敕令案，但"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司法省案，思想取缔的意图是露骨的，而警保局案比起思想取缔来更着眼于具体行动的取缔"。司法省案在内务省参事官会议上作了修改，并决定作为法案提交议会。(松尾尊兊《第一次大战后的治安立法的设想》，见藤原彰、松尾编《论集现代史》，1976年，145页)

⑬ 共产国际编(高尾、辻野译)《远东劳动者大会》1970年，17、232—248页。

⑭ 松尾尊兊《被遗忘了的革命家高尾平兵卫》，《思想》，577号(1972年7月)。还有，在远东劳动者大会后，列宁对高尾指出了日本的中间阶级的作用，说应该和政界的革新分子、先进的知识分子等结成统一战线。

⑮ 关于这项内容，可参见犬丸义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讲座现代的意识形态》2，1961年，岩村登志夫《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建立》，1977年，Ⅱ章。

第四节 关东大地震

反对过激法案运动和检举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建成的时候，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中国共

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接着苏联代表越飞对孙文进行工作，于 1923 年 1 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联承认孙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路线为中国革命路线，同时约定苏联给予全面援助。第一次国共合作走上了轨道。另方面，苏联还对中国北京政府进行恢复外交关系的工作。

日本和苏联的关系，仍然处于绝交状态。统治阶级最害怕的是同苏联一复交，革命运动就会得势。但是，苏联再次进入了国际社会是无法否定的现实，而为应付华盛顿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同苏联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起了推动作用的是被认为是政界的生力军东京市长后藤新平。他以苏联远东代表越飞前来养病为理由邀请他来日本。他打算抢在苏联同中国或同美国接近之前，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从而抓住向苏联发展经济的好机会。1923 年 2 月，越飞来到日本，后藤不顾外务省、警察的阻挠和右翼的暴行，与越飞单独进行谈判，为日苏复交打下了基础。

在国内，共产党的影响扩大了。总联合决裂后不久召开的总同盟第十一周年大会，声明承认工农俄国，声明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不参加普选运动，显示出总同盟左倾达到顶点。渡边政之辅、山本悬藏等，于 1923 年 3 月以工会内的左派结成革命派，大阪的西尾末广，名古屋的叶山嘉树等也参加了会议。在 1923 年 2 月的日农第二次大会上，农民提出了和城市工人携手共进的意见，农民要求政治自由的议案成了大会的中心。新人会、建设者同盟等学生团体，对工会、城乡的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于 1922 年 11 月创立了学生联合会，并于 1923 年 4 月，川合义虎任委员长，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3 月 8 日，第一次国际妇女节讲演会，在播种社的支援下取得了成功。 4 月，《社会主义研究》、《前卫》和青野季吉、市川正一等的《无产阶级》合并，发行了共产党的合法的

机关刊物《赤旗》。

在1923年初的第四十六届议会期间，总同盟以及其他工人团体、社会主义团体发动了反对以过激社会主义取缔法为主的"三恶法"运动。由于以《劳动周报》为据点的山崎今朝弥和平泽计七的努力，把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两派工会拉到走向统一行动上来，2月11日，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统一行动的示威游行，取得了成果。

这届议会期间，动员大规模的群众开展了普选运动，但总同盟等主要工人团体没有参加。2月23日的普选示威，是一次十万人参加的大示威，但在野党害怕群众运动的高涨，由此停止了对民众的动员。

在地方社会主义团体中，也有积极参加普选运动取得很大收获的。下伊那自由青年联盟、名古屋工人协会等，把普选运动和反对恶法运动结合起来推动了运动，创办《播种人》的秋田青年同盟的领导者们，也积极地参加普选运动，从而同工人、农民、青年团体、急进的政治团体等建立了密切关系。

这个时期，也提出了日本工人同在日朝鲜工人联合的问题。1922年，在信浓川水力发电厂施工现场发现朝鲜工人被杀事件时，在进步的朝鲜人中间发动了抗议运动，同年9月号的《前卫》也号召"日鲜工人的团结"。该年12月，在东京、大阪建立了朝鲜工人同盟会。1923年的五一节，在东京通过了"解放殖民地"的决议，在大阪提出了"日本和朝鲜的工人团结起来"的口号，各地朝鲜工人都参加了。8月，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努力促进殖民地人民的无产阶级运动"。①

革命运动开始向大众化方面发展，而当权者却想乘革命运动还处在萌芽时就镇压下去，同群众隔离开，进而使民众敌视革命运动。1923年5月，在早稻田大学发生了军事研究团事件。拥有大

山郁夫、佐野学、猪俣津南雄等人的早稻田大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据点引起注目，而陆军却想在这里首先组织起军事研究团，实行教育的军国主义化。早大文化联盟、建设者同盟发起反对军研运动，阻止其开会仪式，随后召开了学生大会。这时纵横俱乐部的森传等操纵的柔道部员等闯进会场找碴斗殴，使许多人负伤。森等是和警视厅串通一气的。

从这次事件开始，6月首次检举了共产党。感到身边危险的佐野学把共产党的文件寄存到警视厅的密探原矿工那里而被警察没收之后开始了检举，6月5日有五十多名被捕。统治阶级大肆宣传共产主义的恐怖，共产党遭到重大打击。但只有二十九人以违犯治安警察法而被判处监禁一年以下的徒刑。

关东大地震

1923（大正12）年9月1日11时58分，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京滨一带陷于一片混乱。震源在相模湾西北部，震级为七点九级。地震最严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带。横滨的人造陆地地区，很多人被压死，全市烧成灰烬。东京以下町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晓仍在继续燃烧。这次大地震造成惨重损失，死者九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名，伤者十万三千七百三十三名，失踪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七名，房屋全毁者十二万八千二百六十六户，半毁者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三户，烧毁者四十四万七千一百二十八户，被水冲走者八百六十八户，受害者总数达三百四十万人。②

京滨一带的电信、电话，在大地震的瞬间都被切断，交通网也为之切断。在有乐町、大手町的官厅街，警视厅以及内务省、大藏省、铁道省等机关也都烧毁。熊熊火势把下町一带全部烧光，在两国横网町的陆军被服厂的遗址上，四万人被火焰旋风烧死。在上野公园、皇宫前一带的市中心广场和江东的龟户、向岛等地方，聚

集了大量陷于饥饿的难民。

恰在此时，加藤友三郎首相于8月24日故去。而萨阀的长老山本权兵卫正在组阁。震灾善后工作就落到了临时首相内田康哉外相等这些已经提出辞呈的加藤内阁的阁僚们身上，直接负责人是水野鍊太郎内相和赤池浓警视厅总监。在火灾蔓延的情况下，赤池总监判断维持帝都的治安是困难的，“何况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没有煽动贫困到极点的群众制造事端的人”。于是午后四时半，要求近卫师团出兵，并命令各署长“严励取缔捣乱计划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种计划”。③ 警察早就仇视社会主义者和朝鲜人，并且水野内相又有米骚动当时任内相，三·一运动后立即就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起用赤池为警务局长，对朝鲜独立运动进行镇压的经历。陆军已规定了近卫和第一两师团承担的区域，开始了活动，当一接到出兵要求，便立即命令各部队向东京出动。

2日午间，出现了朝鲜人放火和投弹的谣言，三时左右，暴动、抢劫的谣言扩散到各地了。下午5时，警视厅发出对朝鲜人加以警戒的命令：“难保没有乘灾害之机出来进行放火等破坏活动的人，现在淀桥、大冢等地已有检举的迹象”。接着命令涩谷、世田谷、品川等署“沿街配置署员，如有不逞之徒，立即击毙。”④ 内务省警保局长后藤文夫还让从船桥电报局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⑤

朝鲜人暴动袭击的消息一经传开，水野内相便决定根据紧急敕令，实施部分戒严令。但因紧急敕令无法经过枢密院的审议，便决定由政府负责公布。在东京市和府辖五郡施行戒严令的一部分是在2日傍晚，随后在赤坂离宫的前院举行第二届山本权兵卫内阁特任式，后藤新平任内相。出动的军队据说并不单纯是以维持治安为目的的行政戒严，而是以镇压暴徒为首要任务的对敌戒严。⑥ 3日，戒严令的实施区域扩大到东京府、神奈川县，同时新设关东戒严司令部，任命福田雅太郎大将为戒严司令官。4日，戒严区域

又扩大到埼玉、千叶两县，到 10 日，出动的兵力达五万人。

屠杀朝鲜人的事件和治安维持令

朝鲜人暴动的谣言一经公然传开，早就担心由于朝鲜殖民地化和朝鲜人受压迫而遭到报复的群众，在震灾的恐怖和不安之中，就相信谣言而变成了凶残的暴民。这是要把群众行将对政府发泄的不满转移到替罪羊身上。各地以青年团、町会、在乡军人会、消防团等为中心成立自卫团，在警察、军队的公然许可下，追逐朝鲜人，加以迫害、杀害，奉戒严令出动的军队，站在迫害朝鲜人的前列，一部分中国人也成了他们迫害的对象。

军部和警察非常仇视社会主义和工人活动家。尤其是具有出兵西伯利亚经验的军队，“怀疑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互相联络，共同策划”。⑦ 任东京南警备队司令官的石光真臣第一师团长，3 日午后 4 时发出指示：“不法分子不一定只有朝鲜人，应当记住，还有利用他们的日本人”。⑧

在这种形势中，发生了龟户事件。9 月 3 日午后刚过 10 时，纯工人工会会长平泽计七和南葛劳动会的川合义虎等八人被龟户警察署逮捕，据军队记录载，于 5 日午前 2 时 30 分，被近卫师团骑兵第十三连队的士兵杀害。

南葛劳动会和纯工人工会，本来处于互相对立的立场，但在上年以来的资本攻势中，双方都要求统一工人运动。这些战斗的工人在地方也开展活动，地震后为救济难民，要求区公所、工厂出米造饭。当权者就是袭击了这些在第一线活动的积极分子。警察杀害了平泽、川合等之后，还说什么已释放了，混淆视听，隐瞒实情。

9 月 3 日，政府、警察当局也明确了说朝鲜人放火、暴动是造谣。而自卫团的行动却越来越激烈，甚至对警察、军人也发生了暴

力事件。5日，军队、警察设置了检查站，内阁告示中也禁止“民众随便迫害朝鲜人”，并禁止自卫团携带武器。然而自卫团的活动却一时制止不住，杀伤朝鲜人的事件一直继续到7日左右。

9月5日，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的警备部决定“尽力调查，并尽量肯定朝鲜人的暴行或将要暴行的事实”，“对国外要特别努力宣传赤化的日本人及赤化的朝鲜人在幕后煽动暴行的事实”。⑨这是认定本来就不存在的朝鲜人暴动的背后有社会主义者在操纵，想要镇压社会主义者。6日以后，浅沼稻次郎等许多社会主义者陆续被捕。

7日，以紧急敕令和暴利取缔令、支付延期令一起公布了《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这是对煽动暴行、骚动等犯罪或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目的散布破坏治安事项，或为蛊惑人心而散布流言蜚语者，课以重达十年以下徒刑的法令，因此被叫做治安维持令或流言蜚语取缔令。这条法令，代替了上一年由于舆论的反对没有审议完的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目的在于压制一切批评政府、军部的新闻报导。在这种情况下，9月12日，日本军队杀害了在亀户南边的大岛街正在为中国工人搞互助事业的王希天。⑩16日，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妇和六岁的外甥，在东京宪兵队本部被甘粕正彦宪兵大尉杀害。

9月20日，《时事新报》和《读卖新闻》，发行号外，报导大杉被杀害的消息，立即被禁止发售，但对镇压言论下的白色恐怖开始进行追究。同一天，更换了戒严司令官，由原陆相田中义一代替了福田雅太郎。9月下旬，开始报导亀户事件，10月10日，警视厅也不得不发表。10月20日，解除了禁止报导自卫团残杀朝鲜人的禁令，但由军队、警察一手屠杀的却完全隐瞒起来。⑪

以杀害朝鲜人事件开始的白色恐怖的责任几乎没有追查清楚。杀害朝鲜人是无法掩盖的事件，但政府只公布了知道犯人是

谁的被害者人数为：死者，朝鲜人二百三十一名，中国人三名、日本人五十九名，并逮捕了自卫团团员。对此右翼方面也要求追究警察的责任，结果判刑也就过分轻微。根据吉野作造的说法，仅朝鲜人受灾同胞慰问班直到10月末以前的调查，朝鲜人死者达二千六百一十三名，后来的调查竟达六千多名。⑫

杀害大杉夫妇的甘粕正彦宪兵大尉被提交军事法庭，但杀害大杉夫妇的关键问题，即是否是根据上级命令搞的，根本没有搞清楚。当局反咬一口说，龟户事件是因为制止不住川合等的反抗，是根据卫戍勤务规定采取的合法行动。至于担心演成外交问题的王希天事件则矢口否认，抵赖到底。

舆论的抗议是软弱的，吉野作造和山崎今朝弥、布施辰治两位律师等的查明真相的活动以及《播种人》的抗议等等，只不过是略微表示了日本人的良心而已。在震灾和以后的混乱中深感不安而轻信了政府宣传的群众，加强了投靠政府的姿态。政府和军部抢在群众的不满日益高涨的前头，11月16日，解除戒严令，代之以大大加强宪兵队，并将其分派到各地。就连在12月召开的第四十七届临时议会上对于残杀朝鲜人事件和龟户事件，也只有田渊丰吉、永井柳太郎等追求一下政府的责任。而且以紧急敕令发出的《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却给予事后承认，确认其法律效力。这和十八年前的日比谷骚动事件时凭议员、舆论的力量撤消了戒严令和新闻约束令，情况大不相同了。

虎门事件和反动势力的发展

山本权兵卫当组织第二届内阁时本想成立一个包括三党首在内的"举国一致内阁"，但高桥、加藤两总裁没有入阁。可是第二届山本内阁，却有政界后起之秀后藤内相和一贯主张普选的犬养递信相等，想通过推行普选和复兴帝都来笼络对政党心怀不满的国民，

以便掌握政局的主导权。保守的平沼骐一郎法相也在犬养的劝诱下，表示支持普选，但交换条件是要犬养赞成禁止共产党结社的法律。⑬

山本内阁的组成，给政友、宪政两党很大冲击。占绝对多数的政友会对又没有取得政权感到失望，党内对高桥总裁以下的干部增加不满。宪政会方面，以对加藤总裁不满的党人派为中心，早就同革新俱乐部一起唱起非政友联合论。

没有多数党支持的山本内阁，不久就遇到了困难。曾任东京市长并致力于城市改造的后藤内相，制定了大规模的帝都复兴计划，但首先在帝都复兴审议会中遭到反对而后退，接着又在12月召开的第四十七届临时议会上，被政友会大加削减。犬养递信相等主张解散众议院，但山本内阁没有决心解散众议院，只好接受下来。随后，田健治郎农商务相由于火灾保险问题辞职了。

12月27日，一名青年在东京虎门狙击前往参加第四十八届议会开幕式的摄政的汽车，但没有击中。这就是所谓的虎门事件。这个青年二十五岁，名叫难波大助，是山口县选出的属于庚申俱乐部的议员难波作之进的儿子。他1919年进京，半工半读，走上社会主义，彷徨于恐怖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因龟户事件、大杉事件、残杀朝鲜人事件，激起了他对当权者的愤恨，为促使当权者和反动团体的反省，打破无产者中崇拜天皇的观念，企图对皇室进行恐怖活动。⑭

这次狙击的摄政事件，确实给日本社会以巨大的冲击。暴露了天皇制所具有的符咒能力，有关方面广泛受到来自社会上的重大压力。⑮山本内阁因此引咎辞职。犬养递信相看到寄托希望于山本内阁的普选很难实现，便极力主张总辞职。

关东大地震抬高了政权的作用，反动的风气加强了。当权者利用震灾造成的民众的危机感，抨击自由思想，挑起对社会主义者

的警惕。11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告戒改革“浮华放纵”和“轻佻诡激”的“时弊”的振刷国民精神的诏书，用以加强统治。反军国主义的舆论也销声匿迹了。虎门事件促进了这种风气。接替山本内阁的清浦奎吾内阁，叫嚷“思想国难”，想要“善导国民思想”。以中央、地方官厅为中心，动员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妇人会、宗教等方面力量，造成一个感化运动的声势。统治阶层中的头面人物也公然出马开展右翼运动。这年的 3 月，建立了以司法官僚平沼骐一郎为会长的国本社，把官僚、陆海军人、财界、学者等广泛地组织起来。12 月，以政友会的小川平吉为中心建立了青天会，接着发行了《日本》报。[16]

与此相呼应，对地方的共产主义的青年团体进行镇压。早在震灾前的 7 月，名古屋的叶山嘉树等人组织的工人团体就被检举了，9 月，群马县的社会科学研究小组，1924 年 3 月，成为下伊那自由青年联盟核心的自由青年联盟（L.Y.L.），分别以秘密结社、秘密出版等罪名被检举，并被宣传为名古屋共产党事件、群马共产党事件等。[17] 刚遭到第一次检举的共产党，在这种加强镇压的情况下，于 1924 年 2 月，连正式会议也没召开就决议解散了。

用权力来限制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活动的动向也明显了。这年春天，辞去东大教授参加朝日新闻社工作的吉野作造，因为论述五条誓文，批评枢密院干涉政治而受到审问，虽没有被起诉，却不得不辞去报社。当时连尊重孩子自发性的自由教育运动也遭到镇压。那年秋天，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长野县松本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进行修身的观模教学时没有使用教科书，督学认为有问题，就受到停职处分。

① 朴庆植《强行带走朝鲜人记录》，1965 年，218—228 页。

② 今村明恒《关东大震灾调查报告》，见《震灾预防调查会报告》第 100 号甲，

1925年。

③ 警视厅编《大正大震火灾志》,1925年,20、24页。原文都是片假名,但引用时除命令外改为平假名。

④ 同上,30—31页。

⑤ 海军省《公文备考》,见姜德相、琴秉洞编《现代史资料6·关东大震灾和朝鲜人》,1963年,18—19页。

⑥ 第一师团《值得将来参考的意见》,同上,631页。

⑦ 同③,1272页。淀桥警察署户冢分署的报告。该分署逮捕了浅沼稻次郎等人。

⑧ 东京市政府编《东京震灾录》前编,1926年,政府活动(陆军省)303页。本书所写的2日,从上下关系和写有"后天5日"的情况判断,断定是3日的误排。

⑨ 海军省《公文备考》,同⑤79—80页。

⑩ 拙稿《大岛街王希天事件和日本政府的对策》,参照藤原、松尾编《论集现代史》。

⑪ 关于发表的经过,见松尾尊兊《关东大震灾中的残杀朝鲜人事件(上)》,《思想》471号(1963·9)57—58页。

⑫ 姜德相《关东大震灾》1975年,152—160,215—220页。

⑬ 《平沼骐一郎回忆录》,1955年,79页。

⑭ 原敬吾《难波大助的生和死》,参照《自由》昭和34年12期、35年3期。

⑮ 丸山真男《日本思想》,1961年,31—33页。

⑯ 小川平吉《创刊新闻日本的始末》,见冈义武等编《小川平吉有关文书》1,1973年,615—617页。

⑰ 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日本劳动年鉴》第6卷,1925年,560—563页。另外参照《下伊那青年运动史》1960年。

第五章　政党内阁及其动摇

第一节　"宪政的常道"

第二次护宪运动

第二届山本内阁在虎门事件中倒台后，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于1924（大正13）年1月1日受摄政之命组阁。元老推荐这个七十五岁的官僚政治家，是为了比较公平地进行正迫在目前的大选，但却是一个很大的时代错误。不了解政界情况的清浦在组阁中遇到困难之后，把选任阁僚工作委托给贵族院研究会的干部，以贵族院各派为中心进行了组阁。

三次被排于政权之外的政党团结起来掀起了护宪运动。首都新闻界有志之士发起的1月11日的时局恳谈会上，有宪政、政友、革新三派的少壮议员参加，商定排斥贵族院内阁和实现政党内阁，并决定为此也可以组织联合内阁。在政友、宪政两党的干部中间，也有接受联合内阁的空气。在政友会中，总裁派和反总裁派的对立正在加深，宪政会也以反总裁派为中心，掀起了非政友联合运动。两党干部为了解决内部纠纷，都有争取政党内阁的必要。在上一年末，政友会的冈崎邦辅和宪政会的安达谦藏一再会谈，为了"实行不向民众和报纸献媚的政治，以确立国家的政策"，① 两党约定进行合作，组织以绝对多数为背景的坚强的政府，重建统治体制。

在政友会，围绕参加护宪运动，党内的对立日趋加深。在十五日的干部会上，高桥总裁决定辞去爵位，作为一个平民，站在护宪

运动的前列，反总裁派的山本达雄、中桥、元田和床次四总务，便连袂退党。退党者相继续出现。由退党者组成的政友本党成为第一党，和护宪运动对立。政友会的分裂，加速了护宪运动。18日，通过辞掉了枢密顾问官的三浦梧楼的斡旋，高桥、加藤和犬养三党首脑举行了会谈。三党首脑商定“希望根据宪政精神建立政党内阁制度”，从此第二次护宪运动正式开始了。

护宪三派攻击清浦内阁说，贵族院内阁的出现，是特权阶级向国民的挑战，是阶级斗争的开端。而清浦内阁和政友本党则反驳说，这种攻击煽动群众运动，致使阶级斗争激化了。防止阶级斗争的激化，是两派共同的论据。护宪三派虽然企图掀起群众运动，但还是象宪政会加藤总裁所讲的“尤其当人心险恶之际，一切行动按法律从事这一点最为必要”那样（《宪政会史》，575页），加紧了对护宪运动的控制。众议院以面临1月26日皇太子的结婚典礼、避免政争纠纷为理由，自动地休会了。当31日刚一复会，在野党对企图颠覆护宪三派干部所乘列车的事件进行追究时，暴徒闯入会场，议会休息。于是清浦内阁就立即蛮横地解散众议院，谴责了三派。大选日期定在三个多月以后的5月10日。

清浦内阁提出了由水野链太郎内相指使地方官、和铃木喜三郎法相互相呼应、取缔选举的强硬方针。护宪三派在各地召开护宪大会和演说会，进行了选举战。当时各报大体支持了护宪三派的活动，但护宪运动缺乏强有力的高潮。② 护宪运动没有把普选列为共同纲领。宪政、革新两派主张普选，政友会则主张自由。加之，对于以前和特权势力一再妥协的政党，人民群众怀有不信任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也因受到关东大地震后人民群众也前来迫害的冲击，处于几乎不能活动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中，各派为争取第一党的选举运动，极为激烈。

大选的结果，护宪三派获得了大胜。长期作为在野党、一直进

行普选运动的宪政会，当选一百五十一名，成为第一党；政友会一百零五名；革新俱乐部三十名；三派合计当选二百八十六名，占绝对多数。宪政会增加了约五十议席，而政友会则减少了二十四议席，革新俱乐部也减少了十三议席。③政友本党减少四十名，为一百零九名。新登场的实业同志会当选八名，无党派为六十一名。水野内相和铃木法相在大选后还试图通过分裂政友会来保持政权，但未能实现，清浦内阁办完皇太子结婚的飨宴，6月7日总辞职。

元老松方在危笃中（七月死去），由另一个元老西园寺的推荐，摄政命令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阁。加藤打算以宪政会所公开约定的普选、整肃纲纪和整顿行政财政三大政策为支柱，组织护宪三派的联合内阁，以宪政会占据内务、大藏为前提，要求两党首脑入阁。政友会表示不满，而高桥干脆让了步。宪政会方面，由若槻礼次郎任内相，滨口雄幸任藏相，被认为是三菱的政治专员的仙石贡任铁相。政友会方面，高桥任农商务相，横田千之助任法相；革新俱乐部的犬养任递信相，这样组成了护宪三派内阁，还有政党外的实力派币原喜重郎任外相，宇垣一成任陆相（留任）。此后，在"宪政常道"的名义下，两大政党的首脑轮流组阁成了惯例。但加藤首相和若槻内相都是官僚出身，是贵族院议员。

整顿行政财政和宇垣裁军

加藤内阁首先抓的是整顿行政财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同时日本的财政也急剧膨胀起来。由于战后经济危机以后，政府还进行了放任的财界救济，致使通货膨胀倾向在继续，财政支出也不断增加。这时又加上关东大地震的复兴支出，因此公债激增，新债发行逐渐困难。此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地方经费激增，地方财政渐渐支绌，也需要加以补充。

财界中要求整顿行政财政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大战中刚刚发

展起来基础薄弱的重、化学工业，在战后经济危机中遭到打击，要靠通货膨胀政策喘口气，在这期间，依仗政府的援助，财阀的财力和外国资本的技术，巩固了基础。同时，为了适应世界产业合理化的趋势，出现了必须依靠整顿行政、财政来稳定物价和靠整顿财界使产业合理化的呼声。

以加藤高明为总裁的宪政会，是适合完成这种使命的机构。原敬的政友会掌握内务省，力图以地方名望家为中心扩张地盘，为此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宪政会是以若槻、滨口和大藏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来巩固核心，以凭紧缩财政实现统治体制合理化为目的的。这也是符合城市小市民厌恶放任、希望稳定物价的要求的。战后经济危机以来，在野时代的滨口要求将通过裁军和整顿行政财政节余下来的财源用到减税上来。但是经过关东大地震当上藏相以后，却主张把节余的财源专用在巩固财政基础上。这就露骨地表明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缺乏把小市民阶层同统治体制联系起来的力量。

滨口藏相在内阁组成后立即提出紧缩财政的方针，号召国民节约消费。加藤内阁在编造翌年1925年度的预算之前，就制定了行政财政整顿方案。在财政方面，想把上一年度十六亿多日元的预算减为十三亿日元，除去震灾对策费，只有十亿多日元。然而政党派却要求把预算用在治水、铁路和建设港湾等所谓建设性的整顿上。整顿行政财政的阁议迟迟不得进展，但1925年度预算案还是缩减了二亿五千万日元，其中一般会计约一亿五千万日元，特别会计约一亿日元。④

在这次行政财政整顿中结束了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废除了临时国库证券特别会计法，改革了大藏省预金部。日本政府因为出兵西伯利亚支出了巨额军事费用，但不能为此发行公债；另外，由于对沙皇俄国和中国军阀政权的财政援助和供应武器、军需品

积压的巨额债权要不上来，为此发行的国库证券不能偿还；因而两特别会计也不能整顿，出了赤字。以邮政储蓄存款为主要财源的大藏省预金部资金，被当时的掌权者用于对华政治策略上的借款、投资和救济财界等方面，连贷给了谁、贷出多少都没有发表，因而被称为伏魔殿。⑤这些法案是由国库负担对此进行整理，并企图防止以政府再次独断作出这种随便的财政支出。通过预金部的改革，把一向由大藏大臣独自掌握其运用，改为由新设的、使有关的各省官吏和学者专家等参加的预金部资金运用委员会来决定，并把从来没有公布的收支，作为特别会计，置于议会监督之下。

由于财政紧缩，财界也进行了整顿。1925年2月，大贸易商高田商会破产了，但政府没有立即给以救济。朝鲜和台湾两银行由于在大战中和战后放宽和轻易的贷款，在战后经济危机中受到了重大打击。滨口藏相于1925年9月令两行减少资本金和不发红利，而政府则把预金部贷给两行的贷款利息减低为二厘，以资救济。接着将因西原借款而招致两行欠兴业银行的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尽管如此，仍然是财界的不治之症。⑥

行政财政整顿的重点是裁军，特别是裁减陆军。滨口藏相和江木翼内阁书记官长制定的原案，是以陆军为中心的，即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取消教育总监部，废除朝鲜和“南满洲”以外的宪兵制度，裁减六个师团，缩短在营服役期间等，尤其要求特权机构的合理化。政府友党三派的方案还主张把科学应用到充实精锐的军备上，普及国民的军事训练，完成产业动员组织等来实现国家总动员是必要的。宇垣陆相则独自草拟了在陆军省内设置军制调查会，裁减四个师团，但将节约下来的财源转用于建立坦克队和航空队上的改革方案。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上原元帅和福田大将等人重视步兵突击主义，认为裁减师团会影响士气，表示反对，但宇垣却不予采纳。

行政财政整顿的阁议一经搁浅，宇垣陆相便借机使向陆军方案靠拢，把撤销军部大臣武官制等根本改革束之高阁，使学校实行军事教练取得赞同。第五十届议会在审议这个议案时，几乎没有听到追究裁军的不彻底、要求促进军制改革的呼声。而且，贵众两院还向政府建议设置国防会议和国家总动员的机关。尽管在整顿行政财政，陆军省还于 1926 年 10 月，设置了整备局，永田铁山就任第一代动员科长，并于翌年 1927 年 5 月，内阁中设立了资源局。⑦

但在另一方面，精神主义也被保存下来。1920年代后半期，领导陆军作战部门的是，第一（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作战科长小畑敏四郎和该科科员铃木率道等人，他们都是后来以皇道派而知名的军人，强调“必胜的信念”，主张精神因素的重要性，重视基于速战速决的运动战。⑧ 这表现垄断阶段的天皇军队具有两面性。

骨干军官和青年军官反对国际协调和裁军的运动也开始出现了。1921 年秋，永田、小畑和冈村宁次三中校，在德国的巴登·巴登约定以打倒长阀和确立总动员体制为目标，集结志同道合的人，回国后于 1923 年由校官级组织了二叶会。⑨ 另一方面，在 1920 年代中叶的动荡时期，西田税在北一辉的影响下，以通过军队的“革命”化来改造国家为目标，开始在出身于士官学校的队付军官中间集结志同道合的人。⑩

普选和治安维持法

加藤三派内阁在其最初的普通议会 1925 年初的第五十一届议会上，提出了一向成为悬案的普通选举法案。但是，普选法案在提出之前，首先必须通过枢密院这个难关。政府原案承认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生活上接受公费救济的人”没有这种资格。而枢密院把被选举权提高为三十岁以上，并且

把没有资格条款中的"公费"改成"公私"，力图限制选举权。政府接受了前者，但对后者没有让步。谈判结果，把"救济"改为具有施行恩惠意义的"抚恤"，达成了妥协。枢密院加上要求"善导思想以及足资防止过激言行的各种设施"的附带决议后，才在2月20日通过。

当向议会提出的时候，若槻内相说明，这并不是以民主主义为基础，而是因为国民的知识和政治能力有了提高，让他们广泛地分担政治上的责任。在众议院，政友本党提出了只承认有妇女的户主才有选举权的修正案，但被否决。贵族院想把没有资格条款改为"生活上接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以限制选举权的扩大。这又遇到了第二道难关。

正当此时，贵族院的改革案也提上贵族院议程。关于这个问题，第二宪政拥护会作出了包括缩减华族议员，新设公选议员等的改革案，但加藤内阁对此表示消极。就连这种不彻底的方案，也被贵族院弄得有名无实了。对于贵族院的反对，加藤首相没有以民意为背景谋求实现普选等悬案的斗志。2月初，一直帮助政友会高桥总裁维持协调护宪三派的横田法相突然死去，在政友会中出现了想以高唱强硬论来使加藤内阁陷入困境的动向。这件事也扯了加藤的后腿。

审议普选法案的两院协议会发生纠纷，会期竟延长了两次。西园寺暗中出头想使其通过(《大正民主时期的政治——松本刚吉政治日志》，大正14年3月15日)。结果，在贵族院的修改之上又加入了"因为贫困"的字样，才达成协议。

男子普通选举就这样勉勉强强地实现了，但是这个选举法还有很多问题。在执行选举中，官选的府县知事不仅仍有强大的权限，而且还加强了对选举运动的限制，一面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众选举运动，并使官宪在取缔的名义下得以对选举进行干涉。另一

方面，众议院修改了原案，以便用从来的选举战术维持现有政党的地盘。选举事务长如果有性质恶劣的违犯行为，候选人也与之连坐的规定被弄成有名无实，开票时改为按町村来检点。这样作"一是蓄意逃避收买罪，一是为了预测收买的结果"。⑪

在这届议会上，在通过普通选举法之前，通过了治安维持法。首次检举共产党之后，又提出了治安立法的计划。其实，在司法、内务两省和法制局之间，于 1925 年初，大体上已拟定了原案。这时，治安维持法案提出议会的消息一传开，以总同盟系和反总同盟系的劳动团体为推动力，掀起了包括日本农民组合、社会主义的思想团体、水平社和在日朝鲜人团体在内的广泛的反对运动。在众议院内部以革新俱乐部左派为中心，护宪三派和小会派的自由主义议员起而反对。但是，报章、杂志的反对是低调的，学者也没有展开反对活动，显示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后退情况。⑫

正当枢密院关于普选法案的讨论达到关键时刻，1 月 20 日签订的日苏基本条约被提到审查委员会上讨论。新任小川平吉法相急于求成，2 月 17 日，阁议按照司法省最严厉的主张决定了法案，在枢密院通过普选法案的前一天，紧急提交众议院讨论。法案是以"改变国体或政体或者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组织、参加结社者判处十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为了上述目的进行协商、煽动和提供利益者也处以重刑。这个治安维持法是为了彻底镇压通过非法活动进行的革命运动，对所有与这种结社有关系的人都处以重刑的新型的治安立法。⑬

政府力图在政府党的支持下，排除反对论，便出动全体干部强调伴随日苏复交，"赤化宣传"的威胁，尽力说服议员。其结果，众议院仅仅删去了"或政体"字样，以二百四十六票对十八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⑭ 在贵族院，只有德川义亲一个人反对。

治安维持法使"国体"这个词首次在法律中出现，代替向来的

"朝宪紊乱"、"安宁秩序"。这个词汇不久之后对于统制国民思想发挥了极其强大的魔力。另外，治安维持法是以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运动为直接取缔对象的，对其处以重刑，这就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运动中的革命的左派和改良主义的右派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促进其分裂。治安维持法和以前的治安警察法、行政执行法等警察法规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尽管大正民主政治有所进展，但治安法制几乎没有进行改革，根据以前的警察法规由警察单方面进行取缔越来越困难了。而治安维持法的制定，却使官吏对于共产主义者们更容易单方面应用或滥用这些警察法规了。随着治安维持法的通过，特高警察机构按中央集权的方式整备起来，在内务省里，以前的地方局、警保局的顺序也倒过来了。⑮

护宪三派内阁的这种动向，意味着整个现有政党体制化了，开始了适应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帝国主义的统治体制的再编组。这不是为了民主政治运动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绝对主义的政治机构的民主化，而是部分的承认它，以谋求政治体制的合理化，把民众吸引到政府方面，对国民进行有效的统治。这样一来，一方面扩大了以军队和警察为首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另方面民众的权利和众议院的势力没有充分确立，因而使政党政治本身不能稳定。于是争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机构民主化的推动工作，就由在阶级斗争中也需要它的工人农民阶级和把工农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接了过来。

三党鼎立

作为护宪三派内阁的最大课题的普通选举法一经通过，护宪三派的团结就紊乱了。在议会结束的 4 月 10 日，政友会的高桥总裁辞职，曾任原内阁陆相的田中义一大将被推举继任总裁。在上次大选成为第三党的政友会中，由于同政友本党恢复了旧关系而成

为第一党，想取得政权的主流很强；对没有搞钱能力的高桥总裁表示不满，出现了想把可能当上首相的政友会总裁这把交椅高价出售给适当人物的动向。传说田中给政友会带来的钱为三百万日元，西园寺也曾批评："现在就有利权内阁的评论，真没办法"(《大正民主时期的政治》，大正14年，3月13日)。

加藤首相为了维持三派合作，作为高桥的后任，要求田中入阁，但田中拒绝了，而让冈崎邦辅和野田卯太郎代之入阁。4月1日，农商务省分成农林省和商工省，高桥任农相兼商相。

接着在5月，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实行合并，政友会成为次于宪政会的第二党。由于策划拥戴田中的政友会的小泉策太郎伙同革新俱乐部的策略家秋田清推进合并计划，对革新俱乐部的前途没有信心的古岛一雄，在取得犬养谅解之后，参加了这个计划，想凭犬养的"产业立国"主义作为政友会的基本政策，以维护革新俱乐部的体面。中正俱乐部的东京电灯公司经理、甲州财阀若尾璋八也起而响应进行活动。这个计划一表面化，认为这是违背革新俱乐部的结党精神、把革新俱乐部出卖给政友会的反对论调高涨起来，但犬养派扼制了这种反对论。参加合并的是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派和中正俱乐部的赞成治安维持法派。

到了7月，政友会便从正面向加藤内阁挑起战来。整顿税制案一提到阁议，政友会出身的大臣便主张和整顿地方税同时审议，并坚持不让。由于内阁内部不统一，使内阁总辞职了。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为取得政权立即商定合作。元老只剩西园寺一人，内大臣也改为牧野伸显。西园寺蔑视这个阴谋，让加藤高明组织了宪政会的单独内阁。

这样，第二届加藤内阁虽然组成了，但宪政会离超过半数很远，形成了宪政、政友和政友本党三党鼎立，致使政局不稳。护宪三派的共同课题既然大致实现了，各党也明确了各自的立场，这就应

该根据普选法举行大选，接受国民的审判才对。但是，这些现有政党都极力想避免解散。它们都不能积极对待民众通过普选而登上政治舞台，毋宁说由于对普选有抵触情绪而害怕受新选举权者的审判。无论反对普选的政友本党或拥戴军人总裁的政友会，对大选都表示消极，希望实现不经选举的政权更迭。就连自认为实现普选的功劳者的宪政会内部也发生了分歧，滨口藏相和安达谦藏递信相等人，为避免无原则的妥协，主张解散议会，但官僚出身、贵族院议员的加藤首相和若槻内相却没有断然解散的勇气。加藤内阁想和政友本党妥协度过议会，而政友本党一方面想通过政本合作来牵制加藤内阁，另一方面，又和加藤内阁谈判，想私相授受政权。政党这样一脱离国民，贵族院和枢密院就有了充分策划的余地。

在通过普选法和治安维持法的时候，工人运动正在进行分裂。

在关东大地震时，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家不仅遭到军队、警察的迫害，而且还受到自警团等身边民众的迫害，这就使得这些运动对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重新进行反省。这个反省是左右两派共同的，但由此走向哪一方面却是个问题。山本内阁的后藤内相在声明立即实行普选的同时，就开始进行把国际劳工组织代表的选出方法改由工会互选的工作，这一工作在 1924 年 2 月清浦内阁时实现了。在还没有工会法的当时，这意味行政官方公认了工会。⑯ 在震灾后应付失业对策上，总同盟的铃木文治等人和内务官僚的结合也加强了。在 1924 年 2 月的总同盟大会上，宣布转换方向说："我国的工会运动已经到了应该从少数人的运动转向大众的阶段。对于改良主义政策的向来的消极态度，必须改为积极利用的态度"。

在这前后，京滨地区的共产彩色很强的东京东部合同等六工会加入总同盟，组成了左派，而且由于左派采取了揭露右派干部、篡夺工会干部的战术，左右两派的对立深刻化了。年末，总同盟关

东同盟会开除了左派工会。被开除的左派组成了关东地方评议会，直属本部。1925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决定解散关东地方评议会，左派立即发动总同盟革新运动，进行对抗，于是总同盟整个组织陷入了左右对抗局面。5 月，参加革新运动的工会被总同盟开除，成立了日本工会评议会。在日本工人运动中一直起核心作用的总同盟，就这样分成了两派。

1924 年 2 月解散了的日本共产党只留下了为进行联系的事务局，但 1925 年初，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在上海商议重建。共产国际反对总同盟的分裂，同时把总同盟右派作为攻击的对象。

反对治安维持法的斗争促成了"工人、朝鲜、农民及水平四团体"的共同行动而引起注目，但关键的工人运动却正在这时发生了大分裂。

① 《第二护宪运动秘话》，横山胜太郎主编《宪政会史》，1926 年，附录 13 页。这是根据斡旋两者会合的原宪政会议员冈崎久次郎的史料写成的。

② 冈义武《转换时期的大正》，224—225 页。

③ 大选和上次一样，按小选举区进行的，但宪政会乘政友会的分裂，在上次政友会大胜的郡部一人区大肆卷土重来。政友会策略家小泉策太郎曾说："我们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地方党员没有彻底了解分裂的意义，从而选举区的整顿没有就绪，这与其说运动费的不足，毋宁说轻视了敌党的兵站部，也就是说不能否认对敌情侦察有了疏漏之嫌"。(《怀往时谈》，1935 年，141 页)。

④ 高桥龟吉《大正昭和财界变动史》，上，1954 年，487 页。

⑤ 关于大藏省预金部问题，参阅山田幸太郎《论大藏省预金部》，1925 年，中津海知方《预金部秘史》，1928 年。

⑥ 该编辑室编《大藏省百年史》，上卷，1969 年，319—351 页。朝鲜银行的减资是二分之一，台湾银行为四分之一，朝鲜银行的监督权从朝鲜总督移到大藏大臣。

⑦ 《战史丛书》，《陆军军需动员(1)》，1967 年，239—253 页。军需局后来成为国势院的一局，1922 年撤销。整备局是以超越军需工业动员法领域的国家总动员为目标的。

⑧ 《战史丛书》，《关东军(1)》，1969 年，19—20、39—40 页。

⑨ 稻叶正夫《永田铁山和二叶会·一夕会》刊行会编《秘录永田铁山》，1972 年，433—438 页。

⑩ 司法省刑事局《右翼思想犯罪事件的综合研究(思想研究资料第 53 号)》，1939

年，《现代史资料 4 国家主义运动 1》，1963 年，34—39 页。

⑪ 《古岛一雄清谈》，1951 年，133 页。

⑫ 木坂顺一郎《反对治安维持法运动》，《日本史研究》，118、119 号（1971 年 4 月 5 日）。

⑬ 参阅奥平康弘《天皇制国家统治人民》《大系日本国家史 5 近代 II》所收，《季刊现代史 7 治安维持法体制专辑》，1976 年 6 月。

⑭ 众议院反对的是，革新俱乐部的尾崎行雄、清濑一郎、星岛二郎、汤浅凡平、田崎信藏；中正俱乐部的今里准太郎、阪东幸太郎、本田义成、畔田明、山本慎平、佐藤润象；实业同志会的武藤山治、前野芳造、森田金藏、古林喜代太；无党派的猪野毛利荣、湛增庸一、菊池谦二郎（木坂前引论文）。

⑮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编》，第 4 卷，1968 年，176 页。

⑯ 其结果，工会会员从 1923 年末的十二万六千人，激增至 1924 年末的二十二万八千人，组织率也从百分之三点二增至百分之五点四。其中也有以海军工厂的共济会改为工会的例子。总同盟会员人数有二万九千人，是工会运动的核心。总同盟的铃木文治和官业工会的川村保太郎被选为 1924 年的国际劳工组织工人代表，西尾末广和米洼满亮被选为随员。

第二节　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工农斗争

币原外交和中国的动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但在 1920 年中期就低落了。因战败和通货膨胀而处于困境的德国，于 1923 年爆发了共产党暴动，但以失败而告终，德国革命的最后尝试遭到了挫折。接着以反革命为目标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发动了政变，但这也失败了。可是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在上年已经当了首相，到 1926 年时，确立了法西斯党独裁统治。形成国际纷争导火线的德国赔偿问题，于 1924 年达成妥协，在 1925 年，英、法、德、意和比利时缔结了保障德国西部国境现状的洛迦诺公约。德国于 1926 年加入了国际联盟。由于美国的巨额投资，德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经济重建取得进展，促进了产业合理化。世界资本主义迎来了所谓相对稳定时期。

闯过了干涉战争和内战但仍面临经济凋敝的苏联，一方面根据新经济政策，力图恢复生产力，另一方面和资本主义各国恢复了贸易。并于1922年和德国缔结拉巴洛友好条约，在1924年和英国、意大利等国恢复了邦交。列宁在逝世前一年1923年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中，促使"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欧"注意：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东方"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709页)。

中国仍然继续着军阀割据，但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族解放要求渗透到群众之中，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活跃起来了。组织了广东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主张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推进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根据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国民党改组成大众的政党。还决定创建国民革命军，并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

苏联同中国北京政府也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于同年5月缔结了中苏协定。该协定宣布，在沙皇俄国缔结的条约和协定中，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款无效，关于中东铁路，认为纯属商业性企业，不具有军事上、行政上的特权，实行中苏共同管理。① 把中东铁路置于自己势力范围的张作霖，在和直隶派北京政府抗争中，声明不承认这个协定，不久第二次奉直战争的形势一紧张，便和苏联缔结了奉苏协定，将旧俄外交机关和中东铁路所定的职位，交给了苏联政府的代表。

另一方面，美国于1924年5月制定了排日移民法，对日本人的移民和已被禁止的其他亚洲人一样实行全面禁止。这个法案挫伤了因关东大地震而过敏了的日本人的自尊心，唤起了国耻意识。华盛顿会议以来的国际协调主义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国家主义的

抬头。未来日美必战的呼声到处流传，也出版了几部以此为主题的小说。由于虎门事件的冲击，出现了强调国体论的右翼团体，紧接着反美和宣传军国主义的右翼和军人的团体也诞生了。

1924年6月，加藤护宪三派内阁一成立，币原外交开始了。币原是从外交官领事官考试合格者出身的最初的外相。币原外相采取国际协调主义，进行经济外交。对中国，他主张尊重其合理的立场和拥护我国合理的立场。

在币原外相就任以前，在北京，芳泽谦吉公使和苏联卡拉罕大使就开始了日苏谈判。1925年1月，缔结了日苏基本条约，日本从北库页岛撤兵。苏联在声明不承担沙皇政府的政治责任之下，承认朴茨茅斯条约，对日本作出让步，承认了北库页岛的石油、煤炭利权和苏联沿岸的渔业权等经济权益。西伯利亚武装干涉，就这样宣告结束。

在中国，直系掌握了政权，但它的暴政受到了舆论的批判。奉系的张作霖和孙文、段祺瑞合作对抗直系。1924年9月，发生了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东北三省也开始传播国民党的革命思想，这年春天，发生了要求引渡关东州内中国人罪犯和收回满铁附属地内的中国教育权的运动等。奉直关系一紧张，张作霖一方面压制这种收回利权运动，另一方面宣传在直系背后有英美撑腰，要求日本援助。张的军事顾问本庄繁少将等人倾向于对张援助，但币原外相不仅考虑到"满蒙"权益，而且还考虑到中国各方面的利益和国际政局形势，坚持了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在张军败退，直系吴佩孚军队逼近山海关时，在阁议上也出现了援张论，但币原不惜以去就力争反对。可是，这一天直系军部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吴军败退。币原外相的不干涉方针获得成功。但是，在冯的政变背后，有日本预备军人参与活动，陆军中央部对此也给予支持，因而也可以看作是，陆军想通过派到当地的军人使军阀抗争向有利于

日本方面发展的秘密干涉，收到了效果。②

但是，冯虽然是个军阀，却以基督徒将军出名，受了国民革命的影响。政变成功之后，冯组织国民军一改直系的反动政策，释放政治犯，广开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工人运动也重新组织起来了。冯为了对抗奉系，邀请孙文。孙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从广东北上。在这期间，奉军进入北京和天津，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掌握了北京政府。

孙文途中顺便来到神户，宣传日本应该在各国中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帮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但是，包括孙文的老朋友犬养递信相在内，日本方面不打算接受这点，加藤内阁事实上拒绝孙文到东京去。③孙文在人民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中到达天津，但各国以尊重既存条约为前提，采取了支持段政权的态度。孙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

一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就加强了经济攻势，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大战中获得巨大利润的日本大纺织公司，大战后打进中国，陆续收买了因不景气而经营困难的中国工厂，发展了在华的纱厂。目的是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以预防日本国内的增加工资和最近预定废除的深夜劳动，以及中国的提高关税。在华的纱厂最初集中在上海，后来上海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又打进了军阀统治下的青岛。

1925年2月，在上海的日本内外棉纱厂劳动的中国工人，为反对日本职员的野蛮的劳务管理，掀起了罢工。到4月已扩展到青岛的日本纺纱厂，但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被奉系军阀镇压下去了。乘直系军阀没落之机，一直受到压制的中国工人运动，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出现了高涨。到了5月，上海内外棉纱厂的罢工再起，并发生了中国工人死伤事件，共同租界警察还逮捕了抗议运动中的学生。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抗

议示威，英国警察局长下令开枪，造成了许多伤亡的流血事件。由于这次五卅事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一下子高涨起来。在上海同时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成立上海总工会，领导罢工，提出包括确立罢工权、撤退外国军队和废除领事裁判权在内的广泛的要求，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然而，总商会不肯赞成，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罢工和抵制外货运动等反帝运动，扩大到中国各地。6月23日，英军对香港对岸沙面的示威民众开枪，造成了有二百多人伤亡的事件。香港工人掀起了总罢工。中国想把反帝运动的目标集中于英国，但各国大都与之协调，持以强硬态度。6月中旬，奉军开到上海，宣布戒严令，外交团对总商会等进行离间工作，9月，奉军封锁了总工会。

就在这时，10月，召开了北京关税会议。这是一次为了实施华盛顿会议上所规定的二分五厘附加税的会议，但中国的学生、工人主张无条件地收回关税自主权，举行反对会议的示威游行，中国政府也要求从1929年开始废除厘金和实行国定税率。大量输出棉制品和杂货等的日本，因提高关税将受到打击。币原外相采取了如下的方针，即：在各国中带头在原则上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另方面则和中国就物品等级各自不同的等差税率达成协定，以便压低日本主要输出品的税率。

在反帝运动高潮中，段政权加深了动摇。各国企图以承认征收二分五厘附加税对它加以支持，但币原外相要求把加征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西原借款等。在这期间，不仅段政权倒了台，而且由于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京政府本身陷于不稳定状态。关税会议于1926年7月，陷于无限期延期。

在北京关税会议正在进行的1925年秋天，中国又发生了内战。中国人民对镇压五卅事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反感越来越大，

直系军阀乘机发动了反奉战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参加了。11月，奉天军阀的开明派郭松龄掀起叛乱，自称东北国民军，逼近奉天。当地驻在的日本军人和外交官都注意到郭松龄在勾结国民党而主张干涉，但币原外相等人重视整个中国的形势，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但当郭军一进攻，政府便通过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对张、郭两军提出警告，不准在满铁附属地附近采取军事行动，这就阻碍了郭军的进攻。关东军还暗中帮助张军，结果郭军失败，郭松龄夫妻被杀害。币原外相对于“满蒙”权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军部采取了同一步调。郭军的失败也影响了北京的政局。以此为开端，奉直两派攻击国民军，各国也胁威国民军。于是国民军撤退到北方，冯玉祥被迫下野出国。3月18日，当北京民众举行反帝游行示威的时候，段政权下令对之开枪，造成三百多人的伤亡。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共同镇压，北方的革命运动一时走向低潮。

在广东，国民政府左右两派的对立也尖锐化了。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以共产党驾驶中山号军舰，企图推翻政府而加以镇压，接着又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在这种形势中，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的呼声加强了，7月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北伐，香港的罢工停了下来。

垄断资本的发展和二重结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在相对稳定时期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向高度化发展。政府为应付因关东大地震而越来越多的入超，试图提倡国货，促进输出，并在1926年的关税改革中，加强了对重要产业的关税保护，新设了对钢铁业的补助金。由于整顿行政财政的物价稳定，促进了产业合理化。

1925年以后，重工业、化学工业切实扩大了生产，特别是每人平均生产额急剧上升。作为基础资材的钢铁生产急剧增加，依靠

输入的程度下降了。钢材的需求，虽然在军需方面减少了，但由于城市建筑、电力和铁路建设投资的增加，却扩大了。在电力工业方面，包括外资在内，进行了巨额的设备投资。由于电费低廉，电力使用普及了，包括现有产业在内的中小工厂都动力化了。随着电力的普及，与电机、电线等有关的工业也发展起来了。以电力为主要原料的化学肥料工业也发展了，硫安代替豆饼，作为肥料，开始被广泛使用了。

轻工业也实行了合理化，棉纺业达到了先进国家的水平。尤其以汇率低落、采用自动织机和原棉操作为武器，发展了棉布的出口，打进中国中部和南部、印尼、印度和埃及等新市场。大纺织业还向中国输出资本，在中国开设纱厂。蚕丝业也靠大缫丝业者的财力，在生产、流通两方面进行了合理化。还由于政府的奖励，大部分养蚕农户被组织在养蚕组合内。其中将近一半是接受大缫丝家技术指导的特约组合。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特别在控制工业的银行、金融业和集中巨额投资的电力业中，实行了垄断。掌握大银行的财阀，为了控制工业而扩大直系企业，同时，通过银行贷款掌握企业的统治权。财阀还利用流通领域内的控制力量，对系列外的企业方面，也获得了垄断推销权和垄断收购权。在这种情况下，不具备强有力的金融部门或独自技术的二流财阀和地方财阀，一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就有的破产，有的衰落了。

资本主义的高度化和垄断的进展，产生了所谓二重结构。④战后经济危机以后，农业生产停滞，只是蚕茧、水果和畜产增产了。农业所得和农业工资，自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就猛烈下跌，其实在 1920 年代后半期，就已经明显了。在要求振兴农村政策的高潮中，政府替代衰退的地主势力，走向直接控制农民的道路。如上所述，抽掉租佃法的租佃调停法在加藤三派内阁最初召开的第

四十九届议会上就制定出来了，接着于1926年施行了维持、创建自耕的辅助规则，这都是为要防止租佃问题的激化和抑制地主制的动摇。产业组合中央金库于1924年开始营业。这是中央的国家资本亲自出头来代替以前跟产业组合相结合的地主的地方银行。1925年农林省独立，扩大了向农村提供补助金的渠道。在1926年第五十一届议会上，围绕税制改革，加藤宪政会内阁和政友本党主张免除小土地所有者的地税和由国库负担义务教育费的增额案；而政友会则主张把地税和营业税拨给地方案，形成对立。为了扩张党势，各党分别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针对地方财政及农村贫穷的方策。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层对于农民组合领导阶层的自耕兼佃耕农上层进行活动，以谋求其体制化，而自耕兼佃耕农上层作为精耕细作的农民，也加强了争取在体制内改善地位的倾向。⑤

农业的萧条，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大企业，正在力求产业合理化和节约劳动力。大企业雇用的新劳动力急剧减少。为了保存熟练工人，防止工人运动的渗入，也采用了到一定年限就按照工作年限优待工人的按资付酬的工资制度。因此，大企业工人的工资没有降低，由于物价下跌，而提高了生活水平。由于急剧减少了新工人的采用，出现劳动力过剩，失业成了社会问题。就连熟练工人也在年岁大、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技术时，或者被大企业解雇，或者因中小企业的破产，丧失了安定的地位。因为劳动力过剩、不太需要继续工作和经验的纤维工业和中小企业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降低了，扩大了同大企业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额。大企业为了补充熟练劳动力的不足，采用雇用期较短的低工资的临时工，把它作为景气变动的安全阀。临时工制度，在1927年前后成了惯例。与此有同样意义的是，大企业把生产的一部分转包给中小企业的承包制度也从这时开始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朝鲜工人的迁来急剧增加了，他们

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从事一向由低工资的女工所从事的港湾、土木建筑和矿山等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被歧视的部落民和冲绳县以及奄美诸岛等的出身者也有同样倾向。⑥这样，形成了多层的劳动市场，象后叙那样，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试比较1920年和1930年的就业结构，就会知道过剩劳动力流入到哪些部门。这个时期，运输、通讯等公用事业正在发展，这些事业的从业人员和事务员的增加也很显著，但增加最多的还是批发零售业的业主，也就是小零售商人及其店员以及服务行业的人员。估计其中大多数是找不到雇主陷于穷困的工人，忍受低收入而就业的。在这个时期，从1909年以来一直在减少的雇用五至十人规模的零星工厂，有了大幅度的急剧增加，吸收了过剩劳动力。这些零售商人和零星工业，依靠大企业和大商人，处于受其剥削的关系，构成二重结构的底层。1922年通过的健康保险法，也把不适用工场法和矿业法的零星企业和商业以及服务行业的就业者给除外了。⑦

在垄断进展的过程中，大城市膨胀了。出现了工薪生活者的增加、职业妇女的登场、百货商店和私人铁路的发展以及近郊村镇的合并等大众社会的现象。可是，百货商店的发展，威胁中小商人。原内阁以来的大学、专门学校的扩建，造成了"大学毕业生"的就职困难。报纸的企业化、广播事业的开始以及大众杂志的出现等社会宣传也发展了。小市民虽然不安定，但也享受着自由主义空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⑧，闷在个人生活圈子里面，也增强了容易为社会宣传所操纵的倾向。

无产阶级政党和工农运动

1925年4月，普通选举法刚一公布，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就具体化了。早在1923年末，以岛中雄三、铃木茂三郎等从自由主

义者到左翼的知识分子为中心，为了调查研究无产阶级政党设立政治问题研究会，后来改组为组织政党的准备团体—政治研究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支部，到了1925年，评议会、水平社青年同盟和地方上急进的青年们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总同盟和日本农民组合对参加这个组织表示消极，因为它们想把无产阶级政党置于工会领导之下。

在1925年6月，日农号召劳动团体组成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8月，包括总同盟、评议会在内的劳动团体，再加上政治研究会、全国水平社和水平社青年同盟组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准备会。但是，在这个纲领调查委员会中，评议会、政治研究会等的左派和总同盟、官业劳动总同盟等的右派，事事发生对立。在殖民地问题上，左派主张解放殖民地，而临场监视的警察威吓说，果真如此就勒令解散，结果落到右派所主张的殖民地自治上。11月，总同盟退出准备会，在日农的斡旋下，评议会也退出了。

12月1日，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农民劳动党成立了，决议表示希望总同盟和评议会参加。浅沼稻次郎被选为书记长。可是，在建党后不久，若槻内相以除了向外部发表的纲领之外，还有实行和国体不相容的共产主义的企图为理由，根据治安警察法命令禁止结社。普选虽然实现了，但政治自由却被置于严厉限制之下，政府利用这点在左右两派之间钉进一个楔子。

农民劳动党一被禁止，立即开始了重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运动。这次没有采取抗议政府镇压的形式，而是考虑政府的取缔方针，排除评议会和政治研究会等具有共产主义彩色的团体，于1926年3月5日建立了劳动农民党。日农的杉山元治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长。但是，该党在建党后不久左派就要求"门户开放"，围绕这个问题，左右两派的对抗激化了。

在护宪三派内阁以来的紧缩政策之下，进行企业合理化和整

顿，其影响都强加到工人身上，于是 1926 年劳资纠纷急剧增加。总同盟和评议会“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并力求开辟空白的地方”，就是其原因之一。其中摆脱了右派干部约束的评议会的活动很活跃。资本家方面也加强组织，施展强硬的纠纷对策，想乘纠纷之机“扫除工会势力”，而工人则以工会势力为背景与之对抗。纠纷深刻化和长期化了。[9] 1926 年，东京的共同印刷厂的纠纷、滨松的日本乐器厂的纠纷，都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对于急剧扩张势力的评议会，资本家方面团结起来挑起决战。针对右翼暴力团体的介入，和警察的干涉，评议会组织了地下领导机关进行对抗。在 1927 年的野田酱油厂纠纷中，资本家的攻势针对总同盟，斗争达八个月之久。纠纷也给予了资方以打击，但是工人终于失败了。这一阶段的纠纷，以中等企业为中心，而且其规模急速缩小了。

租佃纠纷在 1926 年为二千七百五十一件，参加佃户为十五万一千零六十一人，参加人数达到战前最高点。在这之前的纠纷，在农民的小商品生产的开展过程中，自耕兼佃耕农和佃农各阶层，为统一减低地租而斗争。对此，地主阶层于 1925 年组织大日本地主协会，通过禁止进入耕地和扣押青苗等法庭战术转向积极的攻势。在新潟县木崎村的租佃纠纷中，反对禁止进入耕地的暂时处分的佃户三十余人，以防害执行公务而被逮捕了。确立耕作权成为农民运动的要求。确立耕作权和团结权以及请愿解散议会的运动，从京都地方扩展到了全国。

在这种形势下，制定以某种形式承认工人的团结权、罢工权和佃户的耕作权的工会法和租佃法成了问题，但这些法案没有实现。

1925 年 8 月，内务省社会局公布了承认工人的团结权和罢工权的工会法案。这个社会局原案，作为政府方案来说是最广泛地保障了工会权利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遭到资本家方面的激烈

反对，在召集各省代表的行政调查会中，斟酌资方的反对意见作了修改，制成政府案。工会方面则认为这是取缔工会的法案表示反对。这个工会法案在1926年初提交给第五十一届议会，但以审议未了而告终。在这届议会中，修改了治安警察法，取消了禁止诱惑、煽动总罢工的第十七条，但代之而制定了规定对公益事业和军事工厂的纠纷进行强制调停的劳资纠纷调停法和加重处罚群众行动的暴力行为等处罚法。

在这年5月，设立租佃调查会，草拟了租佃法草案。这个草案比起1921年彻底确立耕作权的租佃法研究资料，是极其温和的。即使如此，大日本地主协会还强烈反对，日农也表示只要不废除扣押青苗、禁止进入耕地就加以反对。在这个法案还没有提到议会时，宪政会内阁就倒台了。

大地震以后，学生运动活跃起来了。他们面对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关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和天皇制正面对抗的，作为全面掌握现实，指导其变革道路的唯一理论，抓住了他们的心。在1925年4月，学校实行军事训练时，以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学联）为中心，掀起了反对军训运动。10月，由于小樽高商的军事教官以"不法鲜人"的暴动为假定而进行演习，使运动爆发了。但在12月，特高警察检举了京都帝大和同志社大学与学联有关的学生，1926年1月，对学联的纲领制定和教程的协议，首次适用治安维持法，起诉了三十余名学生。紧接着冈田良平文相通告高等专门学校和大学预科的学生不准研究社会科学。

在同年一月，由于福冈第二四连队的差别待遇事件，水平社青年同盟掀起了揭露差别斗争，并结合同年7月反对开设青年训练所的实行军事教育，扩大了反军斗争。但在11月，由于捏造出福冈连队爆炸阴谋事件而受到镇压，松本治一郎等人被判为有罪。

在工人、农民的权利毫无保障，以扩大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为

目标的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如何推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是个重要课题。

在这种形势中，在1925年9月出版《无产者新闻》，并正在重建共产党的左翼中间，福本主义抬头，具有压倒的影响力。在山川均的联合战线党的主张造成的混乱中，从留学国外归国的福本和夫提出了由先锋党进行领导的问题，他极力主张利用反对绝对专制势力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必要性。但福本同时还认为先锋党应当通过理论斗争来争取，强调"结合前的分离"，使工农运动的分裂合理化了。他用理论至上主义和先锋的使命感吸引了新参加运动的学生们。在这个时期，反对失业斗争、解散议会请愿运动和健康保险费斗争，争取政治自由和对政府的斗争也在积极进行，通过工厂代表者会议形式的共同斗争也在发展。但是只用理论来分析现实，引导大众斗争的作法，结果在残酷的镇压下以街头斗争而告终，招致了运动的衰退。在共产主义者之间也发生了内部纷争，铃木、猪俣以至于连山川也脱离了主流。

在解散议会请愿运动的高潮中，左派展开了通过建立地方支部夺回劳农党的运动。总同盟等的右派，认为不能和共产系团体共同行动而退出劳农党，经安部矶雄、吉野作造等人的提倡，于12月组织了社会民众党。不满意总同盟的右翼倾向的麻生久和加藤勘十等中间反对派，和浅沼稻次郎等日农的中间派结合起来组成日本劳农党，总同盟和日农也都分裂了。劳农党以左派为中心，进行了改组，大山郁夫当了中央执行委员长。

① 中国根据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把撤出俄国铁道守备队作为对日本要求撤兵的理由。参阅信夫淳平《"满蒙"特殊权益论》，1932年，471—489页。

② 池井优《第二次奉直战争和日本》，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218页以下。

③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192—194 页。

④ 参阅中村隆英《战前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分析》，1971 年，第七章《二重结构》的建立。

⑤ 金原左门《大正民主的社会形成》，1967 年，172—184 页。

⑥ 岩村登志夫《在日朝鲜人和日本工人阶级》，1972 年，104—110 页。

⑦ 隅谷、小林、兵头《日本资本主义和劳动问题》，1967 年，192—193 页。

⑧ 江口圭一编《大正民主(讨论会日本历史 20)》，1969 年，339 页。

⑨ 隅谷三喜男《日本工人运动史》，144 页。括弧内引自内务省社会局《工人运动年报》。

第三节　田中政友会内阁

三党首脑会谈和金融危机

1926（大正 15）年，政界中揭发丑闻和互相攻讦的事多了起来。在这年年初的第五十一届议会时，加藤首相突然死去。若槻内相任宪政会总裁，继承内阁，他和政友本党妥协，渡过了议会关。在这届议会上，政友会田中总裁进入政友会时带来的三百万日元事件和同它纠缠在一起的当年出兵西伯利亚的机密费事件被揭露出来，遭到了攻击。宪政会的中野正刚一追究这个事件，政友会就进行反宣传说：中野是苏联的爪牙。

这年夏天，发生了朴烈的离奇照片事件。一分附有被认为计划暗杀摄政的朴烈（朴准植）把他的妻子金子文子抱在膝上的照片的怪文件分发到各地，其中攻击若槻内阁和江木翼法相对被判处死刑的朴夫妻给予特赦、减为无期徒刑的“优待”，缺乏国体观念。① 这件怪文书是由得到这张照片的北一辉和政友会前法相小川及森恪等人密谋，写成后分发到各处的。政友会抓住这个事件，打着“维护国体”的旗号，猛烈攻击政府。恰在此时，和迁移大阪松岛花柳街有关的贪污事件被揭发出来，政友和宪政两党的干部被检举了。11 月，若槻首相以伪证罪被告发，受到了审问。政友会

抓住这些问题，和右翼相呼应，把贵族院和政友本党拉过来，攻击若槻内阁。

12月25日，大正天皇逝世，已经摄政的皇太子裕仁继承皇位，改年号为昭和。1927（昭和2）年1月，第五十二届议会复会时，政友会和政友本党以朴烈和松岛花柳街两事件为理由，提出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按常规当然要解散众议院，但是若槻首相让议会休会，同在野党的田中、床次两党首脑会谈，以“新帝新政之初”为理由，提议停止政争，在野党两总裁要求“慎重考虑”，便撤销了不信任案。舆论对这次政治交易深为失望，就连阁内曾经期待解散的滨口内相和安达递信相也更加不满。这次避免解散是由政界情报通松本刚吉和研究会的有力者勾结之下进行的策谋，使高举国体问题进行的攻击，失掉了通过国民审判进行反击的机会。②

接着以处理震灾票据问题为开端，发生了金融危机。三党首脑会谈之后，宪政会和政友本党结成联盟，谋求在两党间私相授受政权。被抛弃的政友会，则出面攻击政府发放国债来整顿震灾票据，是救济部分资本家的方策。因此，对持有震灾票据的银行越来越感到不安。从3月15日起，存款的挤兑开始了，东京和横滨的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停业。4月，曾对铃木商店放出巨额贷款的台湾银行，陷入了窘境。于是三井银行就撤回对台银的短期资金，台银濒临破产。若槻内阁向枢密院提出以二亿日元为限由国库补偿、救济台银的紧急敕令的提案，但被枢密院否决了。以枢密院为根据地的伊东巳代治和平沼骐一郎等官僚政治家，反对币原外相的对华政策，他们和政友会呼应，图谋推翻若槻内阁。然而若槻内阁也不是无计可施的，办法之一是，可以用责任支出来摆脱危机，然后在临时议会上请求批准，还有对枢密院进行对抗上奏的办法。但是政府从三党首脑会谈以来的不明朗作法，使得采取这种坚决态度有了困难。

正在这时，在中国，国民革命军正以破竹之势进行北伐。国民革命军得到渴望从军阀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协助，很快于 1926 年 9 月占领汉口，又于 1927 年 3 月占领了上海和南京。北伐的进展使反帝斗争高涨起来。1927 年 1 月，武汉人民群众用实力收回汉口的英租界，在九江也接着收回了英租界，英国被迫归还了这两个租界地。然而英国出兵上海，显示出和中国革命对抗的姿态。当占领南京时，英美军舰借口中国军民袭击了外国领事馆和住宅等，对南京城内进行了炮击。但是，币原外相没有响应英国的出兵建议，日本军舰也没有参加炮轰南京，而着眼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对立，进行了离间蒋介石的交涉。但在日本国内，和中国有深切关系的纺织业界等，却强烈要求实行强硬外交和保护权益。政友会抓住南京事件攻击币原外交。宇垣陆相也害怕中国共产运动波及到华北和"满蒙"，主张和各国共同进行军事干涉。

4 月11日，英、美、日、法和意大利五国一齐向中国提出了有关南京事件的最后通牒。蒋介石于翌日 12 日，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解除工人武装和逮捕共产党员，为对抗武汉政府，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张作霖也搜索了苏联大使馆等。这样，中国国民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攻击开始分裂了。

在帝国主义各国开始干涉期间，2 月，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向无产阶级政党各派呼吁支持中国革命，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华不干涉运动。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分裂，步调紊乱了。劳农和日劳两党曾经一度联合进行斗争，但是 5 月对华不干涉同盟的组成是以劳农党为中心推进的，从而受到了残酷的镇压。社民党转向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5 月，在汉口召开太平洋工会会议，交流了亚洲和太平洋各地区反帝斗争的经验。

若槻内阁于 4 月 17 日实行总辞职，元老西园寺推举政友会的

田中总裁为后任首相，20日组成了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台湾银行已经被迫停业，金融危机波及到全国。前首相高桥就任藏相，首先发出以三个星期为限的延缓偿付的紧急敕令，令日银发放非常贷款。并召开临时议会，使之通过了以五亿日元为限，由国库补偿的对台银和其他银行给以特别贷款的法案，度过了金融危机。

日本资本主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放宽投资，在战后经济危机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却一直不断用政府救济和银行贷款等来加以掩饰。金融危机使这种病灶冒出脓来。金融危机迫使台银、十五银行和近江银行等大银行在内的三十七家银行停业，进行整顿。一般中小银行也受到打击，存款集中到大银行和邮政储蓄。铃木商店和川崎造船厂以及与这些银行有往来的企业也被迫进行整顿。中小企业不仅因为往来银行的停业和停止交易受到损害，而且由于中小银行的没落，发生了金融困难。由于金融危机，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五大银行，称霸金融界，连产业界也确立了财阀系企业的统治。这一年制定了规定最低资本金的银行法，促进了中小银行的限期合并。大藏省为了防止银行集中于大城市，奖励地方银行之间的合并。大银行由于大城市和地方的利率不同，在吸收地方银行方面表示消极。③ 结果加强了大银行和地方银行的二重结构，政府不得不利用以邮政储蓄为主要财源的大藏省预金部资金等，谋求资金还原于地方。

第一次普选和三·一五检举

田中内阁的班底，反映了田中总裁就任以来政友会面貌的变化情况。在政友会中虽然是个新手，但曾经帮助田中掩盖贪污事件的前法相铃木喜三郎，④ 就任了副首相格的内务大臣。外务大臣由首相兼任，对华强硬论者森恪任政务次官，掌握了实权。森恪和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农林大臣山本悌二郎在朴烈事件中一起活动过。

从律师起用而博得好评的法相原嘉道，也是国本社的一员。担任满铁社长的山本条太郎和森恪同为三井物产公司的中国派出身，山本农林大臣也是三井系的。金融危机告一段落，高桥大藏大臣便辞职了，三土忠造文部大臣任大藏大臣，贵族院的水野錬太郎继任文部大臣。这就预告了执行的是反动和侵略的路线。

另一方面，下野的宪政会和政友本党联合起来，组成立宪民政党，成为第一党，前内务大臣滨口雄幸被选为总裁。民政党在政纲中宣称"要把全体国民的意见反映到帝国议会，贯彻天皇统治下的议会中心主义"，强调实行社会政策，于是二大政党时代到来了。

招致二大政党时代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确立了政党内阁的惯例。为了能够成为执掌政权的多数党，促进了政党的联合。政党更加靠拢了统治体制。在野党民政党为了接近政权，在努力诉诸舆论的同时，还必须向元老以下的特权势力讨好。垄断资本统治的确立，地方财界的衰退，更显著地加强了靠紧垄断资本的党干部的党内统治力。俗称三井的政友会、三菱的民政党。即使并非完全如此，但政友会的山本条太郎和宪政会的仙石贡等这些分别把三井、三菱和政界结合起来的人物，占据了内阁阁员和满铁总裁等要职，通过这条渠道流入了巨额的政治资金。打出诉诸民众的独自政策的政党和政治家存在的基础显著地缩小了，其中的一部分不久之后便开始走向同军部结合的方向。

为了应付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田中内阁于5月末，以保护侨民为理由，出兵中国山东省。这是根据森恪的强烈主张搞的。这次出兵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的武汉、南京和北京三政府一致提出抗议。6月，以驻中国的外交官和陆海军当局为中心召开东方会议，公然采取了为保护权益的军事干涉政策和分离"满蒙"政策，和币原外交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接着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蛮横地向张作霖要求修筑铁路，致使奉天全省的

排日运动高涨起来。对吉田的这种作法就连日本方面也有强烈的批评，于是满铁社长山本出面代替，在秘密中进行了谈判。满铁为了建设铁路，和美国摩尔根财团进行了借款谈判，但因中国坚决反对，结果停止了借款。

日本出兵山东以后，由于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纷争，北伐停顿，日军于9月撤兵。在这期间，武汉政府和冯玉祥都转向反共，蒋介石下野，武汉和南京两政府合并了。蒋介石访问日本，和田中首相会谈，只在反共这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1928年1月，第五十四届议会在众议院议员任期即将届满而被解散了，这才得以根据普选法实行大选。在这之前，铃木内务大臣对党派彩色极为露骨的地方官实行大调动，甚至在不准在野党质问施政方针的情况下，实行了解散。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屑说了，连对于民政党也实行了严厉的选举干涉，“一提起三百万日元，或机密费，就停止演说，……使民心激愤”。[5]政民两党的选举资金都很丰富，展开了大规模的收买战。当政府取缔时，不仅对政府党候选人加以关照，内务省还编写了逃避法律行为的指导书发给了他们。在投票前一天，铃木内务大臣发表声明，否认政党内阁、认为议会中心政治和国体不相容。

2月20日大选结果，政友和民政两党不相上下，在全部四百六十六个议席中，政友会占二百一十七席，民政党占二百一十六席，占了九成以上。政友会虽然勉强成为第一党，但距离过半数还很远，从它是执政党来考虑，事实上是失败了。主要报纸采取了批判政府的立场，这对民政党有了很大好处。尽管实行了普选，而上届议员得到再选的很多，和以前相比，出现了更老的众议院。需要巨额选举费是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6]

无产阶级政党合起来只有八名当选。无产阶级各党起初订立了选举协定，但是由于劳农党没有遵守，协定失效，造成胡乱竞选

状态，使选举人大为失望。当选者是社民四、劳农二、日劳一和地方无产党一，按地方来看，东京只是一人，集中到关西和北九州。得票数为总数九百八十六万票中的四十八万票。

在4月召开的第五十五届特别议会上，掌握决定权的中立议员明政会，提出政治国难决议案，民政党也支持这一提案，弹劾铃木内相。政府命令休会，试图进行离间，但在野党把议员关了起来进行对抗，成了讽刺时局的漫画的绝好材料。田中内阁最后还是免去铃木内务大臣职务，和明政会妥协，度过了议会关。

议会以后，田中首相任命望月圭介递信相为内务大臣，而委派田中财政上的援助者并和铃木商店同为巨额震灾票据发行者的久原房之助为后任递信相。党内也有人表示反对，水野文部大臣提出辞呈，虽因受到天皇"优诏"而暂时留任，但因接着这件事演成政治问题后而辞职了。田中首相任命西原借款的负责人、贵族院研究会的胜田主计为后任文部大臣。

在上年7月，共产国际同1926年末重建的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协商，就日本问题作出决议，即所谓二七年纲领。这个纲领从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说起，认为急剧扩大了势力的日本资产阶级，由于惧怕工农运动而和地主阶层结合起来，而具有封建属性的国家，又和它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认为日本革命应该是从以国家机关民主化和废除君主制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该纲领还说明必须有以工人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和广泛的各种群众组织，批判了工农运动的分裂。但是，这个纲领本身接受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方针，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把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把其左翼作为危险敌人而加以抨击。另一方面，曾经批判过重建共产党的山川和猪俣等人，认为该纲领过高评价了地主制和绝对主义势力，而采取了反对立场，不久形成了

劳农派。

在大选时，共产党使党员作为劳农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号召人民群众"建立工农政府"。田中内阁在召集议会之前的3月15日，对同共产党有关系者进行了大检举。铃木内务大臣起用起草过治安维持法的前司法省刑事局长山冈万之助为警保局长，山冈全面地适用了治安维持法。被检举者达一千六百名，在严刑拷打之后，约有五百名以违犯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其中学生和青年占据多数，特别引起注目。4月10日，政府允许报纸发表这个事件，蛮横抨击其为冒渎国体尊严，并将劳农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作为共产党的外围团体，根据治安警察法迫令解散。紧接着东大的新人会和各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遭到禁止，河上肇等五教授被赶出了大学。

田中内阁接着在第五十五届临时议会上提出了治安维持法的修改案，对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结社行为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等重刑，另外把"为了达到结社的目的的行为"列为处罚对象，开辟了对结社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也一样处罚的道路。在执政党不占有绝对多数的议会中，这个法案成了废案，但是田中内阁在议会结束后的6月，竟不顾阁内的反对，决定以紧急敕令形式将其公布了。对此，不但东京帝大美浓部教授，连上杉教授也表示反对，就连枢密院中，反对论也强烈起来了，但在这次破格地花费了两天的大会上，却照原案通过了。政党内阁竟公然无视了议会。接着在全国各府县设置了特高警察。

三·一五的检举和接踵而来的镇压，不单给共产党，而且也给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运动以打击，政治自由不屑说了，连学术自由也广泛地受到侵害。但只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分裂得很严重，所以没能进行统一的反击。共产党立即重建组织，并劝诱劳农党进行重建，但在同年末，由于共产国际方针改变，突然变为合法

致党无用论，采取了除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全协以外排斥一切的方针。合法无产阶级运动方面，尽管抗议这次镇压，但却强调和共产党划清界限。民政党虽然反对治安维持法的修改，但却支持检举共产党。

炸死张作霖事件和田中内阁的瓦解

继三·一五检举以后，田中内阁为对付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于4月19日再次出兵山东。田中内阁的对华强硬政策，激发了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中国和各国的反对。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后不久，5月3日，日中两军发生冲突，日军为了显示国威而增兵，8日攻打济南城，并占领了该城，中国方面的伤亡人数达五千多人。

济南事件以后，国民革命军仍继续北进，张作霖军队的失败已经明显。满铁社长山本乘此机会，使之签订了悬而未决的修筑“满蒙”五铁道的承建合同。18日，日本政府通告南北两军说，如果战乱达到“满洲”时，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并劝告张作霖回“满洲”去。这是等于战争宣言的通告。国民政府固不待言，连张作霖也对日本这个通告提出抗议，美国国务卿也谴责了这个通告。但是，国民政府委婉地表示，如果奉军撤退，就不进攻长城以北。⑦这么一来就没有出动关东军解除武装的必要了。田中首相和山本满铁社长想利用张作霖来掌握“满洲”实权，而关东军这时却想使张下野，对于不下达出动命令感到愤怒。

张作霖于6月3日向奉天撤退，但是张坐的列车在离奉天车站不远与满铁的交叉点上被炸毁。白川义则陆军大臣主张给予关东军占领“满洲”要地的权限，但是阁议驳回了。爆炸事件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校独自搞的阴谋，但得到了关东军的暗中支持。张当场被炸死，但在其子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之后才公布出来。

以为干掉张作霖就会加强日本对东北三省统治的想法，是完

全错误的打算。张学良很快于7月就向国民政府发出和平通电，决定实行三民主义，挂起青天白日旗。田中内阁发出警告令其停止，并任命奉天总领事吉田为外务次官，试图推行对华强硬政策。

田中内阁用紧急敕令把治安维持法改坏以及出兵山东等暴行使日中关系恶化，激起了舆论的斥责。民政党于6月下旬发表声明，认为维护权益虽属理所当然，但却斥责田中内阁的对华强硬外交是"轻举妄动"。但这个声明由于干部主张慎重而被修改了，于是在少壮派的压力下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该声明一方面指责国民政府废除日中通商条约通告，但又表示我们重视的是确保权益，而不是东北三省的政治组织如何。

但是8月1日，民政党的干部床次竹二郎以和党主流的对华政策见解不同为理由，声明退党，有二十五名议员响应，组成了新政俱乐部。这是接近元老的松本刚吉和久原递信相呼应进行的工作。久原的离间工作，后来仍在继续。

1928年末，田中内阁的政策陷入僵局。中国国民政府已于7月宣布修改不平等条约，通告废除日中通商条约。日本表示拒绝，但美国首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接着美、英、法三国承认了国民政府。在同年年末，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在东北北三省挂起了青天白日旗。

在1929年初的第五十六届议会上，民政党逼迫政府说明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然而由于和新政俱乐部结合而控制了半数以上议员席位的田中内阁，拒绝了民政党公开发表的要求。民政党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以追究真相为目的，而主要是为了倒阁来追究责任，因而只吵嚷一下"'满洲'某重大事件"就结束了。⑧ 修改治安维持法的紧急敕令也于3月5日得到了众议院的事后承认。反对这个敕令的前劳农党众议院议员山本宣治，当天晚上遭到了右翼的杀害。

当田中内阁靠绝对多数的力量硬是不顾众议院反对时，与它对抗的是贵族院。前面那个“优诏”问题使贵族院各派团结起来了，接近政友会的研究会也由于民政系议员的活动而分成了两部分，因此追究首相责任的决议案得以通过，除了预算和修改治安维持法案外，主要法案几乎全都以审议未完而搁置起来。在期待由贵族院来抑制政府党的横暴这点上，反映出政党政治的病根。

议会以后，田中内阁仍然想抱住政权不放，但它已明显地陷入僵局。在对华政策上陷于孤立、面对排日运动风暴的田中内阁，大大地后退了，缔结了解决济南事件的协定，为时已晚地承认了国民政府。少数党的民政党，当巴黎非战公约的“以人民的名字”一句成为问题时，挥起国体论，煽动枢密院，不择手段地攻击起田中内阁来了。

正当那时，炸死张作霖事件的善后处理成了问题。元老西园寺为了维持军队的统制，恢复国际信用，敦促田中首相严厉处罚犯人，田中也同意了。但是，陆军中坚层却团结起来拥护事件的主谋河本大校，白川陆军大臣、小川平吉铁道大臣等阁僚也坚决反对。因此，阁议决定说，日本人与事件没有关系，只追究守备上的责任，予以行政处分。田中上奏此方针时，天皇指责说和以前的上奏不同。于是处于左右为难的田中首相，于7月1日终于下台。田中内阁的瓦解，也是由于幕后的宫廷势力和军部活动所致。这不仅是因为所谓天皇斥责了田中首相，而是复杂的策谋的结果，民政党利用了陆军的强硬论，这是无可争辩的。接着组成的滨口内阁，根本不想再提这个事件了。⑨

① 朴和金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关东大地震以后被捕，受到了上述的判决。这个事件被认为是，为了报复对屠杀朝鲜人的非难，利用朴等人的英雄主义而判成了大逆罪。据推测，这张照片是担任审问的预审审判员立松怀清为讨得他的欢心而照的。参阅许世楷《朴烈事件〈日本政治裁判史录，大正〉》。关于分发一事，见山浦贯一《森恪》，

1940 年，514—519 页。

② 松尾尊兑《政友会和民政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 19 近代 6》90—92 页。

③ 加藤俊彦《本邦银行史论》，1957 年，309—313 页。

④ 据推测，和灭迹掩饰运动有牵连的，有1926年 10 月石田基检察官的横死事件。参阅松本清张《石田检察官的离奇之死》，《昭和史发掘》I，1965 年。

⑤ 朝日新闻社编《普选的大选概观》，1928 年，43 页。

⑥ 藤泽利喜太郎《大选读本》，1928 年，239 页。

⑦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时代》，1971 年，139 页。

⑧ 五味川纯平《战争和人》2，1965 年，关于这一点，书中对此事件引用议会的速记记录，详细说明了民政党的中野正刚的追究，在查明真相问题上，远不如无党派议员田渊丰吉的追究(144—156 页)。

⑨ 关宽治《"满洲"事变前史》，《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1963 年，326—327，330 页。

第四节　在经济危机的旋涡中

滨口内阁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

1929（昭和 4）年 7 月 2 日，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阁。曾任宪政会内阁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再任外相，负责重建对华外交和制定裁军会议的对策。为了准备预料中的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以下译作"金解禁"——译者），从党外起用了银行家出身、在财界有势力的井上准之助为藏相。

币原外相为了重建因田中外交破坏了的日中关系，把容易刺激两国舆论的"满洲"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而首先和国民政府之间，解决关税问题等悬案，以使日中关系好转。为此，特别任命同国民党首脑关系较好的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和中国方面会谈，但在11月为了和政府磋商而回国时，却莫名其妙地死了。① 后来日中关系一时呈现紧张，但 1930 年关税协定谈判有了进展，3 月草签了协定。这是一方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同时又在日本输出总额中占百分之四十四的棉制品等重要品种上，实行以三年为限（但杂品为一年）的协定税率。这是对日本单方面有利的协定，但是《朝

日经济年史，昭和5年版》(362页)，却倾述了强烈不满，说至少需要5年期间，对此不应让步。

滨口内阁的经济政策是以紧缩财政和坚决实行金解禁为基本方针。缩减财政支出，降低物价，实行金解禁，稳定汇兑行市，促进产业合理化，目的在于健全日本经济的体制。紧缩财政是和协调外交结合进行的，具体表现为促进裁军和刷新对华外交。无论为了紧缩财政或者为了在金解禁方面取得不可缺少的英美两国的金融协助，必须实现裁军，尤其是裁减海军。另外，为了确保对华输出，继续和平地维持帝国主义的权益，也必须推行对华协调外交。而在金解禁方面，还有金融资本的要求。在金融危机时，吸收了政府发放的巨额救济资金的大银行，正苦于游资过剩，希望用金解禁打开海外投资的道路。另外，日俄战争后发行的第二次四厘利英镑公债二千三百四十四万英镑(二亿三千万日元)的偿还期限迫近了，为了这笔借债的倒期，也必须实行金解禁。

滨口内阁作为实施金解禁的前提，号召大规模地节约消费，以文部省为中心掀起了教化总动员运动。这个运动和明确国体观念、礼拜神佛相结合，以实行节约消费为目标，为此，要动员地区的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和教化团体。这种教化运动和试图通过个别利益要求来组织群众的政党的本质是不相称的。滨口内阁依靠这种教化运动，确实"显示出没有自己的群众组织的政党的弱点。"②但这也反映了滨口内阁所处的历史地位。日本的政党政治从原内阁以来就过于露骨地追求个别利益，因而加剧了它的弱点，受到了舆论的批判。克服这个弱点的方法之一是彻底贯彻民主主义，但是现有政党并不想采取这个办法。另一个办法是抑制追求个别利益来恢复政党政治的信用，这一点倒适合官僚出身者占多数、尤其和金融资本关系很深的民政党的性质。滨口内阁在政纲中首先提出的"公明政治"，就具有这种意义。

同时，为了防备预料中的萧条的激化和失业的增加，为了防止经济负担的影响波及到民众，以“确立社会政策”为目标，设立了社会政策审议会。

滨口内阁组阁后，立即编制实行预算，贯彻紧缩财政。10月公布政府官吏减薪百分之十。这次减薪由于以司法官为首的官员的反对而撤回了，但是接着由安达谦藏内相实行了地方官的大调动。随后，积极揭发牵连政友会的贪污事件，前铁道相小川和前朝鲜总督山梨半造等人被检举了，滨口内阁的小桥一太文相也因政友本党时代的贪污遭到检举而辞职了。9月末，前首相田中突然死去，犬养毅被推举为第六代政友会总裁。

在以大选测验民意之前，于11月21日公布了金解禁的大藏省令，从下一年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由于是根据旧比价的解禁，从以前的外汇行市看来，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二十。

在公布金解禁省令约一个月以前的10月24日，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大暴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危机。政府断定这次经济危机造成的海外利率的降低，是防止由于金解禁造成的本位货币流出的好材料。然而，一进入1930年，经济危机便扩大到全世界，日本经济受到了金解禁的影响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

伦敦条约问题

1930年1月，召开伦敦海军会议，在日、英、美、法和意大利五国之间，讨论了限制补助舰和延长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限制主力舰的期间，由于上述理由，滨口内阁极其希望伦敦会议成功，元老西园寺等人也支持了这个方针。另一方面，加藤宽治部长、末次信正次长和由强硬派控制的海军军令部，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上，海军的主张由于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不得不作出妥协，这回把补助舰总括为对美七成、大巡洋舰对美七成和潜水舰七万八千吨称为三

大原则，对舆论鼓吹说如果缺乏这三大原则，国防就发生危险。

滨口内阁以若槻前首相和财部彪海相等人为全权，滨口首相在海相不在期间代管事务。会议在比率问题上迟迟不见进展，到了3月，美国提出相当照顾了日本要求的最后妥协案。全权团向政府请示是否应当接受这个妥协案。华盛顿会议时是实际上的首席全权加藤友三郎海相下定决心接受的，但是这次全权团没能达成一致，形成了政府和海军之间的问题。于是冈田启介军事参议官等人从中斡旋，接受妥协案，但交换条件是阁议决定将考虑海军的补充计划等要求。

这样，滨口内阁压制海军特别是军令部的主张，在签订伦敦条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滨口内阁没能贯彻这种政治上的成功。政友会和枢密院等，站在海军军令部方面进行反对，因此，政府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后退下来。

这期间，1月众议院解散了，2月在第十七次大选中，民政党获胜，占了绝对多数。当选者，民政党是二百七十三名，政友会不过一百七十四名。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分裂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只当选五名。

当4月召开第五十八届特别议会时，政友会犬养总裁和鸠山一郎等人说，以军令部反对的兵力员额，国民不能放心，以伦敦条约问题攻击了滨口内阁。这是政党政治家的一种自杀行为，是对右翼团体主张的、正在海军中间继续扩大的统帅权干犯论的进一步煽动。滨口首相也避免明确回答兵力员额的决定权属于政府。因为担心一旦明确说出了这一点，陆军会强硬起来，陆海军会结成联合战线。打倒田中内阁时陆军出了一臂之力，所以不能无视宇垣陆相的活动。③ 滨口内阁在政友会和军部、枢密院等特权势力相呼应的情况下，没有以国民的支持为背景，毅然决然贯彻立宪政治原则的勇气。

6月，加藤军令部长在帷幄上奏中，附上弹劾政府的奏文，直接向天皇提出了辞呈。有人散布了攻击政府和宫廷势力干犯统帅权的奇怪文件。7月，伦敦条约提交海军军事参议官会议咨议，在承认该条约时，政府答应按轻重缓急安排财政及其它，来实现海军所要求的对策。接着问题转到枢密院。平沼副议长和伊东顾问官等人策划想吓唬一下政府，但是滨口内阁在元老西园寺认为这是改革枢密院的良好机会的援助下，采取断然态度来对付。枢密院的审查继续了两个月，在最后阶段竟传出了由于枢密院的否决将发生政变的谣言，但审查委员长伊东终于屈服了，作了无条件通过的审查报告，于10月1日在正式会议上通过了。政友会期待枢密院否决、召开临时大会、掀起倒阁气势的愿望，完全落空了。

11月2日，批准了伦敦条约。但在政府忙于这个问题时，不景气深刻化，失业者急剧增加了。谣传政变也增加了财界的不安，促进了黄金的外流。此后，由于伦敦条约，浮余出六年间的保留财源五亿余日元的分配，牵涉到翌年1931年度的预算编制而成了问题。当时的不景气，加强了减税的要求，但是由于从来和海军的关系，有三亿七千四百万日元拨入了海军的补充计划。可以充作减税财源之用的是一亿三千四百万日元，翌年度的减税额为九百万日元，从再下年度起只不过二千五百万日元而已。

这样，在伦敦条约问题大致已经解决的11月14日，滨口首相启程参加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车站遭到阻击负了重伤。凶手是右翼青年佐乡屋留雄，作案用的手枪是右翼团体爱国社干部岩田爱之助亲手交给的，北一辉也牵连在内。但其幕后关系，没有充分追及就结束了。④

内阁的主要支柱、受到国民信赖的滨口首相，遇难后陷于危笃，这对政府说来是一个重大打击。在滨口遇难以后，由于江木翼铁道相的主张，币原外相答应到议会开会为止，担任临时代理首相，

但在党内，以安达内相为中心的政党派和以江木铁道相为中心的官僚派之间的对立尖锐化了。议员虽然是政党派占多数，但安达并没有牢固地控制了政党派。同元老、贵族院以及财界的关系，官僚派方面很强，他们和山本达雄等旧政友本党系结合起来，掌握了党的领导权。⑮

经济危机和日本

1929年秋，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1930年波及到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有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和黄金储备的将近半数，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成长的中心。这时期，由于垄断资本的庞大投资，产业合理化和劳动生产率都提高了，但是在这里面，生产过剩的矛盾发展了。经济危机从股票危机开始，发展成工业危机，而大资本则用限制生产和组织卡特尔谋求保卫自己，这样就使经济危机越发深刻化了。危机又进一步结合农业危机，使景气恢复就更加困难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农业生产的发展，战后的农业正苦于慢性的生产过剩，因而危机一发生，很难限制生产的农产品，价格跌落极为剧烈。

由于减低工资和解雇等资方的攻势，劳资的对立激化了。由于中产阶层的没落，失业者的增大和农民的贫困，社会不安深刻化了。由于关税壁垒等经济的国家主义的加强，国际对立也激烈起来了。在1930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国社党和共产党有了很大的发展。世界的黄金集中于美国和法国。经济危机，再加上社会不安和国际对立激化带来的国际资金的回收，招致信用危机。1931年6月，德国陷于全国性的金融危机，9月，英国停止了金本位。“由于金本位制的崩溃，资本主义失去了统一世界的货币制度”。⑯

尤其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因为面向出口的单一生产的农产品和矿业原料的价格极度暴跌，再加上其中大

都是采取银本位制的，而银价的暴跌，就使输入极端困难了。殖民地居民陷入了贫困的深渊。但是，银价的暴跌，也成了阻止外国商品流入的障壁。以低工资为武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民族资本却开始了新的发展。以中国国民革命为开端，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以工人、农民为中心展开的民族解放斗争，在经济危机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危机范围外推进了经济建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帝国主义各国增强了对苏联的敌视。

经济危机在1930年春也波及到了日本。正因为由于金解禁而汇兑行市得到恢复之后，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占输出首位的生丝，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和之后同人造丝的竞争，输出急剧减少了。丝价从1月到10月，降低一半，输出额减少到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其次是棉制品，销于中国的因银价暴跌；销于英领印度的因关税提高，输出也大为减少。这年的贸易，输出减少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输入减少百分之三十点二，入超达到了七千六百万日元。贸易不振加速了物价的下跌，但因海外的物价也下跌了，所以仍比较高。

在产业界，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实施限制生产和共同销售，力图维持价格，但很多企业被迫减少分红。减少资本、解散的公司也增加了。政府也于1930年6月，设置临时产业合理局，力求降低生产费。1931年4月，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促进了利用卡特尔的统制，加强了垄断资本的立场。

由于金解禁和经济危机，资本攻势加剧了。由于缩短作业、关闭工厂和产业合理化，失业者大量出现，就业者的工资也减低了。当社会政策审议会于1929年末，就承认工人团结权和罢工权的工会法案一事回答谘询时，全国的资本家团体一致展开了反对运动。对抗这个运动的工人战线的步调紊乱了。在经济危机深刻化的过

程中，安达内相以及内阁和执政党维持原案的姿态动摇了，1931年初提到第五十九届议会时，已经面目全非，变成劳资纠纷取缔法了。

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农业危机。由于生丝输出的急剧减少和丝价的暴跌，1930年茧价一落千丈，比上一年，春蚕减低五成，夏秋蚕减低了七成。10月丰收一成定局，米价也从每石二十七日元左右暴跌为十七日元左右。这样开始的农业危机，很长时期给与农村以深刻的打击。

经济危机一激化，在因此受到严重打击的中小企业和农民之间，批判紧缩政策的声浪高涨了。因此，政府对中小商工业贷款，救济农山渔村的失业，公立当铺的放款和补偿稳定丝价贷款等方面，以低利贷给大藏省预金部的资金。然而，只要金解禁和紧缩财政这个前提不变，指望对经济危机实行大规模的施策是不可能的。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因经济危机而遭到破坏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斗争扩大了。劳资纠纷的件数和参加人员，从1928年的一千零二十一件、十万二千人，增加到了1930年的二千二百八十九件、十九万二千人。象以温情主义出名的钟纺那样一向处于工人运动之外的大工厂，也发生了反对减低工资的罢工。在农村里，1926年以来趋向减少的租佃纠纷件数也转向上升，反对中小地主撤佃的纠纷显著地增加了。在中农中间也掀起减免租税、发放政府贷款和把欠款一笔勾销等要求，还有减低电灯费等垄断价格的斗争也扩大了。在大城市劳动市民阶层中间，发起了减低房租运动和减低电灯费及煤气费运动。在零售商人中间，由于反对百货商店的侵入，组织了地方政党。值得注意的是，要求打破现状的呼声扩大到素称“国家的中坚”的这些保守的中间阶层。然而，这种不满，没能以推进民主主义的形式吸收进来，而是积累起来之后，被拉到法西斯主义方面去了。⑦

在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中，工人运动的急进化和群众斗争的扩大化有了进展，但是，领导这个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工农组织却一再搞分裂。由于纠纷而引起的工人的急进化和联合斗争的进展，增强了左派的势力，在加紧镇压中，同旨在保护本派组织的右派领导者造成了分裂。共产党仍坚持反对合法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并经不断的检举已削弱了的该党领导们，断定革命危机已经到来，便走向了武装的五一劳动节等极左冒险主义。

“满蒙”问题和三月事件

从1930年末到1931年，“满蒙”问题紧张了。由于1928年末东北三省挂起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统一中国表面上是完成了，但事实上军阀割据仍在继续，内战频发。1929年，张学良力图单方面收回中苏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而引起了中苏纷争，在国境附近的战斗中惨败于苏军，中东铁路在中苏共管下重新开始运输。这显示了正在推行五年计划的苏联充实了军事力量，激起了日本陆军的危机感。

1930年春，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北方军阀兴兵要求蒋介石下野，当时张学良的动向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到了9月，张学良表示拥护中央，进行武力调停，促进了国民政府的统一。张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其结果推进了东北三省的中央化。东北交通委员会早就设想在满铁的东西两面修筑两大干线，把它和北宁线（北平——沈阳，以前的京奉线）连结起来，通到海港，以对抗日本，所以在这年7月，用德国资本开始建设锦州南边的葫芦岛港。现有的中国铁路也实行了联运。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波及到东北三省，以大豆为中心的满铁货物运输激减了。由于银价的暴跌，运费以银币计价的中国铁路，比用金币计价的满铁更处于有利地位。统治“满洲”的动脉满铁的

运费收入,1930年度急剧减少,1931年首次出现了创立以来的赤字。

日本帝国主义以满铁为中心的特殊权益为杠杆，集中对外投资的大半,用来推进对“满洲”的经济统治。苏联的抬头和中国统一的进展,“满洲”的军事意义又重新受到重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便站在怎样才能维护权益的十字路口上。

此外,遭受了经济危机打击影响的朝鲜和台湾,也发生了农民和工人的阶级斗争，并和民族独立斗争结合起来，取得广泛的发展,这更激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感。⑧尤其是在和朝鲜接壤的间岛地方，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朝鲜人的武装独立斗争发展起来。日本一面想根据治外法权,由领事馆警察取缔住在“满洲”的朝鲜人,以图镇压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一面想使中国承认它所否认的二十一条条约中规定的土地商租权，以便使住在“满洲”的朝鲜人充当统治“满洲”的助手。因此,“满蒙”问题更加尖锐化,朝鲜人被中国方面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遭到了民族的排斥。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末，币原外相和张学良开始了铁路谈判。其方针是彻底阻止建设重要的竞争线，但其他路线则和满铁缔结联运协定，使之成为满铁的培养线。对具有妥协性的币原方针,关东军和日本侨民大为不满,政友会众议院议员、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把“满蒙”叫作日本的“生命线”，猛烈攻击旁观这种危机的币原外交。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大阪朝日新闻》,虽然也排斥单纯的强硬外交，却认为“满洲”的重要权益对国民生存是必要的而主张坚决加以保卫。另一方面,在中国,恢复国家主权运动正在高涨,铁路谈判停顿下来。

滨口首相倒下了之后的民政党内阁,因内部纷争而不得进展。到了临近第五十九届议会时，以到议会开会前为条件的币原外相所担任的临时代理首相一事成了问题。12月,若槻、山本达雄，以及满铁总裁仙石贡所谓三长老劝告币原继续代理首相，但党内的

安达派表示反对，于是舆论集中地批判起来。[10] 但是，直到第二年 1 月滨口首相出席议会，决定币原仍继续代理首相。

1931 年初第五十九届议会，对滨口内阁来说，是首次的通常议会，但是首相遇难、内部纷争的滨口内阁，已经没有实现近年来的公约的干劲了。政友会以代理首相问题和伦敦条约问题追究政府。币原代理首相则答辩说："既然经过天皇批准，这就证明伦敦条约不是危及国防的"。政友会大加攻击，议会陷于混乱达一星期之久。政府让重病的滨口首相出席议会，才度过了议会的难关。

这届议会通过了预算案和减税法案等。但可称滨口内阁招牌的工会法案、租佃法案和妇女公民权法案，却在提到议会之前，因资本家团体等的反对，被删去主要内容，虽然众议院通过了，但在贵族院未审查完就结束了。对执政党占绝对多数的议会来说，成绩之差，是前所未有的。

政党内阁对经济危机没有提出象样的方策，使国民大为失望。恰在这时，开庭公审先前被检举的政党政治家的贪污事件，腐败暴露，加深了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

从 1928 年炸死张作霖事件起，在陆军中坚阶层中产生了想通过军部自身的直接行动，用武力来解决"满蒙"问题的动向。1929年 5 月，双叶会发展为一夕会，小畑、冈村和永田三大校占据陆军中枢部的要职。在发生统帅权问题、经济危机加深的过程中，主张排除政党政治和资本主义、以天皇为中心来改造国家以及把英美和共产势力赶出亚洲的民间右翼运动也活跃起来，还发生了上述阻击滨口首相事件。在继裁减海军之后，裁减陆军的舆论高涨中，1930 年 9 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校为中心，组成了"为了改造国家，行使武力也在所不辞"为宗旨的樱会。在参谋本部第二部 1931 年度形势判断中，附加了一项"要想积极地解决'满蒙'问题，就不得不把改造国家作为先决条件"。

第五十九届议会陷入混乱时，樱会的急进分子就和右翼的大川周明等人商议，企图把陆军中枢部也包括进来，策划政变。他们的设想是，在工会法案提到议程那天，大川联系无产阶级政党，举行群众示威，由军队包围议会，迫使内阁辞职，实现以宇垣陆相为首的军部内阁。但是，这个企图由于计划架空，宇垣也在中途改变主意，没有实现而停止。陆军中枢部参加了政变，政变流产后竟置之不问，这对陆军内部产生了强烈影响，结果促进了用直接行动改造国家的趋势。

滨口内阁在议会后的 4 月总辞职了。一时曾有拥立宇垣为民政党总裁的动向，但还是落到前首相若槻的头上，组成了第二届若槻内阁。宇垣没有留任陆相，而担任了朝鲜总督。在陆军幕僚层中，军事科长永田铁山的在改造国内之前、作为准备工作、应该想法用武力来解决“满蒙”问题的主张得了势。而且为了使国民采取同一步调，大张旗鼓地宣传“‘满蒙’的危机”。在构成民政党的进步的一翼——少壮派中，也产生了对政党政治不抱幻想、对法西斯式的国家改造寄与期望的动向。

在经济危机和“满蒙”问题深刻化的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走向侵略的冲动增强了。但是，日本资本主义无论在资本方面，还是在资源方面，都要依赖外国，特别是财阀不得不亲英美。[11] 政治力削弱了的民政党内阁，在这种事态面前没能提出任何打开局面的办法。在这种政治上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陆军中枢部和关东军以武力侵略“满洲”和为此而改造国家为目标，正在积极进行准备。

①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方面在关税问题上，要求中国给予特权和方便，中国方面则作为它的代价，希望日本带头废除租界以外的治外法权，但前途的困难是预想到了的。佐分利于 11 月 29 日在箱根的旅馆里横死，被认为是自杀，但币原外相等人对此怀疑。拙稿《币原外交中的政策决定》，日本政治学会编《对外政策的决定过程》，1959 年，95—97 页。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1，1971 年，172—173 页。

② 古屋哲夫《民众动员政策的形成和展开》，《季刊现代史》6（1975年8月），31—33页。

③ 元老西园寺也特别重视宇垣陆相的去留，在议会后因病辞职问题一发生，极力加以挽留。原田熊雄述《西园寺公和政局》1，1950年，50、81—83、93—94页，

④ 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认为，法院的态度"对右倾非常缓慢，多少有些故意袒护的倾向"，还口述道："他们大概是为了使国民诅咒政党政治，甚至于认为这是极好的产物"。原田前引书，227页。

⑤ 松尾尊兊《政友会和民政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9，近代6》，124页。此外，关于这个时期的政治体制，参阅伊藤隆《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1969年。

⑥ 铃木正四《经济危机和世界政治》，1963年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现代3》，171页。

⑦ 参阅鹿野政直《大正民主的暗流》，第二章，和江口圭一《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史的研究》，第5章。

⑧ 1929年10月，由日本中学生侮辱朝鲜学生引起的光州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朝鲜的抗日学生运动；在台湾，由于1930年10月反对日本苛刻的掠夺，雾社的原住民起义，日本出兵镇压下去。

⑨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1975年，53—55页。

⑩ 《东京朝日新闻》（昭和6年1月3日）论述如下。"按照政党政治原则，滨口总理具有众议院议席，如果说这是优点的话，那么现在请来党外的贵族院议员来代表政党政治，无论怎么说也是倒退"。"这样民政党的大事，也不征求党员的意见，仅仅根据三长老的策动而决定，对此进行反对，那是理所当然的"，"似乎只打起把三菱的老板作为党外长老，拥戴三菱的女婿作党外首相的御用政党的招牌"。

⑪ 关于这种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见远藤湘吉《军部和资本的对抗与和睦》，《思想》，昭和29年4月（江口圭一编《"日本法西斯"论》（历史科学大系12），1977年，265页）。

人名索引

（按首字笔画顺序）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 四 画

十 五 画

十 七 画

事 件 索 引

（按首字笔画顺序）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 一 画

十 二 画

十 三 画

十 五 画

十 六 画

十 九 画